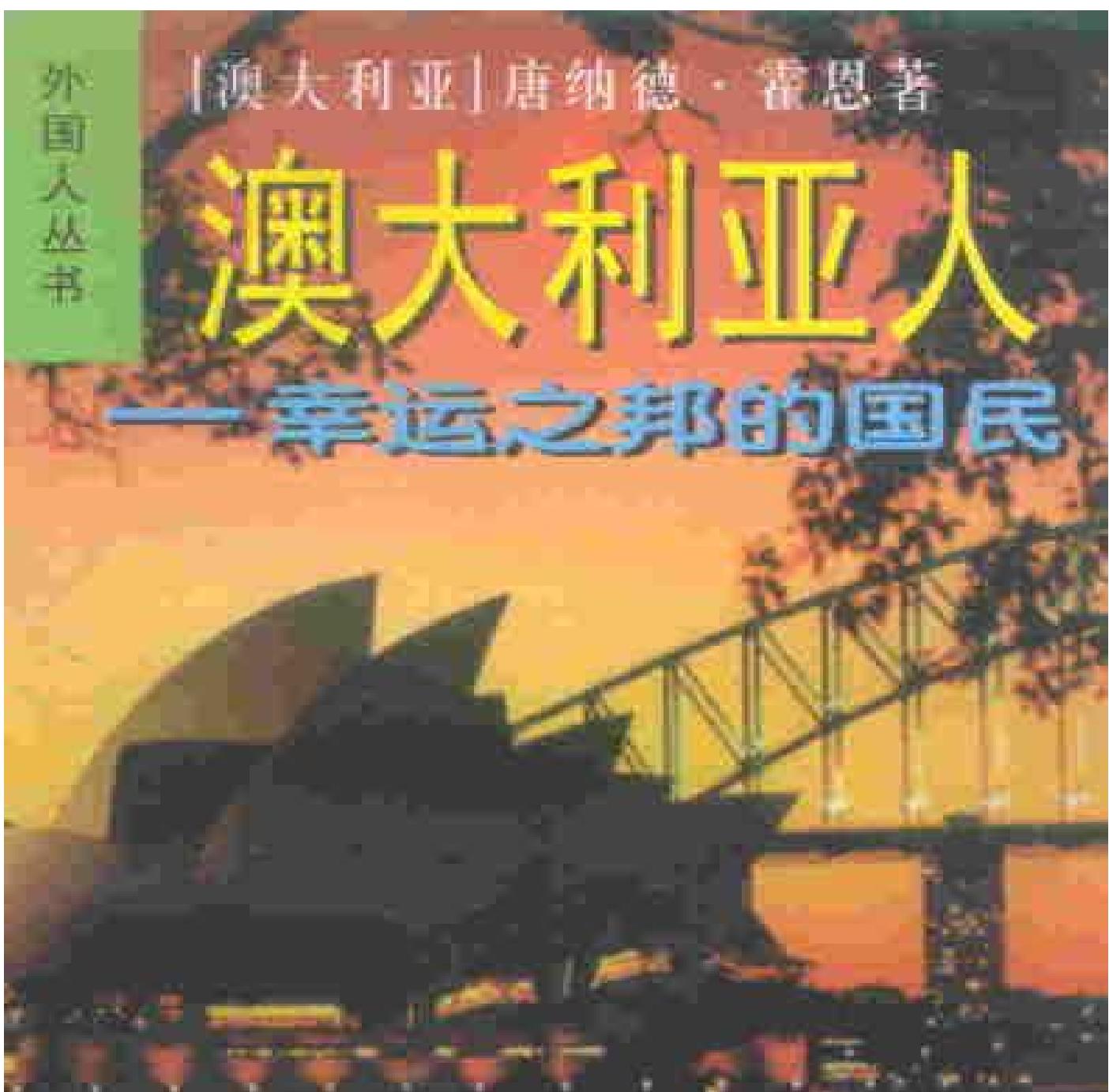


外国人丛书

【澳大利亚】唐纳德·雷恩·吉

# 澳大利亚人

## ——幸运之邦的国民



THE LUCKY  
COUNTRY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D761.169

2  
2

外国人丛书·外国人

[澳大利亚] 唐纳德·霍恩著

# 澳大利亚人 ——幸运之邦的国民

徐维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译者的话

去 澳大利亚之前,不止一次听说过澳大利亚如何富足,如何美好,似乎澳大利亚是一个世外桃源。80年代译者留学澳大利亚,后又执教于那里的高等学府,感到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幸运之邦。澳大利亚资源丰富,社会稳定,普通老百姓“一般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房子、汽车、牡蛎、芦笋罐头、龙虾、海滨度假、高尔夫、网球、冲浪、钓鱼以及花园”;他们崇尚平等、信奉“唯物主义”、珍惜伙伴情谊。当然那里同样也有悬殊的贫富差距,但是一般穷人的生活也过得不差。

不可否认,澳大利亚的富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得天独厚的辽阔疆域和矿产资源;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人通过辛勤开拓和努力发展,在短短的近200年的时间里,把一片处于石器时代的大陸变成了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作为地球村的成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我们的邻居,包括澳大利亚这样的远邻,光知道悉尼歌剧院、皇家十字区、树熊和袋鼠是远远不够的。本书是对澳大利亚人的生态环境、心理习惯、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在60年代面临的内外挑战的勾勒。在最近由悉尼的《悉尼信使晨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本书被70%的普通读者以及一批特邀的专家学者评为

澳大利亚在 20 世纪里影响最大的一部非小说类著作。霍恩当时写得很匆忙,线条很粗,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草率,但他生动地刻画出了澳大利亚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精髓和本质。此外,因为本书是写给他的同胞们看的,旨在警世,所以语多讥讽,毫无掩饰浮夸。本书初版至今已 30 多年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大利亚也已经旧貌变新颜。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人还是在做着同样的梦,他们的怀疑主义、享乐主义、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还是一如既往。他们面临的差不多还是同样的一些问题:如何确保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浪潮中不至于落后得太多,如何达到高度的社会和谐,如何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选择共和国还是保持君主制,沾沾自喜于幸运之邦的成就还是设法变成聪明之邦、创造之邦,等等。《澳大利亚人》不是一本沉闷的学术著作,但认真的读者自能体会到其价值,同时注意到作者不时流露出来的政治偏见。

为帮助阅读理解,译者增添了一些脚注,而书中未加标明的脚注则为作者原注。

1999 年 7 月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

## 第五版导论

当我在 1963—1964 年的夏天写《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时，谁能想象得到它在 30 多年以后会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当时的那些自封的权威认为肯定是不能的。一位评论家说它的寿命不会长过一个季节。在它出版的时候，确实没有人（我也绝对没有）预见到它立竿见影的空前的成功。然而，现在回顾起来，它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表达了以不同方式郁积于成千上万澳大利亚人心里却极少有人谈论、至少没有一股脑儿畅所欲言的许多想法。它写在孟席斯统治的末期，那时澳大利亚似乎正遇到麻烦。世界上到处是变革和挑战，而澳大利亚却死水一潭。《澳大利亚人》触及到了几乎所有的那些变革和挑战，并通过这种触及促进了某些变化。不过，为什么现在人们要阅读它，或者重读它呢？

重温“经典作品”总是令人好奇的，它本身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看看《澳大利亚人》里写的东西有多少在今天还和当时一样符合实际，它对当时澳大利亚的一些描写在多大程度上在今天依然准确无误。对于这种比较，许多年轻人可能比我更在行。例如：“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就是生活，而其他都虚无缥缈”；或者，

“澳大利亚人不想受语言的蛊惑。……他们听到华丽词句就像狗嗅到诱饵而满怀狐疑”；或者，“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是种真正的生活哲学。……澳大利亚人以捞取实惠为乐”；或者，“一旦被迫行动，澳大利亚人会高高兴兴地‘试一试’”；或者，“当你看到站在吧台周围的男人那么急切那么强烈地想显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时，你几乎觉得他们简直会扯开裤子的拉链”。假如这是一份考卷，我会问：在今天考虑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些论述还有用吗？请详细说明。

重温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当时的社会现象的颇有用的写照，包括提醒人们我创造“幸运之邦”这个词时的真正本意，即要人们注意澳大利亚的某些方面。但这一切不是为了怀旧。

不错，这本书是以“天真的欢乐”为题开始的。我还写到了“人生的意义体现在周末和假期”、“澳大利亚人普遍认为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是政府的工作”和“很少对成功作大肆宣扬”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那是写在 70 年代初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战后长期繁荣结束以前的一个较有信心、对一切较有把握的时期。在那些年代里，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都同时经历了奇迹般的高经济增长和高就业。在澳大利亚，“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好像是一个完美的制度的一部分。回想起来，对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那也是个由白色尖桩栅栏保护着的高枕无忧的时期。人们之所以能高枕无忧，是因为在那时人们可以期望找到能干上一辈子的活。

接着“天真的欢乐”的那节就是“没有头脑的国家”。除了提供一份可能是最简洁的关于在孟席斯年代失去的机会的记录之外，《澳大利亚人》还对澳大利亚的精英——尤其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工会领袖——进行了从非左翼立场出发的最为严厉的书面

抨击。这一抨击在我创造“幸运之邦”这个词的那段文字里达到了极点：“澳大利亚是一个主要由二流水平的人治理的幸运之邦，这些人沾了国家的好运的光。澳大利亚的生存依赖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尽管它的普通老百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它在所有领域里的大多数领袖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太缺乏好奇心了，以至于经常会措手不及。”

从本书能够学到的另一点是，曾经被说成是“激进”的做法现在看来可能显得相当温和、甚至保守了。在那些日子里，用两节文字写“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很“激进”的，可是如果现在读这两节，就会觉得它们写得很拘谨。我在书里揭露了当时依然在全面执行的白澳移民政策，指出其出发点是种族歧视，而不是出于对社会协调的合理要求。但我提出的改变这个政策所应采取的步骤，即与一些亚洲国家签订“在语言、教育和工作能力方面具有公开明确的同化标准”的移民限额协议，是保守的、试验性的。（不过，我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发生的种族变化，都将决定“澳大利亚的命运”的说法，也许是激进的。）事后回想起来，我提出的对土著居民在历史上受到的虐待作出补偿的措施也许现在在很多人眼里是反动的。书里在说到驱逐土著的“野蛮”历史应该“使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感到惭愧”时，是激进的。令人遗憾并出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惭愧仍会被视为过激。根据当时的进步的标准，我提出的唯一的补偿方法是通过“同化”，使土著居民能“采取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方式，作为单一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成员而生活”。我没有提出让土著保持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希望那样的话。这个想法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实际可能性而进入大众文化。

“同化”这个词在本书中有关非英国白人移民的那一节里也

用得很多。不过，只有在说到普通澳大利亚人自己向欧洲人同化和“最好的同化是在床上实现的”时，我才是取的它的褒义，这是自己的有点独特的用法。我没有提到“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少数民族”(ethnic)这个词那时也还没有移植到澳大利亚。看《澳大利亚人》里缺了什么是判断它的历史意义的一种方法，这两个词就是例子。(对某些人来说，正是这种缺乏或许会让他们留恋地回想起这些新词出现以前的悠闲日子！)在当时那种思想普遍枯竭的气氛下，我没有专门提到经济阶层。“公平分享”的概念在那时还真有点意义，经济上的不平等在那时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人们那时对待经济不平等的态度虽然一方面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则是满不在乎。记住这一点是很有启发的。书中有一节是关于贫困的，但因为那时对贫困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更新，我的讨论现在可能看起来有点敷衍了事。“妇女”也占有一节(用“妇女”作为独立的标题是非同寻常的)，虽然其中确实指出了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寻求事业机会还是休闲娱乐，基本上仍然是男人的事(如“当男人们站在酒吧里，憧憬着他们想与之睡觉的女人的时候，他们的老婆们在家里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幻想着新的床罩”)，但书里对两性问题的整个处理是粗浅的，所用的语言和形象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中性的。比如，当我想说明澳大利亚的男人可能比他们乐意显示出来的更恋家时，我说：“澳大利亚的形象是一个穿敞领衬衫的男子一本正经地品尝着冰淇淋，旁边站着他的孩子。”因为在当时描写澳大利亚人时通常是把他们描写成男人的。要过了 10 年，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书籍出现以后，这一段才被正确地(尽管是回顾性地)重新理解为性别歧视的表现。

《澳大利亚人》的价值在于它既是持久不变的真理的源泉，又是对过去的发人深省的简述。不过，今天重温它还有第三个更重

要的理由,那就是,在 90 年代,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忧虑和不满的时期,要是我们恰当地运用这本书,它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想指出一些令人高兴、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不过这种高兴是有所保留的。(事情开始走上正轨之际,也是聪明人得担心它们或许会出岔子之时。)这些变化是,从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这段时期里,澳大利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了一个公开地提倡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实际上也成了一个自由得多的社会。对这点只要想想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提供的它的褊狭和反自由主义的证据就清楚了(我原来提到了一些,下面是全面的概括)。

-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种族兼宗派仇恨,加上各自的阴谋集团和秘密组织,长期分裂了这个国家,而这种分裂前不久才停止。
- 那时土著居民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土著被看成是一个滋扰白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土著不再作为土著。
- 以肤色为基础的白澳移民政策几乎渗透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澳大利亚人》写作之际,在工党的政纲上,保持澳大利亚作为白种人国家的政策依然列为该党的靠近头条的政策。再早 3 年,在接手担任《公报》杂志编辑时,我在一片反对声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该杂志的口号“澳大利亚是白人的”。
- 出于同样的种族优越观的缘故,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提出的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独立国家的预言被人认为是“过激”的。
- 当时依然存在着迫使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迅速“变成澳

大利亚人”的目光短浅而又不容怀疑的政策。在上层人士心目中,澳大利亚在世人面前最大的骄傲在于它是属英国的。在重大场合,英国国旗飘扬在澳大利亚国旗的边上,似乎那样能增加后者的分量。我们以高唱“上帝保佑女王”来强调自己祖国的重要性。我们的总理孟席斯想要把澳大利亚新的货币单位称为“royal”<sup>①</sup>而不是“dollar”(元)。

- 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禁欲主义者是那时社会、文化以及私人生活标准的制定者。几百部书籍和电影被禁止;6点以后在酒吧喝酒和在餐馆卖酒刚刚才合法;流产和同性性行为是犯罪;离婚受到限制;星期天的体育比赛和竞技场外的设赌是非法的;除了主要为男人服务的酒吧,郊区没几个普通老百姓可以聚会的地方(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人》的一开始就写了悉尼一个新的老虎机俱乐部里兴高采烈的场面。这些俱乐部为城郊的社交生活提供了最早的突破);“性解放”、反越战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那时还没有到来。

所有这些能为目前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大多数时候,澳大利亚朝向宽容和自由化的变化多半是和平发生的。这证实了我在《澳大利亚人》里表达的信心,即“澳大利亚普通老百姓看上去有适应能力”,特别是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开始经受到的那么巨大的震撼:如劳工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对“国家发展”这一坚定信仰的挑战,以

---

① 英语 royal 意指“皇家”。澳大利亚在 1966 年将英式币制改为美式币制。——译者

及任何残剩的对“荒野”是澳大利亚一切繁荣和优越性的宝库的信念的破灭。（《澳大利亚人》里阐述的“根本”事实之一，是澳大利亚总的来说是个“城郊国家”。）问题是，尽管澳大利亚人曾经表现出实用主义的适应能力，90年代中期在公众生活中突然冒出的全然不讲实际的反对宽容的逆流，特别是种族主义的卷土重来，令人惊恐。

澳大利亚人的两个特点可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特点是，澳大利亚人接触宽容还为时不久，他们还没有多少在大庭广众谈论宽容的经验。而在一段迅速变迁的时期，也许太多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澳大利亚人说得太多了。《澳大利亚人》再三警告要注意澳大利亚人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和怀疑主义。要是进步人士使用多一些实用主义的语言，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他们期待太多的宽容，是不是因此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在宽容方面，澳大利亚的进步分子应该学习的第一课也许是要认识到，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爱每一个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愿意与我们不喜欢、但相信是跟我们同样的公民的人共处，仅此而已。（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实用主义、更充满怀疑精神呢？）在进步分子说得太多的同时，太多的保守人士变得太沉默寡言。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读《澳大利亚人》中“没有头脑的国家”那一节。那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老和年轻的保守派对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那种似乎一切都确定无疑的状态的留恋不仅仅是心地狭窄，这种留恋也显示出他们对那些日子的实际情况的懵然无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种强加于社会的表面上的一致性；而我们现在再也不向社会强加这种一致性了。保守分子在宽容方面需要学习的第一课是，维持社会协调并不意味着把早在《澳大利亚人》写作之际已经支离破碎的一致性强加于社会；宽容意味着承认

差异，不设法压制差异，以及寻找使全体人民不管有什么差异仍然能够共同生活的途径。

不够宽容该责怪谁？责怪有偏见的澳大利亚人民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接触到澳大利亚人的第二个发人深省的特点。

《澳大利亚人》里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也是认识澳大利亚的过去和将来的关键，是我们在又一次想从“人民”那里找出澳大利亚的毛病的根子以前，应该十分小心。我们在这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创造了一个词组“高罂粟综合症”<sup>①</sup>，以暗示是普通百姓的妒忌阻止了英明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而事实上真正阻止英明领袖人物出现的是领袖们自己的平庸。正如我那时所说的：“这种习惯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虽然普通澳大利亚人具有许多优良的、有些是相当突出的特点，但现在的那些精英基本上是二流水平的”。（澳大利亚的许多精英如今不再是二流的了，但我们中间还是没有涌现出多少有才华的政治领袖。）任何社会里都有害怕外国人的人、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满怀怨恨的人。绝对没有证据证明在有偏见的民族的名单中，普通澳大利亚人名列前茅（只要看看在欧洲发生的种族净化或法国的勒·彭<sup>②</sup>领导的“国家阵线”就知道了）。在 90 年代中期发生的，特别是在玛波案<sup>③</sup>之后发生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们变得手足无措。最高法院根据其对普通法的解释，就玛波案作出了

---

① 相当于中文里“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的意思。——译者

② 勒·彭(1928—)，法国政治家，其创建和领导的极右的国家阵线大力鼓吹驱逐在法国的移民。——译者

③ 玛波(1936—1992)在 1982 年和其他几个默里岛岛民一起，提起诉讼，指控昆士兰政府对他们部落世代居住的土地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占有是非法的。最高法院就玛波案的裁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众多类似的诉讼。——译者

若干判决，其中之一是，在英国人最初抵达澳大利亚之际，土著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如果那些支持最高法院裁决的人更谨慎精明一点的话，他们应该使用更冷静的语言，像凡夫俗子那样谈论普通法和产权，而不是高谈阔论重大原则，或者不光是高谈阔论重大原则。在另一方面，人们希望那些反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人声嘶力竭地发出的是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最后声音（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白人至高无上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使这些人大吃一惊）。在波林·汉森<sup>①</sup>的问题上，所有的政治精英都知道该如何反应，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即作为总理的约翰·霍华德<sup>②</sup>。要是他仔细读过《澳大利亚人》，也许就不会存有那个幻想，即 90 年代的政府还可以拿他自己青春时代那 10 年里的那种强加于社会的必然性当回事了。

“幸运之邦”这个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误用，似乎它是对澳大利亚的颂扬而不是一个警告。这种误用是社会上各种各样头脑空虚、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的胜利。在本书刚出版时，谁都不怀疑这个词的讽刺意义。但是，这些年来使它变得与其本意正好相反的歪曲，使书里大声疾呼的对澳大利亚的未来的三大警告再也听不到了。我的警告是：必须接受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挑战；在确定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方面需要有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大胆地重新评估国家的现状的必要性。这三个警告现在可

---

① 波林·汉森（1954—），1996—1998 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97 年创建单族党并担任领袖，主张限制亚洲移民，反对多民族文化主义，对土著居民成见极深。——译者

② 霍华德（1939—），1985—1989 年及 1995 年以来任自由党领袖，1996 年以来任总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公开批评波林·汉森反亚裔、反土著的种族主义立场。——译者

以照样重提，不过需要用更大的声音了。

很多澳大利亚人已经满足了第一个要求。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更多的交往已经帮助澳大利亚进入了其历史的第二章。无论是作为游客、专业人士、专门机构的成员、行政官员、艺术家、教育工作者，或者有时候作为实业界领袖，他们都在用《澳大利亚人》里所建议的那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澳大利亚。

但是那种把亚洲看成几乎仅仅是一架我们能从中赚到几块钱的经济机器的浅薄的实用主义，使本来富有创造性的觉醒黯然失色。在《澳大利亚人》里，我告诉心地慷慨的人们，不要把他们看到的不结盟的“亚洲”领袖们道德上的优势理想化。现在，我要告诉头脑精明的人们，不要把亚洲虎<sup>①</sup>在经济上的飞跃理想化。光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的社会比任何亚洲虎社会都更公平、自由、民主、宽容（对那些其政府虚构出可以随心所欲地套用的“亚洲价值观”为专制统治辩护的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根本的问题是“亚洲”这个词变得太大，含义太空。在《澳大利亚人》里有个警告，即不要以为存在着一个叫做“亚洲”的巨大的整体，因为在事实上只存在一个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国家的组合。这个警告今天看来不如我当时提出来时那样有效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90年代的一位总理<sup>②</sup>表现得好像是他一个人为澳大利亚人发现了“亚洲”（顺便提一下，他的“亚洲”似乎不包括印度次大陆）；而在他以后的一位总理<sup>③</sup>则可以在雅加达的一次国

---

① 指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省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译者

② 指保罗·基廷（1944—），1983—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1—1996年任工党领袖，1991—1996年任总理。他大力鼓吹亚洲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意义。——译者

③ 即约翰·霍华德。——译者

宴上宣布“澳大利亚不是亚洲的一部分”。这种政治上的愚蠢不仅使澳大利亚人感到困惑，甚至会在他们中间造成分裂；它还会重新唤起我在《澳大利亚人》里嘲笑过的那种对“没有个性无以辨别的庞大人群”的恐惧。如果你以为亚洲人全都一个样，你就会想象有个叫做“亚洲人”的单一的移民集团，它在亚裔聚居区里腐烂化脓，威胁着来个大发作，用乙型肝炎让我们其余的人全部遭殃。

我提到的第二个需要，即在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方面实现彻底的革命性变化以适应新的技术，现在甚至都很少提起。我在《澳大利亚人》里说过，如果没有根本的改变，澳大利亚在新的技术时代将无法维持其繁荣。当前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表明，我们的企业—政治—行政管理综合体对后工业社会的新发展趋势的反应比几乎所有其他类似国家的同行都迟钝。鲍勃·霍克<sup>①</sup>在1990年竞选政纲演讲中提到的“明智的国家”本来可能是个良好的开端，可是一旦念完了那篇演讲稿，他就对这个词组（一位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加进去的）避之唯恐不及，人们再也没听到过它了。

我们时时听到的“信息社会”这个词像一个有魔力的符咒，可是政治家们为之做了些什么呢？教育政策、科学政策、研究开发政策，所有这些在《澳大利亚人》里提出的规划，都变成了为压缩预算、增加利润服务的事情。它们本是必不可少的投资项目，但管账的人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现在不断有人提倡使教育向“职业化”靠拢的急救办法，不过这也没有抓住要害。在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里，最有实用价值的训练的基础是高质量的、培养学习的终身兴趣和能力的常规教育。在这一切的同时，几乎无

---

① 霍克(1929—)，1983—1991年任工党领袖，1983—1991年任总理。——译者

法置信的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始终是把食物、纤维、矿产送到几个“亚洲虎”国家去，让它们得以开发更多的巧妙玩意儿。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我的“幸运之邦”命题的核心部分，即我们的传统是那种殖民地的思想方式和以模仿为主的实业文化，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银行业方面；而这种传统使我们不能理解新观念是生产因素之一。在我们的殖民地时代，大家都认识到在农牧业和矿业方面的革新是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农牧业和矿业是我们的本行。但在制造业方面，一旦起了步，我们的目标只是通过建立一个受到严格保护的、差不多彻底依赖他人的创新的工业来取代进口。几乎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想到过或许我们也能出口工业制品，因为这不是殖民地的事。我们的银行系统的思想方式同样也是殖民地式的。所以，工业革命的两大引擎——制造业和银行业——并没有为澳大利亚积聚起动力。当然，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但跟其他国家的改进速度相比还差得远。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以救世主自居的保罗·基廷以及一大套经济方面的新理论的出现<sup>①</sup>，对经济“改革”的宣传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然而，这一改革主要着眼于取消从前的一些管制和保护，并没有考虑为制造什么新东西而创造条件。它也许是必要的，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必要的。但光凭这种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它偏离了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即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机智地抓住新型技术带来的机会，“国家会变得一蹶不振、落伍陈旧、不知所措、怨声载道”。

---

<sup>①</sup> 基廷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实现了澳元的浮动，取消了对金融市场的政府管制。——译者

当我在 1964 年在《澳大利亚人》一书中宣布，澳大利亚会——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时，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事实上，正是通过《澳大利亚人》，公众才得以对共和国的设想有所了解。不过，我当时的想法并不是从全面的共和国原则出发的（不管这些原则多么崇高伟大）。澳大利亚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澳大利亚人民的独立自主权的国家元首，这一点显然只是我提出的澳大利亚的第三个迫切需要的一部分，澳大利亚需要一种新的、目的明确的重新定位和自我界定的感觉，一种最终摆脱旧有束缚的感觉。

共和国的设想只是必不可少的观念更新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发展某种新的身份感、某种作为一个民族的全民感受，即可以被描写为——哪怕描写得不对——如此这般的一个民族，而且有时它的行动就好像它真是那样的一个民族一样”。在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中，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只要看看《澳大利亚人》里“文化突破”和“生活的写照”那两节，再想想从 50 年代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多么远的路，一切就清楚了。那时没有澳大利亚的电影业，只有一点点澳大利亚戏剧和屈指可数的作家，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差不多完全没有高质量的新闻媒体。

然而，在今天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能与文化生活中相提并论的创造性活动。在考察我们目前的领袖们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早已成为《澳大利亚人》的主旨之一的那个似非而是的悖论，即在某些时候，唯一的实用主义的途径是当个幻想家。问题是，跟孟席斯时代的末期相比，当今的政治领袖们对把实用主义风格与关于未来的可行的想象结合起来更加不感兴趣，而现在正是我们的好运终于到了头的时刻。

## 本修订版说明

本版，即《澳大利亚人》的第四个修订版，删除了加在 1971 年版<sup>①</sup>后面的题为“7 年之后”的跋。

## 第四版注

当《澳大利亚人》分别在 1965、1967 和 1971 年修订重版时，我在“第二版前言”的后面每次都加注以说明修改。以下是出现在第三次修订版(即第四版)里的注。

## 修 订 版

这是经过彻底修正并加以扩充的第一个修订版，包括一些全新或部分全新的小节。第三章里的“妇女”、“移民如何被同

---

① 指《澳大利亚人》第三个修订版。——译者

化”、“社会底层”和“天主教徒”是新加或扩充的。在第四章里，“外省人心态的澳大利亚”是新的，“共和国吗？”稍有扩充。第六章里的“企业家”是新的。第七和第八章里一半以上的材料是新的。第十章扩充了一点。最后增加了一个索引。

## 第二次修订版

考虑到 1966 年和 1967 年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罗伯特·孟席斯爵士、亚瑟·卡尔韦尔先生和苏加诺博士退出政治舞台以来的发展，第二次修订版根据事实作了彻底的修正。

## 第三次修订版

本版在最后增加了新的一章，以归纳自《澳大利亚人》初次出版以来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主要变化。书中其余部分也有所修正。



---

---

## 第二版前言

### 急就章

19<sup>64</sup>年12月，一位评论家在提到《澳大利亚人》的初版时说：“我毫不怀疑，霍恩的一通小小的发泄不到这个夏天结束就会被人忘了。”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澳大利亚人》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任何同类的书籍，而现在这一经过修正、补充了若干小节的修订版又已准备就绪。为什么有这么多澳大利亚人买这本书呢？我想，吸引这么多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写作的时候，6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的紧张状态左右了它的主要内容（或许因此也使它变成了比我原先计划的更好的一本书）。它总结了澳大利亚人目前面临着的大多数挫折和冲突。人们可能不同意书中对某些事件的观点，但大家都同意它正确地提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匆匆忙忙地写一本书，想描写一个动态中的社会，自然要比把这个社会写成浑然一体、静止不动、毫无变化来得费力费事。但是既然静止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投身于汹涌冲撞的社会激流中去，同时希望能够万事大吉。知道事情是如何

结局的，从而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乃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时事评论家的特殊权利。《澳大利亚人》对时事的关注，即对当前是什么样子的关注，可能会错误地强调某些方面。譬如，在写到澳大利亚的清教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时态：过去时？现在时？还是将来时？且不管其他一些更模糊的时态，这三种时态在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活动或不同的人时都可能是确切的。但作这种细微的区别是没有必要的，也许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描写出澳大利亚享乐主义和澳大利亚清教主义这两大互相对立的思潮，并指出享乐主义在目前比清教主义赢得了更多的胜利。书中在描写澳大利亚人对待英国、对待技术方式、对待“亚洲”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互相冲突的趋势时，也有同样的不确定性。谁也没法正确地使用时态并保证强调得恰到好处，因为整个对象在不断地改变着形态。不过，我们可以说，澳大利亚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比较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正在朝着较少外省人心态、更重视才华、对亚洲更感兴趣的立场转变。我们知道，现在无从预料的事件可能干扰这一进程，也许会使澳大利亚朝这些立场转变的步伐更加轻快敏捷，也许会使澳大利亚偏离这些立场，或者根本背道而驰。在本书初版里提出的一个预言，即澳大利亚在繁荣富裕方面将走上相对的下坡路，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这种衰退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即使某种具有超常规模和效果的社会调查能够就一年中某一天的社会作出精确的描述，我们也只会更加糊涂，因为我们得应付一大堆的材料，而未必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社会与民族一样，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即使是在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和立场观念中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互相矛盾的信念和态度；而我们的行为又往往与我们的信念相抵触，或者行为之间

会自相矛盾。还有，人们会随着境况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秉性”。对这一点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没有多花笔墨加以论证，因为那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人们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国家，同时也可以说在澳大利亚存在着种种差别，如经济上的不公正、机会上的不平等、诡上欺下等等。说澳大利亚是个人人平等的国家是符合实际的，说澳大利亚有势利行为也是符合实际的。我之所以费心在这里指出这一点，是因为现在在一些澳大利亚人中流行着一种时髦，即声称既然澳大利亚存在着不平等，那它就不是个不同寻常的奉行平等主义的国家。但事实正好相反，尽管平等主义的豪言壮语听到得不如从前那样多了，在澳大利亚人真正关心的一些事情上，像在人际关系的总的气氛（如在工作中）和娱乐消遣的条件方面，有证据表明澳大利亚正在变得比以前更为平等。谁要是不能凭自己的感受能力觉察出像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国家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气氛与澳大利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气氛的差别，他的感觉官功能一定退化了。

如果人们写关于自己的国家，并意识到它当前面临的紧张状态，那么在揭露其社会弊病时，他们就难以做到公正，尽管这些弊病是其他国家也常见的，或者是出于人类共性的。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人》可能不很公正。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在每次讨论澳大利亚的某一点时把其他所有国家都逐一点到，以通过比较看澳大利亚的成绩如何。这个公正与否的问题有时只能留待读者凭他们健全的理性和经验去解决了。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自己的比较。（例如，一位外国来访者指出，能够与澳大利亚相比的最富有启示性的国家是以色列！）在某种意义上，除新西兰以外，没有任何国家能与澳大利亚相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唯一的两个在战略上属于亚洲的“西方”国家（如果有

风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草也会摇晃）。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依附于他人的、派生的、二流的“西方”国家，同时又碰巧在战略上是亚洲的一部分，正是它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它不能公正看待。澳大利亚可能必须比其他同样是依附于他人的、派生的、二流的国家像比利时和加拿大“强”些。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并且始终致力于物质上的满足，所以把它跟那些在这个意义上不那么幸运、但人口相仿的国家作比较，从而沾沾自喜，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澳大利亚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国家比南越、阿富汗、苏丹或秘鲁富裕稳定而弹冠相庆。只有跟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国家作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根据规则，就经济环境而言，澳大利亚在这类比较中情况越来越糟糕。

除澳大利亚侨民外，《澳大利亚人》一书销售的地方离澳大利亚越远，就有越多的人似乎觉得它是在赞美澳大利亚。一个美国人写信给我说，他在读了《澳大利亚人》之后终于下决心移居澳大利亚了。而澳大利亚人则认为它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祖国。它确实严厉地批评了澳大利亚，但不是批评澳大利亚的普通老百姓，它批评的是澳大利亚的精英。在修订这本书时，我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这种批评。在澳大利亚掌权执政的人不甚高明，这对于任何读过关于澳大利亚的书的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如此可怕的细节则可能是《澳大利亚人》的特点之一）。在这本书里找不到的是澳大利亚精英们惯用的自我辩护，即他们别无选择、不能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个主张平等主义的国家里，精英必然是二流的，必然反映出被认为是人民的平庸的素质。这种流行的观点使对未来社会的预测蒙上了一种时髦的灰暗色彩。但是，澳大利亚的经验未必支持这种观点。澳大利亚的精英之所以会是二流的，很可能不是因为澳大利亚人际关系中普遍的人人平等的气氛，而主要是因

为他们自己的外省人似的稟性。

本书的主旨是对澳大利亚作一个概述，“幸运之邦”实际上是个时隐时现的次要主题。总的说来，这不是一本论辩的书，它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也没有单纯不变的议论方式。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观察角度看一个国家。我逐一尝试了 6 个角度。第一章描写了两个颇不相同的澳大利亚的整体“形象”。第二章探索澳大利亚人中间的共性。第三章探索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差异。接着的两章注重于澳大利亚跟英国、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它的影响。再后面的四章从另一个角度，即社会阶层的角度，如企业家、工会领袖、政治家等等，来观察澳大利亚。最后一章讨论其他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不想使整本书太千篇一律，所以故意采用了不同的议论方式。



---

## 前　　言

### 来自亚洲各地的人

我们坐在卡尔顿大酒店的露天平台上喝着威士忌，四下是香港辉煌的灯火。招待我的中国人在谈论着“白澳政策”，他说：“小心中国人，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要是让太多的中国人进入你们的国家，我们就会把你们取而代之。”在台北，我和一位中国人一起喝咖啡，我告诉他，我们常常想知道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亚洲学生回国以后关于澳大利亚说些什么。“你们欢迎亚洲学生去你们国家学习？”“现在大概有 12000 名亚洲学生。”“12000 名！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在菲律宾大学的一次午餐上，我们在谈论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在重新划区时把澳大利亚划作了亚洲国家，坐在我旁边的菲律宾人说：“你们为什么还保留着君主制？亚洲人不信任你们，因为你们是君主制。你们应该脱离英国，宣布独立，成为共和国。我们都对澳大利亚有兴趣。那是一个辽阔的大陆。在一百年里，那里将会住满来自亚洲各地的人。”

1963 年初的远东之行以后，我回到家里，决定值得为澳大

利亚写一本书。在将来，如果能知道这个辽阔的大陆在被来自亚洲各地的人住满以前的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挺有意思的。那一年里我后来又出了几次国，这些旅行使我得以根据其他国家人民对我的祖国的凌乱无序的反应再次重新对它进行评审。

斐济的殖民官员说，他们发现要在他们管辖的殖民地激起对于堪培拉的兴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火奴鲁鲁有个一半日本人一半夏威夷人血统的女孩，在一个夜总会的歌舞节目里扮演一个塔希提舞女，她问：“住在澳大利亚跟住在美国这儿一样舒服吗？”在新加坡古德伍德公园酒店的游泳池畔，一个马来人跟我聊天，他说他最好的朋友中的一些是华人，然后就询问我在悉尼的华裔商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在曼谷，我被问到澳大利亚的土地改革和农民的生活条件。第二次到香港时，在一次晚餐上，有个英国人试图提议为澳大利亚把亚洲人拒之门外而干杯，他认为澳大利亚是文明在东方的最后堡垒。在东京，我对一个日本妇女说，现在许多澳大利亚人把自己看成是亚洲人。她说：“不，这不对。澳大利亚是在大洋洲，不在亚洲。不过你们跟我们一样进入了文明社会。”她接着说她乐意到澳大利亚来滑雪。回到马尼拉，在塔尔湖畔吃午餐时，一个年轻的菲律宾人提醒我澳大利亚把菲律宾的甘波亚中士驱逐出境的事。我说：“可那是 40 年代发生的事。”他说：“哎，不，霍恩先生，我记得那事。那是去年发生的。”

在德里，人们在议论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种族怎么才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人，以及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大英帝国的老牌成员”如何比加纳这样的新加入者有多得多的共同性。在亚历山大的一个私人海滩，两个正在考虑移民到澳大利亚去的黎巴嫩人告诉我说“黑鬼”（指埃及人）不到这个海滩来，然后问：

“你们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对付黑鬼的？”我说：“土著？噢，我们现在正在开始给他们各种公民权利。”其中一个马上说：“你们不能给黑鬼民权。我不会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在雅典，一个希腊人朝卫城<sup>①</sup>的方向点了点头说：“那都是过去。我们这儿的人都爱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未来。”在罗马，一个意大利参议员对澳大利亚不屑一顾：“嘿，你们那里没有共产党的问题。”在柏林，一个反共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告诉我中国对“西方”不具有侵略性，当我回答说中国毫无疑问对“东方”包括澳大利亚具有侵略性时，我们意见统一了。在法兰克福一个花园里的露天啤酒酒店，我碰巧遇见了一些熟人，有人问我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哲学，在我解释了一通之后，那人说：“这么说来你们那里都是存在主义者了！”

在英国，我回到以前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家用电器、浴室和宾戈游戏<sup>②</sup>好像有点澳大利亚的味道。在伦敦，一位编辑说，当英格兰废弃君主制的时候，王室大概会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在纽约，一个朋友解释为什么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澳大利亚并不存在：“美国人对澳大利亚的兴趣还不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埃及人的兴趣那么大。在美国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形象。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除非知识分子创造出一个形象来。”在那里的两次鸡尾酒会上，我多次被称呼为“你们英国人”。在旧金山的时候，正好那里在举行市长选举，当我试图说明我们在悉尼并不和旧金山同时举行市长选举时，酒店的女招待怎么也不肯相信。

---

① 古希腊文化古迹，在雅典西南一陡峭的山冈上，主要有帕提侬神庙、伊瑞克先神庙和雅典娜大雕像等残迹。——译者

② 一种许多人一起玩的赌博游戏。——译者

除了在那些依然把澳大利亚看成是移民的机会和未来的希望的地方，世界对澳大利亚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精神生活是二流水平的，而世界的形象是由知识分子塑造的（然后由其他各种人去传播）。澳大利亚大部分社会生活质量之差令人惨不忍睹；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普通老百姓正在实现着他们的愿望；而对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少见的事。澳大利亚人民发展了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风格，只是这种潜力在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是一个比美国更“新”的国家，它对未来的构想使美国望尘莫及，因为美国社会容忍太多的不平等。只要澳大利亚不自暴自弃，它或许正是这个世界可能发展成的模样的写照。世界将变得像澳大利亚一样这种可能性应该引起全世界大多数有教养的民族的高度警觉；可以使它们感到宽慰的是，澳大利亚可能正要经受——或者已经在经受——变化，甚至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进了五花八门的差异，没有这些差异，至少对个别人来说，生活会变得几乎难以忍受。对变化的兴趣在逐步增长，因为人们认识到，要是变化不很快地发生，以其目前的状态，澳大利亚很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

---

## 目 录

<b>第五版导论</b> .....	I
<b>第二版前言</b> .....	I
<b>前言:来自亚洲各地的人</b> .....	I

### **第一章 澳大利亚之梦**

<b>天真的欢乐</b> .....	1
<b>没有头脑的国家</b> .....	6

### **第二章 何谓澳大利亚人?**

<b>第一个城郊化的国家</b> .....	10
<b>公平点儿,伙伴</b> .....	15
<b>享受生活</b> .....	22
<b>任其自然</b> .....	27
<b>平庸的骗子</b> .....	32

### **第三章 差异感**

<b>十一个城市</b> .....	36
--------------------	----

荒野	44
清教徒禁欲主义者	49
天主教徒	52
势利之徒	57
文化突破	61
妇女	69
移民如何被同化？	73
社会底层	77

## 第四章 在英美之间

迷失方向	80
指望英国	82
指望美国	88
外省人心态的澳大利亚	91
共和国吗？	95

## 第五章 与亚洲共存

什么是亚洲？	99
实力态势	103
亚洲的形象	107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白澳政策	112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土著居民	116
对大洋洲的态度	118

## 第六章 工作的人

企业家	122
-----	-----

广阔的天地 .....	131
工会 .....	135

## 第七章 掌权的人

谁统治着澳大利亚？ .....	143
学自美国的联邦制 .....	144
学自英国的议会制 .....	148
澳大利亚的四党制：为工党运动而奋斗 .....	151
澳大利亚的四党制：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的 “紧张关系” .....	160
行政机构 .....	163
压力集团 .....	169
他图的是什么？ .....	174

## 第八章 孟席斯时代

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	177
孟席斯时代 .....	183
孟席斯之后 .....	188

## 第九章 观念的形成

新闻文化审查 .....	191
学校 .....	192
生活的写照 .....	195
“学者们” .....	197
新闻界 .....	201
知识分子 .....	205

## **第十章 幸运之邦**

靠运气生存 .....	214
幸运能否持久？ .....	216

## 第二章

# 澳大利亚之梦

## 天真的欢乐

在某种意义上，悉尼可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城市。在它的一个郊区的澳新军团大道 558 号 A 座大楼里，有个南悉尼青年联盟俱乐部。这是一个在今天的某些国家里仍会被看作是劳工俱乐部的地方。它的几千名拿平均周薪的男女成员坐公共汽车、出租车或私家车来这里玩老虎机。人们或坐或站，拉着老虎机的扳手，身旁放着啤酒。顾客平均每天总共能从老虎机里赢到几千块钱<sup>①</sup>，而俱乐部在扣除所有成本后，每年的获利以千百万元计。它把利润投入附设的酒吧、餐馆、游泳池、壁球室、蒸汽浴室、体操房、保龄球道、楼顶上装备着价值 12 万元的空调机的玻璃花房、小图书馆和托儿所。俱乐部每星期有 4 场舞会，其中两场同时在星期六举行。它每年在歌舞表演上耗费 52000 元。它还有一个停车场、6 个网球场、以及“南半球最漂亮的弹子房”。这里的基调是城郊的高雅品味：剑兰花瓶、金鱼缸、嵌木地板、素淡柔和的色彩、轻质木制家具和一幅对妇女杂志的文化水准表示敬意的土著壁画。人们穿着随意，男人穿衬衫短裤或西

装，女人穿宴会礼服或松紧裤。这个俱乐部代表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平等和追求幸福的古老理想，即任何人都有享受欢乐的权力。

无论从社会外表，还是从普通百姓所知道所关心的一切，澳大利亚都可以说是最讲平等的国家之一。它不受明显的阶级差别、等级制度、种族主义造成的不安或专制统治造成的恐怖的折磨。出租车司机经常喜欢乘客跟他们一起坐在前面，最好还给点小费。老百姓认为自己比谁都不差，什么人假如不喜欢这种态度，不喜欢老百姓也欣赏他自己欣赏的东西，他就不会喜欢澳大利亚。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博爱的精神，尽管有时伴随它的平等的真实意义正在消失。在财富、权力和机会等方面都仍然有不平等，但平民百姓赢得了——或者说是设法给了自己——一个深刻的、令人心满意足的、观念上的胜利。澳大利亚是一个大部分人接受博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

社会上也有谄上欺下的丑行和争权夺利的紧张，但那都发生在暗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不管老板是多坏的混蛋，他也总是袖管卷得高高的，看上去就像哥儿们中的一个；他通常不会公开地向那个“为他干活的人跟他一样强”的信念挑战。普通澳大利亚人可能恨他们的老板，或者可怜他们的老板，但不再妒忌他们的老板。他们把成功归之于好运或精明的管理（后者为成功提供了一个准确得多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在经济上出人头地的好处有时显得微不足道，不值得费劲；他们也看不出那有什么社会上的好处。澳大利亚不是个竞争奋斗的社会。普通百姓根本不操心有钱人或读书人的作为。他们一般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房子、汽车、牡蛎、晒得黝黑的皮肤、

---

① 本书中提到的货币单位均指澳元。——译者

芦笋罐头、龙虾、海滨休假、高尔夫、网球、冲浪、钓鱼以及修整花园。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意义体现在周末和假期。住在海边城市的澳大利亚人可以过上类似地中海或南太平洋人的生活。在一些人眼里，他们看上去很懒。其实他们并不懒，他们只是对工作不总是很认真罢了。休闲时他们干什么都卖力。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以人口比例计，它拥有的汽车和电视机比任何地方都多。它的住宅私人拥有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超过它的人口。但是所有这些都还没有显示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的平等程度。它的平等化不仅表现在很少有极富或极穷的人，更表现在其人均收入并不是单纯的平均数，而是接近典型收入水平的平均。

当澳大利亚人在大选那天在设在学校和各种大厅的投票站前排队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澳大利亚从 1860 年起就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制度，是世界上最早证明了在当时被攻击为标志着“自私、无知、民主”的胜利的制度下，社会依然能够生存的几个国家之一。只有十个左右的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一百多年来由稳定的、民主的、被绝大多数人民认定为合法的政府有效地治理着<sup>①</sup>。跟这其他几个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对派（除了小小的共产党）是不准备使用任何非民主手段取代政府的。确实，在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政治民主：不到 1300 万人口，却有着 6 个州政府和 1 个联邦政府、13 个立法议院（包括上院）、700 多个政治家、大约 80 个政府部长。不参加选举将被罚款的强迫选举制度使“毛驴投票”（即不分青红皂白顺着候选人名单从上往下选）成为政治计划中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

① 外国军事占领期间不计，只有英国、美国、加拿大、低地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瑞士和新西兰够这个标准。

选票优先顺序制度(投票人必须给一个议员席位的每个候选人一个优先顺序,在对所有优先顺序加以统计后得到多数票的候选人获胜<sup>①</sup>)给了那些令两大主要政党的党魁们头痛不已的小党派“公平对待”的机会。

澳大利亚人是如此地随和,盲目狂热与他们无缘,他们也不祈望伟人,因而社会非常稳定。人们依赖有序的改革以纠正他们意识到的不管什么弊病。澳大利亚政府的特点之一是临时应付,尽可能回避棘手问题,以便不至于突然发生终审判决的问题。连曾经相当强烈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现在也变得犹犹豫豫,不再明确自己的意义和目标。再也没人告诉澳大利亚人他们是谁了,而他们也显得毫不在意。他们有家庭和闲暇,他们知道如何去度过一生。他们看来清楚他们是谁,只是他们对随和宽容的理解与知识界和政界的时行理论并不相符,所以澳大利亚的作家或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人民时,经常谬误百出,或者带着蔑视。不管澳大利亚人会表达什么样的个人意见,今天的社会总的来说比从前宽容得多了。人民大众可以享受人民大众通常希望享受的所有公民权,唯一的例外是他们不能任意享受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即过得轻松愉快,尽管这听起来有点悖理。一般而言,人们不尊重当局,不相信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常常憎恨警察。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澳大利亚人远比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更能接受当局,不过那也许只是出于他们对当局的无所谓的态度。社会上能看到好斗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但比以前少了。人们变得好斗往往是因为他们先感觉到别人在挑衅。正常的好友关系通常很快就能恢复。

---

① 得到第一优先票最多的候选人不一定获胜,如果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得到的第一优先票比他少,却比他得到多得多的第二优先票的话。——译者

澳大利亚人非同寻常的公开坦率使惯于清规戒律或恭顺服从的人印象深刻，或者惊骇不已。直言不讳的真实有时让来自善于转弯抹角的文明的人们感到恶心。澳大利亚人抱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即人类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平凡的。从这种信念派生出一种对不拘礼仪和非正规化的崇拜，从而使各种纪念仪式只能在角落里由自觉参加者悄悄地举行。参加纪念仪式的澳大利亚人都是自觉的。他们在战场上的军队肯定是世界上向长官行礼最少的。真正的全国性的节日是澳新军团日<sup>①</sup>、圣诞节和元旦。澳新军团日是老百姓的节日，圣诞节是家庭的节日，元旦是快活时光的节日。其他节日只是不用上班的日子（对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则另当别论）。在纪念澳大利亚人 1915 年在加利波利的登陆的澳新军团日，全国所有城镇的普通老兵们都穿着非常普通的服装上街列队游行（不少人步伐不齐），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然后许多人去喝个烂醉。澳新军团日的主题是死亡和牺牲，然而它的吸引力则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的共通性（即使死亡也是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手段）和在逆境中凝聚成团的必要性。它不是什么宣扬爱国主义的节日，而是如彼得·科尔曼<sup>②</sup>在《公报》杂志上所称的“一个部落节日”，这也正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无骄傲之气而富战友之情的澳新军团日。

澳大利亚没有重大的政治对话，也欠缺排疑解难的激情，甚至往往不肯直面存在的问题。它没有什么恢宏的思想理论体系。政治通常被看作是别人的事，并且是肮脏的事。对许多人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1915 年 4 月 25 日，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组成的澳新军团（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缩写 ANZAC）作为大英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向土耳其北部加利波利的悬崖峭壁发动强攻，随后据壕固守，坚持达 8 个月，最后失败撤退。在这次战役中，澳新军团死亡万余人。——译者

② 科尔曼（1928—），政治家、记者、出版家。——译者

来说，参加体育运动或观看体育比赛才是赋予人生最基本意义之一的活动。在体育以外的生活中以各种方式掩饰伪装着而无法如实流露的感情，如忠诚、狂热、追求快乐、竞争、雄心、奋斗，在体育中都一泻无余。整个人生的奋斗变成了一场比赛。伯特兰·罗素<sup>①</sup>在1950年说，澳大利亚为人类指出了通往未来的更加幸福的命运的道路。他说：“我在离开你们国家的时候，要比我刚来到你们中间时对人类抱有更大的希望。”詹姆斯·弗劳德<sup>②</sup>1886年在提到澳大利亚人时说：“你很难跟那些只追求天真无邪的欢乐的人争吵。”在炎热的夏日里，人们在海滩上晒太阳打瞌睡，或者迎风破浪游泳，就像在传教士没到以前怀基基海滩上的夏威夷王子。不过这个象征不符合澳大利亚人的口味。澳大利亚的形象是一个穿敞领衬衫的男子一本正经地品尝着冰淇淋，旁边站着他的孩子。

## 没有头脑的国家

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快乐的国家写本书呢？原因之一是它在某些方面并不那么快乐，如它的源远流长的清教徒<sup>③</sup>宗教道德观念、获得成功的庸碌之辈的沮丧和怨恨以及许多平民百姓生活的绝对无聊。通过研究澳大利亚，人们能对快乐增进了解。另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一些对澳大利亚人来说非常实际的基本利益，即澳大利亚能否维持它的快乐？使之如此成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否同时也削弱了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减缓了它赖以生存

①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② 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译者

③ 源于16世纪英国国教内部的改革运动，主张清除国教内残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缛礼仪，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译者

存的本能反应速度？还有个原因是，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是没有头脑的。富有睿智的生活是才出现不久的新鲜事物，还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与实际生活挂上钩。社会上层给人的印象是愚蠢的洋洋得意。无论在社会中下层在智慧上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上层社会的气氛总是乏味之极，以至于在精明的旁观者看来，澳大利亚民主生活的特点也许已经被糟蹋了。这是反知识的胜利。

我这不是为让知识分子舒心而作的专门辩护；我也不会反对怀有正常欲望的普通百姓对“富庶”的心满意足。我会接受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生活的现存态度，尽管这些态度并不都是我自己所倾向的。我们要问的是：在现代社会，一个如此强烈地排斥各种思想见解的国家能保持住所有的繁荣和幸福吗？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即澳大利亚真的那么排斥各种思想见解吗？还是呈现在它面前的思想见解本身有什么不妥？

哪怕世界对澳大利亚一无所求——澳大利亚人经常认为，既然他们不管世界，世界也就不该管他们——这个国家的繁荣也可能消逝，至少与其他国家相比会这样。在全球范围里，未来的物质繁荣的基础很可能在于敏于学习和理解的受过教育的人民。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培养某种聪明才智的需要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关系的紧张，在澳大利亚则尤为如此，因为聪明才智会被视为非澳大利亚的东西。除了有限的几个有事业心传统的领域，澳大利亚不是一个有伟大发明或独创性的国家。它一贯利用别人的创造发明，它的自吹自擂多半是寄生虫的自吹自擂。作为一个移植的社会，它与产生创造发明的社会在运作上有足够的相似性，因此能够利用这些创造发明而不至于在效率上蒙受太大的损失。但是，随着技术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澳大利亚可能会被甩在后面。它也许

无法明白周围在发生着什么，也许不具备采用新方法的技能。目前外国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公司的迅猛势头可能还会加速，澳大利亚弄不好到头来又会变成经济上的殖民地国家，由外国人管理它的主要经济事务。就制造业而言，它现在距那种状态已经不远了。

澳大利亚还面临着数量惊人的其他的挑战。如巴拉·沃德<sup>①</sup>在《纽约时报》上所说，这些挑战本身没有一个 是澳大利亚独有的，但其他“西方”国家不必应付这么广泛的、各领域互相交叉的、20世纪中叶典型的窘困处境。人们还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还可能独一无二地意识不到这些挑战的性质。这些挑战是本书写作的又一个原因，而罗列这些挑战就是罗列世界上当前正在谈论的主要议题：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崛起、新兴国家稳定性的缺乏、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贫困和人口过多的压力、食物过剩、在发达社会保持增长速度的困难，以及资源贫乏的国家发展经济的困难。

澳大利亚为研究20世纪中叶的主要困境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例，它值得同情。除非有雄厚得多的实力——而这看来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大量地增加人口——许多问题都是它无可奈何的，它能做的只是祈望万事如意。毛病在于，澳大利亚在解决它的任何问题上都是慢慢吞吞的，没有大辩论，几乎没有切题的公众讨论。当权者显得无从激发自己的想象力，更谈不上通过激发其他人的想象力而使他们逐渐了解这些挑战。政府无法与低能的官僚机构拉开差距；没有几个“新人”能聚在权力场上，为国家构思崭新的形象，从而使变化成为可能。高踞顶峰的那些人，那些部落领袖们，都没有受过应付这样的困境的训练。

---

① 沃德(1914—)，美国作家、学者。——译者

他们的想象力好像早被国家的成就消耗尽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即早期澳大利亚的要求不高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在他们乐于请教的人当中，没几个会告诉他们这些理想早过时了。现在的那些功成名就者所具有的传统智慧属于澳大利亚历史的第一章，而这第一章在 20 世纪中叶的某个地方已经结束了。在澳大利亚再没有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未来的概念了。

整个一代人好像都被接二连三的事件弄得精疲力竭了。持外省人心态的眼界狭窄的一代人制造了一个时代，在其中，愚蠢成了美德，压力集团的私利至高无上，智慧必须加以掩饰，当机立断绝无必要，海外发生的一切与己无关。在一定意义上，研究当代澳大利亚就是研究这代人。这代人容不得能预见将来或现在的不同状态、欣赏挑战、生活充实的那种人。社会上几乎没有能使政治家们头脑清醒的高深复杂的政治上的交流，没有能导致智慧上的突破的渠道。除了个别例外，大学里的聪明人被公众的漠不关心弄得灰心丧气，因而只会自怜自悯。政府官员被流放到堪培拉而远离他们所治理的人民。由开拓了整个大陆的先辈的子孙组成的社会如今显得在躲避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问题是，就澳大利亚的标准而言，眼下差不多任何重要的事物都是不同寻常的。

## 何谓澳大利亚人？

### 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作家似乎觉得要认真描写他们的同胞是不可能的。他们或是嘲笑讽刺自己的同胞，或是用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具备的品质美化他们。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奥威尔<sup>①</sup>去探索人民的性格气质，承认这些性格气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事。不能严肃地看待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导致了态度上的虚伪和犹豫。既然从来没有人详细描写过澳大利亚生活的现实，对书呆子来说，这种现实就不存在了。而他们自己眼中的澳大利亚生活则又总似乎显得有点不真实，可能只是一时一地的表象。他们老觉得让自己的同胞给背叛了。

这种背叛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那些一切从伦敦的角度看问题的澳大利亚人好像是些来自外国的精英，统治着一个造反精神强烈的殖民地。他们嘲笑“澳大利亚口音”，评论某些人“非常澳大利亚化”。对他们来说，澳大利亚人是粗野的、“没教养”的一帮。那些眷恋于想象中的澳大利亚乡村浪漫神话的人认为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亚人住在城镇这一事实是对某种历史职

责的背叛。他们中一些人的待人处事的方式仍然好像认为澳大利亚人主要并不是城郊居民似的。他们闭着眼睛，想象着一个由简朴的乡下佬组成的种族。那些还死抱着“劳工阶级”神话不放的人憎恨“富裕”，憎恨最强烈地体现富裕的年轻人，憎恨从前的“劳工阶级”的语言现在说得越来越少了。放荡不羁派和造反派则攻击“城郊化主义”。不管是怎样的“城郊化主义”，都可能成为实际上所有知识分子的攻击目标。而既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住在城市的郊区，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憎恨差不多整个社会。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最城市化的国家，而这是一个对全国性神话制造运动极为不利的事实。

没有几个澳大利亚人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城郊社会之一。到 1875 年，澳大利亚已经是世界上拥有最高比例的城市居民的国家之一了。澳大利亚可能是第一个城郊化国家：大多数男人在平时赶车上班，周末在屋里和院子里忙忙碌碌，这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了；澳大利亚人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习惯于郊区街道生活的规则；澳大利亚实行世俗大众教育的时间比大多数国家都早；它最早从消费品购买中发现部分生活意义的国家之一；现代城郊社会中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重新分布这种事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毫不新奇。同时，澳大利亚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是真正都市化的城市，即一个五光十色、热闹喧嚣、住着很多人、人们爱往那里去的中心城市。悉尼的皇家十字区有 10 万人口，是世界上任何“西方”城市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然而悉尼还没有真正精巧丰富的城市生活，尽管它已经开始在模仿。对澳大利亚基本城郊化这一特点的细致认识进展很

---

①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和记者，主要作品有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译者

慢,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神话还在作祟,另一方面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一些特殊因素,如对户外活动如痴如狂的热爱,把国外权威心目中的“城郊化主义”应有的模式弄得面目不清了。

除非一个人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过的生活、他们奉行的价值观持赞同的态度,否则很难想象他怎么能够理解澳大利亚。譬如,澳大利亚是个极其稳定的社会,而经常受到攻击的自满自足的态度其实正是这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澳大利亚人看上去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它包括一幢平均有5至6个房间的住宅、住宅周围有自己的院子、充分独处而不受干扰的自由、舒服的家以及享受天伦之乐。澳大利亚人有一种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喜欢对家里有用的东西,并且会加班加点挣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人生应该如何度过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哲学,那就是:攒钱,结婚,为房子付上一笔定金然后购置家具,希望孩子能过上比你幸福的生活,为退休制定计划以便安享晚年;在去世后,把房子留给孩子们,他们可以把房子卖了,把钱拿去付他们自己房子的抵押贷款。对澳大利亚老百姓来说,人生有它的季节,有繁殖有更替。使某些人感到不快的也许就是老百姓接受这种并不出格的人生观。

在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中,“家”占据的中心位置就像土地在农业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一样,只不过“家”在死后是可以处理掉的。同时,澳大利亚和农业社会一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只是孩子长大成人后,原来的家庭就解散了,孩子们得走自己的路。跟多种多样的家和家庭一样,澳大利亚生活中有各种为人所接受的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人经常渴望休息和独处。他们时而可以与大自然非常一致。在这个舞台上,人类的所有喜剧和悲剧轮番上演。人们庆祝婴儿的诞生,为死者哀悼。他们的欲望实现了或者破灭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并不因为人们住在小小的红

瓦砖房里而消褪。正是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作家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导致他们不是嘲讽就是漠视澳大利亚的现实生活，并堕落到罗伯特·伯恩斯在《异见》<sup>①</sup>杂志上所说的那种“社会生活和人类意识的残破边缘”。伯恩斯说得好：“澳大利亚的小说家，包括非常出色的以及相当蹩脚的，都属于那样的一伙人，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像某种珠帘，在作家们进入酒吧畅饮真实与成功酒之前，必须把它们撩到一边去。”无论政见如何，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作家都是反对派，他们对城郊生活丰富的多样性态度，不是忽视，就是指责，他们绝不肯去弄清楚那里到底有些什么。

在澳大利亚城市生活的初期，高雅与粗俗的区别是很鲜明的。粗俗来自大城市的“劳工阶级”，在人们眼里表现为马虎随便、酗酒、豪赌、狎昵、蔑视下层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里多见的怯懦之辈势利之徒。粗俗表现为某种没有占有欲、得过且过的社会心态，那里有的是陈设简陋的出租屋、友善、卤莽以及对硬汉形象的关注。这幅图画反映了某些原始的美德：一个不能容忍侮辱与伤害、反抗当局、有时残酷地报复的人。他被看成人类历史的真实反映，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城郊的产物，就像丹尼斯<sup>②</sup>眼里的金格·米克：

抢个痛快，砸个稀烂……  
歇上一番，穿上最棒的衬衫。  
像当年的亚当偷吃禁果，

① 1961—1979年间在澳大利亚出版的一份比较激进的政治科学季刊。——译者

② 丹尼斯(1876—1938)，诗人。金格·米克是他的长篇叙事诗《金格·米克的心境》中的主人公。——译者

他也学会跟女人搭讪。  
约会见面，乐此不倦，既壮又健，  
抢个痛快，砸个稀烂，  
追求女人，笑逐颜开。

这种人确实存在过，不过把所有挣工资的人都看成这样，那是太浪漫了。人们还应该记住，当路口酒吧或小街陋巷里的无领骑士从有酒喝和有钱赌的喧闹快活的男人世界回到家里时，他们或许会毛手毛脚、柔情蜜意地跟老婆孩子亲热一番；但要是心情不好，他们也许会把老婆孩子揍上一顿。他们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贵族，凭借着别人的牺牲而活得轻松潇洒。由于若干原因，如社会的日益繁荣、贫民窟的清除、教育的普及、白领职工数量的增加（现在已占劳动力的一半以上），这个阶级正在消亡之中。虽然还有很多人表现出它的特点（在举止上通常不再粗野了），但这些人绝不都是“劳工阶级”。至于强调自己的强硬和男性气概，以及把女人排斥在他们的社交生活之外，则依然是许多澳大利亚男子的显著特点。

那些攻击“城郊化主义”的人有时还没有认识到的是，整个高雅与粗俗的对抗已经过时了。高雅和粗俗一样，也在消亡之中。神话的制造者们长期以来压制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以清醒自制、勤劳刻苦为荣的人的事实，现在却又在夸大这一事实。现实是，新的几代人正在否定从前的礼貌规矩和一本正经。高雅被粗俗化了，而粗俗则变得高雅多了。不同的人们现在更多地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生活。假如你在周末在人们准备出去寻欢作乐的时刻开着车在任何大城市里转悠，你会发现，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大家连穿的都一样。对不拘礼仪的崇尚已经扩展到从前的上流人士，而友善则软化了从前的粗野汉子。现在，粗野

或者社交上的冷淡傲慢，与其说是阶级的特征，不如说是个人或家庭的特征。一种新的不那么僵硬死板的生活方式正在发展起来。不过我们不能说那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扩展，因为那种生活方式本身也正在被摧毁之中。澳大利亚年轻人作为一个整体（全人口中约有一半在25岁以下）看来正在以某种新的、仍然难以捉摸的方式越来越趋于一致。

## 公平点儿，伙伴

澳大利亚的全部特点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公平点儿，伙伴。”这是澳大利亚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回答。如可以预料到的，这些理想在移植和生根落户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磕磕碰碰，但没死什么人，现在，公平对待已经是澳大利亚生活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假如外部世界允许的话，它看来是不会消失的了。

澳大利亚人一般的信念是，保证每个人——从养老金领取者到制造商——都得到公平对待是政府的工作。公平对待通常指的是钱。澳大利亚人把政府看成是一种设施，其功能是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他们既信任政府又鄙视政府，这种对政府半信半疑的态度产生了大量半心半意的奉公守法，同时使政府把确保人人都有“公平对待”的机会的工作交给了许多准法庭性质的审理机构，如仲裁委员会、关税委员会、难民遣返审理委员会等等。

有着这种精明狡猾地应付政府的态度，人们既不崇拜政府，也不憎恨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参政的另外一些澳大利亚人，而这些人也得使其他人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否则他们就该被解雇。他们只是干份内活的经理人

员。这种干脆的态度令那些呼唤真正的领袖、呼唤能激励人民、促使人民为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投入不太愉快的活动中去的政治家的人苦恼万分。其他一些人也感到苦恼，因为这种态度不是永远跟政府对着干的态度。在澳大利亚没有太多关于自由的豪言壮语，然而政府受着一整套最复杂的机制的监督和制衡，政府想扩大其权力的企图经常被挫败。人们常常指责澳大利亚人对自由漠不关心，顺从听话，是潜在的权威主义者。对普通百姓来说，这种评价大概有点太苛刻了。真要批评的话，针对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人们一般指望着为自由而奋斗的人。政治自由的关键是国家的体制以及民众根深蒂固的态度，而不仅仅是言语辞藻。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在政治方面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民主程序是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当局有种不信任感，人们宁可为朋友或家庭的私利奔走而不理会国家的需要。除了清教徒主义以外，澳大利亚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直到不久前所能够相信的更为自由。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的几个表明这些是能够做到的国家之一。在澳大利亚，在某些领域里，政府挨批评可能不是因为滥用权力，而是因为作为太少。

公平对待不光是为自己，而且是为了弱者。甚至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澳大利亚人也以从支持本国选手转而为勇敢无畏的外国挑战者喝彩而出名。澳大利亚人爱“斗士”，爱胆敢与霸主对抗的弱者；不过假如弱者最终还是输了，对他们的敬意多半会随之消失。在工作中，在那些不是雄心勃勃的人们中间，对弱者的同情非常强烈。为不能胜任的伙伴帮忙打掩护是常见的事，只要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尽力而没有偷懒。人们觉得肯试肯干的人不该因为能力有限而倒霉。在教育中，对弱者的关心同样影响深远，因而制定的标准倾向于适合不太有天资的学生的要求。

对失业的忧虑远超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政府或者企业瞎折腾或朝三暮四时，那些最无力照顾自己、对有关决定最没有责任的人却要成为第一批、常常是唯一的受害者，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人看来，被认为是极不公平的。澳大利亚人不喜欢想到其他的澳大利亚人会失业（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民族之一）。在孟席斯<sup>①</sup>政府的长期统治过程中，失业率有时似乎像是会把老不倒翁孟席斯赶下台的一种威胁。不过，澳大利亚人对弱者的友善也有些死角，例如，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欠缺使他们看不到土著人民的苦难；还有，对社会服务的兴趣现在有所衰退。

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对成功的大肆宣扬。除了与体育有关的，人们之所以能记住极有限的几个英雄或英雄事件，是因为英雄的风格，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就。早期的探险家事迹和澳新军团日，纪念的都是战友情谊、英勇顽强、意志力的发挥、咬着牙关忍受痛苦。要勇敢，不要抱怨，不要哭哭啼啼，这是最重要的，远比那些凭着组织和思想获得的平淡无味的成功重要。既然澳大利亚是个商业社会，自然也就有许多狡猾的生意人及他们的仰慕者。跟其他民族一样，澳大利亚人也会说一套做一套。而即使是在这方面，受人钦佩的往往也是那种横冲直撞的厚颜无耻的流氓，而不是工于心计、精于组织的人。

在衡量澳大利亚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的反应能力时，公平对待的观念有一定的重要性。这基本上是一个非竞争的观念，是对保护的要求，是争取安全和稳定的努力。

无论是工厂的小工人，还是要求关税保护的大老板，大家都

---

① 孟席斯(1894—1978)，于1939—1941年和1949—1966年任总理。详见第八章。——译者

觉得只有有了生存的保证，才能有公正，所以必须避免在开放的市场上为谋求生存而斗争，尽管也许可以靠法律或其他的手段保护自己。连在雇主和工会之间的仲裁制度都带点这种性质，即不能听任对立双方自己去斗个你死我活。我不是在为这种性质唱赞歌，但是希望能感到安全是人类共同的要求，如果这种愿望能够实现，那是很明智的。问题是，公平对待的观念在国际上是行不通的。这个观念在澳大利亚的普遍接受有时使澳大利亚人在面对不跟他们讲友善的国家时显得太天真。

在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毫无意义的博爱的学说，在澳大利亚受到极大的重视，尽管人们有可能生活在澳大利亚而体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从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坐出租车、在街上不撞到别人身上、不问路、不跟不相识的普通人打交道，那他也许就不会听到“伙伴”这个词；而其他一些人使用这个词就像共产党人使用“同志”一样地普遍。

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伙伴”指的是被某种紧急情况卷入不友善的环境而凝聚成团、患难同当的一伙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最强烈的使用效果体现在工会和军队里。伙伴们在逆境中为共同利益紧抱成一团，这种伙伴情谊不是全人类手足之情的理论，而是一伙特定的男人之间的手足之情。然而，这种对厄运的强调在没什么厄运时就会给人小题大作的感觉。例如，在伙伴们聚在一起喝得醉醺醺地表达他们对充满阴谋诡计的世界的猜疑时，这种伙伴关系就成了妄想狂的发作。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但仍然是排斥性的意义，在这里伙伴情谊指的是男人之间的哥儿们交情。在澳大利亚（那些过于强调男子气的）男性生活中，有一种社交上的同性恋倾向，即在男人群中没完没了地显示自己的粗犷强硬。当你看到站在酒吧柜周围的男人那么急切那么强烈地表明他们的男性身份时，你几乎

觉得他们简直会扯开裤子的拉链。

澳大利亚有许多要求与社会习俗保持一致的压力。对一个有相对长久历史的城郊化文明来说,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罗纳德·塔夫脱主持的民意研究表明,受试的澳大利亚人更强调遵循社会习俗而不是表达自己的个性;他们宁要肤浅但正确的社会关系,而不要出自内心的亲密的社会关系。对一个由加利福尼亚人构成的群体样本进行的同样的民意研究显示,跟澳大利亚人相比,美国人就不那么倾向于接受社会习俗。澳大利亚人喜欢大家都普普通通。其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跟自己有所不同的生活。例如,体育、金钱和汽车占据了男人交谈内容中很大的比例(它们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并赋予平等为荣的社会习俗一种真实性),所以有时如想参与交谈,你非得精通这些题目不可。如果你不知道,那就不是个男人。对社会各阶层普遍广泛地感兴趣的这些题目没有兴趣的人,只能是社会的弃儿。与众不同在人们眼里就是装腔作势。

社会上还有要求与“诚恳”和“考虑周到”这些概念的通行标准保持一致的压力。你有时可以把“诚恳”理解为“愚蠢”,因为聪明有时就是不诚恳;有人会说:“我知道你不对头,但我说不出为什么。”“考虑周到”不一定就是亲切和蔼,它可能光是意味着不与社会行为惯例相冲突。要是再三盘问一个澳大利亚妇女“考虑周到”是什么意思(这主要是个女性用词),你最终多半会发现一种对差异的怨恨情结。一个“考虑周到”的人就是一个符合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循规蹈矩的人。

在另一方面,除了清教徒的干涉,澳大利亚是个高度宽容的社会。除非直接遇上或受到了影响,人们通常不在乎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从任何社会里可以指望得到的最大程度的宽

容：不跑去干涉别人的事。假如你告诉一个澳大利亚人另一个郊区或另一条街上正在发生什么可恶的事，他也许会对之发表一通严厉的意见，然后会总结说，有各种各样的事物才成其为世界。他不会发起一场改革运动。那不管他的事。一些批评家声称他们发现澳大利亚人并不宽容，因为他们使用粗鲁无礼的语言议论移民。但问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人攻击其他的民族。或许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大家都自称信奉平等主义，所以这特别引人注目。其实澳大利亚人通常是在乎的，他们至多说说而已，并不采取什么行动。至今只发生过极少几次上规模的反移民抗议示威。在澳大利亚人生活的任何方面，所有的干涉行动几乎都是由清教徒鼓动、从上层发起的。这里从来不曾有过狂热的群众性运动。只有面对着争论时，澳大利亚人才会变得好斗起来，但那也只是个人的事。

认为全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善良的是个高尚的概念，只要允许有差异，它也是一个恰当的评价。不过在澳大利亚，这个概念还需要略加修正，以便把不住在自己郊区的各种秉性的人都包括进去。在澳大利亚人的坦率作风、不拘礼节和友好态度中，闪耀着这个概念的光辉。澳大利亚人的明显的坦率作风有时被看作粗俗而令人不快。有时真的是粗俗，那是粗鲁而刚强或焦虑不安的男性固有情绪的表现；但有时只是比诚实更简单的直截了当罢了。当那些以伦敦的眼光看世界的澳大利亚人指责直率爽快的人们的粗俗时，他们常常会被那些模仿英国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人（其实这些人只是在装模作样）奉为知己。（当然，直率也可能是装模作样。）但真正澳大利亚人的行为准则是不相信过分的礼貌的。他们会说：“哼！他在搞什么鬼？”

工作场所交际中卑躬屈膝的态度越来越少见。在办公室干活的老百姓的生活从前要远比现在更死板拘谨、更强调服从。

崇尚不拘礼节，由来已久，而且继续在发展。权势依然存在，但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露出一种较友好的微笑。对社区中大多数人来说，下班后的生括比从前能想象到的更放松、更不受社会礼仪习俗的束缚。这是一种不必为社会地位而操心的悠闲的生活。澳大利亚生活表现出来的民主代表了一场成功的革命。如果一个 1917 年的俄国贵族能够看到 1964 年澳大利亚的照片，他也许会以为在这里人民在当家作主，而不是在俄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的人民确实在当家作主。祝他们好运。

马克斯·哈里斯<sup>①</sup>在《澳大利亚文明》一书中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说：“伙伴情谊成了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一种乐意毫无戒心、热情随便地跟其他人交往的态度。在外人眼里，这种态度往往被看成是庸俗的过分民主化的证明。……事实上，澳大利亚人有一种马马虎虎、但不算太差的与别人成为知己的本事。这是澳大利亚人和某些地中海沿岸民族共同具有的素质，尽管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澳大利亚人喜欢建立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基础。他们在城市里也会表现出传统的农村里的那种对来客、甚至对陌生人的好客。去英格兰的澳大利亚人想不通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他们因受不到同样的盛情款待而感到沮丧。由于澳大利亚式的友善经常忽视社会礼仪，这种友善有时在外人眼里显得很奇怪而被视为粗鲁无礼。之所以会这样，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是感觉不到差异的，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自己好的东西对别人一定也好。他们的坦率和对友情的追求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在经常不存在相似性的地方面寻找相似性，甚至要找在他们自己中间都不存在的相似性。他们渴求人类善和爱的本性，可

---

① 哈里斯(1921—)，诗人、评论家和出版家。——译者

他们追求的方法太原始了，于是他们缩了回去，变得疑神疑鬼。

## 享 受 生 活

要理解澳大利亚人有关享受的概念，人们必须明白，在澳大利亚存在着清教徒主义与享乐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后者正开始赢得上风。那些在 30 年代得出有关澳大利亚的结论的人还在一如既往地批评着澳大利亚的枯燥乏味、粗鲁无礼。这些人好不容易有了个结论，现在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了。但是，在澳大利亚事物正在发生变化，是在不同的地区，正以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方式改变着。澳大利亚生活中很多部分固然仍受着那些专门使人扫兴的人的制约，但情况在逐渐好转。

在 50 年代这种好转开始以前，人们都说澳大利亚人在享乐时也是庄重严肃的，就像真正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他们的城市里找不到中国人或大陆欧洲人的欢乐气象。清教徒的信仰习俗在几十年里似乎僵化了澳大利亚社会，尽管这在澳大利亚的阳光下显得非常古怪。在大多数州里，旅馆的酒吧到 6 点就关闭；餐馆不准卖酒；赌钱是非法的；在郊区没有社交中心；没有新形式的伙伴关系替代原有的劳工阶级的群集交往；社区居民趣味低下，与文学和艺术格格不入；几乎没有好的餐馆；星期天总是凄凄惨惨；书禁和其他形式的新闻审查大行其道；女人只能呆在家里。这是个有着让人懒散的气候、普遍的富裕和一种快乐哲学的国家，这本来是个美妙的随心所欲恣情享受的环境；然而，这里的生活却死气沉沉。众人如在一起寻欢作乐，往往会以乱哄哄的争斗吵闹收场。在晚上和周末，所有郊区都充满着无聊。人们得打发日子，但没什么可用来打发。除了天伦之乐，人们有的主要是三种消遣：喝酒、体育运动和花钱。

在那些至少否定了清教徒主义的部分准则的人中间，喝酒成了衡量男子气的考验之一。对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野蛮的享乐：在装饰简陋的酒吧里挤挤撞撞，被喧嚣嘈杂弄得头晕目眩，大口大口地喝下啤酒，或许过会儿又把它们呕出来。不过，喝酒的部分特殊意义可能出于其清教徒的背景。跟澳大利亚人自己想象的不同，澳大利亚从来不是个酒徒之国。啤酒消费量是大的（每个成人平均每周 1 加仑），然而对照数字表明，虽然澳大利亚人的酒精消费率和因酗酒而被捕的比率是高的，但他们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属于世界上最能喝酒的人，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不是。澳大利亚人在喝酒时不讲平均主义。喝酒总是与伙伴情谊与放荡不羁的传闻逸事难分难解，但总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看来并没有按这些传闻逸事行事。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在所有社会活动中都无酒不可的酒精社会。喝酒在清教徒和上流社会人士中影响极小或根本没有影响；就是在酒徒中，它的影响也有所限制：一个男人或许会在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但在自己家里，他可能会滴酒不沾。现在有迹象显示，跟其他事情一样，喝酒也在走向平等，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酒徒们喝得少了，而其他群体喝得多了。喝酒正在成为更普遍的社会现象，不过因酗酒而被捕则稍有减少。

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就是生活，而其他都是虚无缥缈的。体育是一项没有反对派攻击的国民习俗。在好多人眼里，对体育不感兴趣是退化堕落的标志。参加体育运动、观看别人进行体育运动、读体育报道、谈论体育，这些就是为国效力，就是培养民族特性。在竞争性国际体育比赛中的成就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这种成就一般总是夸大的，他们其实并不如他们自以为的那样出色；他们还错误地以为别人也总是像他们那样对他们的非凡才

能赞赏不已。)那些爱国人士们认为,体育中有分为各种等级的美德:亲身参与是最好的;观看是次好的;看板球比看赛马好;看摔跤或赛车则根本不是看体育比赛,那只是娱乐;如果可以参加比赛或看别人比赛,却呆在家里或去沙滩晒太阳,那是罪恶。(他们会说:“瞧那些沙滩上的瘪三,他们该去看板球才对。”)在学校里,体育比赛是根据咄咄逼人的竞争原则冷酷无情地组织起来的。例如,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网球选手很可能会被卷进一部其最高奖品是戴维斯杯的竞争机器中去。竞争性体育至今在澳大利亚仍可能是一种无情的、半军事性的活动,这是澳大利亚生活中讲求纪律方面的一种表现。

因为对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其他努力有那么多社会限制,钱就跟体育和喝酒一样,成了一种允许追求的人生目标。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这就是现实。“钱很重要。”人们可能只关心钱本身,有时同钱能买到的东西联系起来,有时则不。但那不是社会上多数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不过,就是那些并不财迷的人通常口头上也要讲讲钱。对社会上那一大帮对各种差异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有钱没钱的差异他们是知道的。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民主的差异。一个人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有钱,而钱是重要的。然而光知道一个人有钱并不说明那人的任何方面。他也许就是运气好,或者会敛财,或者别的什么。他并不是一个优秀出色的人物,他只是一个重要人物罢了。澳大利亚老百姓梦想着钱从天上掉到他们的口袋里。比如在悉尼,每个周日都开六合彩,俱乐部里的老虎机总要转到深夜。而在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够的钱买房子、置家当、照顾孩子以及参加闲暇活动,澳大利亚人就再不肯多干活了,因为“钱不是一切”。

如今,澳大利亚社会这幅阴沉沉的图画已经被泼上了一些

明亮的色彩；旅馆现在开得晚了；餐馆的菜肴不那么粗糙了；在餐馆吃饭也能喝到酒了；可以尝到出色的二流的若干民族风格的烹调了；对待赌博的法律宽松多了；清教徒主义对性生活的束缚在逐渐减少；连新闻文化审查也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尽管还是比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严厉；艺术开始进入大众；在郊区，咖啡馆、俱乐部、餐厅、饭店里的娱乐节目更轻松愉快了；妇女更公开地参加享乐了。所有这些进步没有一种是通过政治示威抗议而取得的。澳大利亚人还是保留着足够的清教徒味，他们不好意思认真地考虑他们最关心的事。引起这些变化的是无组织、非意识形态的社会压力，而产生这些压力的因素则可能是清教徒主义的逐渐衰弱、移民要求过更接近于他们原来习惯的生活、到国外旅游的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多，以及人口的新老更替等等。人们只要看看年轻人就知道他们与前辈之间的差别了。他们对享乐更直言不讳，更自信，在各种人混杂的群体中更放松。他们寻求更大程度的多样化。不久他们也许会把崇尚体育的传统颠倒过来，把户外活动看成是令人愉快的消遣，而不是一种立国的习俗，从而也许会不在乎赢不赢戴维斯杯或板球对抗赛<sup>①</sup>。他们偏爱的好像是个人表现的项目，如冲浪、跳水、滑雪、射箭等，而不是集体对抗的项目。

由于新教各个宗派、英国国教福音派、爱尔兰天主教、新教伦理派（为实业界人士所信奉）和非国教良知派<sup>②</sup>（为政治上的

---

① 在某些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西印度群岛和南非等之间举行的板球对抗赛。——译者

② 新教是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16世纪世界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教的统称。英国国教是新教三大主流宗派之一，又称圣公会。福音派是其中的一派。新教伦理派是信奉新教伦理，强调遵纪守法、勤奋工作、节俭生活、自我约束等道德准则的教派。非国教良知派是英格兰以外的新教中的一派。——译者

左翼人士所信奉)的潜移默化,澳大利亚有浓厚的清教徒气息,但是在普通人中,还有与之抗衡的享乐主义。在天朗气清、海浪起伏有致的日子里,海滩上的人群不光在享受,他们同时还在仰慕人的躯体,并把自己溶入到沙滩、海洋和天空中去。在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以后,人们在户外游戏消遣中任性取乐,而这些游戏消遣表达了人们对活动和自然有裨益的信念。澳大利亚很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因素,即喜欢朝气勃勃的人生,同时不提有关人生的问题。这种因素在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中被表现为一种从不质疑、反知识分子和清教徒,经常暗含着自然崇拜的享乐主义。这也许是年轻人的人生哲学。当年轻人把马利布<sup>①</sup>冲浪板(价值70至90澳元)绑在车顶,开到海边,整天在浪花之间穿梭出没时,他们过的更像是波利尼西亚<sup>②</sup>人的日子而不像清教徒的生活。在《象限》杂志上,休·阿特金森<sup>③</sup>引用了一段一个冲浪者的话:“我不知道,这很难说清。当你顺浪壁直冲而下,海水在你身后盘旋打转,浪沫飞溅,或者当一个大浪卷起形成一个空心浪时,你顺势做个后侧旋,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这让你觉得像飞起来一样。”

与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跟英国和部分西欧(不管地中海欧洲)相比(偶尔瞥一眼美国),不如观察一下南太平洋群岛人民的生活,这对于说明澳大利亚生活也许更为有用。德斯蒙德·奥格雷迪在《观察家》杂志上写到欧洲移民体验到的失落感时说:“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空虚之中,觉得他们住的郊区与城市没有有机的联系。那些由于觉得没有归属感、没有进入澳大利亚人生活

---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太平洋海岸上的一个小城。——译者

② 位于中太平洋的岛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和汤加群岛等。——译者

③ 阿特金森(1924—),记者、剧作家、小说家。——译者

的中心而感到失望的意大利人会继续感到失望，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中心。一旦他们意识到没有这样的中心，并且完全不在乎了，他们就是被同化了。”海滩正是可以让移民在那里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太平洋沿海城市里人群聚集相处的最强大的中心之一。澳大利亚人不坐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座里看人散步；他们去海滩沐日光浴、冲浪，在那里看人散步。他们也看人，不过看的是几乎脱得光光的人。在那里，一个年轻小伙子可以在水里向同辈以及同伙中的女人卖弄身手；他身上的衣服脱光到他自己能感到和看到的程度（所存无几了）。在此同时，他的父亲也许正在男人堆里讲着打仗故事、钓鱼故事或者体育比赛的仪式典礼。其他人也许正在驾驶帆船或者照料花园。在澳大利亚生活中，还有一种对宁静及缓慢的思考的向往。人们喜欢坐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几乎什么也不想。在假期里，澳大利亚人喜欢躲到水边的木屋甚至帐篷里去，以过原始生活为乐。

如今，澳大利亚人当中对简单享乐的如此强烈的渴望，在官方的生活观念中依然无立足之地。官方报告之所以如此虚假、令人厌烦，这大概是原因之一。指望政党为人民争取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如更多的通往海边的道路之类）也许是不可能的，但要是某个党开始暗示它接受享乐是澳大利亚人生活的一部分，它很可能发现能吸引更多的选票，尤其是在已经从父辈的罪孽感中解脱出来的年轻人中间。

## 任 其 自 然

场景是朵门公园，悉尼星期天下午的演讲角。演讲者在冲着人群大喊大叫：“告诉我，什么是澳大利亚人？我是说，什么是

澳大利亚人？”有人在人群中举手：“澳大利亚人是懒惰的酒鬼！”人群哄笑。就是这样。我们非嘲笑自己不可。不过，那真是在嘲笑我们自己吗？懒惰的酒鬼有什么不对？除非用最简明的词句来表达，澳大利亚人听到严肃的谈话就厌烦。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澳大利亚人公开演讲的水平都低得可怕。常见的风格是演讲时表现得似乎对演讲的主题毫无兴趣。热情和讲究修辞往往会被看成是令人不快的怪癖。社会交际的通常形式是“耍弄”、开玩笑。这种行为有时会以最复杂的方式持续好几分钟。对一些人来说，它现在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艺术。对一个不相信多愁善感、听到华丽辞句就像狗嗅到诱饵而满怀狐疑的民族，这是表示亲密的捷径。澳大利亚人不愿受语言的蛊惑，他们怀疑当众流露的感情。他们好像宁愿他们的社交场合能多乏味就多乏味，那样就没有人会认真看待他们了。

马克斯·哈里斯在《澳大利亚文明》中谈到这一最普遍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时说：“现代澳大利亚人，在他们难得地想到世界时，抱的是一种与己无关、毫不动情的态度，既没有自怜也没有自信。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小小的迫切需要，还是欧墨尼得斯<sup>①</sup>那样的大事，都没必要大惊小怪。……人际关系（伙伴情谊的残剩物）是挺严肃庄重的，但希望和雄心多半是‘胡扯’。这种对任何意图目的都冷讽热嘲的态度滋养了我们臭名远扬的庸俗主义，但同时也防止了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澳大利亚人发现要陷入经常的自我欺骗很难。在他们认真思考的时刻，他们看到世界上满是胡说八道。在他们经验所及的范围里，他们能辨认出并迅速处理这些胡扯。不幸的是，他们对自己应付不了的经

---

① 希腊神话中三个复仇女神的总称，她们身材魁伟，眼中流血，头发是盘结的毒蛇，专司惩罚人类所有的罪行。——译者

历和现象也照章办事。在一个特定的重要的范围内，澳大利亚人有不显露于外的智慧、正确的判断力、对所有装模作样和自高自大的充满诙谐的抵制力。……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们周围看到的世界，澳大利亚人总是愤世嫉俗、爱自我诋毁。他们从不放过自己的胡说八道。哪怕看上去在自吹自擂的时候，澳大利亚人一般实际上是在取笑自己。就跟苏格兰人一样，很难判断什么时候澳大利亚人是在说‘真心话’。那种情况不常有。”

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哲学，一种决定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民族风格。它的影响遍及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它可能是最广泛地影响澳大利亚人的一种哲学。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像澳大利亚人这样充满怀疑精神的民族更倾向于有组织有条理地实现变革而不是通过社会大动荡。他们或多或少听任事物自行发展，以避免那些灾难深重的社会里常有的可怕的个人的苦难。还有，澳大利亚人对当局通常所持的嘲笑态度是绝对有利于自由的。在澳大利亚军队里，士兵在战斗中勇敢机智，但下了岗后，许多人是好兵帅克<sup>①</sup>。他们当兵是为了跟敌人打仗，而不是参与军队里的“胡扯”。世人在这个时代里见到了这么多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造成的恐怖和残暴，因此谁也不能无所保留地指责澳大利亚没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指责澳大利亚人不张扬自己是谁以及在历史上的位置。历史上回荡的那些繁文缛节和思想意识几乎全是“胡扯”，最后倒霉的总是普通人。澳大利亚人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他们对哪怕是物质利益的许诺也会疑窦丛生。在大选期间，澳大利亚人以捞取实惠为乐。据说在澳大利亚，许诺过多会导致落选。所有的老板都在哀叹纪

---

① 捷克作家哈谢克·雅罗斯拉夫(1883—1923)同名讽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天性极其厚道老实而又无能的士兵。——译者

律的松弛，而对于普通澳大利亚人来说，他们尽可去跳湖自杀。知识分子在哀叹澳大利亚人缺乏冒险精神，他们也尽可去跳湖。如果考虑到知识分子想出的许多主意是何等荒谬的话，这个反应并不一定愚蠢。总的说来，人们也许会赞同普通澳大利亚人的观点，即从言语机器里冒出来的多半是“胡扯”。

与怀疑主义相结合的是某种务实感，即对具体物质的兴趣，以及在狭隘的范围内，拿物质做实验的思想准备。澳大利亚人的怀疑主义不是反动的保守主义，而是将言行挂钩时的谨慎态度。澳大利亚的高度物质繁荣是不可能在一个彻底没有可塑性的社会里实现的。怀疑主义并没有阻止澳大利亚人屡次突然作出相当剧烈的变动。而一旦接受了变动，他们就会全力支持。他们看上去极少有要与过去保持一脉相承的观念。变化发生时，总是突如其来，无怨无悔。过去的已经过去，逝者如斯夫。

他们基本上是经常想到行动和未来，但不爱深思的人。而他们之所以不更经常地投入行动，或更细致地思考未来，则可能是因为怀疑主义造成的想象力的褊狭。他们只能看到有限的可能性。不过，要是什么新事物被证明是可能的（这样的证明多半发生在更有创造性的某个外国），他们就会接受。他们会说：“好啊，美国佬能干，我们也来试一下。”他们发现的困难是要自己去想象出什么新的东西，而在他们的国家里没那么一帮人能定期地为他们做这事。

尽管缺乏想象力，但很奇怪，澳大利亚人可以是本事不小的随机应变专家。一旦被迫行动，澳大利亚人会高兴地“试一试”。他们试验某种东西，看它行不行，同时相信它能行。他们几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随机应变的态度，崇尚鲁莽和笨拙的言行举止，这也许是崇尚不拘礼节的延伸。这个国家现有的程序规范和概念早已支离破碎得不成样子了，它的体制结构的某些部分好像

是仗着安全销和绳子才维系在一起似的。要是你建议一个澳大利亚人花点时间仔细调查一下一个实际问题，并罗列出合理的处理程序规范，你一定会让他不胜其烦。他会说：“没问题，我们让它试一试。”对正在干的事情谈论太多是“胡扯”。你最好埋头干活。（“没问题”这个词组会让试图在澳大利亚干点事情的人心惊肉跳。它的言下之意可能是：“甭担心，让我们替你把它摆平了，让我们安静些。”这是个毫无理由地自信的词组，就像中国人仅仅表示礼貌的“是”，那意思可能是“不，但我不想那么说”。）

澳大利亚人的怀疑主义产生了许多弱点以及优点，尤其是因为它已经渗透到社会上许多权力所在的领域。热衷于随机应变导致了一种鲁莽的态度，在技术时代，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这种态度还包括对专家的不信任。怀疑主义可以与平等主义者对聪明的厌恶相结合，把最简单的事情过于简化。与所有乐天派一样，澳大利亚人是惊人的简单化派。不过，作为有现实头脑的乐天派，他们可以克服即使是对实际问题讨论的厌恶，因为大多数问题已经有人替他们在国外解决了。他们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在竞争不很激烈的条件下权且采纳外国的主意。问题是，只有在澳大利亚社会与产生这些主意的社会足够相似时，只有在它不需要为自己提供主意时，这种高高兴兴的简单化才会有效。

怀疑主义反对哪怕是最实际的想象。然而，想象不仅虚构事物，它也可以帮助分析问题的性质、探索新的可能的领域。澳大利亚连这样的想象也反对的怀疑主义，实际上是在维护时行的僵化定型的观念。它并不是真正出于现实的感受，而是某种特定形式的错觉。作为乐观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澳大利亚的怀疑主义有时会很天真幼稚。

面对这种古怪的处事方式，澳大利亚人会问：“他能得到什

么好处？”这样的人生观足以撕破一切精心修饰的私利的伪装，但它也不允许世界上有时也许比理性更重要的不合情理——种狂热的因素。由于他们的精明、唯物主义和乐观主义，澳大利亚人发现很难接受所有这些荒谬怪僻的行为，像不顾私利的幻想、悲观主义、讲究灵性、盼望失败、厌倦、喜欢玩弄辞藻、热中冒险以及为揽权而揽权等等，所有这些怪念头经常会导致行动。澳大利亚人只会在窄窄的一束清澈明亮的阳光下思考问题，在这一视域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我们似乎只看到阴影里一群人乱蹦乱跳的景象，而丝毫不理解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澳大利亚人以为他们彻底领悟了人生。

## 平庸的骗子

有些评价澳大利亚的著作未能充分反映出社会上那么多对攫取利益和玩弄权力的关注、那么多的阴谋活动和私下的为非作歹。澳大利亚真正的分野之一在这里出现了，这是追求天真快乐的人民大众与试图得到权势和野心的多重满足的人们之间的分野。后者现在大概是少数，他们公开地谋取权力，公开地以享有权力为乐。他们是些“强人”，他们立业的手段是拿破仑式的猛攻以扫除障碍，是善于抓住机会，能够集中力量利用机会。驱使他们的往往是非澳大利亚式的对兴奋和成就的渴望以及做成事情的渴望。这些人从前在澳大利亚相当普遍，但如今主要局限于商界；而即使在商界，他们的人数也在减少。他们的难处之一是，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现在为取得成功既需要有利用对方弱点的决心，也需要众多下属细致具体的工作。虽然“强人”可以学习如何利用下属的复杂的工作，但在澳大利亚，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很慢。

这种人有时被他们的对手讥讽为过分粗野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反对他们的还有来自新一代的“甜言蜜语派”。虽然这些人肯定比外表流露的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直爽坦率还是适合普通百姓的作风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野心勃勃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直截了当，他们学会了隐匿自己的抱负，并在平等主义的假面具下转弯抹角地实现抱负。特别是在中年那代人中间，这种人变得极其奸诈、精于欺骗。假如不是受建功立业（就是说，做点什么事）的欲望的鞭策，而是受掌握权力、同时被人爱戴的渴望的驱使，那么，当他们蹑手蹑脚进入权力场时，可能不是为了权力场外的目的运用权力，而是为弄权而弄权，以至于随着这种见不得人的恶行而堕落到最黑暗的秘密中去。

在上层，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托辞，权力的运用往往表现为无效的权威主义。不懂创造性和专业化的人不会量才用人（但他们可能会诿过于人）。他们高高在上，对花时间成为专家很不耐烦。他们没有对照标准，对新思想不感兴趣。他们主宰一切，而他们的主宰无声无息、反复无常、毫无意义；不像“强人”做出的决定，也许虽然很武断，但不管怎样总是形成某种公法。

普通澳大利亚人的许多弱点多半在任何地方的人群中都可以找到。澳大利亚人的很多思维方式受到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其表现是，当某个人要批评澳大利亚时，他不批评治理国家的那一小撮人，而是批评广大民众，似乎全部民族特征都只体现在他们身上，只有他们的自发行动才能够影响改革。这种习惯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虽然普通澳大利亚人具有许多优良的、有些是相当突出的特点，但现在的那些精英基本上是二流水平的。许多国家事务由平庸的骗子主持着。这些人在一个非竞争性的社会里爬上高位，他们保护自己的法宝是搬用别人的主意。他

们常常看上去简直就像组成了一个专门保护过时作废的或业余水平的东西的秘密社会。而他们这样做时是非常澳大利亚化的。在普通百姓中值得赞赏、至少无害的特点一旦渗透进权力场,就可能变得很危险。比如,对公平对待的热情会变成为了特权而要求得到公平对待的狂热追求;想发财的人会哭哭啼啼地跑到政府或某个政府机构去诉苦;对随机应变的偏爱意味着会使“没问题”成为标准,对缓慢细致的准备工作和专业程序失去耐心;对怀疑主义的着迷会导致对讨论效益的猜疑。造成严重缺乏从实际出发的想象力,以及在讨论和交流中的心不在焉;对平等主义的眷恋会与对怀疑主义的着迷结合起来,压抑才华,使才华无从发挥。

对愚蠢无知有如此广泛的需求,以至于能人们故意混在众人中间装聋作哑以免显得太聪明从而太“不实际”。澳大利亚社会上人际关系的错综微妙远远超过那种简单的粗线条的澳大利亚人的形象所能够反映出来的,但太多的精力浪费在装傻上了。显得平常,跟大家一样,有时是在澳大利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这只是装假,它能使才华无以发挥,但还不至于窒息才华。不幸的是,不是装假的时候居多。

澳大利亚的精英们有时以比几乎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公开地漠视才华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权力。在这样的气氛里,甚至想拟份准确、详细、条理清楚的报告,有时都会招致嘲笑,因为那是对国家的传统规矩的大不敬。国家的精英们是按照别人的规矩生活的。如果什么人成为专家、采用专业标准,他会被处理为二等公民;如果他据理力争,人家会说他装腔作势;如果他对现状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兴趣,人家会说他放肆;如果他试图设想未来,那就是不讲实际的自供。对许多澳大利亚的当权者来说,在富于创造性的国家里用于管理的才智、概念化和程序方面的技

能，都只是“理论”而已。

在这种环境下，聪明才智会变得隐晦起来，但还能低调地存在。在商界或政府的官僚机构、大学和现有的知识界里被彻底毁灭的常常是创造性、洞察力和敏感性，即人类活动的全部创造性源泉。在一个以模仿为生的国家里，没人需要有创造性，而有创造性的人多半会遭到猜疑。虽然不一定在科学界或艺术界，但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澳大利亚的当权者好像继承了一个他们对其规则一窍不通的文明。

对澳大利亚的创造性的不信任和对世界的无知，往往使那些统治着澳大利亚的人对可能性的范围有种特别狭隘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对潜力的评估就是做出维持原状的决定。澳大利亚的“造反派”通常根本就不对可能性作评估，他们只表达希望。而那些自称讲求实际的人则常常缺乏实践的杰出才能，即探索可能性的极限的能力。澳大利亚老百姓具有变化的巨大潜力，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的事务控制在一帮二流人物的手里，这些人不能理解变化的现实性，换句话说，他们是些“循规蹈矩派”。愚蠢的不是人民，而是统治他们、紧抱权力不放却不能领导的人。雇主发现澳大利亚人懒惰，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不信任他们，知识分子憎恨他们，然而，要是有不同的领导，澳大利亚人完全可能展示出一份骄傲的记录。澳大利亚人对管理他们事务的人的蔑视不光是平等主义的表现，那也是个确切的评价。

## 差 异 感

### 十一个城市

火 焰、空气、水，这些是悉尼的元素：太阳的火焰、漫无拘束的空气、太平洋沿岸和杰克逊港、布罗肯湾、皮特沃特湾、植物学湾、哈金港的 35 个沙滩的挑战和消遣。那些看到从大洋、海湾或河边延伸出来的长长的郊区街道的人看到了悉尼的模样，但那不是悉尼看待自己的方式。悉尼梦想的是冲浪、钓鱼、扬帆航行、在平静的海湾里游泳、在阳光下舒展四肢、让热量渗透骨骼。如今，悉尼终于有了某种大城市的感觉。它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澳大利亚城市。除了伦敦、巴黎和柏林，悉尼不比任何西欧城市小。它大于马德里、罗马和维也纳。与美国城市相比，它的面积与旧金山相仿。它的独特风格是一种完全无序的差异。它的近 300 万居民已经把规矩全打破了。悉尼没有公认的形态，它无名无姓。它的人民自行其是，不操别人的心。悉尼不承认什么“社会”。这里只有沽名钓誉的人才对地位有兴趣，而他们尽可通过自封而达到想要的地位。这里没有准则。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新南威尔士州搞政治就像坦慕尼协会那样<sup>①</sup>

不讲政策，就是私下交易以及除了对其成员以外毫无趣味、没有理论作装饰的压力集团。悉尼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造成了一种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宽容。在悉尼可以看到比任何其他澳大利亚城市都多的亚洲人，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即不反对，也不欢迎。是墨尔本在为道德良知呼吁，也是在墨尔本会发生反移民的恐吓运动。悉尼有几十个移民社团，在那里英语充其量只是第二语言，然而在悉尼没有对移民的公开指责，没有恐吓运动。没人在乎。悉尼对自己、对其他首府城市都无动于衷。而其他城市都有自觉意识，也总是意识到悉尼的存在。这点总让悉尼人感到惊讶。

墨尔本位于悉尼西南，直线距离为 450 英里，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人口 240 万，仅次于悉尼。在人们眼里，墨尔本比悉尼更“英国化”，不是伦敦或南方的英格兰，而是曼彻斯特和外省派头的英格兰。墨尔本的社会上层凝固成一种一眼可知的模式，那里仍有大量的、充满流露在外的绅士风度的俱乐部生活。不像在悉尼，如果你走进一家墨尔本的俱乐部，你能看出谁是掌柜的。墨尔本的街道不像悉尼那样通向海港，而是通向庞大丑陋的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墨尔本人在冬天对澳式橄榄球的着迷看来似乎在帮助他们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在悉尼是非常困难的。悉尼人说：没阳光还活着干什么？据说人们在墨尔本要比在悉尼温和些，不太好斗；据说他们也更倾向于结党组派，按自己所属群体的规矩行事。在悉尼，连社会团体内部的争执也更多些，不过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团体则很容易。在墨尔本，同一团体的人彼此间更为友好，但团体间互相影响较少，对外人的猜疑

---

① 坦慕尼协会(Tammany)，1789 年成立于美国纽约，因其在 19 世纪的贿赂、高压等种种劣迹而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者

更重。墨尔本在外表上比悉尼有更浓的清教徒气息。比利·格雷厄姆<sup>①</sup>称墨尔本是他见过的最道德的城市之一。埃娃·加德纳在那里拍她主演的影片《沙滩上》<sup>②</sup>时说，墨尔本是拍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的好地方。墨尔本担心它的犯罪率。它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比悉尼的讲实惠的同行更注重思想。一般说来，墨尔本自以为是比悉尼更有教养的城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的文化生活与悉尼不同，仅此而已罢了。墨尔本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城市都更懂得理财。它是多数澳大利亚大企业的基地。有许多粗人在悉尼赚大钱。那些原本对无论什么事只要经过改头换面都能够宽容的英国来客，把悉尼看成是粗鄙的新暴发户的城市。（实际上它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富豪家族的中心。）金钱在悉尼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它不是以一个声音说话；而在墨尔本它是以一种体现社会惯例和体面的外省绅士的声音说话。在社会上层，墨尔本提供了特别华而不实、落伍过时的澳大利亚的“世家望族”还残剩的代表。墨尔本的世家望族大概最有效地保存了澳大利亚的腐朽。直到不久以前，所有4个政党都是从墨尔本发号施令的。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首府，人口大约是墨尔本的三分之一。它与墨尔本之间的距离跟从伊斯坦布尔到罗马的距离差不多。这是一个不穿外套、高卷袖管、炎热、沉闷，偶尔给人一种怠惰的感觉的城市。城里到处是热带鲜花和啤酒，非常好客；政治上布里斯班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是由天主教徒控制的，现在则由卫理宗<sup>③</sup>教徒控制着（所以妓院被封闭了）。它

---

① 格雷厄姆(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会传教士，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等宣传基督福音而著名。——译者

② 加德纳(1922—1990)，美国40—50年代著名女电影演员。——译者

③ 新教宗派之一，又称卫斯理宗或循道宗。——译者

是澳大利亚城市中最不看重自己的首府。在它北面的热带地区，在那些蔗糖输出港、以牧牛业为生的农村，以及发展中的矿业和工业区，人们并不把布里斯班放在心上，他们要一个独立的、由自己当家的北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的大公司把布里斯班看成是个分部经理呆的小城，一个庸碌之辈的城市。布里斯班是个男人的城市：亲切友好、对变化反应迟钝、不拘小节。

阿德雷德是南澳州的首府，跟布里斯班大小相仿，离布里斯班就像伦敦离里斯本那样远。阿德雷德处在自我冲突之中。它的公认的形象是个优雅的城市，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绿草茵茵的广场、殖民地时代的石头建筑，一切都规模恢宏。那些拥有财产和管理家族事务的富人们在阿德雷德俱乐部的绿色遮阳板和香柏木大门后面文质彬彬地运筹帷幄。这里建立的社会没有“爱尔兰因素”和“罪犯血统”<sup>①</sup>。这里的人信心十足，控制着巨大的利益，但是清教徒味十足，枯燥无味；他们致力于公民自豪感、高度商业道德、出色的作品和高雅的嗜好。有人攻击这幅图画是掩饰政治上的操纵欺诈和愤世嫉俗、诡计多端的社会保守主义的虚伪外表。不管这种指责是否有理，对阿德雷德的现有定论的无法否认的批评是，这种定论已经过时了。阿德雷德已经进入了技术时代。尽管有着保守主义的传统，它是工业转移中具有开拓性的地方。它的大部分地区如今嘈杂、肮脏、混乱。眼下在那里工作的人可能从来没听说过那些古老的家族，而新的经理人员和专家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还有，尽管有人做尽手脚，工党终于在阿德雷德上了台。如果跟

---

① 1788—1868年间，澳大利亚是英国流放罪犯的殖民地。如最早随所谓的“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的1030个人里，736个是罪犯。——译者

过去的相互关系作比较，我们看到布里斯班落后了，悉尼分裂了，墨尔本在前进而得以保持其原来的位置，而阿德雷德进步了。

珀斯是西澳洲的首府，它与阿德雷德之间的距离跟伦敦到列宁格勒的距离差不多，与悉尼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西贡到东京的距离。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荒漠和长着矮小杂树丛的土地把它跟澳大利亚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珀斯是世界上有类似人口的城市中最与世隔绝的一个。濒临印度洋，它到科科斯群岛跟到悉尼一样近。在当初建立联邦时，它的居民并不想加入澳大利亚，是外来的淘金者迫使他们加入的。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其南端大部分地区是有少量季节性雨的沃土，北端是雨季和旱季交替的带状区域，而其余主要部分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土地。珀斯治理的州相当于 10 个英国那么大，但只有 100 万人口。珀斯宽松、好客，是钓鱼和后院啤酒聚会的天堂，随处可见漂亮的花园。那里的人干活非常卖力，不过在赤日炎炎的夏天，也会稍微松点劲。他们不信任“东部”（在阿德雷德，人们也不信任“东部”，但珀斯连阿德雷德也不信任）。

排在珀斯后面的澳大利亚大城市不是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霍巴特（霍巴特人口不到 15 万，位居第八），而是纽卡斯尔，它扩展中的南端目前距悉尼扩展中的北端只有约 50 英里了。这是一个吃水很浅、淤泥沉积的港口，专用于为来自亨特谷矿区的煤装船，纽卡斯尔正在向四周蔓延，构成其在蓝天下的轮廓的是澳大利亚重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的控制下以及悉尼的商业机会和墨尔本巨大的重工业企业总部的支配下，纽卡斯尔正在极力培养一种更成熟的城市的特点。为它定基调的是那些古老的家族、炼钢厂的经理和当地的企业巨头们。

悉尼的南面是还不太雄心勃勃的伍伦贡，澳大利亚第七大

城市，英联邦里最大炼钢厂的所在地。伍伦贡是工业发展之谜造成的难以理喻的怪物：它的建设和重建是 20 世纪的技术和淘金狂年代的混乱无序的结合。伍伦贡是沿着海岸延伸的一系列集居地而不像是一个城市，它的中心至今仍是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来自四五十个国家的移民组成了伍伦贡。在炼钢厂里移民占到了 50%。到目前为止，在澳大利亚的大城市中，它最像是新边疆。它四处伸展，只有上帝才知道哪儿是尽头。在包括悉尼、纽卡斯尔和伍伦贡的不到 50 英里<sup>①</sup>的海岸线上，居住着约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口。悉尼打破了一切定义的界限，纽卡斯尔在尝试新的定义，而伍伦贡则在制造混乱。按目前的趋势，到本世纪末，在这片动荡不定的土地上将会有 500 万人口，也许到那时，人们才会充分领悟到新澳大利亚的风貌。

霍巴特的生命开始于开拓新边疆的时期，接着又沉睡了。它本是最早的罪犯殖民地之一，一个喧闹快活的捕鲸港，后来却变得安逸懒散了。它前面是蔚蓝的海水和 10 英里长的海岸，背后雄踞着冬日里白雪皑皑的青山。由土黄色石块砌成的殖民地时代的旧房子构成的街道依然存在。整个城市好像一下子就溶入了港口，以致那些船似乎就像停泊在大街上。习惯于这里的生活的人说霍巴特的百姓比大陆上的人更含蓄谨慎。新建筑和其他新事物在把霍巴特拽进现代化的潮流，不过它对正在震撼着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和伍伦贡的那种新发展仍然懵然无知。据说这里的生活介于小镇的和平宁静与小镇的勾心斗角之间。大陆上的人很少想到塔斯马尼亚，而外国人想要知道谁拥有这个岛屿。

堪培拉虽然是全国的首都，但比霍巴特还小。它有某些小

---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从纽卡斯尔到伍伦贡约 110 英里。——译者

镇而不是城市的特点。尽管它是玩弄权力的行政管理中心，它基本上不是个政治城市。除了也许有决定性意义的各政党的会议和如今无足轻重的议会开会，澳大利亚的政治活动发生在全国各地，而不是在堪培拉。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美丽的公园和花园的堪培拉铺展在丛山环绕的一片平原上，它是一个由与澳大利亚人民隔绝的行政管理官员们驻扎的权力场。这些行政官员对政治家的压力可能是政府里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但这种压力通常并不是基于对国家生活结构的理解和感受，因为只有生活在其统治的人民中间，才会产生这种理解和感受。这些官员对可能性的判断往往是过了时的。他们肯定是生活在多少年前澳大利亚人看上去的那种样子的记忆中。堪培拉有的是政府大楼和郊区花园里的小小的宁静的住宅。一些人与素质高低悬殊的外交官圈子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有来往。这里有在知识分子聚居的花园般的郊区里可以期望的那种娱乐和文化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达尔文是约瑟夫·康拉德<sup>①</sup>留下的残羹剩汤。它是一个懒洋洋的、半亚洲色彩的港口。由于在整个世纪里几乎完全无法与北澳特区一起做任何事情，它变得非常虚弱。它在热浪中沿着阿拉弗拉海延伸，是珍珠商、捕捞海参的渔夫和猎鳄人赌博和喝酒的地方。1942年日本轰炸机把它的大部分炸光了，它的一些居民抢走了剩下的东西，然后开着车逃到荒漠里去。现在它是一个由建在高桩上的整洁的房屋组成的城市。它的一半人口是政府官员，管理着6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在这片地区里有4万“白人”，其中大部分是还在做着种种

---

① 康拉德(1857—1924)，原籍波兰、水手出身的英国小说家，曾4次到过澳大利亚。——译者

发展实验的政府雇员，只是至今还没有取得成功的报道。达尔文是一个跟堪培拉截然不同的行政管理官员的驻地，在这里说了算的还是“烈酒聚会”；寂寞的男人还会偷偷地溜进锈迹斑斑的铁皮棚屋，用瓶酒换个土著女人。达尔文在赤道南面，距赤道只有 12 度，非常热。以纬度计，它到霍巴特比从喀土穆到罗马还稍微远些。它的长长的雨季有时让人发疯。在旱季里，水牛会闯进高尔夫球场。这里混血土著与白人的融合进展迅速，而纯土著与白人的融合则慢得多。达尔文有长期失败的历史，遍布着成百个规划留下的废墟。现在它和北澳特区有着三大希望：养牛业、鼓励开矿，以及发展澳大利亚第一个真正有广泛基础的多民族社会。

布罗肯希尔在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西部，是什么也管不了只能管它自己<sup>①</sup>的一个行政中心，一个只有 3 万人口的城市。这里开采银、铅和锌。统治布罗肯希尔的是工会。对布罗肯希尔来说，工业管制理事会远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更强大。在“证章出示”日要检查工会会员的身份，看他们有没有缴纳会费。商店的价格是由工会控制的。要是人们认为某个商店的价格太高，这个商店就会被宣布为“黑店”。矿工们甚至以抵制啤酒的办法来压低价格。工业管制理事会有份晨报，如果什么商号不上那里登广告，理事会就会把它宣布为“黑户”。所有工会会员都必须买这份报纸，哪怕一家有几个工会会员，或者他们是不懂英语的移民。妇女一结婚，就给 3 个月的停职假期。布罗肯希尔遵循它自己的法律而不管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

---

① 指布罗肯希尔控股有限公司，直到两三年前，它始终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企业。参阅第七章中“压力集团”一节。——译者

人们不该把以上对澳大利亚最大的 8 个城市以及堪培拉、达尔文和布罗肯希尔的简略描写看得太认真。还有，我希望人们能一眼看出我对悉尼的偏袒。这些只是澳大利亚人在谈论他们的城市时会提到的现象的一些例子。跟本章的其他部分一样，它们是对前一章的总体概括的具体说明。澳大利亚城市之间的差异，不管是什么，都可能是在某种同一性范围里的差异。关于澳大利亚人（不算移民）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说他们全一个样；另一种是说他们全都不同。这两种理论都是真实的。达尔文的烈酒聚会、珀斯的后院聚会以及悉尼皇家十字区的聚会形式不同，但完全可能只是同一回事的不同表现。布里斯班人对简洁的癖好也许实际上跟塔斯马尼亚人含蓄的举止异曲同工。这是澳大利亚的奇迹之一，即尽管在殖民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差异，它的人民到处都差不多。

## 荒 野<sup>①</sup>

大约 58% 的澳大利亚人住在首府城市里，还有四分之一人口住在有相当规模的镇上。略多于 15% 的人住在可以说是乡村的环境下。在整个劳动力中，只有 8% 的人直接以土地为生（这个数字是从 40 年代末的 15% 降下来的）。古老的乡村价值观甚至在阿利斯普林斯也在受到威胁。阿利斯普林斯位于澳大利亚中部，那里飞扬的尘土有时可以笼罩几千平方英里。土著从前在那里被屠戮，今天还有人会死于荒漠。6000 人口的“阿利斯”<sup>②</sup>是 8 万平方英里澳大利亚土地的中心，也是无线电

① 原文为 *the bush*，指澳大利亚偏僻的或未开垦的灌木或森林地带。——译者

② 当地人对阿利斯普林斯的昵称。——译者

学校和无线电医生<sup>①</sup>的中心。为了开发旅游业，阿利斯普林斯正在使自己城郊化起来。目前，坐在空调大巴里的游客一路开去，他们还能看到干涸见底的托德河里的白沙和河岸上瘦削苍白的桉树；托德河在镇里贯穿而过，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梦。不过同时他们也能看到现代化的旅馆、汽车旅馆、商店和保养良好、足以让墨尔本的郊区增色的花园。

在想象澳大利亚乡村小镇的模样时，人们会调动自己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亨特谷是一个有3300人口的小镇。那里地势起伏不平，零星地长着胡椒树。高尔夫球场上的草一片枯黄，脆得一碰就断，上面点缀着晒干了的牛粪。乌鸦哀鸣着在空中盘旋。出了镇可以见到牛尸的白骨。房屋是简单的木结构。自动喷水器保持着草地的翠绿，但要是久不下雨，喷水器就会被关掉。每幢房子都有储存从波状铁皮屋顶的水槽上引下来的水的大水柜。站在屋外走廊上，人们可以越过褐色的峡谷看到三两座古老的断树残桩似的小丘。镇上有早已成型的社会等级，从拥有镇四周大片土地的大地主，到小绅士、下层中产阶级、手艺人、铁路员工，一直到矿工的小团体。商店里体现的是不久前出现在悉尼的新意。还有一些陈旧的商店，那里体现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的旧观念，人们会纳闷这样的店怎么能维持下去。天主教徒在山丘上有高耸的尖顶的教堂做礼拜，他们被视为高人一等。卫理宗教徒在镇里主要街道上的砖砌的卫理宗教堂做礼拜，他们被视为下等人。长老会<sup>②</sup>教徒在另一座山上也有个尖塔的教堂做礼拜，他们像

---

① 借助收音机进行学习和通过无线电得到医疗指导、寻求医生帮助的机构。——译者

② 从英国国教分离出来的一个宗派。——译者

是居于两者之间。不过在战争纪念碑的纪念仪式之前的澳军团日主要祈祷是在河边平坡上的哥特式英国国教教堂里进行的。人们往往奇怪为什么在澳军团日举着十字架，走在教长前面，显得如此重要的人，就是平时送煤气账单的那个人。在艺术学校里人们能读到轻松的爱情小说和战争冒险故事。柳枝阴影笼罩着的溪边木头教室里，学生们受到教育，说作为澳大利亚人是幸运的。

这个教室现在已经被推倒了。我的整个记忆是 30 年前的事了。即使是在那时，传统的乡村价值也已经在衰退。与城市相比，乡村有它的特点：步行上班，有时得穿过牧场，比坐电气火车上班要让人心平气和；个个都回家吃午饭；能买到的娱乐比悉尼少（据说乡村里的人比城里人更多地“自寻乐趣”）；话说得慢一点；社会差别的感觉更明显些。但总的来说，住在乡村镇上的人基本上只是住在城市郊区里的人的慢节奏的翻版，尽管他们也许自以为不同。我祖父过去老跟我讲澳大利亚，讲他从家里跑出去“体验殖民地生活”，参加一帮牛羊商人时所发现的澳大利亚，但他知道的并不比我多。他们从来没有在篝火上烘制过硬面包。所有那些都是另一个时代、黄金时代的事，那时一个流浪汉可以背着行李包走进一片定居地，然后着手建造一个城镇。

金伯利斯在西澳洲的热带北部，占地 10 万平方英里，生活着不到 5000 名“白人”和混血土著。那里拓荒人家放牧牛群的土地像中世纪的王国一般大。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地方，现在也有了利用位于奥德山和菲茨罗伊河之间几百万英亩的肥沃处女地的计划，其中包括建设若干新城镇，那将是一些距离任何地方都有上千英里的、看上去像突然冒出来似的、小小的、整洁的郊区。在那些更为普通的乡村小镇里，有扶轮

社<sup>①</sup>分社、专业和行政人员协会<sup>②</sup>、国际狮子协会俱乐部<sup>③</sup>、共济会<sup>④</sup>俱乐部、设有老虎机的退伍军人协会俱乐部、保龄球俱乐部和高尔夫俱乐部。轮流演出其保留剧目的剧团在上演 10 年前在伦敦西区<sup>⑤</sup>走红的戏。当地电台播放着流行音乐。越来越多的镇里有了电视。带点城里高雅趣味的人在用大木碗卖色拉。在一定规模的乡村小镇上，人们现在多半能在餐馆里吃到典型的城里的晚餐：海鲜开胃菜，嫩牛肉片、以及传统的牛排和煎蛋。

我不认为我祖父过去常说的那些价值观至今还以任何显著的形式存在着，虽然还能从某些个人或家庭看出它们遗留的痕迹。那是一些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的、也许是 18 世纪保留下来的价值观，它们更多地带有贵族化而缺少民主性，其特点是简单朴实；对别人的意见满不在乎；对自己的行动将给自己造成后果也满不在乎；对独立的强烈的、几乎是执迷的追求；憎恨任何凝聚力，包括被自然或社会环境中的敌对因素抛到一起的朋友之间自然产生的凝聚力；相信争论的后果无非是各持己见，最好还是一走了之。这样的价值观把人送上一切全靠自己的征途，在物质的意义上，不是毁灭就是造就他们。它们暗含着对命运的反抗，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一些老的、拥有地产、因而可以拒绝新的价值观而不至于失去从银行透支的特权的家庭里，这些价值观的影响至今最深。

在镇以外的乡村里依然存在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农民

---

① 即扶轮国际，一个由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的人员组成的群众性互助服务社团，1905 年创建于美国芝加哥。——译者

② 即 Apex，全称为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Executive, Clerical and Computer Staff（专业、行政、办事及计算机运算人员协会）。——译者

③ 狮子协会俱乐部（Lions Club），1917 年创建于美国。——译者

④ 共济会，在欧美有许多分会的一种以互助为目的的秘密社团。——译者

⑤ 英国王宫、议会、政府部门所在地，多大商店、剧院和高级住宅。——译者

都有的对牲畜、庄稼、气候、季节和市场的着迷，那种以土地为生的人对土地的感觉。那种感觉不仅仅是爱，它已经变成了理解。那是一个蠕虫缠身、跳蚤紧咬不放的世界，橘黄色菊花和牧场改良的世界，用枪射鹰或阅读关于母牛铜缺乏症的小册子的世界。那是些萦绕人们心头的澳大利亚的风景：苍白酷热的天空下，巨大的牛群在一望无际、毫无阴影、蒸发着热气的大草原上漂移；麦田缓慢地、单调乏味地向远处伸展；散布着杂树丛和大卵石的潦倒破败的奶牛场的牧地；碧绿的甘蔗田，天上飞掠过来自海上沙礁的低低的白云；阡陌齐整的种植果树的灌溉区；“旧家庭”孤零零的房子和玫瑰花园；以及与沼泽、荒漠或被野火烧毁的山岭为邻，与命运所作的疯狂的抗争。

在西部平原上有些萧条的小镇，二三十幢住宅、一个酒吧、一个邮局、一个警察署、一个百货店、一所学校；满是尘土的牲畜往来的通道将就着成了主要大街；胡作非为的山羊在镇外公地上大嚼青草。或者是离海不远的溪谷中的小镇，那里钟声悠悠，鸟鸣婉转。

在这个澳大利亚，人们不信任城镇里那些精明的家伙。他们喜欢不同的性格，欣赏有“个性”。一些人疯疯癫癫的，可以为一杯啤酒大喊大叫吵上半天。这里也会有猜忌和怀疑主义，也会要求政府“公平对待”，但个人判断、个人责任的观念比城里要强得多。在周围几百英里渺无人烟的某个静寂偏远的地方，对澳大利亚以外的世界的要求的感触也许会比在沿海城市的整个郊区所能体会到的还要多；比如，日本人买不买羊毛、中国人买不买麦子、美国人买不买肉，这些都是直接利益攸关的大事。这里有欢声笑语，但这是懂得洪水、野火、瘟疫、干旱或市场崩溃等大灾大难的人的欢声笑语。这里有赌棍的梦想，但没有城郊澳大利亚人那种淡淡的乐观主义。这里可以有推心置腹的合作，

也可以有家族间不共戴天的夙仇。除了富人，这里寻欢作乐的机会跟城里不可同日而语。年轻人在不断地流失。澳大利亚乡村居民还有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他们真的是住在“荒野”上。作家和画家们笔下充满神话色彩的风景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对那些趁休长期服务假的机会参加空调巴士旅游，用新照相机拍摄这片神话般的土地的城里人来说，已经变得熟悉起来了。如果附近有旅游指示牌，城里人或许还会记下当地的海拔高度，这种资料以后在放彩色幻灯片时是很有用的。

## 清教徒禁欲主义者

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教会不再至关重要了。虽然 89% 的人在填写人口普查表时仍然注明自己所信奉的宗教（34.8% 英国国教，24.6% 天主教，10.2% 卫理宗，9.3% 长老会），非官方调查表明多达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会承认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里上教堂的人比美国少，非天主教徒上教堂的人比英国少。英国国教一个小组调查了 770 个新人伍的军人，其中只有 19% 能写出主祷文，21% 能说出三位一体中的三位指什么，只有一半的人知道复活节庆祝的是什么。

澳大利亚人还是喜欢利用教堂结婚，几乎所有婚礼都是在教堂庆祝的。不过正如肯·英格利斯在《澳大利亚社会》一书中所说的，这大概是 19 世纪留下的习惯，而不是坚持宗教信仰的表示。在处理死者时，澳大利亚人在两边都下注：他们喜欢要牧师主持追悼仪式，同时又宁可选殡仪馆而不是教堂举行追悼仪式。非天主教的澳大利亚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倾向于火葬。（还有，按人口比例计，澳大利亚妇女大概是世界上使用口服避孕药最多的。）

如果谈话转到了宗教(谈论宗教常常被认为有欠风度),谈话可能主要是与金箴<sup>①</sup>有关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模糊记忆,而这些金箴已经变成了伙伴情谊的表达。在关于不朽永存的轻声细语中所表达的是公平对待的观念,如地狱对弱者不公平,所以被废除了;要是有永恒的幸福生活,那该人人有份;对耶稣的救世主作用的信念不再强烈;有关罪恶的概念并不是澳大利亚的,因为人必须寻找他人的美德。清教徒主义的本能还在,所以寻欢作乐还会引起极其激烈的思想冲突,尤其是在年纪较大的人中间。教会的性伦理依然是普遍接受的教条,尽管统计资料<sup>②</sup>和日常观察显示人们的实际行为与教会的告诫大相径庭。澳大利亚人对人的尊严、潜力、生命的价值的信仰几乎是全民性的,他们的正式信仰基本上是人道主义,而基督教教义中与这一信仰相符的部分都保留了下来。

大约有一半的天主教徒和三分之一的卫理宗教徒定期上教堂,而在自称为英国国教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的人中间,只有七分之一至今仍这样做。非天主教教会现在把几乎所有的教义,除了那些最含混不清的,都抛在了一边。宗教成了提供安抚慰藉的神秘主义。澳大利亚人最普遍地强调的往往是实际的事情,教义是不重要的。年轻的经理人员投身于教区的具体事务,如设计筹款策略、统计上教堂作礼拜的人数等等,就像他们投身于保龄球俱乐部的事务。母亲节成了个宗教性的日子。礼拜仪式有小小的复兴,主要局限于牧师和若干富有同情态度的俗人中间。但总的来说,在实际上,新教教会已经几乎耗尽了所有严

---

① 基督教为人处事的准则,尤指《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说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译者

② 约四分之一的初生子显然是在他们的父母结婚前受的孕,此外还有约七分之一是私生子。

肃的智慧和道德成分。严肃性也许把老百姓拒之于教会之外。

应该指出的是，在澳大利亚人中间有长期的反宗教、反“古板的新教徒”的传统，所以每当基督教的习俗向其他信仰挑战时，它们往往只能落个第二。如果澳军团日（澳大利亚的大众节日）正好在星期天，来自教会的抗议多半会遇到反驳，说澳军团日比上教堂更重要。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也确实是如此，因为与澳军团日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比基督教更强调坚忍和恬淡寡欲。

在实际上，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宗教只有在阻止他们去干想干的事情时，才变得重要起来。这种阻止的主要形式是由清教徒禁欲主义者体现的非英国国教良知派，而非国教良知派则是澳大利亚自由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迈克尔·罗在《1835—1851年间澳大利亚东部对权力的追逐》一书中指出，早在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已经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优秀、聪明、成功、负责任的公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教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首先是帮助抵制了英国国教和拥有地产的绅士们把英格兰的模式强加到澳大利亚头上的企图；然后是力劝贫穷、受压迫的人停止酗酒，要他们穿上硬领外套，像好基督徒那样在郊区的小房子里安家落户。跟在英格兰一样，禁酒运动是新教徒对社会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也是反对贫困、反对社会不平等的运动。但是，随着这些罪恶的消失，以及其全面振奋社会的意义的衰减，禁酒运动成了针对某些享乐方式的狭隘的成见。在这点上，它的支持者包括受爱尔兰影响的天主教会的一部分，这些人以爱尔兰的方式为英国非国教良知派摇旗呐喊。与新教徒禁欲主义者相比，天主教的禁欲主义者不大会痛斥喝酒和赌博；不过在猛烈抨击除了某种特定功能以外的性行为方面，他们是先锋。

要夸大清教徒禁欲主义者，或者推而广之，澳大利亚人想限制别人行动的强烈冲动在澳大利亚传统上的重要性是不容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场大战可能是他们的穷途末路的起点），清教徒禁欲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占领着大部分领域。他们攻击喝酒、赌博、抽烟、离婚、妇女时装、星期天搞体育活动、现代诗歌、当代小说、公寓套房、母亲上班以及口红。像避孕和越规的性行为这类主题禁忌之深，以至于它们都受不到攻击。清教徒禁欲主义者的选票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举足轻重的。从两次大战期间直到 50 年代，对旅馆营业时间和赛马场外投注之类事情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自那时以来，清教徒禁欲主义者在慢慢地、无序地撤退。不过，值得记住的是，哪怕是在最主张思想自由的澳大利亚人的头脑里，常常依然会有那么点清教徒禁欲主义者的道德观在徘徊不去。

## 天主教徒

澳大利亚人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与宗教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天主教教义与反天主教教义的对立，这一直是在澳大利亚人中间造成分裂不和的问题之一。在传统上，这里有一个牢固稳定、大多数成员出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社会，它是怀着一种对基本上不友善的环境的疏离感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今天对天主教教义的反对已经不像 19 世纪时那样公开了，那时对罗马的恐惧和憎恨导致世俗主义者和新教徒在使州政府和教育世俗化的斗争中并肩作战。不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人现在不总是能觉察到反天主教思潮的影响，而这种思潮如今终于衰退了。尽管如此，对天主教教会的极端不信任仍是大多数年纪较大的非天主教澳大利亚人的信仰系统的一部分。这种不

信任是由某些新教牧师灌输出来的，它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信条（反天主教相当于知识分子的反犹太主义）。在许多政府部门的下层，反天主教思潮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自由党中很多人有反天主教的偏见，许多商界领导人也是反天主教的，这在工党运动的斗争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共济会的地方分会常常鼓动反天主教。在商界、政府部门和政党中，共济会员经常带头反天主教。作为报复，非神职的天主教徒则通过他们自己的秘密团体南十字星骑士会，一个模仿共济会、有特殊的握手方式、暗号和暧昧难解的仪式的组织，以自卫来反抗他们心目中的强大可恶的敌人。而这反过来更增加了共济会员的猜疑。所有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现在都没有关系了，反正都是图自己的永世长存；而双方虎视眈眈，则是因为谁都坚信对方在策划反对自己的阴谋。

在澳大利亚，这种敌对心理是促进行动的重要推动力。互相对立的秘密社团具有共产党掌权以前的中国的秘密社团所具有的某些影响。在澳大利亚，由黑社会阴谋策划而成的事件，其数量之巨，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能意想到的，或任何人所能详细描写的。恐怕正是由于所有公开讨论的调子都是那样地理想主义，因而只有在暗中才能应付权势的现实。不管什么原因，热中权力的少数澳大利亚人确实爱策划阴谋诡计，并从肮脏的勾当中捞取好处。

反天主教派通常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天主教是铁板一块，只要教皇或红衣主教或别的什么人颁个旨意，所有天主教徒都会服从，就像开关一按，灯就会亮一样。这种信念由于若干证据而变得牢不可破，如教区神父对他们的一些教民的影响范围无疑远远超过教条所规定的；天主教的作风造成它的发言人经常暗示教会远比现实更为团结，因而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天主

教的作风也造成它的出版物压制讨论；天主教在工党中拥有不成比例的强大势力（人们也可以加上一句，它在自由党和乡村党中的实力不成比例地弱小）；天主教学校经常鼓励学生去从事公益服务，因为那里有对他们有利的天主教权力系统。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教会是铁板一块。教会的自身结构是多元化的，每个主教都直接对罗马负责；而红衣主教也仅仅是个主教，如果想对其他主教施加影响，他必须通过民主方式才行。

虽然天主教的一般教徒会搞阴谋，但整个教会并不是一个由人操纵的单一的阴谋集团。只要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按比例计算，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更多地在关于是否要禁止共产党的公民表决中投反对票<sup>①</sup>。还有，在上教堂的人中有一种反牧师制度的倾向；而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根本不上教堂。对工党的传统上的支持（可能有75%的天主教徒在50年代工党分裂前一直投工党的票）被视为天主教阴谋活动的证据，但实际上这一现象的解释要微妙得多。天主教徒控制着工党的许多机构，这是事实，然而这可能是工党在利用教会而不是相反；工党某些个人的影响在天主教徒中不断扩大，就像毛细管吸附作用一样，传统的投票模式就此建立了起来。无疑这让牧师们高兴，同样无疑有些牧师是帮工党头儿们的，但他们看上去并不能为教会从中得到太多的好处。

30年代随着坎皮恩社<sup>②</sup>在墨尔本的成立，教会的某些部分开始呈现富有智慧的活力，同时一般教徒的影响也在逐渐增长，这是一般教徒在知识界的第一次（也许是粗糙而不完善的）的突

---

① 1951年孟席斯提出一项禁止共产党的法案，在全国公民表决中被击败。——译者

② 由信天主教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宗教团体。——译者

破。由于他们中一些大学教师的缘故，天主教徒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从前高了，尽管他们占有的重要职位的数量与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数量还是不成比例。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徒从牛津和鲁文大学<sup>①</sup>毕业，在大学和教会中成名。这些新型的天主教徒中的一些人在高质量的“小杂志”上发挥他们的思想，以努力展开在自由的多元化社会中的友好对话。这种现象造成的力量产生了一批严肃地考虑严肃问题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们心智敏锐，充满活力，就像那些总想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人那样。

所有这一切为在态度上的一场革命奠定了基础，而态度的放松是从第二次梵蒂冈教廷会议<sup>②</sup>开始的。罗马一招手，连变化的最大的反对派也成了自由化的倡导者。天主教牧师们纷纷从他们的深院幽室里冒出来参加电视上的对话。教会各种仪式的变化在澳大利亚看起来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迅速。不管当前发展的结果如何，澳大利亚的天主教会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对变化的接受是出于实际考虑的，它本身就是非常澳大利亚化的。而一般说来，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澳大利亚天主教会的澳大利亚特点。其实，对实用主义、筹款和组织的强调，对知识分子微妙的话外之音经常缺乏耐心，州权至上主义和宗派主义，社会行为的循规蹈矩，以及南十字星骑士团这样的一般教徒组织的实用主义（除了生意上的阴谋，通常对什么都太不讲究理论），所有这些都是澳大利亚的特点。

天主教会“非澳大利亚”的一方面是它至今仍在灌输对教会的泛人类的教导的信念。教会为天主教徒提供了一套远比其他澳

---

① 指比利时的鲁文天主教大学，一所创建于 1425 年的名牌学府。——译者

② 20 世纪 60 年代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相继主持的天主教会最高会议，提出了“礼仪改革”、“权力下放”、“教士当地化”、“教会合一运动”等革新措施。——译者

大利亚人复杂得多的生活态度，它指望教徒们学习这些态度并把它们转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而澳大利亚人通常再也不受这些清规戒律的折磨了。对天主教徒来说，生活可能依然未必显得轻松乐观。教会的信念在社会上体现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如避孕、离婚、异族通婚和性之类；而大多数非天主教澳大利亚人对天主教的理解也就是它对这些事情的执著不放。曼宁·克拉克<sup>①</sup>发表在《澳大利亚文明》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触及得更深，他写道：“爱尔兰人也把他们的耶稣和圣母的概念带到了澳大利亚。前者的特点很难用词语来表达。……俄国人的思维方式担心人类心灵上既有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也有索达姆<sup>②</sup>的理想，而爱尔兰人则相信圣贤和流氓共存于一体。爱尔兰天主教徒知道他们不是那种人：他们不是英国人老要他们奉为典范的那种正直、诚实、雄心勃勃、功成名就的人。”

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的问题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天主教教义和反天主教思潮的特点。这个争论了上百年的问题如今快结束了。世俗化运动在 19 世纪迫使天主教徒自力更生，从根本上触动了教会组织。至今，只有天主教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私立学校系统。其他极少几个私立学校只是为能付得起学费的人办的。澳大利亚有将近 2000 所天主教学校，差不多占学校总数的五分之一，教育着 25 万名儿童。教区许多牧师的迫切任务经常就是确保天主教徒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为学校筹款，以及主持一套复杂的教育体系。除非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如关于政府资助的社区早餐演说、为慈善目的的抽签售卖、宾戈游戏和其他筹款活动、家庭对学校费用的念念不忘、政治压力等

---

① 克拉克(1915—1991)，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作为《澳大利亚史》6 卷。——译者

② 索达姆，古代巴勒斯坦的邪恶之城。——译者

等，人们不可能理解天主教生活的滋味，而正是这种气氛帮助形成了一种置身于充满敌意的社会里的印象，强化了天主教徒的团结排外。

对教会学校的政府资助是澳大利亚实用政治的问题之一。作为权宜之计，非天主教的自由党如今克服了成见，开始点点滴滴地提供政府资助；与此同时，工党在这事和其他事情上一样意见分歧。现在没有一个选举政纲能缺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

## 勢 利 之 徒

在澳大利亚，基本的势利行为都与土地拥有权有关。不过，尽管土地所有权在各州所谓的“社会”里依旧显得至关重要，一般住在城郊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对拥有大片土地的家庭并不在乎，除非他们在都市生活中能出人头地，像赢得墨尔本杯<sup>①</sup>或卷入轰动一时的离婚纠纷之类的。现在几乎对所有城里人来说，一个地主也就是另一个人。在悉尼进行的一次关于职业的社会地位的调查中，地主只获得 B 级，排在第十九，介于编辑和政府部门主管之间。医生是 A 级第一，大学教授第二。不过，在其地产附近的镇上，一个地主多半还是有最高地位的。在乡村小镇，人们彼此间太熟悉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基于社会地位的识别模式。这也许是澳大利亚城乡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乡村里对社会地位的差异更敏感，地主家族与镇之间的悠久渊源依然存在。尽管从历史的苛刻眼光看，这种差异实际上已

---

① 每年 11 月第一个星期四在墨尔本举行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一场马赛。——译者

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存在着这种差异的镇子在外表上看来是如此民主，使外人或许觉察不到什么差异，但是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差异依旧存在。

这种差异在习俗上最毫不含糊的表现之一是一年一度的乡村赛马会。它们具有英国定点比赛、然后从汽车后行李厢里取出食物进行野餐的某些特点，不过是平地上的比赛而不是越野障碍赛。马要差些，有更多的人喝得酩酊大醉，参加定点比赛的程序比较民主。比赛结束后在乡村的私有土地上举行晚宴（大多数家庭都会为之安排家宴），饭后是舞会。

昆士兰的地主们过着自己的一套生活，他们是如此地怡然自得，以至于布里斯班在他们眼里也只像是另一个乡镇。在西部，地主们领导着“社会”，只是几乎谁也不知道。在南澳和维多利亚州，他们还是跟其他的“社会”领袖们混在一起。在新南威尔士，他们奉行着传统的礼仪，照样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中心，而实际上在悉尼棘手的竞技场上，他们面临着众多的对手。这些地主们一度在世故练达方面高人一筹，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老朽了，其实只是乡下的富亲戚罢了。

与土地所有权有瓜葛的是所谓的“门第”问题。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普通百姓中，如果谁能声称有早期来到这块殖民地的祖先，哪怕是个罪犯，倒可能引起小小的羡慕。家庭间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收入来源。要是婚姻双方的父亲挣钱途径截然不同的话，就可能有麻烦。与生俱来的高贵，家族因世世代代的淘汰筛选而强化或受上帝或命运的眷顾而具备某些最好的素质，这类神话的市场极其微小，不过也会让一些人心醉神迷。在一些地主家庭里和热衷于社会声望的人中间，对家谱学的难以理喻的关注会达到英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程度。老想着在社会上往上爬的人会买些古董

(可能是通过分期付款)以暗示自己的家庭渊源,至少暗示自己是识货的行家。假如能碰巧撞上个有点来头的祖宗或传家宝的话,连最鲁莽无礼、表面上对出身不屑一顾的暴发户也会紧紧抓住不放。

跟在英格兰一样,在没有地产或“好人家”背景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有助于打入排他性的小集团,所以人们设法赚钱,然后把孩子送进“好学校”去。而人民大众对这些同样无动于衷、不理不睬,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关于借助“好学校”在社会上往上爬,关于搞只是比学校老同学圈子稍微扩大的、同时混杂着姻亲关系的小集团中的小集团,以及关于“好学校”在职业上的重要性等等的微妙故事。进“好学校”能改善年轻人的职业前景(尤其如果他头脑迟钝的话。如果他有才能,他会选一个专业);在一些公司里,老校友的帮派主义厉害得可怕,那里英国式地强调培养发号施令的习惯、不信任专家、仇视思想和技能。还有,跟英格兰一样,澳大利亚的“好学校”也要求学生理解股票市场。

社会地位在澳大利亚会很重要。普通老百姓倒不一定尊敬商人或高官,但某些专业,特别是医生,受到普遍的尊敬。在郊区,说某人“娶了个医生的女儿”会令人肃然起敬。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唯一几乎普遍接受的势利表现,因为如果他们的老婆要他们那样做,专业人士也会进入这些排他性的小集团。在小集团中对专业人士的尊重程度不像外人那么高,但是人们差不多从来没有意识到小集团成员对他们中间的非专业人士的尊重是多么有限。在澳大利亚不可能粗粗观察一番就决定别人的社会地位。你不能凭听人的口音或他的谈话内容、看他的衣着和仪态举止来判断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普通人不大能根据感觉准确无误地辨认出“真正的绅士”,而这种准确性曾经是英

兰普通老百姓的特点。学校不出产标准产品。没有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排外性小集团是其成员自行组织的。这类小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尤其是非专业人士)会表现出种种唐突和粗鲁,足以把他们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排外小集团中驱除出去。跟澳大利亚许许多多成功的形式一样,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也往往够不上世界级别。

如果阅读报纸上的妇女专栏,人们会得到一个印象,即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社会”;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报上说的只是由组织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妇女说了算的妇女“社会”。这个“社会”为报纸创造了足够鲜明突出的形象,对许多读到有关篇章的人来说,这就是“社会”了。这个“社会”在悉尼已经四分五裂,以至于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本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的,现在却最好能避免他们该做的一切事情。

那些在社交界确立种种规范的名媛淑女们,在妇女杂志的专栏中常被报道,但她们不一定都非常有钱,她们之所以处于有号召力的社会地位,是因为她们的慈善委员会组织从前只有富翁才提供得起娱乐节目。能否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员,关键是个算计问题。让自己的照片上报,以显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可以是轻而易举的事:你只需要作好安排,在赛马会、艺术展览开幕式、新戏的首演式、电影预映、鸡尾酒会、烧烤野餐、帆船俱乐部、葡萄酒品尝会或舞会上拍张漂亮的照片,或者在有钱人常去的教堂(大多数是英国国教教堂)或大学的礼拜堂里结婚。

在悉尼的这个世界里,上报最多的是马塞尔·德基凡里夫人,她是社会上势力很大的黑白球委员会和其他若干委员会的主席,最近开始在悉尼的《周日电讯报》上发表周记。要反映她的世界,可以先从她在2月份一个忙碌的星期的周记里了解她的世界里有些什么。星期天,她上教堂。布道的主题是:“我有

一个梦想”。她评论说：“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的梦想，哪怕有时梦想不能成真。你说是吗？”星期一，她收到以前在悉尼的一次慈善活动中遇到的鲍勃·霍普<sup>①</sup>寄来的圣诞卡。她在澳大利亚大酒店进午餐，接着去看一个秋冬时装系列表演。她在谢夫隆－希尔顿酒店进晚餐，“总的来说，这是个美好的夜晚”。星期二，她主持了一个慈善委员会会议，去上了《圣经》课，然后对将要和丈夫一起乘飞机作商务旅行这件事考虑了一阵：“我猜想这次现代航空旅行该是很好的经历。……以前我飞过……那是30年前。”星期三，在开车沿着麦克利街驰过时，她想到那里看上去“有点像巴黎的一角”。后来她去看了一个画展的预展，觉得那些作品的色彩“惊人地亮丽”。这天是以在老托德剧场看《认真的重要性》结束的。星期四，她做了次减肥治疗，买了一顶坐飞机戴的帽子，“我知道没人在飞机上戴帽子，但我要戴。”在下午她有一个慈善会议。她在外面进晚餐。星期五，她夸奖了一番她丈夫送给她的新航空旅行箱，然后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星期六，她去看赛马，晚上看电视。

## 文化突破

澳大利亚的文学和其他一些艺术领域，现在是一片由突破所造成的混乱。原来确凿无疑的东西已经消失。变化是如此地自相矛盾、如此地激烈，以致任何同时代的具体评估都没有多少价值。对这些，职业批评家经常描绘出一幅黯淡凄凉的图画。他们被弄糊涂了，有时因突如其来的变动而勃然大怒。社会上

---

① 鲍勃·霍普(1903—)，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和电影演员，靠唱歌和滑稽表演起家。——译者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么多的活动。考虑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和它的人口，写诗、写小说、写剧本、画画、办艺术馆或小剧场、上音乐会或剧院的人数相对来说是多的。

就公共建筑设计而言，从前谁都可以轻易地挑出一大堆毛病，现在则不行了。罗宾·博伊德<sup>①</sup>在《澳大利亚的丑陋》一书里写到的他在实业界人士中发现的那种对业余水平的洋洋自得依然存在。报纸的排印式样和编排方针是由编辑设计的，产品展厅是由销售人员设计的，住在城郊的夫妇爱自行设计房子，如此等等，都是民族风格的一部分。不过，如今对标准，至少对时尚，开始有所意识了，尽管这种意识也许还是朦胧而闪烁不定的。眼下在悉尼和墨尔本到处拔地而起的一些新大楼还不错，起码它们闪闪发光的玻璃比已经推倒了的不值一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显露出更多的协调和风格。在悉尼可以觉察到建筑上一种灿烂的梦境已初露端倪，哪怕眼下还没有多少能体现出伟大想象力的东西。

人们如今对残剩的一些古老建筑，特别是两三幢在殖民地岁月里按乔治时代<sup>②</sup>风格建造的房子很感兴趣。古老的带有阳台、装饰着铸铁花纹的房屋已经时髦好一阵子了。工人们正在修复帕丁顿和格雷莫西广场。街上甚至有几家“铸铁装潢商店”，里面除了大大小小的铸铁花饰，什么也不卖。城里一些新的大楼成了谈话的内容，表明人们终于对他们的城市应该像个什么样子表示意见了。许多人在新住宅的设计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是有时结果还是令人失望。这些趋势总的来说显

---

① 博伊德(1919—1971)，建筑师、评论家，《澳大利亚的丑陋》是其最著名的作品。——译者

② 英王乔治一世至四世执政时期(1714—1830)。——译者

示了对正确方向的兴趣。在建筑方面确实是有变化、有改进，而对澳大利亚其他许多领域的活动是不能这样说的。由于缺乏专业化和对创造性的领悟迟缓，许多标准也许还不如人意，但至少可以说，随着事物的自然发展，尤其是老一代人逐渐失去控制权，澳大利亚人对设计的重视将远甚于自早期殖民地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

与此同时，现存的多数建筑看上去都还是像淘金热时代粗制滥造的楼宇一样。人们越是紧张地修缮、粉刷、美化它们，它们越是接近罗宾·博伊德在《澳大利亚的丑陋》一书中所描写的模样。鲜亮的原色的巧妙涂抹，仿断裂石纹的饰面材料，装饰上的条纹、波纹和方形、多层复合的塑料板，这些是澳大利亚人对“品味”的新渴望的最初征兆。

在音乐方面，音乐会演出的兴旺景象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一年中将近有上千场专业水平的严肃音乐的公开演出。这些演出几乎都是由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BC)控制的。它控制着所有永久性专业交响乐团，包括悉尼和墨尔本的两个正规交响乐团和其他州首府的小型交响乐团。所有在澳大利亚作巡回演出的音乐家几乎都是由它聘请来的。它还为伊丽莎白基金会<sup>①</sup>主办的歌剧演出季节提供交响乐团。对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的音乐会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说它倾向于选择档次不高不低的节目。据说澳大利亚人无缘欣赏到当代音乐的现场表演。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为追求演出的场次，常采取友情演出的方式。

澳大利亚的典型特点是凡事一哄而起，红火一时。有人抱怨说，尽管现在单是悉尼一年就有约 200 个画展，但“只有 20 个

---

① 即伊丽莎白戏剧基金会，创立于 1954 年，旨在促进戏剧、歌剧、芭蕾艺术以及澳大利亚作品和艺术家的发展。——译者

艺术家是一流的，其他 15 个是有前途的”。绘画已经变得时髦起来，有关的活动非常频繁。公关部门（或者总经理的太太们）说服公司设置艺术奖或委托艺术家为公司作画或搞雕塑。艺术展览开幕式是社交妇女出入场所的一部分。参观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馆的人数，据该馆的估计，目前达到了每年 75 万人次，差不多是 40 年代早期参观人数的 4 倍。不过，艺术馆的永久收藏品靠的是可怜巴巴的政府的经费；其中大多数如以国际标准衡量，水平很差。要彻底了解绘画，即弄清人们持有的印刷品的那些原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还是得到国外去看。

在戏剧方面，政府经费是花在伊丽莎白戏剧基金会上的，有的花钱得当，有的则糟得很。商业剧院恢复了，还有许多小剧场。至少在悉尼和墨尔本经常能相当快地看到海外正在议论纷纷的剧目，尽管有时演出质量平平。悉尼有 14 家剧场，包括已成气候的小剧场。《第 17 个玩偶之夏》<sup>①</sup> 这出戏的成功开始呼吁澳大利亚戏剧的复兴，只是组织复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那时以来上演过五六出好戏，但这些不能满足澳大利亚人，他们取的好像是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标准。他们责怪剧场的经理人员。其他人则说新戏在澳大利亚比在其他许多国家容易得到演出的机会。商业性的及一流的保留剧目轮演剧团每年可能推出十几出澳大利亚的新戏。欠缺的是电影业。虽然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十字军战士》是 1901 年在澳大利亚拍摄的，在随后的 20 年里，澳大利亚拍了约 200 部故事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好多年里，这个速度降到了每年还不到一部。其结果是，在电视问世之前作为最积极跃上银幕的民族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在看电影时竟看不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形象。

---

① 雷·劳勒描写砍甘蔗工人与酒吧女招待的剧本，1955 年起上演。——译者

澳大利亚有几十个其作品为诗歌爱好者所知的诗人。要出版诗歌不难。澳大利亚诗集印刷的数量经常跟人口多得多的国家差不多。不过，爱好诗歌的澳大利亚人会悲叹全国只有五六个、或许十来个优秀诗人（好像有这种可能！）。跟在绘画上一样，这里有高度发展的差异感，有很多关于“学派”的议论，但其中一些只是闲扯而不是文学批评。到处都在写小说，而不局限于“搞文学”的人。澳大利亚每年出版 20 多部相当不错的小说，其他是在国外出版的。出版业现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了。国际出版市场对澳大利亚作品的兴趣在逐渐增加。很难想象任何值得出版的作品始终得不到出版这种事。澳大利亚大约有十多份的文学或半文学杂志。

本书并不试图对所有这些活动进行评估。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文化上的突破，人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澳大利亚的事情。例如，经过培养、有艺术鉴赏力的人或希望有这种鉴赏力的人大致上认为戏剧、音乐、书籍都是供人欣赏的东西，享受它们就像吃顿美餐，吃完发表几句议论，然后就忘了。文化是生活享受的一部分、欢乐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并不光要求快乐或奇妙的东西，他们也能欣赏悲哀和真实，就像他们能欣赏《第 17 个玩偶之夏》、霍普<sup>①</sup>的诗以及那些色调沉郁的澳大利亚绘画一样。但他们还没有培养出自 19 世纪以来就成为风尚的对艺术的高度神圣的敬仰，也没有积累太多的具体详尽的知识。这些特点造成的结果是，澳大利亚人对艺术的反应是自发的、外行的、多半是一知半解的。

有时在从事创造性艺术的人们中间会有一种乐观主义的骚动，使他们的某些作品显得很草率，这一点对于了解澳大利亚也

---

① 阿历克斯·霍普（1907—），诗人、学者。——译者

很有意义。这里有点“任其自然”的味道，人们把欠缺风格、自发性、甚至真诚当成了美德，似乎艺术的标准就是这样。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特别是一些最著名的作家，他们有着比一般澳大利亚人强烈得多的谨慎感和责任感，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了解国际标准而不仅仅是地方标准。澳大利亚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文学艺术有一种关税保护的态度，即一种只采纳澳大利亚标准的民族主义，似乎作为澳大利亚人就天生具有某些艺术特长似的。有些人希望保存旧的传统，好像永远应该像 19 世纪末期的人那样地写东西。这些要求今天依然存在，不过正在匆匆地消亡。

澳大利亚文学艺术批评的质量低劣，有些绝对是党同伐异。有许多“恶毒攻击”和暗箭中伤；有时是小团体内部争斗的反映，有时则恐怕体现了实在说不出所以然的真正的沮丧。相信只有熟悉整个绘画史才能作画，或只有熟悉全部写作史才能写书，那当然是种错觉；但是人们指望评论家具有全面系统和融会贯通的知识和立场，而澳大利亚评论家通常不讲究这样的准则。美国的大学如果研究澳大利亚文学，那里的讨论有时比澳大利亚大学里的讨论更到位。从前人们还执著于喋喋不休地谈论澳大利亚作品中的继承关系，以致很少有当代的判断意识。那就像是在搞清楚近来正发生些什么以前，必须从头到底回顾一遍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一样。

文艺批评中的这些毛病，而不是观众的愚昧，可能是造成某些澳大利亚作品被“误解”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作品没能得到善意而内行的解释。评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任务，澳大利亚文艺评论中的这一毛病，可能正是他们在追求不朽的、精深博大的思想方面总体上无能的一部分原因。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谈话往往流露出同样的特点：若干信口而出的判断，或许加上点大声

喊叫，然后转移话题。对话在澳大利亚不活跃。当然有可能听到出色的对话，但须得知道上哪儿去找。

相对于国家的人口和性质而言，澳大利亚的文化生活非常充实。在任何民族的文化生活中通常都能找到的从第二流到第十流的活动中，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成就卓著，尤其是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本来每代人中如能出一个为时代增光的人物，就很了不起了，而澳大利亚比这强得多。但澳大利亚的评论家经常——或者说通常——期待太高。他们表现出过于热中地攻击往往环绕着艺术的无意义的内容。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有种孤立的艺术观点，他们眼中的艺术既没有观众，也没有其他的艺术家，那是种在自家后院除草或在岩石上独自垂钓的人的宁静。问题是，观众（通常总有部分是傻乎乎的）以及乱哄哄的活动（通常大多数水平低下），常常是优秀作品得以产生的条件。澳大利亚知识分子总是对澳大利亚期望太高：他们要绘画作品，但不要经纪人；要诗歌，但不要版权；要戏剧，但不要观众。其他人还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惊恐，因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文化产品漠不关心。他们确实是不关心。文化是不讲平等的。

文学艺术不能搞命题创作。艺术家可从任何地方吸取思想养料。否认这点就是野蛮。像某些澳大利亚人那样，他们把武断地声称的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决定的标准强加于人，就是遏制人的想象力。不过，在认识到这些的同时，探索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和艺术家看上去共有的对待人生的态度，希望能从中加深了解澳大利亚，那也是理所应当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里，从前的带“阶级意识”的民主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这毫不奇怪。只有多愁善感的人或骗子手才会置澳大利亚社会显而易见的彻底的变化不顾而写那老一套。但问题是现在好像也没人关心澳大利亚普通百姓中博爱主义的新表现

形式；富有创造性的人似乎对出租车司机或退伍军人协会俱乐部里表现出来的伙伴情谊毫无兴趣。艺术作品中原有的乌托邦人文主义也消失了。人文主义在普通人民中间还有的是，但在更有教养的人那里，它看来已经变得不受欢迎了。新的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关于澳大利亚未来的观念还没有出现。“新土地”和“新时代”的观念都不再时行，尽管“新时代”正在为自己勾勒轮廓；而对爱吹毛求疵的人来说，它不在的时候显得更好些。从艺术作品中还能看到从前的繁荣兴旺和生活的某种快感的痕迹，只是现在黯淡多了。仿佛人民变得越来越高兴，而诗人变得越来越忧郁了。

对风景、自然环境和神话的迷恋在澳大利亚一如既往。这种迷恋有的就像一般人能把自己与环境视为一体一样，具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连最复杂的头脑看来也得去荒野寻觅他们天真淳朴的形象。对一些诗人和画家来说，荒漠似乎是澳大利亚希望的象征。在另一方面，极少有描写普通澳大利亚人、把他们当作可加以观察的人类的城市文学。当一个艺术家看着普通人时，他通常会敌视他们，攻击他们，或者为他们臆造出浪漫的替代品。不管如何，艺术作品里有许多凄惨或绝望的挥之不去的形象、惊恐或幻想破灭的姿势。显然天堂已经失落，艺术家们大失所望。

除了是无意识的、并且是以歪曲的形式，澳大利亚的文学和艺术不再代表社会的情绪和态度，它们明显地显示出对人民缺乏兴趣。指出这点并不是批评艺术家，也不是批评人民，而是想说明这么多的作家和艺术家感到疏远和失望，实在是他们的自作自受。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之一体现在拉塞尔·德赖斯代尔<sup>①</sup>

---

① 德赖斯代尔(1912—1981)，现实主义兼超现实主义画家。——译者

的绘画作品里。如马克斯·哈里斯在《澳大利亚书评》杂志上所说的：“德赖斯代尔的油画里有疏远感。……孤独是自我遏制的表现、一种内在的宁静的表现。……像每个荒野上的居民一样，德赖斯代尔感到与景物彻底地融为一体。这种认同，这种人与环境的互为依存，是澳大利亚的寂寞孤独给予人们的优厚的酬报。而按欧洲人的想法，‘孤独’这个词给人的只是悲剧性的印象。……德赖斯代尔的画阐释了美妙的人与环境的合二为一。……德赖斯代尔画中人物的‘要素’不是受恐吓受威胁，而是安心、泰然从容、天久地长。”在澳大利亚的含蓄和说来就来的对宁静的渴望中，有时有一种并不是怕羞害臊，而是一种万物尽在于此、尽在于人及其环境的醒悟。这种醒悟不是所有的书本所许诺的，但内中有模式、有趣味。万物尽在于此。

## 妇 女

澳大利亚是一个独特的“男人”的国家，这种说法既真实也不真实。

如果做定量分析，以就职机会、专业或社会地位而言，澳大利亚并不比其他任何“西方”社会更像个“男人”的国家。我这是说，它依然是个男人的国家，只是并不比同类的国家更厉害。诺曼·麦肯齐<sup>①</sup>在《妇女在澳大利亚》一书中显示，妇女在澳大利亚劳动力中的分布情况与其他发达工业社会惊人地相似；澳大利亚妇女在专业领域中的比例甚至略高于美国和瑞典。“但就绝对数量来说，差异是巨大的。虽然妇女在澳大利亚医学界里的百分比略高，但总共只有几百名女医生，而在美国有 12000 多

① 麦肯齐(1921—)，社会学家。——译者

名。……尽管比例大致保持相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专业领域的妇女们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和团结感”。澳大利亚的专业妇女人数还太少而达不到这种程度。人数太少影响公众对专业妇女的接受,减少分工专业化以及妇女进入上层的机会。

体现澳大利亚是一个男人的国家这一说法最明显、最真实的领域恐怕是休闲活动和享乐机会了。直到不久以前,在社会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头脑中那些千篇一律的印象仍足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聚会上,男人们站在房间的一头,谈论着体育、金钱、汽车,还有女人;在房间的另一头,女人们坐着,谈论着孩子、家庭、内衣,还有男人。喝啤酒可能是澳大利亚朋友交往最常见的形式,而它差不多无一例外是男人的事。当男人们站在酒吧里,憧憬着他们想与之睡觉的女人的时候,他们的老婆们在家里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幻想着新的床罩。

有许多这样的老一套的形象,也有许多例外。例如,在悉尼的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东区,无论是老派的放荡不羁的人们聚居的靠内城的郊区,还是沿着港湾海岸伸展的富有郊区——所有悉尼标新立异的东西均出于此。人们都知道在国外女人和男人是混成一片的,他们也就依样画葫芦。整个情况在改变,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而必须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年人中间,很多方面也在改变。

两性之间关系的僵硬或许应该更确切地描写为一种社交上的尴尬而不是因为男人的主宰。男人和女人各行其道。男人之所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是因为他们的途径更多。从统计数字看,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无疑是个男人的国家:在殖民时期,城里男女之比大约是 100 对 70,在内地则可高达 4 对 1;甚至直至今天,男人的数量还是略高于妇女。男女间的尴尬也许是在这个阶段产生并成为习惯的。在或许可以描写成更有

教养的圈子里，则可能是因为谁都没什么可说的。在一个随意交谈的艺术严重退化的国家里，男人跟女人能谈些什么呢？

男女之间的僵硬关系可能也跟在澳大利亚经常是女人当家这一事实有关。男人出门上班，空余时和哥儿们玩。在家他们往往只干些杂活，如当司机、花匠之类的。女人为自己规定了当家庭主妇和照顾家人的高标准，把家变成了神圣殿堂。美国西海岸一位心理学教授丹·阿德勒甚至不厌其烦，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最佳母性”以强调他的研究发现，即在澳大利亚家庭里，在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决策人；澳大利亚家庭比美国家庭更是母亲说了算。阿德勒的研究有助于肯定本来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即许多澳大利亚妇女对家庭全身心的投入通常远远超过了对时尚的追求或母性的关切，它实际上代表了往物质世界和生活方式中输入精神价值的企图。在一个基本上是非宗教、非竞争性的社会里，对家庭、家具、住宅装饰、家庭娱乐和烹调的“高雅情趣”的执著追求能赋予生活以丰富的意义。（许多“高雅情趣”实际上相当糟糕这一点在这里无关紧要。）

澳大利亚人对家的讲究经常被错误地拿去跟人们所说的美国人对社会地位的关切作比较。澳大利亚有实在太多的关于“社会地位象征”的轻率的议论。这种象征其实只是以粗俗的形式存在于有抱负的男人的小小的世界里。假如一个澳大利亚男人想炫耀自己，他可以买某种牌号的汽车，或在富人区买幢豪宅，或设法加入某个私人俱乐部，或去国外旅行。他可以大把花钱，买些权势的象征以耀武扬威，而权势的象征实际上只是钱的象征。他可能会反对“趣味”，因为钱并不总能买到“趣味”。与之相反，一个澳大利亚女人要的是美好的生活，以及正确的令人满意的行事方式。她不用老是关心着丈夫的事业。她不用她的“家”去帮助丈夫的工作，而是用“家”去营造一个她所相信的世

界。她创造的世界远比男人的世界更精妙，这是个具有多重差异而不太依赖金钱的世界。

从报纸上妇女专页摘引的一些文字显示了这个世界的某些价值观，如“星空下的晚宴是在四周有围墙的、由黑色锻铁架上带着防风罩的蜡烛柔和地照亮着的庭院里进行的”；“从墙上及长桌两侧的银质烛台上的黄蜡烛发出的柔光使整个餐厅显得十分典雅”；“上星期天由 A 和 D 两位夫人在她们位于基拉拉的有小溪流淌的花园的家里举办的非常出色的自助午餐，拉开了全城聚会的序幕”；“最近对 L 和 K 来说，是一连串的告别。她们将在星期五动身去国外旅行，她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行程将从埃及开始，上溯尼罗河，到耶路撒冷、安曼、佩特拉<sup>①</sup>、希腊诸岛、欧洲大陆、英国，然后绕道美国回家”；“品位高雅的 L 和 A 请 R 吃了顿充满艺术气氛的‘再见，早去早回’的饯行晚餐。R 将在星期五回到她在切尔西的迷人的房子和狮子狗白脱卡帕那里去”；“没人能在创意方面胜过 D 和 C。她们作东举办了一次上佳的情人节聚会，那红心主题不但体现在姓名标签和用于装饰自助餐桌白台布的带花边的红心上，连果冻色拉和甜食都做成了心的形状”；“自粉红的波特罗沙别墅的前门开启的那一刻起，你就好像来到了地中海边。从铺地砖的地面和带廊柱的阳台，到棕榈树和水面上的小船，这幢在沃森湾的房子给人一种意大利的感觉”；“用大蒜、橄榄油、龙蒿醋和刚碾出的胡椒粉调味而成的令人垂涎的酥脆什锦蔬菜色拉是无肉四旬斋期<sup>②</sup>菜谱的首选”；“用享誉全球的中国菜以确保你下一次宴会的圆满成功”。

---

① 约旦西部城市，古厄多姆国都城，旅游胜地。——译者

② 指复活节前苦修的 40 天。——译者

## 移民如何被同化？

澳大利亚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个移民国家，但它已设法做到了用不着对这件事操心。在 19 世纪 50 年代淘金潮的十年里，主要是因为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口增加到了原来的 3 倍。在 19 世纪末，只有 77% 的澳大利亚人是本土出生的。即使是今天，也只有 83% 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澳大利亚（其中 5% 的人的父母是移民）。然而，不像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从不宣扬他们的国家是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或全世界人才的市场。他们也许以后会这样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吸收了大量来自欧洲的“无法或不愿返国的难民”<sup>①</sup>；在其历史上，它一直是移民人才的用武之地。如果以澳大利亚的《名人录》中的条目作为检验标准，人们会发现成功的移民的比例是成功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的两倍以上。

在传统上，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中一个始终不变的因素是，它的大部分移民是买来的。除了淘金潮那 10 年，以及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两次严重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地鼓励他们并为他们支付旅费。在紧接着二次大战以后的那批移民以前，大部分移民都来自英伦三岛，人们以为这些人一旦到了这里，自会对面临的一切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想当然给这些人造成了很多困难，因为澳大利亚并不如看上去的那样“英国化”。不管怎么样，这些移民能说英语——虽然不够澳大利亚标准——所以其余一切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

<sup>①</sup> 当时联合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难民的称呼。——译者

原来的移民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打破了。日本人在战争中几乎占领了整个新几内亚，加上他们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轰炸，把澳大利亚人吓坏了。30年代的口号“不殖民，就灭亡”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政府决定从英国和欧洲引进足够的移民以使每年的人口增长数量加倍。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来自英伦三岛的人与英国人一起被买了进来。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来到澳大利亚的167000名“无法或不愿返国的难民”，其身价非常便宜。他们中大多数人身无分文，因而他们别无选择或选择余地极小。他们被白白地运到澳大利亚，安置在从前的军用棚屋甚至帐篷里，送到多半在农村地区的建筑工地干活。最初的两年里他们必须干体力活，两年后才可以自行作主。（澳大利亚不要受过教育并具有特长的人，除非他们乐意先挥上两年的大铁锹。）从经济角度看，这些人是上帝的恩赐，他们帮助国家实现了战后的迅速发展而不必在上层建筑方面立即承受昂贵的额外支出。

在作出接纳大批“老难”<sup>①</sup>（他们很快就被大家称为“新澳大利亚人”）的决策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又跟大多数西欧政府签订了移民协议，以协助那些在移民方面有多种选择的人到澳大利亚来。这样，除了若干由亲戚带到澳大利亚来的，其他欧洲人也多了起来。历史上第一次，澳大利亚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英国或爱尔兰了。

从官方角度讲，那时还有着狭隘的同化观点，即要求移民以加倍快捷的速度“成为澳大利亚人”。各地总共设立了6个移民中心和29个接待站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英语和关于澳大利亚风俗习惯的课程铺天盖地压到新来的人的头上。成立了各种

---

<sup>①</sup> 澳大利亚人当时对接纳的难民（refugees）的昵称。——译者

社团组织。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如期召集(会场里总是备着叫作“汤姆叔叔”的饼干)。在入籍典礼上,“新澳大利亚人”得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宣誓效忠。而对当地出生的人并没有这一要求。

不言而喻,上述措施无一能产生它们所预期的效果。移民照旧按他们自己的速度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还有许多人照旧我行我素。有大约 70 多种语言的报纸和 20 多种语言的期刊。有几百个移民俱乐部和社团,移民们在那里叙旧谊、算老账。在足球这一迄今为止观众人数增加最快的运动中,球员球衣上各具民族特点的姓名表明欧洲那些世世代代的敌对竞争在这里又开始了(类似的姓名是英国夏季足球联赛的基础)。匈牙利人坐在咖啡馆里,还在为箭十字党<sup>①</sup>的问题分成两派争论不休。希腊人高举反对保皇派的标语牌在街上游行(连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宣过誓的希腊人也这样)。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水火不相容(南斯拉夫前国王彼得到澳大利亚看望南斯拉夫移民时,克罗地亚人攻击他是“塞尔维亚国王”);他们中相互间敌对程度较轻的是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族人和波斯尼亚人。像乌斯达莎<sup>②</sup>之类的法西斯组织还有一定的势力。大多数东欧人不仅自己互相对立,他们中还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对立。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同化的程度究竟如何了。如果你看到澳大利亚的希腊人到乌鲁鲁的码头上去等新娘船,你也许会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同化。如果你看到一个荷兰家

---

① 匈牙利法西斯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4.10—1945.4)控制匈牙利政府。——译者

② 南斯拉夫法西斯恐怖组织,曾于 1941—1944 年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残酷迫害非克罗地亚居民。——译者

庭在他们位于郊区的家里，平和恬静，与四周环境融为一体，就像一个分子从一种物质进入另一种物质，你也许会说，同化已经完成了。有证据表明，在第一代澳大利亚出生的德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北欧人后裔中，原有的侨民团体的观念可能会消失。对荷兰人来说，这种观念好像在移民这一代就消失了。看起来南欧人失去他们的差异感比较慢，特别是在连续移民的情况下，即来自他们祖国的同一社团的相当数量的人成群结队地移居澳大利亚并准备在这里继续他们的群体生活。希腊人可能是最缓慢的同化者。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普通澳大利亚人自己向欧洲人“同化”要比大多数澳大利亚批评家所认为的更快更和风细雨。不管什么原因，不会讲英语的欧洲人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是成功的，全然没有美国的那种紧张气氛；当然，持续的就业繁荣确实意味着在找工作方面只有极少或根本没有竞争。这里没有封闭的移民定居区和分开的学校，没有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拉帮结派或者不同教会的拉帮结派（希腊人例外）。虽然无疑在整个过程中许多个人难免会有痛苦，但是就总体而言，战后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是相当愉快的。移民不比其他澳大利亚人更容易触犯法律，事实已经证明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当地出生的澳大利亚人。

从前那种澳大利亚一口吞下移民，却并不因为消化了移民而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如今看来不再确切了。多数移民的孩子不再是欧洲人了，这是事实；但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澳大利亚人也不再是“澳大利亚人”了。希望看到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澳大利亚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得到保存，这是正常的、开明的想法；但现在看起来需要认真加以讨论的，是一种新和旧都在寻求改变的澳大利亚方式。既然澳大利亚不继续移民就绝对难以指望有什么未来，既然可能需要加快移民的速度，改变移民的性

质，那么，修改“同化”理论，使其听上去不太妄自尊大，应该是个好主意，尽管原来的各族通婚有利于移民规划的设想看来还是非常明智的。澳大利亚人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变成永久性的少数民族的大杂烩，而最好的同化是在床上实现的。

战后移民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整个社会骚动起来。要是没有过去 20 年的加快移民，澳大利亚能否达到今天的先进发达是大成问题的。在某些方面，移民的作用太明显了，从而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如为澳大利亚市场提供特种产品的小型工厂的发展、特种商店和各色餐馆的涌现、对食物和艺术欣赏品味的改变等等。

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抱负和才华使澳大利亚的持续繁荣成为可能。虽然多数移民还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干着相对来说没有技术的活，虽然除了英国出生的移民，他们在公众生活中还没起多大的作用，但他们的才华，以及他们对子女才能的非同寻常的培养，正在帮助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研究组织(CSIRO)<sup>①</sup>里近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是移民。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教职员是移民。移民子女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子女更倾向于读大学。移民或他们的子女开始在一些政府部门里担当重要职务。当需要更多的有技能的熟练工人时，政府现在可到海外去招募，不过等到澳大利亚与西欧的经济差距消失了，这种供应就会断源。

## 社 会 底 层

根据目前流行的最低基本生活需要的统计方法，至少 20%

---

① 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科研机构。——译者

的美国家庭和 14% 的英国家庭迫切需要帮助，而只有 8% 的澳大利亚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这对澳大利亚人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因为造成美国和英国的高贫困率的社会结构上的缺陷在澳大利亚几乎不存在。这里没有黑人问题（土著问题相当于红色印第安人问题，而不是黑人问题）；也没有英国的社会等级问题；有的只是小小的贫民窟问题；在初等教育方面，澳大利亚人上学的机会更为平等；就业率很高；自动化在澳大利亚对就业还没有形成可怕的威胁；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制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可能是，由于较明显的痛苦不幸现在在澳大利亚已经解除了，所以人民大众忘了还有人在贫困中挣扎；而政治家们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看不到这里有多少百分比的选票。澳大利亚的社会服务已经越过了生死攸关的斗争和广泛宣传动员的阶段，而成为处理不同领域的细节问题的事。问题是，大多数细节还没有得到处理。

澳大利亚对寡妇很吝啬。在一个视舒适的高标准以及恰当地抚养子女为生活真谛之一的国家里，寡妇和她们的家庭，尽管没犯任何过错，生活的标准会一下子直落千丈。一旦男人去世，女人再也无法维持原状。她只能领到一份入不敷出的抚恤金，而抚恤金的多寡得取决于对申请者经济情况的调查。如果要赚点额外的收入，她必须偷偷地干，否则要是被监查人员发现，她就会失去抚恤金。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情况更惨，在开始的 6 个月里她们得完全自力更生，那以后才能领到救济金。

不过，在澳大利亚的最大灾难是活到老年。只有一对老人的家庭现在几乎到处可见。除非很有钱，否则家长到了老年就会失去小辈的尊敬，在火炉边就会没有他们的位置，这种现象自有其原因，但关键是得有个解决的办法。老人得自己照顾自己，

或者依赖许多出自澳大利亚人天生善心的出色的志愿者组织。本来，除了那些最幸运的人，老年对谁都不是好受的，但是要是到了老年还得承受孤独，失去生活的所有意义，那就会加倍地痛苦。经常是父母活到耄耋之年，寂寞孤独，只有子女偶尔来看望时才是例外。年老的盲人坐在小小的套间里听着收音机。长年卧床不起的老人只知道为他们送午餐的善良的从慈善机构来的太太。被子女遗弃的老人依赖房东为他们打扫房间、修剪指甲。

澳大利亚人多半会为他们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先锋而自豪，但他们其实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伟大。他们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固然优于美国和英国，但有关的设想没有一个是他们的首创；何况事实上他们通常总是稍微落后于新西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发展的速度比美国和英国都慢，跟一些像瑞典那样的更进步的小国相比，他们差得更远了（在瑞典，退休制度规定，养老金是就业期间工资最高的 15 年里的平均工资的 60%）。

除了保健制度，澳大利亚的方针主要限于确保收入，它忽略了其他许多能够造成不幸的因素；还有，以过去 20 年的富裕的标准衡量，现在的有保证的最低收入实在太低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只要从海外偷些好的主意，把它们移植到澳大利亚特别有利的条件环境之中，就会有助于让澳大利亚回到它本该处的位置上去。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外在理由使它的普通百姓得不到快乐。

## 在英美之间

### 迷失方向

人们常说，澳大利亚是移植到南方这片辽阔大地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如今，它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亚洲世界之中。可以马上肯定的一点是，澳大利亚人似乎还不明白他们身处何方，因为在澳大利亚进行的许多公开讨论可以同样发生在英国的某个地方。记住澳大利亚的确切位置也许是值得的。它在印度尼西亚和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南面。由这些国家构成的次大陆的人口几乎与非洲相仿。居高临下俯视这个次大陆的是总共拥有三分之一以上世界人口的印度次大陆和中国。邻近中国的还有拥有约相当于非洲一半人口的日本、韩国等国。澳大利亚的北面和东面是南太平洋，其中有新西兰、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斐济和其他大洋洲岛屿。太平洋的对面是第七舰队<sup>①</sup>、珍珠港和美国。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

澳大利亚历史上似非而是的一大悖论是，在世界上其他地

方都在凭借通讯手段扩展眼界之际，澳大利亚的眼界却变得越来越狭隘。直到 1941 年，所有跟澳大利亚有关的事就是欧洲，以及统治着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世界的欧洲殖民势力。在殖民时代早期，澳大利亚最可能的敌人不是周围的民族，而是法国人。在本世纪的多半时间里，它最可能的敌人则是德国人。当澳大利亚人在 1939 年当兵参加远征军奔赴中东抵抗德国人的入侵时，一切都跟他们的父辈在 1915 年登陆加利波利与德国人的盟军土耳其人打仗没什么两样。当日本人在 1941 年 12 月轰炸珍珠港，准备攫取整个东南亚并进攻在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领土<sup>②</sup>的时候，大部分澳大利亚一线战斗部队还远在 7000 英里之外。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企图阻止澳大利亚军队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从地图的另一端粗粗看上去，澳大利亚似乎是可以牺牲的。1941 年 12 月 27 日，约翰·柯廷<sup>③</sup>发表了澳大利亚总理曾经发表过的最为重大的一项声明：“我要毫无约束地把话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的是美国。我这样做，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与英国的传统的血缘关系而痛苦。我们知道英国正面临的问题……但我们同样知道，澳大利亚可以离开而英国仍然顶得住。我们因此决定，澳大利亚不应离开。”在那以后，正如每个澳大利亚人都会告诉你的，美国人（在澳大利亚人的协助下）使澳大利亚免遭入侵之灾，并进而打赢了战争。日本人摧毁了太平洋地区原来的实力态势。混乱动荡呼啸而过之后，新的实力态势出现了。而澳大利亚至今还未能真正确定自己在这

---

① 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译者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1975 年独立以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澳大利亚接管的原英国殖民地，另一部分是由澳大利亚治理的联合国托管地。——译者

③ 柯廷(1885—1945)，1935—1945 年任工党领袖，1941—1945 年任总理。——译者

个态势中的位置。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新的实力态势多半还像是个梦境。那些名字，像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冲撞着澳大利亚人的意识。尽管几乎一半的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派驻在亚洲，但亚洲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如果发生什么事件，亚洲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上，然后又很快消失。当这些名字符合某个党派的政治需要时，它们会在澳大利亚政治上形成一定的模式。不过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还没能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获得真正的“感觉”，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在谈论这个部分。地图上有名字，手册上有统计数字，报上有事件报道，交谈中有流行的词汇理论，而人们的工作态度却照旧显示出极少的对亚洲和太平洋的生活结构的理解。澳大利亚人谈论亚洲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还是生活在欧洲。

## 指 望 英 国

尽管澳大利亚对英国和西欧的态度依然受到一种强烈的、执迷不悟的、系统性的影响，但把澳大利亚描绘成“英国”也是不对的。“英国人”是在一个名称之下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的联盟，而这些地区来源和社会阶层在澳大利亚表现为不同的混合（如在澳大利亚有更多的爱尔兰人，这是重要的区别）；还有，原来的各地区群体的特点并没有保持下来。只有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在继续内部通婚繁殖。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有些人与非爱尔兰人或非天主教徒结婚。他们没有像许多美国爱尔兰人团体那样总觉得自己是“爱尔兰人”。有段时间他们的牧师一直是爱尔兰人，但现在也已经改变了。不过爱尔兰人仍然信奉天主教，这意味着在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影响要远远超过英格

兰。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人更广泛地互通婚姻，所以他们的孩子对父母出生的地方并没有真正的渊源感。还有着高地竞技会<sup>①</sup>之类的活动，不过那往往只是穿穿漂亮衣服的机会而已。据估计，如今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的祖先大致分布如下：将近三分之二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五分之一不到是爱尔兰人，超过五分之一是其他欧洲人。

这个由各种成分融合而成、又以新的方式分别组合的新民族——澳大利亚人，把英国和欧洲的历史当作他们的历史（他们实在很难声称土著的历史是他们的历史）。他们也不加细察地保留了许多英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许多词像“民主”、“君主制”、“工会”、“议会”、“上层阶级”、“劳工阶级”，以及整套术语结构，在两国都用，但具有不同的意义。澳大利亚人绝不仅仅是移植过来的英国人。当战后成千上万因为种种原因而移居英格兰的澳大利亚人到达伦敦时，他们往往欣赏那里的戏剧、音乐和艺术展览，喜欢英格兰的自然美以及与欧洲的接近，却不能与英国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流露出寄寓他国的疏远。几乎每个澳大利亚人在到达英格兰时都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感觉。

然而，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sup>②</sup>却会让大英帝国的女王（在宪法上也是澳大利亚的女王）给他授西斯尔骑士的爵位，并以此为乐，俨然像一个苏格兰的高贵绅士；他也能让自己周旋于一帮以18世纪德国小宫廷里的贵族特有的那种精力争宠邀荣的人之间。澳大利亚没有国歌，却有《上帝佑我女王》<sup>③</sup>。《前进，美丽

---

① 源于苏格兰高地的民间体育竞赛，一般包括平地赛跑、障碍赛跑、跳高、跳远、撑杆跳等。——译者

② 指孟席斯。——译者

③ 英国国歌。——译者

的澳大利亚》只具有民族歌曲的地位<sup>①</sup>，那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首先对英国表示敬意后，也许还会唱的一首歌。在各种礼仪场合，英国国旗经常和澳大利亚国旗并排飘扬。来自欧洲各共和国的移民在入籍前必须向一位君主宣誓效忠。墨尔本的企业家们坐在套着褐色皮套的桃花心木椅子上，在他们深信跟伦敦一模一样的俱乐部里模仿着英国绅士的举止神态（事实上伦敦的俱乐部是不会接纳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成员的）。高级军官还得从女王那里领取委任状，就像“第一舰队”<sup>②</sup>时那样（不过现在不需要用钱买了）。直到不久前，几乎所有的总督和州长都还是从英格兰指派的。

我并不是在理想主义地呼吁要百分之百合理地处理人类事务。何况像我提到的那些琐碎小事对英格兰也许还有好处。问题是，这种在礼仪上紧抱着英国不放的做法正是统治着澳大利亚的那些人的幻觉构成的一部分，是在认识和大刀阔斧地应付澳大利亚新的战略环境和面临的新问题方面无能为力的症状。走向独立国家这个概念的势头现在减缓了，或者已经停住了。这个世界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大概已经变得太难以捉摸了。有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不定因素，使他们难以做出最后的努力。

对 50 年前的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目前的这种停顿是难以置信的。那时的激进立场是反英国，发扬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梦想一个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那种立场不仅代表了爱尔兰人的影响（他们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憎恨英格兰），而且体现了社会上普遍的平等主义思潮。英格兰代表特权和财富，澳大利亚代

---

① 英文为 Advance Australia Fair, 1901 年经全民表决正式取代《上帝佑我女王》而成为澳大利亚国歌。——译者

② 指在 1788 年 1 月 26 日第一批运送英国罪犯到澳大利亚的船队。“第一舰队”里有 294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译者

表平等和伙伴情谊。但那时激发的民族主义只是旺盛精力的即兴而粗野的宣泄而已，对今天的需要来说实在太浅薄太陈旧了。我们不再能装作我们全都是当年煮洋铁罐的牛贩子了。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政治独立，实现了社会平等之后，民族主义变得含糊不清、萎靡不振起来。现在，澳大利亚人的反英情绪可能比任何时候都低落。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生活中的另一层面，那种充满自信的亲英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好战情绪，也在随着上一代人一起消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对澳大利亚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小可。那时地图上有那么多代表帝国疆域的红色；太平洋上有的是帝国的军营和舰队；英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关于整个大英帝国的浪漫的概念显得远比本地的淡淡的民族主义气息强有力得多。那时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能感觉到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可以想象，考虑帝国事务能使人觉得自己与这些事务挂起钩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澳大利亚的角色就是举手赞成大英帝国的决定）。但即使是那些将自己等同于英国人在遇上“英国佬”时，也会在现实面前目瞪口呆。极少有澳大利亚人真正喜欢英国人，他们喜欢的是英国人的思想、帝国的显赫以及历史文化遗产；而对这些遗产，澳大利亚人觉得他们跟英伦三岛的同代人有同等的继承权。

失去称霸世界的实力有时使英国人寸步难行，也使在英国国势鼎盛的年代里成长的澳大利亚人无所适从。许多澳大利亚人至今还在从伦敦吸取高见睿智。在帝国时代，这些高见睿智可能确实与世界和澳大利亚有关，但现在它们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智慧罢了。澳大利亚缺乏丰富的精神生活，这种情况意味着喜欢跟上时代步伐的澳大利亚知识分子经常——或者通常——栽倒在“高质量”的伦敦的报纸和周刊上面。他们

立足伦敦看世界，这使他们不仅倾向于接受伦敦的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观点（在这方面至少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也会接受伦敦的关于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一个有头脑的人预期会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的观点。他们眼中的澳大利亚世界主要是英国人看到的世界。即使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的报纸上，一年中有关苏格兰的新闻很可能还是多于有关新西兰的新闻，同时也许没有一篇关于菲律宾的背景文章。

因为是从伦敦吸取灵感，碰到的是跟澳大利亚毫不相干的事情，澳大利亚的一些“左派”的头脑被搅得稀里糊涂。对“富裕”的痛苦的再评价，在伦敦本是种进步思想退化的征兆，一旦搬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来重复，就变成昏庸愚昧了。所谓进步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疏远，跟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关系，虽然这种理论可能给许多受雇于澳大利亚大学的英国人造成深刻的印象。

那种举手投足好像生活在欧洲的习惯，不光局限于幻想着第三种力量<sup>①</sup>的人。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尤其是来自现在由共产党政权统治的国家的移民，也总是以欧洲人的直觉看待冷战中的冲突。（不过他们的子女可能已经继承了做澳大利亚式温柔美梦的本事。如在肯尼迪总统被刺那时，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 18 岁的儿子对我说：“真是无法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 20 世纪。”然而，就是他的父母，先是逃避纳粹，后来又逃避共产党；他的祖父被纳粹枪杀在自己的家里；他家的一些亲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失踪。）许多澳大利亚人想到俄国、东欧和西柏林的时候远远多过他们想到中国或南越。这是他们受到的教育训练的结果。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欧洲是大多数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可是，除了在联合国举举手，在更强大的

---

① 指苏美以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译者

国家的声明后面随声附和地签个名之外，澳大利亚对俄国、西柏林或者欧洲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有一些澳大利亚人，他们支持“西方联盟”，对世界上的某一部分有雷打不动的观点，尽管他们的意见无关紧要。他们还会以欧洲的眼光看待亚洲，而欧洲人有时是在玩弄亚洲政策以作为与美国竞争的一部分。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亚洲问题要比这重要得多。说澳大利亚的未来，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未来一样，可能取决于美苏对抗的结果，这是对的；而另一方面，说澳大利亚的未来，可能像从前一样，不牵涉到亚洲以外的世界而悄悄地确定，这也是对的。归根到底，在我们身处的这部分世界里，既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同市场<sup>①</sup>，也没有“西方联盟”。

直到关于共同市场的辩论造成的震动前为止，罗伯特·孟席斯爵士在整个 50 年代的东南亚政策始终打着现实主义的烙印（他的实际表现逊于他的许诺和言论），但他本人却比英国人还英国人。他总是落后于伦敦好几年。他关于英联邦的设想的议论颇有 1908 年时改良派讨论的味道。他还是按年轻时学到的反应模式而行动。关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初次尝试的辩论，在澳大利亚的“右派”中触发了对现实的重新评估。要是当初戴高乐总统允许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那很可能会引起澳大利亚舆论上的一场启迪心智的、有益的危机。而这正是一些澳大利亚人希望英国能够进入的原因。他们认为，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不便，那种被人抛弃的心理上的震撼或许会加快澳大利亚的戏剧性的重新定位，加快对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真正的地位的确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所有这些也许是澳大利亚得以重获生机的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相当普遍地怀疑，澳大利亚还是

---

<sup>①</sup> 又称欧洲经济共同体。60 年代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多次努力因法国反对而失败，这在英联邦国家中引起轩然大波。——译者

生活在透支的年代里，它被允许销售食品给英国，直到英国加入欧洲为止。

## 指 望 美 国

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战略上的相互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对美国力量的依赖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引起怨恨。如果看到澳大利亚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时不时出现妄自尊大的情况，人们也许猜想不到这点，其实澳大利亚人早习惯于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并依赖别人的力量了。他们生活在受人保护的舒服和天真无知的状态中太久了，他们一望而知的弱点之一就是先是把依赖英国、后来是把依赖美国的实力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而经常忽略了这种实力的现实状况，没有对这种现实状况加以仔细考虑。澳大利亚人比西半球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更早地认识到美国的全球实力。从 1942 年麦克阿瑟<sup>①</sup>将军从菲律宾逃到达尔文那时起，澳大利亚就成了当代世界上第一个被美国人拯救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极少几个承认自己是被美国人拯救的国家之一。它甚至已经原谅了美国人救了它。澳大利亚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以人口中巨大的军人比例、高度的技能和勇气，在拯救自己中尽了全力<sup>②</sup>。不是所有被美国拯救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现在澳大利亚也不是这样了。）这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与美国势力友好共处的能力

---

① 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将领，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军从菲律宾撤退至澳大利亚，1942 年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译者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近 100 万澳大利亚男女参军，其中近 4 万死于战场或俘虏营。——译者

可能还得益于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经济援助的寥寥无几的国家之一的事实。当澳大利亚人向美国人指出这一点时，美国人会显露出在情感上缺乏安全感的迹象，他们也许甚至不相信这一点。美国人已经变得习惯于相信世界上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到经济援助，所以澳大利亚人不要他们的援助简直是对美国的慷慨的大不敬。

人们步入神秘之境，总会作种种的猜测。比如，澳大利亚看上去很可能会与美国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尽管这会在劳工运动的“左派”中激起强烈的反对，但还不至于在普通人民大众中产生在政治上有效的反美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猜测。答案之一也许是，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在某些方面——仅仅某些方面——是同样的人。很难说清“美国人”这个词究竟应该意味着什么，因为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美国人。或许最好是这么说：澳大利亚人不觉得官方的有关美国该是什么样的说法令人讨厌。自由、平等、富裕、追求幸福……这些词语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毫无问题。这些词在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之间互相使用时，可能比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互相使用时有更多的共同涵义。澳大利亚人接受美国人关于竞争的议论，哪怕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澳大利亚人有时也许会对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嗤之以鼻；就像对所有理想主义一样，他们也怀疑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他们会问：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对美国人的物质成就和技术知识有某种他们会以为是实事求是的尊敬。

猜测澳大利亚人心目中英国和美国的“形象”也许毫无价值，只是这种欲望实在不可克制。我的猜测是，英国大概会与女王、文化、衣衫褴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谄上欺下和伦敦西区剧院联系起来，轻快活泼的伦敦则是当代的令人不解的象征。而美国则可能会跟电动洗衣机、军事实力、麦克阿瑟、肯尼迪、电视机和平等主义联系

起来。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因为家族内的许多误解而疙疙瘩瘩。澳大利亚就像长大离开父母的孩子，正在寻找新的与父母认同的模式，寻找与他们共同的业余爱好和感兴趣的主题，以便能保持跟他们的联系。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是一种小表弟与已经建立丰功伟业的大表兄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有一大堆批评，可以说没有英雄崇拜，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直截了当。澳大利亚人会在陌生人中寻找温情友善，同样也总是伸出充满友谊之手。他们对爱摆官架子的英国人这么做时，有时会弄得很狼狈；而和美国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挺谈得拢。

在一定程度上，澳大利亚和美国有同样的经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至少在它们的历史上有某些不为其他欧洲国家享有的共同因素。虽然澳大利亚得以避免了野蛮的内战和种族暴行，没有权势显赫、贪得无厌的大亨，澳大利亚的生活比美国更平等、更少竞争性，但两国间有许多相似点，如迁往新大陆的移民、荒野开拓的神秘气氛（两个国家实际上有点不同）、淘金狂时代的动荡、松弛的管制造成的残酷、后街小巷里的百无聊赖、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上可能有比澳大利亚人目前能理解的更多的共同性。澳大利亚历史上也许有远比历史学家记载的更多的疯狂和恣意妄为。历史学家干的是把凝固的温文尔雅精选出来，让人装进标着“历史”字样的箱子里。现在，帕特里克·怀特<sup>①</sup>在《沃斯》一书里对一个探险家的研究，以及曼宁·克拉克的历史新著，已经揭示了与官方版本不同的对历史的解释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有政治上有影响的“反美派”，不过应该把他们跟

---

<sup>①</sup> 怀特(1912—1990)，作家，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沃斯》出版于1957年。——译者

只是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后者完全有这种权力)。“反美派”中知多识广的“左派”经常以海外的事情作为攻击美国的炮弹;而智能低下的“右派”靠的是淡化的记忆,他们觉得美国人缺乏英国人的手腕和其他本事。不过,迄今为止,在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批评的主要来源是美国自身。美国大概是当今世界最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国家。什么“实力精英”、“纸上经济”、“组织工作者”、“激进右派”、“隐蔽的说服者”……这些吃人的妖魔气势汹汹朝澳大利亚人扑来,吓得他们有时钻到自己的床底下去找“激进右派”或“组织工作者”,就像他们把伦敦对英国的批评乱套到澳大利亚一样。

美国人,包括最有影响、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常常表现出对澳大利亚的无知。他们从英格兰或美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或者干脆不看。他们这种态度会让澳大利亚人伤心。澳大利亚人天真地觉得美国人对他们的理解总该比这好些。无论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还是美国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在美国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澳大利亚的形象。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澳大利亚显得是个枯燥无聊的地方,还不如老挝或沙特阿拉伯那样有趣。不过,凭着澳大利亚人的实用主义和相对的坦率,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广泛交往应该是有希望的。国家之间从未相互“理解”,这并不比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或不同个人之间的不能互相理解更差。关键是在这个充满嫉妒的世界上,美国人在这里能找到一些最好的朋友。这部分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相信,在为普通百姓争取幸福方面,他们已经走在美国人前面了。

## 外省人心态的澳大利亚

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至今还是英国的一个省。在某种

意义上,它现在也是美国的一个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个历史相对久长的“新兴国家”,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个亚洲强国。)

我不想过分强调澳大利亚的外省性这个比喻,当然也不想像伦敦的知识分子近来所强调的那样,那些人说,大都市里文化繁荣的美妙世界是外省人无法理解的。(这种说法本身也许是伦敦的眼光变得越来越狭隘短浅的症状。)我们也必须跟奥登<sup>①</sup>洋洋自得的势利言论划清界限。奥登说:“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对我来说,是低下的外省,这些地方不产生艺术,住在那里的人跟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总是使我想起阿诺德·贝内特<sup>②</sup>的日记里充满优越感的第一句话:“今天,和来自外省的天才 D·H·劳伦斯<sup>③</sup>一起吃午饭。”这就是阿诺德·贝内特!劳伦斯把澳大利亚写得那么好,甚至考虑在这里住下来也许不会是偶然的。一些作家就是能在外省登峰造极。

问题是,除了“外省人心态”,还有什么词可以用来描写这样一个国家呢?其大多数活动都是模仿和派生出来的,大多数新思想都是从外国引入的;其制造业和战略方面的主要决策都是由海外的中心控制的,时髦的东西通常是别处的过时货,它不仅缺乏当前的重要感,也没有过去的重要感;它在观察它的两个极其相像的大都市(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和趋势时,有时比观察自己的政策和趋势有更大的兴趣、更内行。

确实有某些澳大利亚人只能被理解为外省人,除非有人认

---

① 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

② 贝内特(1908—),英国名律师。——译者

③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儿子与情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1925年5月至8月访问澳大利亚,其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小说有《荒野中的男孩》和《袋鼠》。——译者

为“殖民地居民”是更合适的词。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英国的辉煌、英国人是天意所属，相信优等种族哲学，相信上帝选择英国人统治世界。这种对英国的信仰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的掌舵人和决策者中最有强有力的思想意识，而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掌权。如果你是“英国的”，你就知道你是谁、该做什么，你会有某种历史感，也会有某种未来感。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臣民来说，所谓忠诚主要是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对澳大利亚忠诚只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传统和命运。要区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利益就是不忠。许多权贵人物视自己的使命就是确保当地人（即他们的同胞）不出轨，确保他们忠于帝国和君主，惩罚他们，如果他们有所违忤。这些人在一个他们碰巧出生的、遥远的、令人讨厌的地方为他们的帝国尽心尽职。

帝国的遗老们在用他们心目中的大都市标准衡量澳大利亚的老百姓时，发现他们脑子不大灵活。这些遗老于是滋生了一种对自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的轻蔑，他们指责普通澳大利亚人不具备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不具备的素质（作批评的人中大多数其实也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在今天的澳大利亚，普通老百姓还会因为不具备精英素质而受到责怪；假如精英们自己也经常不具备那些素质，并且被注意到了，背黑锅的还是老百姓。之所以会这样，其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从前帝国遗老们的习惯。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这是非常典型的外省人心态。

在英国的世界霸权崩溃时，这些遗老们残剩的只是记忆了，而他们至今还在凭着这些记忆行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多数礼仪仍然在强化着他们的记忆。不过，在澳大利亚，在几代人中间，显然将发生剧烈的变化。眼下，新一代也许会被周围看到

的一切吓得束手无策，令人难以忍受的谎言绵延不绝以及缺乏自信心增加了这一代人的力不从心的感觉和绝望。但是只要行动起来，这些人多半会比任何前人都更少地操心是“英国的”还是“反英国的”。

在过去，澳大利亚人还表现出外省人心态的另一面，即被解放的省份的那种自吹自擂和傲慢，以及喜欢炫耀自己的外省人味，似乎那是本地特产。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上的尖锐泼辣的风格，说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特色，然而这种所谓“澳大利亚语言”其实大半只是殖民时代从英格兰带来的城市俚语、外省土话甚至扒手的切口。整个 19 世纪 90 年代的荒野叙事民歌运动<sup>①</sup>充满着与英格兰民歌的派生关系。甚至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也是从英国起源的。人们应该记得，在英国普遍接受的唯命是从的制度背后，一直有着平等主义的精神；而伙伴情谊是影响英国许许多多人的生活的潜伏的思想意识。当电视系列剧《Z 型汽车》<sup>②</sup>来到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带着英格兰北部的口音罢了。连澳大利亚的简洁也有其渊源，那是英国人轻描淡写地陈述的风格的极端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非常“英国化”，两个社会都明显地疑心重重、讲究实际，都不相信在公众场合流露的情绪以及任何概念化和系统化的复杂形式。而澳大利亚的“让我们任其自然”的概念则可能也是英国的“胡乱应付”概念的极端形式。

作为外省人，澳大利亚人会对在别的国家作出的、影响他们的一切决定持怀疑的态度，就因为那决定是在别的地方作出的，

---

① 1890 年以后由《公报》杂志倡导的由澳大利亚诗人和作家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记录民间传说、表达社会心态的文学运动。——译者

② 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电视系列剧。——译者

而这也是外省人心态的特点之一。舒服地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澳大利亚人的地位使他们既可以批评英国人，也可以批评美国人。如果来了一个本是英国勋爵的总督，人们会批评他生活得像个勋爵；如果来了一个本是得克萨斯百万富翁的美国大使，人们会批评他举手投足像个得克萨斯百万富翁。澳大利亚人用美国标准批评英国人，用英国标准批评美国人。英国人如果知趣，该派一个举止像得克萨斯百万富翁的总督，而美国人该派个举止像勋爵的大使。

## 共和 国 吗？

当一个外省人自有许多好处，但是，鉴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其余地区的特殊关系，澳大利亚可能以后会享受不起这些好处了。澳大利亚可能不得不开始替自己拿主意，而它这样做的方式将与现有的看法格格不入。在经过惊人地长期的拖延之后，孟席斯政府终于在60年代中期认识到澳大利亚应该再次拥有自己的国防力量，这个认识可能是整个变化过程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也许会不再作为帝国的一个外省，这是很艰难的事。即使澳大利亚的运气比这好些，它的主要实力基础，无论是在贸易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还是不大可能继续仰仗与英国的关系。英国不久前还是澳大利亚的主要主顾，现在只是第三号最佳主顾，排在日本和美国之后。澳大利亚至今进口货物最多的还是英国，但这很可能改变。英国人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投资者，但新投资更多地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英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承诺至多只比澳大利亚稍微多一点。随着贸易的减少和战略保护的消失，澳大利亚与英国在宪法上的关联还靠什么来支持呢？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国家元首住在伦敦这点会越来

越感到荒诞不经。

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传统的英国方式已经比老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意识到的浮浅得多了。对35岁以下、在新加坡沦陷时<sup>①</sup>还在小学或根本没有出生的人来说，君主制度力量软弱、表现不佳、毫无道理。在现在已经构成人口多数的移民和35岁以下的人的眼里，王室只是个新奇的玩意儿，只是一帮可爱的名流；而即使在充当这个角色时，他们的吸引力看上去也今不如昔了。澳大利亚不再缺少来访的“名流”了。

我们无从预测澳大利亚怎样以及在何时会成为共和国。这样的变化对老一代澳大利亚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知道，他们将会死去；而在年纪较轻的人们中间，对保留澳大利亚的君主制度是不大会有兴趣的，光写“君主制”这个词就会招来他们的嘲笑。在某个年龄段以下的澳大利亚人中间，极少有人会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个君主国，然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在宪法上的地位。总有一天这个突破会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所需要的只是某些事件的推动，某些实现突破的激动人心的理由。没人能说出那将是什么样的推动，可以肯定的是，要推动的是一扇紧紧锁着的大门。

在那些并不信奉君主主义原则、但可能反对变化、或不愿促进变化的人之间的私下议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冷讽热嘲的、辉格党人<sup>②</sup>式的基调。他们争辩说，与君主制的联系是一种有用的构想，有助于把典礼仪式跟实权分离开来。他们又说，澳大利

---

① 守卫新加坡的英军在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译者

② 英国自由党的前身，17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张君主权力隶属于议会。——译者

亚不欢迎那种会被选上总统的人；没人会信任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澳大利亚人，因为当上总统的人可能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们还说，虽然在理论上君主制早就荒唐地过时了，在实际上这只是小事一桩，而且可能还有点好处；大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大事上，而不是君主制这种小事上。

这样的论点本身正是澳大利亚虚弱不安的征兆。其中一些，像“小事一桩”之类，完全是伦敦的论点。

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被其他国家看得很严重，尤其是在亚洲。澳大利亚有时被看成是个半主权的国家，一个殖民地时代怪诞的残存物，或狡诈地设计出来的享有若干自由的英国卫星国，即“西方”的匈牙利或波兰，连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都不如。有这样的名声是恼人和危险的。而这正是许多澳大利亚外交官不十分清楚的许多坏名声之一，因为亚洲人不喜欢告诉他们。

在澳大利亚，利用英联邦作为一种实力工具的讨论还在进行，这使得跟其他国家建立更现实的联系的希望和目标提不上议事日程。因此，澳大利亚需要在其社会中来几场重新确定方向的突然震动，以便跟基本上与它无关的英国的问题脱离开来，使它能够加速必要的变化，并发展某种新的身份感、某种作为一个民族的全民感受，即可以被描写为——哪怕描写得不对——如此这般的一个民族，而且有时它的行动就好像它真是那样的一个民族一样。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无名无姓、无影无踪、什么也不是。这种谦虚羞怯、这种隐姓埋名，就体现在那种澳大利亚不欢迎可能会被选为总统的人的论点里。难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本事给自己设个元首的国家？这完全是殖民地习俗的死气沉沉，对自己的最后责任的惶恐不安。

当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共和国时，也许会指定一个总统，同时

假装什么真正的变化也没发生，即只是尽可能悄悄地用一个总统换一个总督。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的要人应该得由人民来选举，但澳大利亚的政治领袖们可能宁可通过对后门把他偷偷地塞进去。目前是总理指定总督，他向女王提名什么人，然后由女王宣布任命。要保持这个传统的话，可以在原先规定的休会期间召集议会两院，然后议会被可以根据总理的提名正式选出总统。也可能尝试更雄心勃勃的办法，即召开一个由州议会和联邦议会共同组织的全国大会，这样会夺走总理的总统指定权，而把事情留给国内最有势力的政治家们通过讨价还价去决定。公民直接选举的方法可能会遭到反对，反对的理由可能是说毁掉君主制残剩的神秘性会威胁澳大利亚民主的基础。但我是很怀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

自由党政府最近指定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担任总督，这是由自由党政府作出的第一个这样的任命，这个任命被人看作是早就该实行的改革。现在甚至有人在讨论怎样在澳大利亚不正式成为共和国的条件下，废除总督这个职位。提出的建议是，可以利用宪法上总督不在时，执政官可以行使总督权力的条款；换句话说，不需要政府指定一名总督，然后可以由某个杰出人士兼任执政官，以签署必要的文件之类，但不主持任何公开的仪式。这显然是个典型的澳大利亚式建议。问题是，事情不大可能就这么容易。

## 与亚洲共存

### 什么是亚洲？

在讨论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态度之前，应该先搞清楚人们没有说到的东西。在对亚洲有深入兴趣的人中间，大家都知道，除了任意规定的地理上的意义，“亚洲”这个词所指的含义太广了，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亚洲只是处于地图上某个位置的居住着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地方。当人们说到亚洲时，就要整个“洲”的概念作一细分。

在殖民征服的时代，欧洲人感觉到他们与亚洲人之间有所不同：肤色和骨架的不同；亚洲人不讲欧洲语言；他们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他们不信上帝；他们听任自己受殖民主义者的主宰。而根本的差异可能就在于这种主宰的事实。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公开承认参与了某些屠杀和征服，造成过严重的破坏，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对这些罪行加以合理化，否则他们的军队、政府官员和商人们星期天怎么在教堂互相见面呢？

从这种犯罪和对犯罪的合理化产生了所谓优秀的“白人世界”（它其实也是一个粉红、褐色、浅黄、灰色肤色的人的世界）和

低劣的“有色人种世界”的荒谬分界。这个分界的基础主要是国家实力，而不是文明的质量。是日本人打倒了欧洲列强而不是相反；他们早在 1905 年就打败了俄国人<sup>①</sup>；30 年代他们在中国长驱直入而欧洲人节节败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结束了欧洲势力在亚洲的支配地位。<sup>②</sup>

“亚洲的”曾经有某种与“欧洲的”相反的意义。随着亚洲从欧洲人手下解放出来，这个“亚洲”就失去了意义。在组成亚洲的种族和国家中间没有共同的特点。对那些发现肤色或鼻子的形状关系重大的人来说，亚洲令他们失望，因为那里各种肤色、各种鼻形的人都有，就是没有什么泛亚主义。在亚洲国家之间有的是分歧；而最重要的是，在各种族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感。亚洲对种族的议论非常多，如日本人看不起其他许多亚洲人，认为他们还没有开化；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跟澳大利亚人比跟印度尼西亚人有更多的共同兴趣。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者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华人社团里，华人认为他们是最高贵、最聪明的种族，是“中央王国”的继承人，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的统治者。菲律宾人恨华人和日本人。人人都不信任菲律宾人和日本人。那些不是华人或印度人的人，都不信任华人和印度人。在华人和印度人内部，又有各种种族和等级的差异。我在这里指出所有这些差异，并不是为了批评亚洲，只是想说明生活在亚洲的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也表现出我们熟悉的人类的特点。让欧洲的反殖民主义者着迷的事情之一，是将生活在亚洲的人民非人格化，把他们美化成可爱的

---

① 指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此战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支配地位。——译者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势力退出亚洲是亚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并非日本人赶走了欧洲势力。——译者

小狗、天真的傻瓜。实际情况是，亚洲人比欧洲人更多地表现出差异和多面性。泛非主义和泛欧主义现在正在发展出可能成为政治现实的某些迹象，但不存在泛亚主义。亚洲太大、太形形色色，它无法把自己看成个整体。它只是几个彼此分裂的次大陆的组合。

亚洲人各种族间在体形上的差异大于欧洲人之间的差异，宗教上的差别也更大（有佛教各宗、印度教、儒教、共产主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经济发展的差距更是大得多。欧洲有一种共同文明的意识，而亚洲除了那些“西方化”了的上层人物，则没有这种意识。“东方宿命论”只是读了什么宗教经文或观察了一些贫困的农村社会后应时的杜撰。如果把这些断章取义的标准用于欧洲，人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创造欧洲历史的人物中的大多数人是不理睬那里的关注今世的虚幻及来世的报应的宗教教义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亚洲。野心、征服、冒险精神，这些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亚洲历史的一部分。在亚洲发生的，是它一时被欧洲突如其来巨大的创造性经济增长压倒了。亚洲很慢才意识到世界是开放的、未来是没有疆界的，它也很慢才获得不断向新领域进军的现代意识。但是，欧洲社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甚至在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欧洲人在日本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压制或扭曲当地的首创精神，日本从而得以比欠发达的欧洲国家更快地进入“新时代”。在台北、香港、新加坡、曼谷和马尼拉的华人实业家绝不是东方宿命论者。印度贫困的乡村社会也许还信宿命论（宿命论过去是、现在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印度的商人绝不是圣人。马尼拉充斥着卑鄙交易，而菲律宾的农村在日益衰败，就像西班牙南部、西西里、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展的早期一样。

亚洲人并不比其他人更不可捉摸。事实是我们全都令人不

可捉摸。亚洲人彼此不可捉摸；印度人无法理解华人，日本人无法理解印度尼西亚人，柬埔寨人无法理解泰国人，如此等等。但巴尔干欧洲人就理解西欧的天主教徒吗？挪威人理解西班牙人吗？有什么人能理解英国人？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日本企业家的书，书里企图把他们跟“西方的”企业家区分开来。书中对他们有些看上去很熟悉的描写，如任人唯亲、家庭观念、对军事不懈的兴趣、怠惰，等等，而这些也正是英格兰企业家的写照。欧洲人通常用比衡量自己更客观的标准衡量生活在亚洲的人。这种苛刻的审查会产生一种伊夫林·沃<sup>①</sup>式的荒诞意识，但是如果对欧洲的制度作同样的审视，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所有人类的努力也许都是荒诞的，要是果真如此，那么亚洲并不比欧洲荒诞得更厉害。假如让安东尼·艾登爵士<sup>②</sup>和他 1956 年的内阁成员全穿上热带服装，把他们送到万象，要他们以实施他们的苏伊士政策<sup>③</sup>时的那种冷酷和笨拙去实施反对川圹<sup>④</sup>的政策，你就会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亚洲势态。

那末欧洲人所说的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越过官方有关基督教精神、尊重人类生命与信仰民主之类的宣传材料而看得更深一点。难道我们真的能说欧洲，这个有着举世无双的杀戮和征服的历史的大陆，一直在实现这些理想吗？这些理想真是欧洲突出的特点吗？亚洲人有时是

---

① 沃(1903—1966)，英国小说家，以善于讽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弊著称。——译者

② 艾登(1897—1977)，1955—1957 年任英国首相。——译者

③ 1956 年 7 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英国为主要股东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导致英法联军在 11 月进攻埃及。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控制苏伊士运河的英法军队在 12 月被联合国紧急部队所替代。运河主权自此回到埃及手中。艾登在次年即以健康原因辞职。——译者

④ 老挝中北部省名及同名省府名。——译者

这样看欧洲人的；他们把欧洲人看成是虚伪的征服者和凶手。

澳大利亚比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更尊重人的生命；澳大利亚民主制度运作正常而不受内部严重的挑战；澳大利亚人享受的生活水准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既超过日本，更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但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澳大利亚最初是作为一个可怕的罪犯流放地而建立起来的。那时人们遭到任意鞭打或被绞死，几乎完全无法无天。土著有时像野兽一样被捕，像狗一样被毒杀；在塔斯马尼亚，他们被彻底地灭绝了。所以，澳大利亚人离原始野蛮状态并不很远。我们或许应该设想 18 世纪末的太平洋地区，想想那时的悉尼、新加坡、上海、香港、东京、旧金山、珍珠港和马尼拉，那时这些地方正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工业化”和“西方化”引起的不可思议的大动荡把它们塑造成当代的模样。同一股力量，以不同的方式，现在也正在改变着我们太平洋地区所有人的生活。假如以不断向新领域进军的意识，即现代精神来衡量，澳大利亚并不是“亚洲”最“现代化”的国家，而日本却是。

## 实 力 态 势

澳大利亚的问题不在于寻求亚洲的理解。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无须同其所有在北方的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开始任何外交事务方面的辩论。澳大利亚的问题在于它当前处于一种新的危险的实力态势中，而它的人民和政策还没有适当地重新定位以面对这一事实。

亚洲是西方欧洲殖民主义被日本人打倒，从而最先瓦解的地方（非洲是后来的事）。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图凭武力卷土重来，但他们的实力在大势已去的殖民战争中或现实主

义的宽宏大量的姿态中，已经被零打碎敲消耗殆尽。欧洲帝国主义的浪漫传奇和花天酒地已一去不复返。亚洲各国自己的军队现在驻扎在过去殖民主义者修建的营房里；各国总统搬进了前总督们的豪华官邸。这些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他们原来的立场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毫不奇怪，从澳大利亚最早觉悟到亚洲的存在那时起，就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大祸临头的恐惧感。日本入侵的威胁为澳大利亚对其周围环境的新兴趣开了个可怕的头。当共产党人在中国风卷残叶般夺取政权，而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叛乘中国周边国家中民族主义者的反抗造成的混乱之机此起彼伏时，这种对可能的灾难的恐惧更是挥之不去了。然后是要求澳大利亚出兵远征的朝鲜战争<sup>①</sup>、马来西亚冲突<sup>②</sup>和越南战争<sup>③</sup>。与澳大利亚紧邻的东南亚次大陆至今仍是世界上潜在的最不稳定的地区。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争执频繁、缺乏安全、凶吉莫测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政策出乎意外地巧妙。在苏加诺<sup>④</sup>政权和马来西亚的冲突，以及随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裂<sup>⑤</sup>造成的一片混乱中，澳大利亚尽管插手干预，但照样保持了与各方的友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大小相仿的“西方”国家像澳大利亚那

---

① 在朝鲜战争中，澳大利亚军队是由 21 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的一部分，先后有 1 个飞行中队和 3 营步兵在朝作战，共死亡 339 人，受伤 1200 人以上。——译者

② 1963—1966 年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不宣而战的边境冲突。澳大利亚 1 个营的军队作为英联邦联军的一部分在 1965 年参与了保卫马来半岛及进攻印尼的战斗。——译者

③ 先后有 5 万澳大利亚军队在越南作战，最多时达 8500 人。共死亡 496 人，受伤 2400 人以上。——译者

④ 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译者

⑤ 1965 年新加坡退出 1963 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译者

样不得不为其积极的外交政策和承担的军事义务而忙碌不已。

在今天种族主义被正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者的坏名声。罗伯特·孟席斯爵士在英国电视上谈到“白澳政策”时说：“喔，我们现在不这么称呼它了。”问题是，尽管在细节上（有时是秘密地）有所改良，澳大利亚在移民方面相当明显地歧视所有的亚洲国家。它鼓励和资助从欧洲移民，包括不说英语的移民，却对亚洲人进行极其严格而又秘密的考查，以致只有个别的亚洲人能进来。亚洲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也确实是种族主义，不管其动机是什么。它使澳大利亚不为亚洲任何国家所信任。

这一政策有时与澳大利亚从前对它的土著居民的虐待联系起来，甚至混为一谈。在对待剩下的10万土著和混血土著的态度方面，情况正在改善，但多年前保罗·哈斯勒克的话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过时：“当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噪音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变得一文不值。”亚洲人其实并不怎么为土著操心（他们对待他们自己的土著往往比澳大利亚人更坏。除土著以外是“黑人”，在亚洲对“黑人”的反感可能比在欧洲或澳大利亚更强烈）。但土著却被说成是“白澳政策”的受害者，而“白澳政策”经常被说成是澳大利亚的“种族隔离制度”<sup>①</sup>。

像澳大利亚人这样城市化的、并非野心勃勃的民族会成为最后的殖民势力之一，完全是由其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偶然结果。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的管理无疑是殖民主义的（虽然它把

---

① 指1991年以前南非当局对黑人和其他有色种族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译者

后者小心翼翼地称为“特区”),不管这种管理在天真无知、对此基本上不感兴趣的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看上去是多么好心好意。60年代初对澳大利亚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联合国托管委员会谴责澳大利亚没有为准备成立自治政府而加速对新几内亚人的培训。不过,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由澳大利亚在1964年提出的加快向自治政府发展的倡议,在大多数成员是本地人的立法会的促动下,会形成在东新几内亚成立独立国家的势头,而这种势头之猛,将会让澳大利亚措手不及。

除加勒比海地区以外,亚洲是世界上唯一既有高密度的人口,又有高人口增长率的地区。按目前的比例,在40年内,它将容纳——如果这是个合适的字眼的话——比今天的全球人口还要多上10亿的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它有差不多3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以领土计是世界第六大国,而人口比荷兰还少。它的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荒漠,另外的很大一部分极其贫瘠,但亚洲人不相信这一点,或者认为没有关系。对亚洲人来说,澳大利亚是个巨大的未开发的“大陆”。我记得曾经面对一屋子不肯信服的菲律宾人,企图向他们解释,尽管澳大利亚在其工业地区和富饶的农业地区足以容纳难以估计的更多的人,但它很大的一部分是荒漠。最后,我请人拿来一本地图册,向他们指出在降雨量图上,标着黄色<sup>①</sup>的大片区域占去了澳大利亚的三分之二,那是世界降雨量图上第三个大的黄色区域。那些菲律宾人还是不相信那黄色区域就是荒漠。他们希望相信在他们的南方有个极其富庶的“大陆”,能为每个人的问题提供出路。澳大利亚该设法把自己重新归类为岛国,那听上去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

① 根据惯例,降雨量图上的黄色表示年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译者

亚洲还有其他空旷的地区，如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省份、苏门答腊和泰国，而澳大利亚的低人口密度之所以会在它的邻居中引起敌意，是因为这种低密度是跟高度的繁荣昌盛联系在一起的。澳大利亚享受着几乎无可比拟的富裕，而在亚洲有着世界上最贫困的一些人口。澳大利亚并不具备当亚洲的“慷慨夫人”的资源，但它的国民人均收入是亚洲的 16 倍。澳大利亚在国内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它在亚洲社会扮演的却是富有、以自我为中心、举止轻浮、目空一切的贵族角色。

## 亚洲的形象

如果从前澳大利亚给人的印象是它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亚洲，那么应该指出，这种印象如今不再符合真实的了。澳大利亚在态度上有了巨大的转变。报纸上突然充满了亚洲的轰动新闻，到处在举办有关亚洲的讲座，到处是有关亚洲的文章。不过，这种兴趣有时只是因为某些人一时被一个想法所吸引：太有意思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弄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澳大利亚人并没有太多的对亚洲的真正的感受，那是得靠经验才能获得的。还有，人们会得到错误的信息。有人也许会在喝着红葡萄酒时宣称：“说不定在中国胜利前我们只剩下几年时间了。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孩子们。”然后，在喝着白兰地时，他又会说：“距离再也没有关系了，地理位置不再那么重要了，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部分。”让那些建议说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是东南亚的延伸的人感到不知所措。

在以下段落里，我将粗略地对澳大利亚在对待亚洲的态度方面会出什么差错归类叙述之。

“没有个性的群体。”把所有亚洲人加在一起会在澳大利亚

引起无知的恐慌。世界上 52% 的人口生活在亚洲，因而世界人口的 52% 全威胁着澳大利亚。这种算术方法有悠久的历史，远比共产主义出现得早。通常作为思想的替代品，这种担忧带着某种粗犷的诗意：“移民们聚在工棚里，玩牌彻夜不停息；待到黎明破晓时分，全让印第安人剥了头皮。”这是一种会造成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作鸟兽散的极端悲观的观点。

“我喜欢亚洲人。”持所有亚洲人全都一样的观点的人中的少数人，似乎对有十多亿一模一样的邻居的前景显得高兴。这种信念经常与有关亚洲人的青春活力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青春活力据说正在向使亚洲那么多农村地区陷于赤贫的保守主义和使亚洲的经济计划毫无希望的懒散挑战。我曾在一次晚餐上听到有人提出个论点，说一个亚洲人抵得上两个澳大利亚人，然后他解释说，他最近遇到一些非洲人，这些人说地道的英语，有的甚至还能说法语，因而一个非洲人抵得上两个亚洲人（或者 4 个澳大利亚人）。当无知的人碰上一个不当众挖鼻孔、并能用前殖民国家的语言讨论时事的亚洲人时，他们往往会在把个人理想化的同时，歪曲贫困的亚洲社会正面临着可怕的问题的现实。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类型的概括不全是个人的幻想，因而变得稍微有点意义。一个澳大利亚人认定他在亚洲有一个喜欢的国家，他说：“我喜欢印度人。”虽然他的这种说法甚至比“我喜欢英国人”更没有价值，但这是个开端，一种打破笼统的开端，至少比“我喜欢亚洲人”更有意义。

“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种极端恭敬的态度有时会导致一种看法，即亚洲人似乎并不对权力政治产生兴趣，他们要的只是爱，或许还有经济援助。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这种态度表现出最极端的形式。持这种态度的人的论点是这样的：现在中国人被世界排斥在外；如果能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

就会作出反应，从而失去感情上的不安全感，表现出温情的一面。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对待苏加诺的问题上：不管他要什么，都给他，他就会太平无事了。说到底，我们是得跟这些人共处。通过强调与某些亚洲国家利益上的共同性，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这绝不是说亚洲的精英们不玩弄权力游戏。亚洲的历史上充满了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好戏，就跟任何其他洲的历史一样。而当代亚洲人对权力的态度就是人类共有的态度。有些亚洲人酷爱权力。

“我们必须尊重亚洲的意见。”一些澳大利亚人接受了含糊不清的不结盟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对自称不结盟的亚洲国家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对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不结盟还有个特殊的好处，即赋予他们一种明显的道德上的优势，使他们对许多主张的真实性自信不疑；如不结盟的亚洲国家比结盟的好；如可以用不适用于结盟国家的理由原谅不结盟国家的军事独裁；如在缅甸完全行得通的做法在泰国就不行（这种比较对泰国极端不公平）。当印度与中国交战时，它像一个不忠于丈夫的妻子那样被各国抛弃不管，因为它已经成了个结盟国家。这种除了在知识分子和左翼集团中，在澳大利亚没有很大代表性的态度，意味着除非退出与美国的联盟，宣布不结盟，否则澳大利亚永远也得不到“亚洲”的信任。

“中国人会赢。”像亚洲各国人民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澳大利亚人，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被共产主义中国迷住了。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代表着人类的命运，于是急于使自己适应“事实”。有些人盼望能借机马上捞上一把；别的人相信中国会赢，所以澳大利亚的现实主义的政策应该是假设这点并作出“妥协”。在澳大利亚，有些人自以为是“理解中国”的人，他们希望在那一天到来前做好一切适当的安排。对在澳大利亚的四散

的、部分自相矛盾的、经常混淆不清的“亲华游说活动”，我们不能低估。

“反共主义者。”我在这里指的不是澳大利亚的人民大众，尽管也许可以这样描写他们。我指的是那些自称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持强硬立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相信澳大利亚还走得不够远。他们对东南亚共产党政权的威胁的评估往往是有价值的、现实的，因为这种威胁乃是澳大利亚未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对待亚洲的总的态度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暴露出两个弱点：有的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圣典看得太重，他们会沉溺于教条而看不到在教条底下丑陋的、然而是人性的真实。他们会过度理智化。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中一些人对中苏分裂的认识非常迟缓，因为那不合他们的逻辑。其他人——或者是同一批人——可能过分专注于亚洲的共产主义，以至于他们看到的全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亚洲。例如，有个朋友考虑在悉尼组织一个来自“强硬反共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他刚拟好份名单，上面有巴基斯坦而没有印度。于是他不得不划掉巴基斯坦（因为“对共产主义太温和”）而加上印度（“强硬派”）。紧接着，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之一的菲律宾的总统马卡帕盖尔<sup>①</sup>，一个反共强硬派，也是个基督徒，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和苏加诺总统站在一起。现在谁是反共强硬派？是结了盟的菲律宾，还是正式说来算不结盟的马来人？以预言家自居的人在充满荆棘的环境里会忘了人性的荒唐和复杂性，他们会变得教条主义而失去政治上的敏感，无法看到通常处理人类事务的混乱状态，忘了尽管事情可能很重要，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却往往是些小丑。

---

<sup>①</sup> 马卡帕盖尔（1910—1997），1957—1961年任菲律宾副总统，1961—1965年任总统。——译者

澳大利亚人在看待亚洲时的最好立场是看到包括共产主义的亚洲，而不仅仅是共产主义。

“那不管我们的事。”看来有那么一些澳大利亚人，他们真的相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觉得只要澳大利亚与亚洲无关，亚洲也就对澳大利亚无关。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在郊区的大街小巷上，那里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澳大利亚去干涉亚洲的事务，那就会招惹麻烦。一些在别的时候最积极地主张澳大利亚应被看作一个亚洲大国的人也会接受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绝不能“介入”亚洲事务，虽然亚洲国家之间互相“介入”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亚洲人了。”这是许多年轻人的观点，我本人也会持这种观点。我想，在亚洲人民中寻找与自己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兴趣是澳大利亚人的责任。认真严肃地看待我们的博爱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应用于亚洲人，将会在澳大利亚人民中间引起一种创造性的觉醒。不过，要是不考虑到亚洲内部的巨大差异的话，这种观点就会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变得毫无意义。这种观点暗含着比表示善意更重要的义务，即必须在必要时支持一方从而得罪另一方。不支持印度反对中国就意味着反对印度；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宣布中立就意味着反对马来西亚。说“我们现在都是亚洲人了”，并不等于说我们再也不必作抉择了。那仅仅开始限定问题的性质。

在对所有这些态度进行分类时，我没有提到澳大利亚人的普遍想法是什么。这是有充分原因的，因为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可以猜想的是，总的来说，他们有一种困惑和徒劳无益的感觉。因为正如雨果·沃尔夫森在《异见》杂志中所指出的，谁也不操心外交政策；公众人物不把外交政策作为他们关注的主要领域；没有广泛的调查；人们从来不把外交事务当成政治活动和研

究的永久性领域来处理；只有一堆“外交姿态和纸上规划的记录”，一堆“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面临的问题鲜有关系或根本无关”的讨论记录；没有足够的体制上的支持；外交部长们不会用概念思考；议会议员极少能得到有关的情报信息；没有任何现存的政府或私人组织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

##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光从名称看，就是种族主义，不管它现在如何乔装打扮。它是在淘金狂时代出于对中国移民的恐惧而产生的（《公报》杂志原来的箴言是：“澳大利亚是白人的，中国才是周家的。”<sup>①</sup>）它还有一个经济基础，特别表现在反对在昆士兰使用廉价的南太平洋契约劳工的激烈争论中，那时那些南太平洋岛民有成为半奴隶的可能性。如今，带种族主义色彩的声音在公共场合已经越来越微弱，极少有人准备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语言公开为这个政策辩护了。原来的种族主义的基础已经被一点一点地砍掉了。

但是，在暗处，还是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对“肤色”念念不忘（个别人可能还会把中国人称作“黑鬼”）。澳大利亚人的真相是，他们跟大多数民族一样，培养各种各样种族、国籍和宗教方面的偏见。但除非这种偏见以公开而狂热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未必引起公众的忧虑。企图借助立法排除对异己事物的反感是不会成功的，除非同时也借助立法排除掉民主。我们必须认识

---

<sup>①</sup> 这个箴言后来被修改为“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我在 1960 年担任《公报》的编辑时，连它也除去了，以致遭到一些病态的辱骂诽谤。

到许多澳大利亚人确实对亚洲人有偏见，不过这在制定政策方面不一定很重要。也许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当初对天主教徒的移民有反感，有些对犹太人的移民有反感。生活的底层往往臭气难闻，人们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希望那臭气呆在原处不动。尽管有对东欧人和南欧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反感，移民照样一直在进行。虽然私下里这些偏见可能还是很强烈，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公众事务上无足轻重。除了地方上宗教性的宗派主义，澳大利亚人可能远比某些人所赞扬的更善于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不管他们在酒吧或自家的客厅里胡扯些什么。

教会、大学和一些报纸对现行移民政策的反对相当激烈。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多数澳大利亚人现在赞成对移民政策作某些修改。在孟席斯政府当政期间，对亚洲移民的出自本能的恐惧似乎大有减轻，虽然这不一定是意识的，但确实发生了。12000名亚洲学生，加上允许入境的其他亚洲人，如今是澳大利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特色，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没有任何某些人预料的抵触情绪。如果真的没有抵触情绪，那么那种现行政策有助于避免种族冲突的论点就变得虚弱无力了。现在大概可以宣布结束这一政策，代之以有控制的鼓励亚洲移民的政策，而不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危机。

对澳大利亚人民来说，这也许是可行的，但对目前当政的这一代政治家来说恐怕还不行。除非工党也积极要求改变，否则即使自由党想改变政策（没有那些元老们准备这样做的迹象），他们也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不管它的一些成员多么希望这么做。自由党还没到这个地步。所以，在政治上，在目前，就是这个样子了。不过目前这种状态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现在在澳大利亚当权的这一代人很快就会去写回忆录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是下定决心要作出改变的。在受过大

学教育的人中间，在工党和自由党的年轻支持者中间，如今几乎人人都赞成改革移民政策。在改变这一政策的愿望中，跟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别的事情一样，要求改变的力量比老人们和中年一代中的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强烈得多。

这几年来一直在别的国家称之为“专家意见拟制层”的圈子里活动的、主要由大学里的人组成的移民政策改革小组已经准备好了改革的方案。如果移民政策改革进展平稳，这些小组功不可没。在题为《控制还是肤色限制？》的小册子里，它们提出了一种保守的立场，建议接收的移民人数应该有所限制，“以防止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的有害的竞争、防止任何种族集团在地位低下的行业中的集中、防止住房拥挤，并确保移民在澳大利亚全社会的合理的分散。”这本小册子把对将来的估计留给将来，但建议说目前澳大利亚在近期内“能够接收的平均移民人数的若干倍而不至于压力过重。”这些专家小组做的一件事是严肃地对待以文化同一性为理由的反对意见，并试图予以反驳。在《象限》杂志上，一个小组的两个成员写道：“这是对这个论点的严峻考验，……不能把文化同一性等同于白肤色。”他们说，譬如，在马尼拉有的是看上去能满足同一性要求的菲律宾人，他们甚至信仰基督教，为什么把他们排除在外？

就是最坚决地表示支持放宽移民限制的人也受到恐惧的约束，主要是害怕其他人的反应，他们害怕不能信任其他澳大利亚人会正派地为人处事；害怕配额政策会在亚洲人中引起更多的敌意而不是消除敌意；害怕一旦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会被已经在这里就业的亚洲人所恼恨。这些恐惧肯定都是出自于无知，因为没人知道有谁想到澳大利亚来。一般认为，欧亚混血的人会乐意来，也许还有菲律宾人，或许还有富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的华人。要是主要是这些人，那实在很难说他们的到来会有

什么造成社会关系紧张或破坏现存生活方式的风险。许多亚洲人指出,印度人通常乐意呆在印度,马来人乐意呆在马来亚,华人乐意呆在新加坡;如果他们想移民,他们会试图移民到英国去。有时有人担心更开放的政策会得罪亚洲政府,因为亚洲的部分精英人才会争先恐后拥到澳大利亚来,从而损害那些国家的利益。但这个问题显然是可以通过双边协议加以控制的。这是亚洲政府的事,而不是澳大利亚的事。对在澳大利亚受教育的亚洲学生,这种担心就更严重了。但这同样还是他们自己政府的事情。反对在澳大利亚受了教育的亚洲学生留在澳大利亚的观点怎么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只是种族偏见罢了。

增加亚洲精英的移民额肯定会丰富澳大利亚的生活,帮助澳大利亚人进一步熟悉他们与之为邻的世界,从而在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更灵活,并部分地解决了澳大利亚从英格兰进口很大部分大学教师的问题(澳大利亚本身缺乏精英人才)。这后一个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一直严重地疏离于他们自己的人民。我们大概需要一些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来帮助打破英国的影响。

如果澳大利亚要在亚洲扮演更有力的角色,它在移民政策方面的变化必须足够显著,以便让亚洲人确信真的有变化。与亚洲国家签订足以消除它们的担心、并有公开明确的语言、教育和工作能力方面的同化标准的移民协议是相对简单的方法。这应该是初步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标准也许可以变得更常规化而适用于所有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我个人的观点是,澳大利亚在未来有发生巨变的可能性,其中也许得包括种族上的变化。这是澳大利亚的“命运”。不管以什么方式,这总会发生。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别的什么人。

##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土著居民

在殖民时代的早期，尽管偶尔也有所改革，对待土著最坏的做法，是把他们当成“危险的野兽”，或者毫不在乎地把他们的原始文化扔在一边，任意践踏；对待土著最好的，也只是把他们看成是需要保护的人种，因而把他们隔离开来。澳大利亚土著受到的对待跟其他极其虚弱、缺乏组织的土著社会在遇到外来移民种族时受到的对待是一样的。大多数亚洲的统治种族也是这样地对待他们的土著，把挡道的土著推到一边的。

做这个比较并不是想原谅现在的态度，而是要把澳大利亚的殖民放到全世界殖民的野蛮历史的背景中去。澳大利亚人过去如何对待土著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这段历史应该使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惭愧（包括 17% 不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人）。最重要的是现在的立场。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在社会上的普遍影响、实行能力和广泛宣传，现代澳大利亚人使土著居民回归人类的工作无疑做得一塌糊涂。

归纳土著的现状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管辖范围：在昆士兰、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各州，他们是州政府的责任，而在北澳特区，他们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在塔斯马尼亚没有土著，因为全被杀戮殆尽了）。要做归纳很困难，还因为在这些地区，对他们的限制现在有不同程度的放宽。在本书写作之际，昆士兰是在修改与土著有关的法律方面最落后的州。无论如何，总的来说，虽然还有些土著在过着部落生活，但保存住他们的文明的可能性很小，不管是想作为珍藏品，还是出于对他们的愿望的尊重。正如彼得·科尔曼在《观察家》杂志上指出的：“不管官方说的是什么，我们对土著的政策根

本上从来没有过变化。从前的想法是把他们全给杀了；接着比较仁慈的方案是让他们平静地死去，而我们则在他们闭眼之际为他们抚平枕头；如今的政策是同化他们。但是对土著自身来说，所有这些的结果全是一回事。同化最终意味着被彻底消化，也就是意味着绝种。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甚至作为一个种族，土著还是注定要消失。……这是我们的历史上充满讽刺意味的怪事之一：似乎为我们对这个种族所犯下的一切罪孽，我们唯一能给予的赔偿，就是帮助它消失。”

所有考虑到土著居民利益的政府现在都保证要实行同化。1951年有各州和联邦政府代表参加的协调会议接受了同化的原则。该原则在1961年类似的协调会议上得到重申。在那以后，对土著在某些领域的限制很快得到了宽松。土著被要求“采取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方式，作为单一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成员而生活”。世界上把对土著的虐待跟“白澳”移民政策混为一谈并说澳大利亚有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现状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还有许多贫困，在某些地区还有事实上的隔离。不过官方的政策是同化，而不是种族隔离；这种政策正在实施之中，尽管非常缓慢。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他们也许在一年中没见过一个土著）现在好像都希望土著能生活得好，都赞成应该把土著简单地看成是澳大利亚人。现在树皮画和其他土著手工艺品很时髦，对土著的前途的担忧已经成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信条。土著的实际处境差异悬殊，从个别生意成功、早就成了彻底的澳大利亚人的，到那些正在城市和乡村小镇里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到那些在乡村小镇外正式的“土著居住区”或非正式的河畔营地过着半澳大利亚人、半土著生活的，到生活在受保护的土著社区里的，到那些依然四处流浪、以荒漠为家的人。虽然法律上的歧视在消

失(政策就是要这样),土著有了联邦选举权,但他们中许多人仍然只是二等公民。家长式的管理、在福利方面的大笔支出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规划,这些必要的配套的东西尽管在 50 年代有所改善,在 60 年代有显著改善,都还是没有跟上。

在一些地区有很多在细枝末节上对土著的歧视,在别的地区则没有。要用立法手段消除这些歧视很困难。作为一个整体,澳大利亚社会或许会受到谴责的地方是它在承认土著的所有权利和为土著花更多的钱等方面动作缓慢。这种缓慢可能部分出于澳大利亚人的种族理论,但主要是出于良知上的盲目和彻底缺乏想象力,他们不懂得缺乏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政策。

## 对大洋洲的态度

澳大利亚人在拒绝承认自己的环境方面最惊人的表现可能是他们几乎完全忘掉了大洋洲世界,那包括新几内亚、新西兰、800 到 1000 英里以外海上的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亞群岛,再远处是斐济,然后是一连串横贯南太平洋的岛屿(这些岛屿中西部的那些主要受新西兰的影响,东面的主要受法国的影响)。在世界的这一角,澳大利亚是个大国。澳大利亚的首创精神,主要是个人的首创精神,在这里表现得很多。澳大利亚的公司企业在这里赚了不少的钱。然而,在澳大利亚的概念中,这个地区并不存在。澳大利亚人知道欧洲比他们知道亚洲多,知道亚洲比知道大洋洲多。一个其想象力受英国历史影响的国家似乎无法了解这些细节的存在。

当《观察家》杂志在 1958 年试图引起人们对新几内亚的兴趣时,它被指责为走火入魔,它的下述观点被说成是歇斯底里:“这是对我们的政策的考验。新几内亚是世界上有争议的领土

之一，是明天就可能爆发战争的地区之一，而我们控制着它的一半。它可能成为南太平洋的阿尔萨斯－洛林<sup>①</sup>。它可能是我们所有政策的试金石：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真正关心它？假如我们在新几内亚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有人会支持我们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快就证明是“不”。印度尼西亚与荷兰就西新几内亚<sup>②</sup>的前途在 1961 年的“冲突”使澳大利亚的政策彻底破产了。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私下里反对印度尼西亚吞并西新几内亚，但是，在执行了 10 年完全建筑在愿望和外交手段的基础上的政策之后，澳大利亚屈服了。西新几内亚的人民没有得到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机会，他们被奉送给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随之就挑起了与马来西亚的“冲突”。

现在，在澳大利亚控制的构成东新几内亚的两块领土上，选举成立了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立法会，不管澳大利亚政府说什么，那里不可避免地将形成强有力的新几内亚共和国。由于澳大利亚的缺乏想象力，这个新几内亚共和国将在经济上依赖澳大利亚或者从其他国家得到的不管什么样的支持，它没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精英人才。一直到了很迟的阶段，澳大利亚还是十足典型地假定新几内亚跟其他殖民地不同。在新几内亚的问题上，澳大利亚面临的将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争论。

与新西兰的关系同样带着那种经常折磨着澳大利亚人的等级盲目性的烙印，即离澳大利亚越近的地方，澳大利亚人对之所

---

① 法国东北部地区，与德国相邻，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德国（187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收回。——译者

② 西新几内亚原为荷属殖民地，1961 年归印度尼西亚所有，改名为西伊里安。——译者

知越少。有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伦敦的《泰晤士报》比从澳大利亚的报纸了解到更多的有关新西兰的情况。新西兰人对澳大利亚人有看法<sup>①</sup>，而澳大利亚人对新西兰人没有看法。当新西兰人发表他们的看法，并流露出优越感时，澳大利亚人会大吃一惊，并感到受到了伤害。谁能想到新西兰会这样？

新西兰的人口只有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它的进口按比例计是澳大利亚的2倍；它的出口危险地局限于羊毛、肉类和乳制品；它的贸易太多地跟英国连在一起，英国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很可能就会毁了新西兰。而澳大利亚较少地依赖进口，出口货物的品种更多，工业更先进发达，所以足以承受同样的压力。新西兰需要——实际上是必须——有一个大国可以依附。在理论上，作为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组成的澳新美互助安全条约的成员，它有美国这个盟友。经济上它与英国关系密切。但是，如果在战略上和经济上依附澳大利亚，对它可能大有好处。在战略上，那样可以实行国防力量的一体化；在经济上，新西兰将得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外贸顺差，加上两国可以对同样的产品实行联手促销，那样能帮助新西兰摆脱在国际上长期处于破产边缘的状态。两国经济上的全面联合会遭到澳大利亚以乳制品为业的农民的反对，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可能会被来自新西兰的竞争压垮；这种联合也会遭到新西兰的制造商的反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被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实力更强的公司排挤出市场。所有这些在澳大利亚都是看上去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变化。而在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比这更大的变化正在

---

① 他们自以为是前英联邦自治领中英国的宠儿，而澳大利亚人笨拙、吵闹、好斗、不可信赖。与此同时，新西兰又是个充满机遇、待人友好的伟大的国家，居住着5万（原文如此。可能指土著毛利人。——译者）新西兰人。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新西兰被看成是组成澳大拉西亚<sup>①</sup>的殖民地综合体系的一部分。在本世纪初，它发起了加入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的讨论，但没有成功。这些讨论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在 1965 年，主要出于新西兰的倡议，两国终于签署了一个非常保守的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覆盖了双方没有争议的 60% 的贸易。

分别讨论南太平洋上那些小岛会是件非常单调乏味的事。它们中许多岛屿的立场是一定要发展成某种形式的独立，而这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所有这些岛屿的趋势。它们都是需要特殊帮助的很小的社会，其中有些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常常是它们主要的经济上的剥削者。有些行政当局向澳大利亚寻求帮助却遭到了拒绝。

这是一个奇特的海岛世界。澳大利亚的想象力，加上新西兰的合作，能在这里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同时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带来某些保障。在澳大利亚的众多盲目性中，最不容易原谅的是它对大洋洲的视而不见。当澳大利亚面临着亚洲千丝万缕的复杂状态时，我们可以要求世界对它宽厚一点；但世界会问，为什么澳大利亚不对大洋洲产生多一点实质上的兴趣？它是大洋洲中的大国，有能力主动采取行动。世界在听取我们恳求同情的呼吁前，也许会先问，我们为需要我们关注和帮助的国家做了些什么？

---

① 原文为 *Australasia*，一个不很明确的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译者

## 工作的人

### 企业家

在新几内亚一些地方，有人相信能在悉尼上空云端的某处找到天堂，而天堂和悉尼是由一把梯子连在一起的。他们相信，在死神们懒洋洋地躺在藤椅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小精灵为它们送上的罐头肉和威士忌的同时，上帝在忙着创造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把它们用梯子从天堂送到悉尼，然后装上船送给幸运的新几内亚人。

澳大利亚人没有这种指望不劳而获的态度。他们制造他们大部分的消费品。但在一些澳大利亚人中，对生产持不动脑筋的态度非常流行。发明创新的过程本是“西方精神”的基本部分，但它在澳大利亚国内起的作用小于除了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澳大利亚人在对这个大陆进行殖民的早期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也不管在受到挤压时他们在临时应付上有多么惊人的成功，澳大利亚的企业家至今未能证明他们善于促使人们想出新的东西来进行生产。制造新产品的指令通常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上空的那些天堂。不像瑞典和瑞士，澳大利亚在

制造业方面没有开发出任何其特有的、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特殊工艺技能。澳大利亚人不但不发明新东西，他们在行动上往往还表现出对西方精神的另一核心部分——对竞争作用的虔诚信仰——的异常的不信任。

澳大利亚资源极其丰富，是国际投资获取暴利的好地方。最近发现的铝土矿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矿产资源；铁矿储量估计高达 80 亿吨；已经发现了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大量石油；这里有巨大的煤矿储量；铅的产量是世界第一；锌的产量居世界第三；羊毛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在这个可以用套话“地大物博”准确地描绘的国家里，大部分制造业现在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不受海外公司支配的主要制造业集团是钢铁、水泥、玻璃、糖和纸张。在澳大利亚最大的 100 家公司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由海外控制的。在记住这些外国公司如何垄断其供销渠道的同时，还应该指出，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制造业归根结底也依赖于海外的企业和决策。连完全由澳大利亚人拥有的公司，也常常得依靠外国的专利以获取新的思想。支撑 50 和 60 年代所谓的“工业革命”的那些思想概念多半是舶来品。而这还不是全部的故事。连管理和销售风格方面的创新多半也是外国搬来的。现在有一种趋势，即外国公司在直接进入澳大利亚的财会业、管理咨询和广告业。澳大利亚工业在最主要领域里的成功是一种发达的殖民社会的成功，靠的是雇用当地心灵手巧的劳动力的外国企业和外国资金。或者如尼尔·麦金尼斯在《象限》杂志上说的那样：“好像是欧洲一部分人口被搬到了这里，以便美国企业能比在欧洲更方便地向他们提供汽车、肥皂刷和可可爆米花。”

这种趋势似乎不大可能会不继续下去。正如麦金尼斯所说的，“我们享有的经济独立的程度取决于煤、钢铁和糖（主要由澳

澳大利亚当地人拥有的三大工业)作为我们最大的(不依靠农村的)工业的情况能维持多久。随着我们进一步进入新的技术时代,在澳大利亚以外作出主要经济决策的百分比将接近 100。在几年之内,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上层中产阶级都将为总部或老板在纽约或澳大利亚以外的什么地方的公司工作,或者为完全依赖于这样的组织的澳大利亚公司工作。”对外国人的依赖不仅限于与国内有关的决定,澳大利亚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的“出口动力”主要也是由海外的决定控制的。在澳大利亚拥有公司的外国企业决定着是从澳大利亚向某个市场出口更有利可图,还是从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的工厂出口更合算。批准在澳大利亚制造产品的外国企业决定是否将它们的专利许可权扩大到世界其他地方。像在加拿大一样,外国企业现在倾向于扼杀本地的研究开发的苗子,一旦发现一个杰出人才,它们就会把他带回到总部去。

不过澳大利亚也从来没有在研究和开发上花过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澳大利亚用于研究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尽管差不多是加拿大的 3 倍)。对研究和开发的漠不关心绝不仅仅是因为外国所有权的问题。澳大利亚人拥有的企业往往就是不懂研究开发的作用。澳大利亚人的研究成果有时得到海外去找主顾,因为找不到懂得研究成果可以用于赚钱的澳大利亚企业。有许多澳大利亚人知道如何进行研究,而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些人去了海外。聪明、有专门知识、老想出新花样去干的人,光这样一个概念就让许多澳大利亚企业家反感,因为接受研究的重要性可能会危及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在这类事情上,澳大利亚企业家蔑视他们的同胞往往就像殖民主义者对待受他们剥削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不能指望当地人有什么主意。

在澳大利亚还有人在谈论“自由经营”，但对许多澳大利亚制造商来说，这只是他们背熟了但不甚了了的东西。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很古怪，它经常意味的是，企业家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保护以帮助他们生存下去。

在这方面关税委员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保证让想赚钱的人都得到“公平对待”的机会。这个委员会是在 1921 年成立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有权对本地工业提出的提高关税以抵制外国竞争的要求进行调查。它原来的宗旨是要保护新生的、缺乏经验的企业，但现在人人都想挤进来沾点光。而关税保护一旦给了，通常就取消不了了。由于政府缺乏任何在重新培训期间供养失业者或帮助企业实现经营多样化的计划，因而让低效率的工业垮掉的政治风险太大。众所周知的对纺织业的关税保护，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澳大利亚也有些出色的纺织产品，但总的来说效率低下，所以制造商把关税推到了高达 100%，而平均关税只是 30% 左右。

就大体上来说，关税委员会大概是个好主意。没有它，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多样化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根本发生不了。对真正的高效率的长期生产来说，澳大利亚的国内市场实在太小（企业的增长模式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外国大公司的年产量可以少到只相当于母公司一天的产量。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的制造商干得不错。不过人们不该忘掉他们中很多人会否认的一件事，即这里的劳动力大多数受过教育、有适应能力、负责任（尽管不习惯于顺从）；如加尔布雷斯<sup>①</sup>在澳大利亚时提出的，对于自动化时代的问题，由于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不存在社会和种族等级，他们可能在根本

---

① 加尔布雷斯(1908—)，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在澳大利亚还有人在谈论“自由经营”，但对许多澳大利亚制造商来说，这只是他们背熟了但不甚了了的东西。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很古怪，它经常意味的是，企业家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保护以帮助他们生存下去。

在这方面关税委员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保证让想赚钱的人都得到“公平对待”的机会。这个委员会是在 1921 年成立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有权对本地工业提出的提高关税以抵制外国竞争的要求进行调查。它原来的宗旨是要保护新生的、缺乏经验的企业，但现在人人都想挤进来沾点光。而关税保护一旦给了，通常就取消不了了。由于政府缺乏任何在重新培训期间供养失业者或帮助企业实现经营多样化的计划，因而让低效率的工业垮掉的政治风险太大。众所周知的对纺织业的关税保护，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澳大利亚也有些出色的纺织产品，但总的来说效率低下，所以制造商把关税推到了高达 100%，而平均关税只是 30% 左右。

就大体上来说，关税委员会大概是个好主意。没有它，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多样化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根本发生不了。对真正的高效率的长期生产来说，澳大利亚的国内市场实在太小（企业的增长模式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外国大公司的年产量可以少到只相当于母公司一天的产量。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的制造商干得不错。不过人们不该忘掉他们中很多人会否认的一件事，即这里的劳动力大多数受过教育、有适应能力、负责任（尽管不习惯于顺从）；如加尔布雷斯<sup>①</sup>在澳大利亚时提出的，对于自动化时代的问题，由于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不存在社会和种族等级，他们可能在根本

---

① 加尔布雷斯(1908—)，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又一个特点。董事之间有一种伙伴情谊、兄弟情谊，他们铁了心要保持董事会的现状。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是，有时寡头集团的利益会凌驾于它们控制的公司的利益之上。

美国式的高层经理人员在董事会议室实行管理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公司的主要突破靠的是一些专业顾问，多半是会计师或律师（在美国，这些人往往雇来提供意见而不是当董事），而这两种人几乎都特别地不适宜于作大胆的经营决策。他们更适宜于评估别人的决定。让他们加入公司董事会有时会强化董事会的保守主义。不过，也有会计师帮助维持了公司的生存的著名例子。当然，有些董事极其能干，但他们经常在十多个、甚至更多的董事会里兼任董事职务。在 60 年代初期突如其来地破产的一些公司的董事会里也有一些能干胜任的董事，但他们似乎太忙而未能认真地监督委托给他们监督的公司的事务。

除非至少部分地消除这几乎像种姓制度似的一套，并像美国一样，代之以专业精神、对公司的忠诚以及对效率的追求，否则很难看出企业怎么能兴旺起来。

在这个安逸舒适的世界横冲直撞的还有罗宾·博伊德描写过的那种“强人”。他说：“他们不是可敬的澳大利亚金融和工业之父，那些人通常年纪要大上 10 多岁，非常地保守；也不是 30 出头、在互相信任的轻松气氛中开始事业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些抱负远大、通常精明能干、意志永远坚强的能创造奇迹的人；是旅行得最多、尤其是去美国最多的人；他们爱把豪华车开得飞快，也总是逼着自己拼命干活；他们清楚他们的工作态度是非澳大利亚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澳大利亚一直迫切需要的真正的救星。……他们全是在这个世纪出生的，年纪最大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岁月里读完中学的，年纪最小的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成年的。……他们比以前任何澳大利亚管理人员都更重视国际标准，尤其是美国标准。不过他们依然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对出自澳大利亚的主意疑虑重重，对花时间完善任何主意缺乏耐心。他们是澳大利亚发展史上一段压抑、没有幻想、呆滞萧条的时期的罕见地活跃的产物。他们知道在单调乏味的学校、大学或学徒期间的无精打采、没有冒险精神的同龄人中间，他们与众不同。很久以前他们就养成了凡事都靠自己的习惯，…… 所以他们惯于做所有的决定。……他们对澳大利亚的信心始终局限于对自己的信心上面。”

澳大利亚的成就很多得归功于这些人。他们以忙碌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为最大的快乐，他们对事物的复杂性熟视无睹，所有这些使他们在一系列冒冒失失的随机应变中勇往直前，并加快了社会的步伐。是他们塑造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形象。对他们的批评是，他们的态度从前是有用的，但在现在则可能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当今掌权的 50 多岁或 60 出头的人，他们成熟的时期跟今天的差别太大了，他们年轻时的经验在他们面对新问题时也许会严重地妨碍他们，但他们照样自顾自往前走。他们可能看不到简单定义的重要性，不能形成面向未来的思想和方针，不能把行政管理的工作委托给别人，不能制定规划，不能鼓励专业人才，不能支持深刻见解、首创精神和协同工作。对一切都企图靠自己干的人来说，这种工作往往太重大了。他们可能不理解技术时代各种可能性的日益扩大的范围和各种业务问题的新形式，即尽快地利用现成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以获取利润。澳大利亚式的工商企业家可能赶不上技术进步造成的发展势头。

尽管工业化不断发展，澳大利亚严重缺乏从工头到总经理的胜任的管理人员。这个国家不是很看重能力的。训练、晋升、

选拔的过程往往取决于其他标准。求实主义的精神意味着在建立管理人员培训体制方面起步相对较慢，不过随着工业界的“少壮派”准备接管责任，对管理课程的兴趣现在增加得非常快。那些占据高位的人（其中一些年纪非常大了）或许本能地在抵制创造一个最终会证明是不可战胜的、新的社会阶级。许多企业遇到的困难并不总是由于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造成的，有时是因为在企业高层管理班子中没人读过一本书。

人们可以争论说，哪怕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在研究开发方面的开支继续保持低水平，澳大利亚制造业继续得到免受外来竞争影响的保护，都没有关系。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还是会相当舒适，他们照样能用当代的蹩脚艺术品填塞他们的住宅，所以为什么要担心呢？新式车窗雨刮的设计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在英格兰举行的一个关于研究和开发的充满批判精神的讨论会上，澳大利亚确实被列作为一个国家的例子，对它来说，租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比它自己构想出东西来更经济合算。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太少（人均比例只是英国的一半），有人建议说，由于这种人供不应求，所以最好把他们用于开发别人的研究成果。对这种看法的回答首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应该翻倍。在澳大利亚不仅研究薄弱，开发也是如此。应该至少大大增加这方面的开支。如果科学家和技师的数量增加了，能满足需要了，从国外租用主意就不一定便宜了。澳大利亚的制造业自然不必自己想出它要生产的每一件东西，但如斯塔布斯<sup>①</sup>所指出的，人们应该记住，许可证费要占到消费品生产成本的1—5%。在1965年的澳新科学发展协会

---

① 斯塔布斯(1937—)，经济学家。——译者

(ANZAAS)研讨会上提交的一篇文章里，斯塔布斯估计，一个耐用消费品制造商每年得为生产许可证花 60 万元，另外得为设计翻译花 10 万元，而这笔钱足以建立一个有 38 个合格的工作人员和 65—70 个辅助人员的研究开发部门。还有，研究开发部门的支出是固定的，而许可证费则往往随着销售的增加而增加。支持本地研究更强有力的理由是，澳大利亚在某些方面——主要是基础工业——特别在行。如果在研究上面花一点钱，在开发上再多花点线，将强化这一进程。如果本地的工程和设计能为耗用更多的金属提供机会，澳大利亚效率很高的钢铁工业和其他金属加工工业也将会更加发达。它的煤矿工业的资源可以转化为具有出色的研究开发能力的经济实体。问题在于，只要澳大利亚继续只能培养按人口比例数量很少的较高学位的理工科毕业生，以上这些进展就不大可能发生。澳大利亚这类毕业生的人均比例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在每 100 万人口中，澳大利亚只有 20 人，英国有 50 人，而美国有 388 人)。随着科技的发展，如果不在本地人才身上花更多的钱，很难想象澳大利亚怎么能够维持哪怕在它在行的领域里的地位，连它怎么能执行来自国外的指示也很难想象了。

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的派生性造成的社会后果也许更重要，因为它很可能导致一个愚蠢的社会、一个在熟悉的环境里坦然自信而在生疏的环境里就忐忑不安的幼稚的社会、一个不能对危险作出反应，不能自作主张的社会。在澳大利亚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商业化标准渗透到所有的权力和决策领域，凭这么少的有创造性的人才就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的事因此很可能使人晕头转向，忘乎所以，从而丧失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作出有独创性的决定的能力。澳大利亚人没有因为相信谁也不必为繁荣富裕而辛勤工作这一古老的殖民主义信念而遭殃，但他们确

实相信谁也不必为繁荣富裕而殚精竭虑，这种信念很可能影响到他们对许多别人无法从海外为他们作出决定的事情的态度。要是澳大利亚是爱达荷<sup>①</sup>，那么不管这种信念多么愚蠢，都不会影响它的前途，可惜它与爱达荷远隔万里。

## 广阔的天地

澳大利亚的一些农产品市场在萎缩之中。在朝鲜战争造成的繁荣之后，贸易条件开始不利于澳大利亚（从总的的趋势看，贸易条件不利于澳大利亚已经有 50 年了）。60 年代初，羊毛受到合成纤维的威胁，小麦受到全球供应过剩的威胁，水果和乳制品受到共同市场的威胁。

随着发达国家食品生产不断地改进，澳大利亚的食品生产者变得越来越担心，因此生产越来越多的食品。与此同时，食品进口国因为战乱频繁而忍饥挨饿，能付得起钱的国家则自己生产更多的食品。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以及发达的英联邦国家都有一定的食品剩余，而这些剩余的幅度很可能会加大。除了肉类，澳大利亚担当的世界富裕地区食品供应商的身份看来正处在危险之中。

令澳大利亚担心的是，影响世界食品贸易前景的主要决定因素多半是政治事务，如国际商品协议、计划经济国家（主要是共产主义国家）无从预料的决定、其他国家同样无法预料的政治决定（如补助法国农民的愿望或美国的配额制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偶然事件（如古巴食糖）。澳大利亚充其量能做的，是希望所有食品市场的底线不一下子全面土崩瓦解，同时鼓励农民在可

---

① 美国西北部州名。——译者

能的情况下改变生产的品种。有人建议一种相当刻薄的解决办法，即在进一步加强工业化以减少进口的同时，增加人口，这样澳大利亚就可以吃掉自己的食品剩余。

另一项主要出口产品羊毛的前景似乎比较可以预测，然而，随着合成纤维的发展，这个原来可说是极有把握的年产值 70 亿元的行业萎缩了。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羊毛生产者总是确信长远的前途是光明的，尽管会有许多短期的担忧。羊毛在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占着支配地位，而澳大利亚羊主宰着世界的细羊毛市场。美利奴<sup>①</sup>公羊是国家繁荣、甚至是国家完整的象征。好几代的澳大利亚人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崇敬狮子、鹰或其他好斗的民族主义象征，而要崇敬绵羊。今天的牧羊场主的祖先们当年带着几匹马、一点面粉和糖、一辆牛车、一群绵羊、加上一条狗，闯进荒野，从简陋的树皮棚起家，积累了大笔财富，过上了气派的日子，并在澳大利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他们的王国却支离破碎了。

羊毛市场的危机也许是虚惊一场。要是某个从事蛋白质研究的人出了什么岔子，转而去生产再生羊毛纤维，羊毛可能会死路一条。这种事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发生，但在目前，尽管合成纤维的产量已经超过全世界羊毛的产量，而且价格在下降，世界上对羊毛的需求还是在随着工业效率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增加。合成纤维的优势在增加，但同时对化纤和羊毛的混纺纤维的需求也在增加，所以对羊毛的总需求更大了，哪怕羊毛在整个纺织品市场上只占很小的比例。澳大利亚羊毛生产者应该为销售和研究花更多的钱；他们肯定应该更重视羊毛的质量和分类的标准，这两方面都在退化。但他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出售羊

---

① 原产西班牙的羊种。——译者

毛,而在于从出售羊毛中赚钱。他们的成本在一个受保护的经济里不断上涨,却无法在世界市场上把钱挣回来。看起来羊毛的市场还是有的,只是生产羊毛越来越难赢利了。失败的羊毛生产者也许可以转为生产肉类。在过去的 10 年时间里,澳大利亚的牧羊场主生产的羊毛比原来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但他们卖到的价格却跟原来差不多,而生产成本则增加了大约四分之一,加上这段时间里相当幅度的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尽管生产增加了,羊毛生产者总的实际利润却减少了。这种情况因为鼓励大牧场分解而变得更糟糕。从前一个大牧场的地方现在有时多达 12 个牧场,而每个小牧场支出的管理费用几乎跟原来的大牧场一样多。

海外投资者打入羊毛工业并使之合理化,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如果真的发生,澳大利亚将会非常丢脸,因为美利奴羊毛的生产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真正有重大意义的创新之一。

在畜牧业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是澳大利亚人重视的领域,水平是世界级的。只是做得还不够。成堆的问题等着从事研究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去解决。要是有更多的科学家,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是澳大利亚经常为世界知识宝库作出贡献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如果为研究项目提供的资金更加慷慨一些,会有更多的专家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澳大利亚来。

还应该有更多的针对农场管理问题的第二个层次上的、主要在基层地区进行的研究。而现在各州的农业部都人手不够,没有足够的农业技术院校,地方上没有足够的技术推广工作,没有足够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农民去迅速而聪明地利用研究的成果。此外,尽管有出色的研究工作,还是有抵制新方法的现象,一是在富有的业主中间,因为缺少培训或是对社会地位过分敏感,有时会妨碍他们接受专家的意见;另外是在不很成功的农民

中间，缺乏教育和资金使研究失去了意义。在乳制品行业，如果所有现成的科学知识都用上，并将太多的小牧场加以合理归并，也许可以减少将近一半的劳动力。

虽然大约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位于热带地区，但只有不到3%的澳大利亚人住在那里。有一派观点认为这没有关系，这种观点认为，把奇缺的资金和人力投到澳大利亚的其他部分比同等地区投到北方会带来更大的发展；开发北方必须要有昂贵的辅助规划；北方即使能生产出东西，能否有市场还大成问题，因为其他生产这些东西的国家的效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在北方不大可能实现真正的生产多样化；投资旅游业也许更合算（“请来参观空旷的大地”）；北方没有开发是因为根本的经济上的原因，即那里不值得开发，而不是政治上的忽视。

铁、铝、银、锌、铅、铜和铀矿的发现已经推翻了上述部分论点。不管愿意与否，主要依靠外资，加上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一些基本设施，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了孤立的开拓型社区的发展。养牛似乎是北方的“自然而然”的行业，现在由于有了成本低廉的带多节拖车的汽车运输而更加有利可图。对开发规划还有要求增加种植水稻、棉花、花生、烟草、亚麻、红花草和牛饲料的压力。一些开发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但它们之间没有协调、没有连贯性，更没有一个像美国国会1902年通过的“国家开垦法”那样富于想象力的规划。由于美国西部17个“灌溉州”逐步的成功的发展，那项法律对美国的影响据说“跟内战、公路的发展或飞机的问世一样大”。移民工作也没有和北方的开发潜力联系起来。运输肉牛的公路的修筑进展缓慢。法国技术公司的工程师认为金伯利海岸潮水的大涨大落有发电的巨大潜力<sup>①</sup>，那是

---

① 指潮汐电站。——译者

“每年几百亿度的持续的廉价电力”(目前西澳的发电量是10亿度左右)。我相信像这样的规划总会有机会实现的。

反对开发北方的人完全根据其经济上的分析。但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当他们想到这点时),这么少的人生活在北方,这么多的资源基本上得不到利用,在道义上好像是不对的。有人担心如果澳大利亚不为其北部地区做点什么,它就不能真正声称这个“大陆”是它的;或者对北方的忽视会在亚洲引起敌意。我们需要的是能为澳大利亚的生产锦上添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花很多的钱仅仅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需要大量的规划以协调移民、商业计划、乡村开发和服务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澳大利亚人不肯勇敢地面对的是,如果真要使北方地区人口稠密起来,光多种点庄稼、多养点牛、多从地下挖出点矿物来是不够的,光发展初级工业是不够的。那将要求新的大镇大城,这是唯一能确保人口大量增加的方法。“开发北方”实际上等于是要创建国家的另一半。

## 工 会

如果一个澳大利亚的普通工会会员雄心勃勃,他能干什么呢?(假设他不是个“极端主义分子”,甚至也不特别能干,只是一个普通的想当个工会干部的“温和派”。)首先,他必须学会怎样在工会会议上谈论工会事务。他越是显得亲近随和、谈的事情越婆婆妈妈,他就越容易得到信任。他可以谈论肮脏的厕所、阴暗的午餐厅、热水龙头出冷水之类。他得提防其他工会的成员染指被他的工会视为特权的工作。他也许会学到有关在他的工会里吃香的政治口号的有用的知识。他不走得太前,也不落得太后;不太“右”,也不太“左”。他还会参加当地的工党支部。

要成为一个组织者，他现在得争取选票。假如他能赢得控制他所在工会的人的青睐，那些人也许会为他争取选票。假如他是一个“造反派”，他可能就得准备被别人说服。如果能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侧面的支持，他也许会加以利用。一旦成了组织者，他就得学会如何跟资方人员谈话，哪怕对工业法或本行业的情况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要是有能耐，他会学会，只是可能很难，因为没人教他。他或许能依赖政府督察员和工业委员会的支持以完成他的大部分工作，并靠耍弄阴谋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成了某种确保本单位遵守仲裁委员会规定的警察。如果他威胁的次数足够多，雇主就会让步，或者争端会被提交给某个委员会。他一辈子都得见风使舵，紧跟所属工会的政策。要是当上了工会的书记，他可能会逐渐失去对工会事务的兴趣，喝过多的啤酒，以穿得比他的会员更马虎来强调他的改革使命。他对州里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兴趣也许会变得比对工会的兴趣更大，并从中体会到权力和目标的意义。如果运气好，什么人或许会给他一个去俄国或美国旅行的机会。

这可能有点像讽刺漫画。在工会运动里确实有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有许多能干的人，有若干杰出的人；但上面所描写的那种也大有人在，他们委琐、保守、不怎么在行。

除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有在所有民主国家中最高的工会会员比例；澳大利亚的工薪阶层比任何国家都更早地享受更多的带薪休假。尽管如此，大多数工会会员通常对工会毫不在乎，在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工会的活动；极少有人参加工会会议（与工作有关的会议出席率高些）；工会选举的投票率不到一半人数（有时还要少得多）；交工会会员费经常拖拖拉拉。他们最大的热情往往表现在举行“非正式罢工”或进行抗议以反对行业里的什么人不跟工会商量就擅自行动，或违抗工会的时候。只有这类活动对工会

会员还有点意义。可是,也许就是同样这些对工会毫不关心的人,会回到在城郊的家里,换上衣服,然后跑到当地的俱乐部里去劲头十足地担当组织的任务。他们对工会的冷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工会的意识形态与澳大利亚人如今过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一种抗议。工会在现代澳大利亚人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买房子、养育孩子、度假——上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大多数工会在组织上软弱外行。太多的小工会想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不到 2000 名成员的工会可能得负担 6 个州干事和一个全国总部。工会干部的薪金菲薄。除了规模最大的,一般工会都无法维持专家和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许多能干的人都因为工会资金不足而无所作为。人们经常看到,没有老板和政府所属专家的辅助,聪明干练但劳累过度的工会书记不得不尽力胡乱应付;他的大部分时间可能只是花在管理办公室、写回信、筹备会议、提交报告和管理账目上面。州分部实力比全国执行委员会强的工会往往重复花费本该集中在后者手里的管理经费。没有训练工会干部的规划。对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厌恶毁掉了工会运动。工会干部常常被在社会上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排斥在外,也跟自己的成员的思想脱节。他们中许多人鄙视乐意帮助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对他们会员的无动于衷毫不在乎,对哪怕通过抱怨诉苦以吸引基层群众参加工会有意义的活动的尝试也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喜欢基层群众的无动于衷,因为那样就不会有来自会员的“干涉”。在一个大家都漠不关心的工会里,他们在安排连选连任上就不会出岔子了。

要是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工会干部的素质在每况愈下。在工会历史上比较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在工会里谋个一官半职是有才华但没有出道的年轻人使自己崭露头角的途径之一;而现在他可以争取大学奖学金,成为专业人士,或者进

入企业或政府部门。除非是受政治动机驱使,如今让一般人作出牺牲的吸引力很弱了。从前那种让人感到可以为之献身以求改变的工薪阶层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境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工会得以保持大致良好的运作,从而能给予工会主义者一种成就感,靠的是仲裁和调解委员会以及州政府不时的干预。谁也无法预料这一大堆十分复杂、动辄引经据典的机构的意向。有各州的、也有联邦政府的仲裁和调解委员会。联邦政府的委员会通常确定方针,但州政府可以直接立法。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政府好几次制定了有关每周工作时间、年假、长期服务假的新立法,迫使其他地区照章办理。这种混乱状态意味着澳大利亚全国到处都有经济计划部门。

联邦仲裁委员会在行业管理方面的权力据说比任何其他机构都大,但它的成员只是些法官,他们做决定时是不管政府的其他政策的,也都不是主管领域的专家。这个具有准法律地位、事实上的主持规划的权威机构在 1961 年宣布:“我们不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或计划的制定者。”它没有经济情报部门的指导,常常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处理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有,在它的 3 份裁判书中不一定具有经济上的一致性。有时人们说,能从这个委员会的裁决中发现的唯一贯穿如一的特点,是一种充分说服争执各方维持仲裁制度的愿望。

仲裁委员会的诉讼墨守法规,但经常把专家证人排斥在外。争执各方的要求有时离谱得惊人(如在 1964 年关于基本周薪的听证会上,工会要求每周增加 5.20 元,而雇主只肯出 0.60 元)。“争执各方都会尽力证明对方的专家证人是不称职的,是在说谎,是骗子”。仲裁人极少讨论或调查专家递交的证词。他们有时会引用一些经典(包括当事方特意发表在经济期刊上的文章),有时会引用像占星术曲线一样非专家不懂的生产率数字。

澳大利亚的经济规划简直就像被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取代了。

其他国家也会因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定而弄得焦头烂额，不过它们通常不至于设立这么多的机构来自讨苦吃。在澳大利亚似乎有种信念，即如果行政程序有足够的法律上的包装点缀，就好歹能提供某种“公平对待”。这种“公平对待”其实跟其他任何裁决方式同样主观武断，只是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冠冕堂皇的话听起来不一样。劳资双方都对这个制度持怀疑的态度。订立集体契约的方式可能使谈判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劳资双方对协定更有信心。但是，要使这种方式真正有效，还得提高工会干部的素质才行。

整个仲裁制度目前可能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越来越多的专业集团也在利用它。很难假装说一个准法律性质的委员会有据以判断一个专业工程师或一个拉丁语教授“值”多少钱的标准，而这些委员会却在试图作这样的判断，结果是强化了薪金急剧上升的趋势。当政府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工资大涨时，他们的收入会比部里主管还高；要是各部主管随之给涨工资，部长和政治家们也得涨；而要是他们涨了，社会上其他人就会要求再涨一次。既然政治家能这样做，他们也可以。人人都能轮到“公平对待”的机会。如果专业和白领协会真的企图利用蓝领工会在仲裁制度里的战术，他们可能会最后毁了这个制度。世界上没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自动补偿工资制度：一旦某个集团涨了工资，所有其他集团都会来申请。现在，那些本来每年也许就可以增加 2000 元工资的人也来搅和，他们会把这个制度弄得十分荒谬。

在澳大利亚，工会本来是有几件事情可以做的，但它们却置之不理。它们通常不像美国工会那样关心为自己的成员提供一般的社会福利；极少有关于在行业中组织联合磋商的讨论；极少有为人们花费较多时间的生活领域引进民主而进行尝试的讨论；

没有一个就业政策；对生产率只是纸上谈兵。工会至今取得的成就中有些只是骗人的把戏，如工资增加有时是虚假的，因为物价也提高了。工会会员们真正想要的，甚至比增加休假时间更迫切的，是更高的购买力。目前已有若干小规模的奖赏制度，雇主同意在周薪之外发奖金而不给额外假期。30来岁的人如发现自己有资格休3个月的长期服务假，他们往往是宁可拿钱的。

墨守老式同业小工会的陈规使行业间处处是排他性的限制；而工会之间大量关于某项工作该由哪个工会的成员承担的争议，以及由此造成的恩恩怨怨，也大大削弱了工会的实力。澳大利亚工会运动有所发展、有所成功，但它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体制上的薄弱。雇主们是在行业的基础上抱成团的，工会也试图这样做，但它们的说服力却差得多。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是所有蓝领工会（包括60年代加入的、有18万成员的强大的澳大利亚工会）与资方谈判的代表，可它却穷得可怜。它总共只有4个干部，工资很低，却要处理近百万成员的事务。它的年收入只有4万元多一点。它对成员工会的控制力纯粹靠外交手腕，时强时弱。在有工党政府的州里，工会领袖可以通过他们掌握的工党机器，为他们的成员争取休假、补偿、工作条件等方面优惠条款。这是他们最大的实力所在。他们其他的成就主要出于社会制度而不是工会出色的工作或它的实力。

要理解澳大利亚工会运动，人们必须认识到共产党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共产党只有3000多一点的成员，同时它的成员在减少之中。这是一个高度宗派性的党，经常内斗不止，而不时抛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则是权力斗争的迹象。在各州分部之间、在它的个别知识分子和工会积极分子之间，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它在州和联邦选举中能得到的选票不到1%。它信奉的教条往往跟普通澳大利亚人的愿望和态度

相差太远而显得荒唐。它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有时使它彻底失去平衡。它有一些聪明能干的人，但大部分成员的素质非常平庸，全靠不断改变党的路线来维持士气。它分裂成了亲北京派和亲莫斯科派。然而，由于它对工会运动的渗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党某些部分的影响，它是澳大利亚的一股势力。

澳大利亚共产党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才能，它的工作人员比所有政党的加在一起还要多。一些共产党工会干部是凭效率赢得他们的地位的。不过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它自己的实力（尽管它肆无忌惮，但真要是碰上个强劲的对手，它是会被消灭的），而是利用了它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弱点，如工会会员的冷漠态度，基层和领导层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工会的大部分意识形态陈旧落后和老式的情绪上的“左倾政策”过时，一些工会干部的懒散和无能（这些人靠着共产党组织的支持而保持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党得以成功。

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里，共产党人有时控制着将近三分之一的选票，有时控制了整个“温和派”的选票。凭着这种实力，他们足以影响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活动的内容。例如，1959年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上总共有222项决议，但它们只来自30个成员工会；而在这30个工会中，8个由共产党控制，12个受共产党影响。所有这些决议的精神是与共产党在大会之前几个月里采取的方针一致的。

这种状态造成的气氛最典型地体现在动摇了整个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的为出国“旅行”而收费的问题上。那时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主席是艾伯特·蒙克<sup>①</sup>，公认的工会和孟席斯政府之间

---

<sup>①</sup> 蒙克（1900—1975），1934—1943年和1949—1969年任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1945—1949年任该组织的总书记。——译者

的掮客，一个跟罗伯特·孟席斯爵士一样经验丰富的政治上的不倒翁。作为赏赐制度的一部分，由他分配免费出国旅行的机会（俄国、中国和美国政府也分配这样的旅行机会）。在 1956 年的一次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派两个人去中国，但遭到了反对；然而当代表团增加到 5 个人时，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在那以后，几乎所有执行委员会成员都免费去了俄国或中国，或者两个国家都去了。蒙克自己出国旅行了 50 多次。当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决定向成员强制征款以资助澳大利亚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互访时，直言不讳地反共的工会造反了。17 个这样的工会，包括强大的钢铁工人工会、秘书工会和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因拒绝被征款而被排斥在 1961 年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全国代表大会之外。共产党人悄悄地处理了这事，因为要是工会理事会垮掉了，他们就会失去可以施加影响的主要的“群众组织”。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在好几年里，这一争执是工会运动主要担心的事。

共产党的渗透使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的改革更加困难。共产党人是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往往决定行动的步骤和言论的基调，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使工会事务带上了一种 19 世纪的色彩，而无助于重新界定工会对其成员所负的责任。最干练的人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上了。在共产党人和工党人士在某个特定的工会里分享权力的过程中，一些工党的工会干部成了共产党人的俘虏，从而替他们干活了。

## 掌 权 的 人

### 谁统治着澳大利亚？

没有证据表明有一小撮人——当然不会是整个“阶级”的人——在澳大利亚说了算。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有这么多互相冲突的势力范围的社会里(这些势力范围又进一步分割成各州的势力范围)，很容易证明那种社会上有着严密的阴谋集团的理论是不真实的。许多在澳大利亚拿主意的人根本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

国家大事总是充满着反复无常、混乱、误解。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创造出种种模式，以便赋予他们神秘荒谬的决定以某种连贯性。他们想在别人面前掩饰自己的困惑糊涂，也想蒙骗自己。他们给自己套上个光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那些不位居要津的人也多半会为这些决定制造假象(制造英明决定还是邪恶决定的假象则取决于各人的口味)，制造一种使事件显得远比实际发生的更合理更协调的理性的幻觉。

这些诡秘而难以理喻的做法不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优点。许多澳大利亚人把生活看成是混沌一团，至少是像抽签中奖那样

全凭运气。随着大规模消费的普及，他们显得越来越不倾向于把生活看成是个巨大的阴谋活动，尽管一些社会主义者还坚持这一信念。澳大利亚人变得不再关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既然结果看上去还不错，他们就听其自然了。少数人还在寻找阴谋的迹象。当然，社会上是有阴谋的。但人们常犯的错误是把许许多多不同的小阴谋误以为是一个大阴谋。确实有些权势显赫的澳大利亚人爱密谋策划、玩弄权术，其中有些人彼此相识，有的甚至在一起共事；确实有人在幕后操纵，有人出头威胁恐吓。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够不上大阴谋。有的只是一些个人或团体在这里那里较劲。到目前为止，各州之间利益的严重分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以及宗教上的差异，使包容一切的大阴谋根本不可能得逞。说在澳大利亚社会有个自行繁衍不绝、有一致的意识形态、垄断着所有特权的阶级是非常荒唐的。

人们在澳大利亚见到的，是雨果·沃尔夫森在《异见》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的“平庸的制度化”。澳大利亚有地位的评论家和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至今仍然经常为公众场合确定基调，他们的影响巨大，连不相信他们的公众人物有时也觉得非重复他们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胡扯不可。而这些人的保守的生活准则其实只是对“英国 19 世纪上层阶级男人仪态的大致上三流的模仿”。是这种公众场合的着迷于无聊事物的陈词滥调，而不是任何精心策划的阴谋，仍然在束缚着澳大利亚。而人们也不知道取代它的将是什么。

## 学自美国的联邦制

澳大利亚的独立国家地位不是通过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或内战“贏”得的。如果愿意，它可以比实际上更早就成为一个国家

的。在 19 世纪末，6 个分散的殖民地开始谈论组成联邦，无组织无条理的辩论断断续续进行了 20 年。最后有了个公民表决，60% 的澳大利亚人投了票，有选举权的人中共有 43% 投了赞成票。于是在 1901 年 1 月 1 日，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为了大英帝国永恒的荣耀”，建立了一个美国式的、中央政府软弱而各州保持强烈独立传统的联邦。如今还活着的许多人出生在一个在州界上还设有海关口岸的澳大利亚。根据官方文件，澳大利亚直到 1915 年 4 月 25 日才获得完整国家的身份，在那一天，澳大利亚的士兵以强攻土耳其的安扎克湾协助了在加利波利的登陆。似乎获得国家独立的整个过程太容易了，只有到死了人——尽管风马牛不相关，而且是在一个次要的、失败的战役里——澳大利亚人才感到他们赢得了进入世界的资格。有关澳新军团的传奇在 20 世纪澳大利亚人的信念中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若干原因之一。

虽然澳大利亚的联邦结构取自美国，有一个众议院、一个参议院，加上一个解释宪法的联邦法院，但它的 6 个州早已采纳了英国式的议会政府制度，联邦法院的运作也跟美国不同。美国宪法保障人权，而澳大利亚的立国过程则不带有 18 世纪时那种关注人权的痕迹。也许某些人权在澳大利亚比在美国更充分，但在天赋人权的宣扬方面，澳大利亚很差（澳大利亚更重视对民主的宣扬，而不是对天赋人权的宣扬）。在澳大利亚的宪法里没有对人权的书面保证。由于澳大利亚宪法是份简短草率、极其乏味、不包含有任何可以不证自明的伟大真理的文件，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未能扮演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的角色。宪法中唯一一段真正允许大量阐释的文字是保证州之间自由贸易的第 92 节。

澳大利亚人对地区的关注和忠诚比美国人还强烈，这种关

注和忠诚在社会生活中几乎从不受到质疑。与华盛顿相比，堪培拉是可怜巴巴的。澳大利亚也没有纽约那样为国家领导时髦新潮流的大都市，没有公认的相信会发生重大事情、看上去更适宜于居住的中心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不仅是英美两大强国的一个省份，它自己也是由 6 个省份组成的。而这些省份彼此之间绝不承认某个都市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城市更重要些。澳大利亚极少有全国性的大事。澳大利亚人看待国家的态度大致上就是他们看待自己所在州的态度。几乎每个全国性的机构组织，如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工会、大的压力集团、教会以及私营企业，都会体现出各州间的分歧和冲突。跟在美国一样，不了解一点各州政党风格上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压力点所在，就无法了解澳大利亚的国家政治。在工党因内部分裂而遭到损害的那一长段时期里，只有了解在各州掌权的派别，才能理解他们那些否则看上去有悖常情的忽略公关和“形象”的做法。澳大利亚各地区党的小小的核心组织比美国的更强有力。不像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里各州在大会上的表决票数取决于各州人口的多寡，在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最小的州与最大的州有同样数量的选票。在堪培拉的国家内阁里，各州必须有几乎确切的代表比例，这就造成有时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傻瓜。

中央政府的权力和重要性自 1901 年以来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宪法上的修改比看上去该有的少得多。不过，各州剩余的权力还是阻碍着国家计划，或者可能阻碍国家计划。这个问题多少年来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压根就没搞多少国家计划。从现存的体制中也许能比已经试过的挤出更多的东西来。在 1959 年，各党一致同意，中央政府需要更大的权力以进行合理的经济规划；然而，政府却不采取这一选择，而是把这事付诸公民表决去决定。联邦权力的问题在意识形

态倾向更强烈的 40 年代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自 1944 年的要求授予联邦政府 14 种权力的公民表决被击败以后，这种激动逐渐平和下去了。社会上还有着主张统一全国制度的人和强调州自主权的人，但是面对一个不想惹是生非的政府，这两派人都无用武之地。有人担心万一再需要他们时，双方都会变得老朽不中用了。

虽然对联邦政府在税收、贷款以及花掉贷款的权力方面的控制恼怒不已而又无可奈何，各州政府依然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压力集团。州里的问题，尤其是地方上的就业问题，很可能决定联邦选举的结果。在每年的州长年会和贷款委员会会议上，联邦总理看到的不仅是各州的部长和他们的随员，而且是分成 6 大块的、经济利益高度地区化的澳大利亚人民。以本书这样的篇幅是无法描写各州的政治的，因为每个州的党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问题。不过，一旦上了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倾向于以尽可能于己有利的方式重新划分选区，以便能承受除了最大幅度以外的任何支持率的波动。有时是党内的分裂，而不是选票的丧失，会导致一个稳固的州政府垮台。

6 个州政府掌握许多直接而明显地影响普通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权力，如子女的教育活动、对刑事法规的控制、对交通、购物、休闲活动的管理、有关城乡发展的各种决定、以及其他许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此外，州政府还为全国一千来个地方政府的活动定调，因为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向来软弱无力（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是各州在本世纪初发明出来的，州政府把软弱的地方政府的模式强加给人民，而人民至今仍似乎对地方的独立性无所谓）。各州政府目前享有许多权力，只是不能自行集资。澳大利亚总有一天得再次处理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解决州政府的问题。

## 学自英国的议会制

人们很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澳大利亚，议会的重要性现在主要表现在礼仪形式上，别具特色的议会这一部分在澳大利亚民主制度中的意义不大。政治领袖通过他的政党而获得政府的领导权，然后利用他的地位以及政府要职的任命权驾驭、或试图驾驭他的政党机器。而反对者则试图通过政党机器以影响其领袖的政策。在这种权力结构中，议会是次要的；政治变化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是通过政党实现的。

个人在政党内部的权力不是凭对广大党员的强烈感召力而获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广大的党员。党的支部很小，除了个别的以外，都是奄奄一息。在党内的权力通常是凭阴谋和操纵获得的。对立的政党组织必须参加定期的议会选举，除此以外，所谓议会代表人民的概念只是澳大利亚公众生活中的一种虚构，就像除了在礼仪上，议会与联邦和各州的管理有任何特殊联系的概念一样。实际情况是，人民有否决权，他们可以以让某个政党执政的代价，使另一个政党在野。而一旦一个政党掌了权，它就会把议会用作立法和宣传的机器。

对行政当局的独断独行的制约虽然相当严格，但主要来自议会以外。有政党组织内部的制约、来自各种压力集团的制约、公开报道和揭发的制约（在这点上议会起某些作用，但恐怕不如媒介的作用大）、定期选举而造成的制约以及宪法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的制约。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制约不少，虽然像美国国会那样更了解情况、更活跃的立法机构也许能提供更好的制约，因为它能通过各种委员会获得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在澳大利亚几乎完全欠缺的是使政党生气勃勃的渠道。澳

大利亚的政治结构倾向于僵化保守。

议会于政党的健全强壮全无作用。由于政党之一控制着议会，而行政当局控制着该党，所以澳大利亚的议会对行政管理没有任何议会该有的影响；除非像有时发生的那样，上议院在反对党控制之下。但这仍然并非议会的制约，这是政党组织的制约。

议会生活的极端沉闷，它在政治上的无足轻重以及那些陈旧的仪式，使许多本可成为优秀行政人员的人躲之唯恐不及，也使许多希望获取有关信息以研究政府的运作过程（从而可能成为优秀的议会议员）的人躲之唯恐不及。正当壮年的有才干的人通常是不会准备作出牺牲，去日复一日地听一遍又一遍几乎满是蠢话的发言的。议会总是激烈地辩论是否通过每项议案，好像还是由 18 世纪的乡绅组成似的。这种大吵大闹，加上政党纪律的要求以及议会候选人总体上的水平低劣，造成了在“辩论”方面世界级的平庸陈腐。我怀疑世界上任何地方议会上的演讲水平会比澳大利亚的更低。

除了那些只要摇唇鼓舌就会产生快感、专爱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澳大利亚议会议员的生活只有在他的选区内才会有实际意义。在那里他可从事一项有用的工作，尽管相当琐碎。他可以替选民争取电话、工作或养老金；从大处上说，就是设法操纵政府的部门。他有时能纠偏改错；但更经常的是，在为某个选民争取到某种特权的同时，他可能造成了对其他人的不公正。

澳大利亚的议会有一个本质上的弱点，即它们没足够的事可干。由议会议员组成行政当局的制度也有一个本质上的弱点，即大多数议会议员并不是出色的行政人员。有些人准备长年累月坐在议会会议上，参加那些千篇一律的仪式，以便最终能得到犒赏而在行政班子里占一席之地，但这种人不大可能是杰出的政治领袖。而那种可能成为杰出领袖的人则发现在公职方

面要得到快速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不做尝试。

在澳大利亚仍然有人在讨论宪法改革的问题，只是多数人讨论关心的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极少有人探讨对议会制度的彻底改革。假定澳大利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定会宣布成为共和国，人们至少可以希望，在那以前，在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以及如何更民主地利用它的议会方面会有所辩论。美国式的总统制政府也许会是那时考虑的制度之一。

如果澳大利亚的总理地位稳固、能够操纵自己的政党，那他就会拥有美国总统所没有的权力，即整个立法机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尽管他没有同样的任命权）。在理论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主要区别是，澳大利亚总理控制他的议会党团，虽然实际上并不一直如此；不管如何，这种制度除了对那些在党内争权夺利的派别以外，对其他任何人是否有好处是大可争论的。如果他像美国总统一样，是被任命的，并被要求组织一套班子以管理政府，就可能好一些，因为那样就会使他失去对他的议会党团的控制，把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而议会则有责任了解国家所有的事务，对其中的一些加以立法，并作为国家的良知而行事。

在政治上是没有理想的“解决办法”的，这个办法也有其危险性。但是，通过从议会以外任命优秀的管理人员参加行政当局，将造成政治生活上的突破，并强化行政管理；同时，它能使议会扮演更强有力的民主的角色，而当议会与行政当局紧紧捆在一起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总理能从全国选择干练的管理人员担任内阁部长，假如议会能仔细考查当局在干些什么并开始行使其在目前纯属虚构的立法大权，那将对澳大利亚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之一是政策制定的过程总是出

现发生故障的趋势。因为一个领袖或多或少控制着他的议会党团以及整个行政系统，谁也无可奈何。政治制度需要有能识别出哪些问题应作出哪种决定解决的种种方法，以及形成各种选择性决定的途径，但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常常根本没有进展。要是新的行政班子能随着总统的上台而上台，那就也许会像从前一样，通过引进一些知道堪培拉以外的澳大利亚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的人而使堪培拉的官僚系统振作起来；还有，如果议会能做点事情，它也许就能把政府的注意力引到它应该关注的事情上去。

## 澳大利亚的四党制：为工党运动而奋斗

澳大利亚没有两党制。在工党团结一致的时候，它有一个三党制。在工党分裂时（30年代，以及1955年以后），它有一个包括两个工党的四党制。其他的两个党现在分别叫自由党和乡村党<sup>①</sup>，它们一般组成合作关系，但有时候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这种合作保持不下去。

历史证明，派系林立是工党的显著特点之一。至今它已经遭受了4次大分裂，其中两次是它的议会党团发生分裂，以致某些工党的领袖们参加并领导了一个仓促重新命名的保守派政党；在另外两次大分裂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组成了独立的政党。

因种种原因而处于分裂之中或濒临分裂，是工党的正常状态。这些原因之一是在英国工党中也能找到的那种紧张状态，即坚持原则的基要主义发现它自己与希望妥协并享受权力带来

---

<sup>①</sup> 乡村党在1975年改名为国家乡村党，在1982年改名为现在的国家党。——译者

的刺激的愿望发生冲突。工党不是彻底“合法”的，因为它的一些成员的信仰不符合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不过，澳大利亚工党的分裂倾向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它跟英国工党的差别而不是相似性，如工会在党里的支配地位、它的联邦结构以及共产党同情分子和天主教徒在党里占有的更重要的地位。

工党真正的核心人物几乎全是从各自的州执行委员会起家的工会领袖。在一些州的工党代表大会上，高达 85% 的代表来自工会。当在州里占优势的工会头儿们为工党的州执行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时，他们知道准赢，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选票。有些非工会会员也会上候选人名单，那是因为主宰工党州分部的工会领袖们助了一臂之力。工会领袖们甚至可能“为了党的团结”而让他们的名单包括几个反对派的代表，但人人都清楚是谁在州分部当家。所有这些意味着由工会领袖组成的 6 个势力强大的小集团控制着工党的 6 个州分部。而这些势力强大的工会集团的自然倾向就是试图控制各州的议会党团。工党里工会头儿们的主要兴趣可能不在于党是否应该通过妥协而执政，而在于能否保住他们自己在党组织中的权力。

工党的组织遵循的是严格的联邦制的方针，真正的权力是在各州分部，这种状态意味着在每个州有同样数量的代表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里，6 个小集团聚在一起，只要其中 4 个同意，就可以把它们的政策强加给联邦议会党团，而这就会在党内造成紧张；假如联邦议会党团不肯接受，党就分裂了。党的中央没有自己独立的、强有力的、能增强它的实力的核心组织。即使某个州的集团希望工党能掌握联邦政府，它也往往因为太着眼于州里的政治而不了解联邦事务。

天主教在工党内的势力特别强大，工党领袖中至少有 50% 是天主教徒。在从前一些由像坦曼尼协会那样腐败的党组织控

制的州里，有时极少有不是天主教徒的政府部长。与此同时，比在英国强得多的共产党对工会的影响则大大增加了工党内共产党 的影响。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里，有些工党干部受共产党的控制，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州里的工党代表大会，并企图在州里形成占支配地位的组织。他们多半会在激进的、信奉工联主义的工会领袖中找到盟友，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倾向于参加受共产党影响而不是受天主教影响的派别。这也往往是他们实际上的选择。

澳大利亚工党最令人惊奇的特点可能还不在于它的易于分裂，而在于它居然也经历了许多真正地团结一致的时期。

不首先考虑在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给工党运动带来巨大灾难的多次内讧，人们是难以理解他在政治上所取得的长期成功的。极其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个牵涉到有天主教徒卷入的复杂内情——有些事情甚至提交到了罗马——有助于了解澳大利亚工党运动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不是那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真正地开始的故事。它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产物。但是假如我们任意从 40 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到 1945 年那时，共产党人控制了运输、燃料、电力、重金属和工程建设工会中的大多数、4 个州的劳工委 员会以及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代表大会。早些时候，他们甚至掌握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不过很快就被驱除出去了）。因为他们准备采取政治罢工的政策，引起工党执政的联邦政府冻结了他们的资金，把他们的一些领导人投入了监狱，下令对他们的总部进行了突击搜查，还派军队镇压了一次煤矿工人的罢工。这种罢工政策（每年造成高达 200 万个工作日的损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武装暴动政策的贡献。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无法从山丘里发动

游击战，所以他们就在煤矿组织罢工。

就在这种共产党的冒险主义的背景下，一个叫桑塔马里亚<sup>①</sup>的墨尔本的法律系毕业生说服天主教的主教们在道义和经费上帮助一个非正式地称作“运动”<sup>②</sup>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联合反共的工会领袖（他们不全是天主教徒），组织天主教徒在工会里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到 1946 年，可能是在“运动”的怂恿下，工党开始组织一些“劳工小组”去反对共产党人，而“运动”则配合“劳工小组”。“劳工小组”的领导人不都是天主教徒，但它们的成员则几乎全受“运动”的指导。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劳工小组”成了“党中之党”，它们自筹资金，有跟工党相应的组织结构。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劳工小组”的领袖麦克马纳斯和凯恩，分别成了他们州里工党的助理书记。桑塔马里亚这个名字直到 1954 年才出现在报纸上。他的策略一直是极其秘密地执行的。对这个决定后来他自己也认为是个错误，因为它造成了多余的猜疑。

“运动”和“劳工小组”的策略帮助工党重新控制了劳工委员会、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一些重要的工会。但“运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它开始在工党运动以外展开活动。到 50 年代初，社会上对看上去像是天主教的野心大发有强烈的不满，尽管极少外人知道究竟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工党内部，也有对“劳工小组”太出格的恐惧，因为“劳工小组”也开始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和工党支部里活动，有人害怕迟早会全成了它们的天下。尤其是在工党里有巨大影响的澳

---

① 桑塔马里亚(1915—)，1943—1959 年任天主教社会运动主席，一生以反共为使命。——译者

② 全名为天主教社会运动。——译者

大利亚工人工会，对“劳工小组”极不信任。而“运动”迫使所有天主教工党成员“听话”的企图也疏远了党内一些最有势力的人物。在好几年里，“运动”在维多利亚的主要兴趣之一似乎是剥夺天主教领袖肯内利<sup>①</sup>和卡尔韦尔<sup>②</sup>在工党内的权力。对“劳工小组”的反对也来自担心自身位置不保的非共产党工会的书记们、共济会员和反天主教派，以及不言而喻的共产党人和受共产党影响的人。1951年，南澳的工党州执行委员会解散了该州的“劳工小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劳工小组”于是——可能是出于恐慌——干脆在1952年利用他们的多数票接管了各自州的执行委员会。

强烈地反映“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劳工小组”的政治政策在这时成了工党内部争论的内容。不管在执政中表现出多么精明的经验主义，对工党来说，这么多新政策一下子冒出来，就是对它的传统的冒犯。如行业内部的集体协商、工资与生产率挂钩、奖励工资、反集权化、开发北方、增加移民、建立距大城市较近的乡村居民点、亲美主义、一些反英主义，以及对外交政策、国防和战略规划的强烈关注，无论这些政策中的一些本身多么英明，要一下子照单全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需要某种全新的语言，而工党基本上只会唱一种老调。

尽管工党内部关系紧张，在1954年以前，“劳工小组”照样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着联邦议会工党党团的伊瓦特<sup>③</sup>博士与“劳工小组”成员的合作。伊瓦特是个忧郁的、

---

① 帕特里克·肯内利(1900—1981)，1953—1971年任联邦议会参议员。——译者

② 卡尔韦尔(1896—1973)，1960—1967年任工党领袖。——译者

③ 赫伯特·伊瓦特(1894—1965)，1941—1949年任外交部长，1951—1960年任工党领袖。——译者

悲剧性的人物，他请桑塔马里亚为他起草 1954 年的竞选政策演讲稿，许诺要是他能获胜，就会让“运动”的人进入他的内阁。但是当伊瓦特竞选失败时（主要因为孟席斯精明地利用了俄国外交官兼间谍彼德罗夫叛逃到澳大利亚的事件<sup>①</sup>），他似乎失去了理智，他断定在要“整”他的那些人中，“劳工小组”也有份。据他的私人秘书说，他决心在“劳工小组”成员“整”到他以前先下手为强。1954 年 10 月 5 日，他首次发起了对“运动”的一系列指控性攻击。

伊瓦特的攻击使积压了多年的对“运动”和“劳工小组”成员的反对一下子爆发出来，所有政治上的怨恨和残酷无情在公众面前顿时暴露无遗。伊瓦特在打了一通抨击和反击的电话战、报纸声明战和电报战以后，吁请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7 票对 5 票的表决结果<sup>②</sup> 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以解散了由“劳工小组”控制的维多利亚执行委员会。原定 1955 年 1 月在霍巴特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之延期，直到 2 月份维多利亚举行特别会议，开除了原来指派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指定了会以相反方式投票的新的代表（为了保证如愿以偿，联邦执行委员会裁定，参加维多利亚特别会议的代表可以不一定是工党成员，已经脱离工党的工会可以不需作任何解释而重新加盟。肯内利和其他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干预的“温和派”本以为他们将能控制这次特别会议，结果却被“左翼”击败了）。随后举行的霍巴特全国

① 在大选前 15 天，孟席斯突然向全国公布了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弗拉迪米尔·彼德罗夫的叛逃事件，他向政府提交的文件表明，工党，尤其是伊瓦特的 2 个副手，有亲共亲苏倾向。澳大利亚当时的反共歇斯底里与美国麦卡锡时代时不相上下，伊瓦特因而落选失败。——译者

② 持右翼立场的金·比兹利（现任工党领袖金·比兹利的父亲。——译者）那时在国外，顶替他的人为伊瓦特提供了多數票。

代表大会解散了“劳工小组”。但是属于“劳工小组”的议员的集体退党导致了以凯恩<sup>①</sup>为首的维多利亚工党政府的垮台，使中央执行委员会感到害怕了，在新南威尔士它就小心得多。它后来解散了该州的执行委员会，禁止举行当年州里的党代表大会，指定了一个由 32 人组成的“留守执委会”，不过其中包括 12 个前“劳工小组”的成员。新南威尔士的工党政府保住了，但工党选票的分裂像在维多利亚一样，造成了昆士兰和西澳工党政府的垮台，并造成了伊瓦特 1955 年和 1958 年、卡尔韦尔 1961 年和 1963 年在联邦大选中的失败。

这段长长的、令人气馁的、充满动荡和怨恨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关于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的说法，而各方都以对方行动造成的效果指责对方的动机。但事实是，在这样的冲突中，人们一旦卷入行动，那就不是他们的动机，而是行动的要求在替他们作决定了。这种决定的效果是无法预料的。“运动”最大的错误看来是它过分的秘密状态，以及它对不属于“运动”的天主教徒和反共的工党成员的逼迫。还有，对不断地改变立场、见风使舵、调和妥协的那种政治上的稀里糊涂来说，“运动”的政治政策太清晰太死板，简直有点大逆不道。“劳工小组”的组织非常出色，它们的反共活动是世界一流的；然而在政治策略上，它们想干的太多，太脱离实际。在反对它们的人中，共产党人的合作者固然令人不齿，其他人不是过于谨慎，就是对陈年旧恨太耿耿于怀。要彻底整顿这一切需要一个盖茨克尔<sup>②</sup>，只是在澳大利亚工党里，像盖茨克尔那样的人要赢得预选怕也很难得很。如果讨论工党这

---

① 凯恩(1882—1957)，1952—1955 年任维多利亚州州长。——译者

② 盖茨克尔(1906—1963)，英国工党领袖(1955—1963)，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译者

段时期的混乱却不涉及它内部的权力斗争,那就会是彻头彻尾的误导(关于这段历史有那么多胡说八道的文章,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失去了天主教的大部分支持,工党就会分崩离析。

在工党分裂以后,共产党人恢复了对一些工会的控制,工党成员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候选人名单”又出现了,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口径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在连续几届工党的代表大会上,写上党的政纲的外交政策决议在亚洲问题上取一种中立主义的立场。30年代那种联合阵线的气氛在维多利亚州又强烈起来,在一段时期里,维多利亚的执行委员会似乎领导着整个党。他们的对手偃旗息鼓,专注于在各自州里享有的权力。党与社会上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分歧看上去越来越大。在直到1965年议会还是由工党右翼掌权的新南威尔士,工党党员人数从37000跌到了2万。在维多利亚则从28000人跌到了5000人。那里怨愤难平的右翼发动了好几次突然袭击,但还是失败了,他们的问题之一是一般的右翼分子习惯于妥协和“交易”,而更注重教条的左翼则拒绝调和。

“运动”没有一败涂地。澳大利亚天主教会内部的激烈争论在1957年被提交罗马的枢机主教团仲裁,结果导致了教会和“运动”的正式关系的破裂。“运动”自身也分裂成了几派,其中最有实力的变成了全国公民委员会,一个由桑塔马里亚担任书记的世俗机构。澳大利亚的主教们分成了3派,一些支持全国公民委员会;一些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有时在教区里继续进行与全国公民委员会对立的、自己的活动;其他的人则试图保持中立。全国公民委员会一直在活动,它们在维多利亚最活跃,在其他州则不怎么引人注目;它们还控制着一些工会。被工党开除的以及退党的人组成了独立的民主工党,该党开始参加议会选举,把工会留给了全国公民委员会。它实力最强的也是在维多

利亚。但是从全国看，人们常说，作为一个具有实际上具有否决权的党，孟席斯之所以能高踞不下，全靠了民主工党选票的实力以及它的宣传。民主工党还是由全国公民委员会和“运动”的残余分子支配着，其内部也挺紧张，少数派希望把它发展成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党，而多数派则把它看成是用于修正工党的政策、重新进入工党、或许随后控制工党的临时性的游击战。

工党实力人物的现实工作是衡量党内斗争的趋势，以及党内地位的调整。而他们的处境证明了人在算计得太狭窄时会变得多么愚蠢。世界上没有比澳大利亚工党里那些“拉票”以应付党内争端的能手对世事抱更怀疑的态度的政治家了。但是这种怀疑主义和自信在澳大利亚民众的大圈子里已消失了，他们不知道怎样在更大的领域里“拉票”。

在党组织中有权有势本身就能令人心满意足；积极分子们更关心的是保住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而不是赢得选举，地位使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行使权力，同时保持情绪上的安全感（以及他们的“正直”）而不必考验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某些发言人的极端保守主义使他们显得非常出格。因此，当某个发言人说什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丘之貉的敌人时，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人是完全精神错乱了。对年轻人来说，谈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老头老太的事，是玩弄辞藻的小花样。

不管导致工党失去政权的居少数的“左翼分子”在感情上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联，大多数工党成员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教条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可能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工党党员在掌权时会漠视“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就像孟席斯在掌权时漠视“自由经营”的理论家一样。工党里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观点，他们就是要地

位要权力罢了。要是换个环境，这会是件好事。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受到某些事件的刺激，被灌输进某些好的思想，能变成伟大的改革家。

工党在联邦大选中连续失败，在领导了第 8 次的失败以后，阿瑟·卡尔韦尔退休了。比他年轻一代的接班人高夫·惠特拉姆<sup>①</sup>先生为未来带来了一些希望，他看来好像明白，不光是工党，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整体，也需要心理上的重新定位、新的基调和新的风格，以适应现代的世界。他的问题是能否重新创建一个自觉有正统性的党和一个看上去像是真正的可以取代孟席斯的政府。工党里的原旨主义者在逐渐地消亡，而惠特拉姆能否把那些左翼分子排挤出政治舞台的中心则还有待观察。

## 澳大利亚的国民党制： 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的“紧张关系”

自由党是孟席斯在 40 年代创建的，曾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党，直到它——或许是孟席斯——变得太习惯于大权在握了。它从前高唱的某些口号，如“百分之百的自由经营”、“社会主义者仅仅是一个没有胆量的共产主义者”等等，现在显得过时了。但是，除了如今已经没有市场的这类陈词滥调，它还有其他的特点。它还体现了澳大利亚人希望不受打扰、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的愿望，并觉得这种愿望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工党以前对社会福利和经济计划的大力推进代表了一种避免 30 年代的惨

---

① 惠特拉姆(1916—)，1967—1977 年任工党领袖，1972—1975 年任总理，是工党在野 23 年后的第一个总理。惠特拉姆在任内将澳大利亚军队撤出越南，承认中国，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译者

状,以及更内行、更现代化的愿望,自由党代表了一种从战后的清教主义、工党妄自尊大的作风以及仅仅是战时管制式的经济规划造成的混乱中解放出来。但是,自由党没有在当代作重新定位的新的热情。那些老人们还剩下的,只是那不可能实现的1949年的梦想,以及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任何政治组织对旧的观念坚持得太久,必然会产生被人背叛的感觉。政治理想从不讲究细节,它只是指示方向。如果一个党改变了方向,肯定会使一些支持者失望,尽管其他人会接受改变。)

在所有的理想中,最令自由党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始终是“自由经营”的信念。跟政治一样,这种追求部分是因为自由党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执著,部分是瞎胡闹。对澳大利亚的制造商来说,“自由经营”意味着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赚钱,同时不打破他们的控制自己企业的幻觉,或者不要以太多的细节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后面这个要求更合理些)。他们是那种由政府制定原则方针,企业家补充细节的部分计划经济的真正的支持者,可是他们中却极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承认这一点。考虑到澳大利亚实业家因缺乏冒险精神、对海外创新和政府支持的依赖而声名不佳,他们的信念却能如此强烈地压倒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不能不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果以他们读的书报上的标准来衡量,大多数澳大利亚的精英都不怎么样,但他们却有一种相信自己非常出色的深切的要求,这也许是他们的罪过的一部分。不管如何,企业家们试图在自由党里有强大的影响,而他们狭隘的眼光、过时的意识形态加上对私利的热衷,则是自由党的毛病之一。澳大利亚的精英们除了“自由经营”的神话,对无论其他什么都没多大的兴趣。

例如,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整个东西方对抗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奉行罢工政策的问题,当共产党不太经常发动罢工

时，许多企业家就失去了兴趣。自由党需要的是一个像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那样的组织，鼓励它为党设计符合时代的新形象，使党紧跟时代，并使党的领袖们对新事物产生兴趣。这种工作需要知识分子，但部分由于自由党的过错，部分由于知识分子的过错，党内寥寥无几的知识分子现在似乎都像朽木粪土一样。党不得不主要依靠 10 年到 15 年以前吸引到的知识分子。自由党有一个有一百多名领薪工作人员的中央机构，但其中除少数例外，许多人现在都在混日子。不管如何，孟席斯巨大的阴影反正足以埋没所有的首创精神或工作成绩。在孟席斯的统治下，党组织是无足轻重的。

自由党比工党在青年人中间有更多的积极的支持者（一些工党支部根本就没有年轻人）。虽然“青年自由党”的支部活动有时只是享受欢乐时光的借口，但其中的一些显示出在自由党内别处看不到的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在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和胆怯畏葸的老年人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有时是涉及政策的（如移民法），更根本的是关于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青年自由党人有时在社会政策上有某种温和的激进的特色，他们希望澳大利亚的管理风格更切合实际，想使澳大利亚现代化。他们也许代表了澳大利亚政治中的“西方化影响”。

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中的另一个党，乡村党，可以看作是政府里最强大的一个压力集团。它无疑比议会以外的任何集团都更直接地控制着选票。在讨价还价中，它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有时冷酷无情的技巧，这种技巧是对孟席斯所主宰的政策唯一持续有效的抵制。既然政治党派通常最关心的不外是自身的生存，乡村党最大的利益必然就是通过维持一种会给农村选票以某种优惠的选举制度，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它在 1963 年向孟席斯施加压力，要他配合重新划分选区（对孟席斯来说，这是第一

次),给农村选票额外的优势,以抵消农村人口减少的后果。孟席斯同意了,但在实际执行上则拖延了很久。许多自由党人是想要甩掉乡村党的。

人们也许可以更确切地把乡村党看作是一个用于保持个人权势和政策的工具。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以来,它只有过三个领袖,其中的两个,厄尔·佩奇<sup>①</sup>爵士和约翰·麦克尤恩<sup>②</sup>,在利用党作为影响政府政策的工具时,远远超出了对农民实行补贴、为农村提供公共设施之类人们预期中的自称是乡村利益唯一代表的政党关注的问题。佩奇利用他的地位改变了州与联邦在财政上的关系以及对联邦银行的控制,倡导了一套医疗福利制度,并引进了其他与农村地区并无特殊关系的改革。麦克尤恩搞的经济总政策与政府的其他政策互相抵触,他的政策是一种“全面保护”的政策,即用高关税保护制造业不受外来竞争的影响,然后用补助保护农民不受随之而来的高成本的影响。他也许有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不专注于农村利益的第三党的野心。在把他的贸易部发展成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部门并在事实上接管财政部在经济计划方面的某些工作的过程中,麦克尤恩表现出相当的吸引企业界以及农民的兴趣的本事。

## 行政机构

目前的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新形式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形成的。在那以前,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员系统执行战前政府相对较小的职能。打一场现代战争的需要使官僚机

---

① 佩奇(1880—1961),1921—1939年任乡村党领袖。——译者

② 麦克尤恩(1900—1980),1958—1971年任乡村党领袖。——译者

构大大膨胀起来，大批人员从四面八方召集而来，分配了办公桌，过起了陌生的战时官员的生活。二战以前的行政官员多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中招募来的，那是给他们工作的一种方式。在二战爆发前不久，已经开始有可能从大学毕业生和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中吸收行政人员了。在战时和战争刚过不久那段群情振奋、人人梦想着“宏伟规划”的时期，有知识的人在行政机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各部门的主管人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代表了占领堪培拉的第一代受过教育的官员，这些人自视为国家的救星，认为他们的经验知识和聪明才智足以使一切改邪归正。他们工作勤奋，开始时致力于变革，决心引进专家水平和职业精神的标准。他们是想为澳大利亚显示国家该如何管理的改革者。他们要结束由企业家当家作主的时代。

这些人至今依然效率很高，非常努力，但是 40 年代的那种兴奋已经没有了。他们没能如愿以偿。除了世界上极少有如愿以偿的事这个事实以外，导致失望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由于联邦政府未能获得为实行高效的国家管理所必需的权力，他们的冲劲减退了。从工党到孟席斯的改朝换代也把一些官员挤出了官场。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听之任之，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更多地想到自己的家庭以及工作对自己的重要性而较少地考虑成就感。生活在堪培拉看上去会使人变得更自负，同时又排斥了自负的实用意义。在堪培拉有的是“想当然”，以及瞧不起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的倾向，认为那里的人全都粗鄙、自私、令人讨厌而愚昧。在堪培拉的人相信只有政府官员才消息灵通，能作出内行的决定，而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远处的干扰。在堪培拉住上一段时间的人对那里的发展赞不绝口（它的人口是战前的 6 倍）。他们欣赏自己的知识和重要性的增长，为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教养而喜悦，但他们的与世隔绝使他们意

识不到在各州首府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变化。他们往往认为澳大利亚还是他们离开时的那个样子。其实，跟堪培拉一样，澳大利亚也一直在发展之中，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甚至比堪培拉发展得更快。有些官员是在拿堪培拉跟一个不复存在的澳大利亚作比较。

在孟席斯的统治下，政府部门主管的权力极大；而在一个对制定政策毫无兴趣的无精打采的政府里，对权力的热中有时并不表现在政策上，而表现在堪培拉炫耀权力上。议会里只有少得可怜的、能迫使官员们兢兢业业的专家。大部分部长超然于他们的部门。一些政府以外的“顾问委员会”充满着只会捧哏逗趣的角色。由于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变成了保住各部门主管人员威望的事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比通常更糟。与此同时，堪培拉的一些谄上欺下的小人迷上了当地的俱乐部生活和小小的外交界的宴会。有的官员自以为是全国的重要人物，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他们。（现在澳大利亚公认的重要人物可能比它历史的早期要少。在企业界一些由孟席斯册封的爵士为他在无名的政府官员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爵士爵位感到奇怪！）

目前这代官僚的所有特点中最要命的或许是他们对管理方面的雕虫小技过分重视。对在堪培拉自学到如何讲究实效的人来说，似乎只有他们才能洞察政府行动的细微之处。他们把 40 年代的那种魄力看成是幼稚天真。与行动无关的风格本身成了追求的目标，而讲究风格可能成为政策上的首创性的大敌。这种风格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使人避免哪怕是最简单的新使命。对围绕着孟席斯建立起事业的、在堪培拉掌权的那代人来说，“可能性”这个词的含义很窄，而任何可能需要立法或新的管理模式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在他们眼里，“可能性”只是意

味着多半不需任何变革就能做的事。然而一般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澳大利亚在经济管理方面有着常见的混乱：财政部和贸易工业部有时试图在主要经济政策方面对内阁施加不同的影响而成为对手；劳工部、国家发展部和移民部的活动也直接影响经济规划；某些初级产品生产商的委员会也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关税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以及储备银行都作重要的决定。

在所有这些机构中，财政部应该是起核心作用的。它的领导班子非常胜任、非常负责，只是高层人物与下面工作人员之间在能力上有所差距。它总的风格是谨慎小心、循规蹈矩、以堪培拉为荣、学究气重、孤芳自赏。就国家经济而言，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内部事务上，如通货膨胀、信贷控制、货币流通和就业率，而不是集中在对外贸易上。它的成员不常会见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公务以外的实际事务几乎毫无感受（他们有时还以此为荣）。说到底，财政部的任务是维持稳定。

贸易工业部的风格是雷厉风行，那里士气旺盛，乐于跟企业家打交道，有接受世界挑战的欲望。该部本身的业务是根据进口量扩大出口；而通过如制造业咨询委员会和出口发展理事会这样的部门以及自己的工业处，它也可以就许多国内事务表达它的观点。财政部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进行间接控制，贸易工业部则倾向于直接控制。财政部是学术性的，局限于堪培拉。贸易工业部则喜欢为实际事务而忙碌，总是眼望全球。贸易工业部招收的工作人员在所有政府部门里，是最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说到底，它的任务是促进发展、保护国内工业以及维持高成本。因此它是实行财政部政策的障碍。

劳工部负责处理与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关系，跟与澳大

利亚工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奇夫利<sup>①</sup>政府相比，它更重视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就是说，它更多地同意后者的要求。它关心雇员的技术培训，在资方和工会之间充当非正式的外交使节。国家发展部有出色的工作人员和研究工作，但已经被冷落了多年。如前所述，仲裁和关税委员会是不顾其他规划机构的意见，只按它们自己的逻辑作出经济决定的。储备银行和联邦贸易银行扮演更富建设性的角色，它们贯彻财政部的许多政策，因而成了澄清思想观点的机构，因为它们得向企业界解释财政部的立场，也得向财政部解释企业界的立场，还得使双方都有利。在国内规划上，它们提供了有益的稳健的因素，因为它们必须磨去政策上出格的棱角以使之能够实行。它们对外贸的真正的关心（除了与进出口商打交道以外，它们还实际持有有关的资料）有助于抵消财政部对国内经济的选择性的担忧。所有这些，加上它们相当独立的地位，以及有各自的研究部门这一事实，使它们对政府的经济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观点，从而使它们成为在需要时能提供高明的参考意见的受人欢迎的单位。

显然，在澳大利亚有若干相当成熟的从事经济计划的机构。如果国家有任何计划的话，除了仲裁委员会以外，这些机构可以合在一起执行计划。职能重叠和争权夺利是事物本性的一部分，假如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它们或许还有好处。政策的构想通常要涉及利益互相冲突的势力集团，但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政策构想。不过看来有理由相信，在经济事务上，我们可以稍微乐观一点，因为原来那种完美无缺的“计划”的想法已经没人相

---

① 奇夫利(1885—1951)，1945—1949年任总理，在其任内澳大利亚顺利实现了从战时向和平的过渡，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实行了移民政策的改革。——译者

信了，同时已有可能使各方面朝大致相同的方向行动了。只是现在在澳大利亚还没什么人想这么做罢了。用我在《公报》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澳大利亚对规划的态度令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sup>①</sup>对性的态度，即它本身毫无问题，只是你绝不能精通它，连讨论它也不行。

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各种冲突。无论是外交部、贸易工业部、移民部、领地部，还是国防部，看上去都在各行其事，而没能从内阁得到作为一个整体该做些什么的指导。其中特别不幸的是外交部，它有好几个能干的部长，但孟席斯爱插手（虽然总的说来亚洲似乎使他厌烦），有时非常粗鲁，而没有一个部长证明有办法阻止他。外交部在宣传方面不讲策略，尽管讲究策略在亚洲可能是有效的方法。同时，对其人民来说，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来没什么成功的戏剧化的变化。（外交政策方面讨论的水平令人难以相信地幼稚。）伴随着这种失败的是外交部里相当狭隘的职业化，似乎外交政策只是某些专家私下的事情。跟财政部一样，许多外交部官员因为远离澳大利亚的现实而变得迟钝愚蠢，而长期驻外不在国内使他们的情况更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把堪培拉以外的澳大利亚看成是对从事神秘深奥工作的职业外交家的一种骚扰。其实外交政策在高层次上恐怕最好是让生活中的专家来处理，而不能交给只精通外交事务的人。伊瓦特博士主持外交部时大事扩充，兴师动众、激动人心，随之而来的该是一段平静点的、以不出意外的态度行事的秩序井然的时期，这可以理解。问题是这段时期持续得太长了，花在专业上的细枝末节的注意力太多了。有一点儿发展中国家的那

---

① 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位的时代（1837—1901），英国在这段时期建立了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译者

种“大刀阔斧”的蛮劲有时或许能产生更好的结果。在职业外交界的狭小圈子里，外交部干得不错，只是如今光凭外交成不了太大的气候。

## 压 力 集 团

澳大利亚政治中有腐败现象，但要衡量腐败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英国大概是个例外）的标准来看，澳大利亚的政治家是相对地诚实的。不过，在一些州政府，有些臭名昭著的时期，那时在贩酒、赌博和其他许可证发放、政府工程合同的承包等等方面有小规模的舞弊行为。在战时，联邦行政当局也有小规模的舞弊，不过其中有些是那种有时能帮助干成正事的舞弊。联邦行政当局如今几乎完全没有经济上的腐败。社会上发生的欺诈行为多半是因为裙带关系或政治交易，但也有比大多数人能想象到的更多的阴谋活动和敲诈勒索，尽管这些未必是腐败。人们无法说清到什么地步这些活动就会变得能登上大雅之堂，可以被称作“压力集团的强硬手段”了。有些有权势的人看上去好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如愿以偿，但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要区分对政治家施加的压力和贿赂也很难。一些州里的政治家确实通过代表特殊利益集团而赚取外快，但联邦政府里的政治家们一般应付的是微妙得多的压力，其中有的仅仅是人情方面的，有的是作为选民代表的本职的一部分。要让政治家在议会里提出某个问题通常相当容易。许多问题和讲话都是别人塞到政治家嘴里去的，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实行民主的过程的一部分。为政党捐献竞选基金的效果是无法估计的。所有政党都从企业得到秘密收入。而许多企业为了保险起见，为所

有的政党都捐款。至于它们的钱捐得值不值，连许多政治领袖都不知道，因为竞选基金是严格控制、极其秘密的。

有时人们不得不划出一条微妙的界线以区别腐败与否。除了腐败以外，人们可以说，压力集团对政府、政党和政府官员所做的工作是治理澳大利亚的方式之一，就像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它本身未必有什么不妥。压力集团在最温文尔雅时，它们的干预为政府和行政人员提供了有关天下事的信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隔绝，使政府官员对为之决策的现实有更多的感受。在最强硬时，不同压力集团的不同要求互相抵触，而这正是民主政体的特点之一。政府对政策的清理调整部分就是对施加于其上的压力的反应。在千头万绪之中，政府寻找可能有所作为的领域，同时不忘它自己的关于事情该如何发展的未遂愿望。不过，澳大利亚的压力集团比其他一些国家的压力集团更“赤裸裸”、更显而易见，因为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在争取政治上的支持以推行他们经济或战略上的政策时，往往特别笨拙，因为这些政策也许有损于某些压力集团的特殊利益，但一般认为是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或主权的。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应付压力集团，而不能迅速地为某些集团很少感兴趣或根本不感兴趣的领域制定政策。他们得过且过，对错综复杂、不为任何特定集团关注的全局性大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见解。

就大的公众压力集团，即不是谋个人私利而是谋群体利益的压力集团而言，要评估它们的重要性是比较容易的。检验它们力量的最高标准就是选票。

虽然相对说来没有多少人，种小麦的农民却控制着足够的选区，以至于有人说，掌握麦区席位的政党就掌握财政部的宝座。麦农集团的院外活动人士既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也通过

麦农理事会施加影响。孟席斯在二战初期当总理时拒绝给予麦农特殊照顾，使他失去了一些支持。不管打仗不打仗，麦农们照样发动反对他的运动。同样的，尽管不符合政府当时的政策，麦农理事会在较早时向中国出售麦子畅行无阻而没有受到质疑。从没人胆敢向麦农挑战。对乳品业农民的代表，人们也总是恭恭敬敬。政治家们不大可能就对乳品业的津贴问题提出争议，因为那会导致失去某些选区。

蔗糖院外活动集团更偏向于私下活动，因为整个行业基本上是由殖民地蔗糖精制公司(CSR)<sup>①</sup>控制的。CSR是世界上最大的百家之一，是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人拥有的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据说CSR在高层复杂的游说活动中手段非常高明，不过即使笨拙粗暴，它同样也能随心所欲。对蔗糖业的优待早已是澳大利亚政治的一部分了，因为在昆士兰有太多的人的工作靠着它，还因为跟别的出口工业一样，它帮助平衡贸易收支。

羊毛压力集团相比而言不是很成功。虽然羊毛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商品，羊毛生产者却没有在某些关键选区里高度集中而使羊毛集团能拿出足够有效的选票。除非昏了头，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羊毛，但它并不太操心羊毛生产者是否发财。前几次羊毛生产者发动的为自己的口袋争取更多的钱的运动都失败了。而这些人从前曾经是澳大利亚势力最大的一帮人。

教会在传统上据说是强有力的压力集团，但它们的实力，尤其是那些压抑沉闷的清教徒禁欲主义者的选票数量，可能被夸大了。毫无疑问，教会有着其影响，不过它们的影响可能主要基于

---

① 即 Colonial Sugar Refining Company。以市场价值计，它目前在澳大利亚排名30位上下。——译者

虚张声势。它们对赌博和酗酒小题大作的反对延误了改革，但每次什么州政府设法搞出更自由化的措施，却总是能够安然无恙。天主教会不参加这种折腾。书商和旅馆管理人往往是天主教徒。为了资助学校（学校是天主教领导层主要关心的事务之一），天主教教区常常组织社区活动性质的赌博。不过，在好几个时期，天主教会向各州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增加新闻审查方面的立法。天主教激进分子书写投寄大同小异的抗议信这种“复写纸运动”的手段被用于他们不时发起的强制运动，所以编辑要是收到来自某个天主教徒对某个道德问题的抗议信，他们多半会发愁的。加菲尔德·巴威克<sup>①</sup>爵士在宽松离婚法上赢得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胜利，他稳扎稳打，权威地解释他的观点，并漠视天主教的反对。

退伍军人协会是最有水平的压力集团之一。凭着 25 万会员和许多非会员的退伍军人——其中多数人都指望在生活的某个阶段能从政府得到点好处——退伍军人协会跟任何政府对话时用的都是投票箱的语言。它与由内阁里的前军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打交道，因而是唯一的与内阁有正规接触渠道的压力集团。事实上，它比军队首脑们有更好的与内阁的定期接触。人们只有考虑到澳大利亚的“遣散优惠”制度，才可能理解退伍军人协会的巨大影响。在这个制度之下，要是一个退伍军人得了慢性残疾，政府如果不支付抚恤金的话，就得负责证明他的身体状况不是由于战时服役而引起的。例如，假如一个退伍军人得了肺结核，不管是在战时服役以后多久感染上的，他都能得到抚恤金。工党的政治家在 1964 年 8 月还攻击政府不肯接受癌

---

① 巴威克(1903—)，律师、政治家，1959 年任检察总长时引进澳大利亚第一部离婚法。1962—1964 年任外交部长。——译者

症作为一种由战争引起的疾病而对患癌症的退伍军人提供补偿（哪怕这些人退伍已有 46 年了）。

报纸的资方们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组个体性的压力集团。在它们之间，4 个大报业集团控制着 11 份日报、5 份只在星期天发行的报纸、所有最重要的杂志、若干无线电台以及大城市电视台的大部分。除非是影响到了新闻业的整体利益，它们难得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即使影响到了新闻业的利益，它们也不总是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在每个主要集团里都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拥有帮助建立或者摧毁政府的力量。这种信念或许是个错觉，但这些人的言语举止就像他们真有这种力量似的。他们经常跟政治领袖中的某一个有密切的接触，有时候并帮助政党竞选。这种介入无非是出于通常使人投入政治的各种动机，如从纯粹的对政策的考虑到纯粹的私人利益。所有主要报业公司在电视台都有股份，而电视台依赖政府的许可证才能生存的事实造成了报业资方与政府的一种新的关系。

像巨大的布罗肯希尔控股有限公司重工业集团这样的企业在国家的兴旺发达中起的作用如此之大，它的高级管理人员出于必要与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就跟对待 CSR 一样，政府非常重视布罗肯希尔控股有限公司，因为它的活动影响经济繁荣，从而影响选票。没这么重要的企业就不一定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同样的富于同情心的对待。

制造商协会在公开场合吵吵嚷嚷、活跃好斗，私下在许多具体事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政府官员来说，它可能是影响最小的压力集团。（商会与政府各部的联系据说要微妙得多。）仲裁法庭、关税委员会以及私下的限制竞争协议的要求把制造商分成了不同的小团体，其中最容易当众激动的是汽车商团体。当孟席斯在 1940—1941 年间因为在打仗而相当合理地

限制汽油的消费时,以及在 1960 年又对过热的经济实施压抑时,汽车商团体宣布孟席斯是其敌人。1960 年的那次事件在被理解为企图向政府施压的大规模开除工人和停工停产,以及由私人组织的最激烈的反孟席斯的游说活动,并以一批墨尔本的企业家在 1961 年大选中支持卡尔韦尔而达到高峰。制造商们还试图从自由党内部对孟席斯施压。澳大利亚最爱走极端的主要压力集团,是由海外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制造商协会,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工会对工党组织的影响比企业家对自由党的影响更为重要。工会领袖们差不多拥有各州的工党组织;而当工党政府在州里执政时,工会会对它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工会对联邦工党组织的影响则要分散得多。联邦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这么少(每州 2 人),两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人数也很少(每州 6 人),这些代表一般总是简单地按自己州的纲领投票,因为他们代表各州的组织。他们在施加影响时,与其说是作为工会领袖,不如说是作为党的头儿。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工党政治家,包括党的领袖,除了要重视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外,还得重视他们所属州的党魁的意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考虑的政策有可能是彼此抵触的。

## 他图的是什么?

在一些国家里,政治辩论多半会避免涉及特殊利益而常常关注或多或少有关全民利益的领域。对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的人来说,澳大利亚像是一个赤裸裸不懂掩饰的地方。这种露骨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一些人在战时对担任总理的孟席斯的完全出于私利的恶毒攻击上。除了合理的对行政当局的懒散和极端

缺乏创见的领导的批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发动了战时罕见的反政府运动。对进口的限制受到进口商的攻击；对汽油消费的限制受到汽车业的攻击；罢工此起彼伏；麦农摩拳擦掌，要求从政府得到更大的好处。无论是孟席斯还是整个国家，看来都不能在理智和情感上作出努力以形成一种战时心态。1960年和1961年因为政府压抑经济过热的努力而引起的一些极其激烈的反对也达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似乎证明在整整一代人之后，还是无法用政治上强有力的整体利益来遏制特殊利益。孟席斯在这方面特别无能，这是事实；但这种无能恐怕也是澳大利亚理智和观念上的大气候的反映，其目光短浅以及缺乏想象力的反映。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真正促使多数人从政的，是对刺激或社会地位的追求（如果他们不太有钱，则可能是对金钱的追求），而这些人的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出于部分人的信念而不是社会的一致意见；政治活动的必要特点是，一旦大权在手，它就基本上变成了瞎胡闹，除非巧合，通常都不能满足社会的期望；哪怕是本来有所信仰的人，当他们接触到权势内里的虚伪时，也一定会变得不再相信人间还有真情善意而是江湖骗子了，他们决意首先要保住自己的权力，政策则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加品”；人们充其量可以希望的，是这些人在可能的场合，在机遇许可的时候，会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行事，不管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是不是政治的奥秘，别的人也不知道。但许多澳大利亚人肯定相信，政治在本质上是追逐私利的坏蛋干的欺骗勾当。甚至连澳大利亚政治家当众发表的言论也总是极其死气沉沉、纠缠于琐事、范围狭隘。在私下里，他们经常用吹嘘自己的怀疑主义来作为参政的借口。要政治家承认对公众事务有认真的兴趣，似乎是一件不光彩、非澳大利亚的事。

澳大利亚政治上众所周知的空虚源于知识分子力量的欠缺。在澳大利亚，跟在美国一样，知识分子一般被排斥于最高决策过程之外，尽管在现代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对政治事件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跟在美国不一样的是，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没有在广大领域的各种机会，如起码的当最高决策者的食客，为他们起草讲演稿、搞民意测验之类。澳大利亚的政治没有这些装饰。如果知识分子在澳大利亚想走进权势圈子，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智慧留在家里。与在企业界一样，有时装傻是最安全的。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对澳大利亚事务的理智化不仅会激起人们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想象力，并且甚至可能赢得选票。

在孟席斯时代，两大主要政党的政治事务中都有一种腐朽的味道，那是一种许多事似乎都发生在历史早期的感觉。这种僵化呆滞，就是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们看上去都是既自命不凡，又孤陋寡闻。他们进行的政治辩论好像是从什么古书上读来的。没有什么在使澳大利亚面临的新挑战变得戏剧化（这是个当代流行用语）方面取得突破的迹象。政治家不能体现现代生活的象征。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孟席斯—卡尔韦尔那一代政治家实际上成了在自己国家里的流放者，部分是由于两党对知识分子的猜疑使它们接触不到大部分关于世界和澳大利亚如今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分析。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尤其是那些年老而又有权有势的，跟不上他们读到的东西。

政党和人一样，需要有某种“哲学”、某种使命感和自我意识，以便保持对它们所处环境的兴趣，从而能以现代方式对事件作出反应，而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却都失去了对自我的现代意识。这正是在一般情况下正在为政治生活注入活力的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多半看不起整个现存体制的原因。

## 孟席斯时代

### 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以他担任 16 年<sup>①</sup>澳大利亚总理的记录，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成了可以用其名字命名一个“时代”的人物之——直到随着时光流逝，以后几代人忘了这个时代发生的任何事情为止。下面我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孟席斯的重要性。这是本书写作时所观察到的情况，当然，我的评价以后有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孟席斯长期统治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极少事关紧要。他的拿手好戏是主持活动并摆出对活动的意义一清二楚的样子。他有限的几次主动干预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善于克服逆境的人，不过他之所以能成为不倒翁，工党的分裂帮了他的大忙。他的统治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似乎相信的大多数事情在他于 1949 年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发生。在 1949 年，他的总的立场是“自由经营”、支持英国的政策、反共、重视国防<sup>②</sup>。但是，在他的统治期间，他不得不采纳许多制定规划的机制，哪怕是零零碎碎地；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加强

了，与英国的联系则削弱了；对外他奉行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在亚洲扩张的政策，而在对付国内的共产党人方面，他只是假模假样开了个头（那时他似乎从中捞到些政治资本），实际上他比奇夫利政府更少关注这个问题；在他任内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他的“时代”里一些值得肯定的特点，如财富的分散、社会风气相当宽松、国民自信心的增强、持续的移民规划、对亚洲的兴趣的萌发、对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的进一步宽容、对新技术的需求、海外投资在澳大利亚日益增加的实力，所有这些，没有一件是孟席斯所“主张”的，其中有些跟他上台前说的他希望的正相反。当连他也似乎对与英国的联系失去信心的时候（从共同市场危机那时起），除了相信自己，他是否还相信任何别的东西是大可怀疑的。他的态度基本上变成了怀旧恋旧；他对看到的 60 年代的澳大利亚的大致情况深以为憾。尽管如此，他恋栈不去。

他似乎相信只有他才能治理澳大利亚。他主持会议、把马提尼酒送给外国客人、上飞机下飞机、阅读放到他桌子上的报纸、发表演说。他跟一小群部长以及政府部门主管中的一小群人共享权力。除了约翰·麦克尤恩，他的虚张声势吓住了他的大部分部长。跟他在 1949 年一起上台的人多半都离开了（其中较有独立思考头脑的是被他搞掉的）。新来的人蜷卧在他的阴影底下，他们中多数人不敢贸然自己作决定，而孟席斯本人也不是个能很快作决策的人。于是事情逐渐堆积起来，其中的一些就

---

① 孟席斯总共担任了 18 年的总理。——译者

② 他在 1949 年作的开发北方的诺言完全没有兑现，所以在 1963 年他又可以作同样的诺言，然后又一次什么也没干。北方问题就是这样。

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随着决策过程的减慢，有时干脆停止，政府部门常任主管的工作就是管好各自的部门，保证不惹麻烦。这是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因为工党在40年代实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政策时，靠的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他们后来依附了孟席斯，渐渐地，孟席斯把他们，而不是他的部长们，看成是他治理国家的代理人。

在党内，孟席斯很快剥夺了那些不赞同他的人的权力，或者使他们闭上了嘴巴。他认为那种人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他私下深信所有的异议都只是“发牢骚”，是“无知”的表现。党的会议都事先作好幕后安排，所以反对意见经常无以发表，而在表达出来时，则往往被歪曲得傻里傻气似的。不言而喻，孟席斯在维系对自己的支持时表现出相当的魅力和狡黠，他能非常有效地运用“老兄”技巧（人们说“老兄”时，可以有丰富的含义）。在一个有许多前军官参加的政党里，他知道如何诉诸服从意识，如何孤立“不忠诚”的人。他把所有不同意见都看得很重，时不时会毫不犹豫地宣称如果有人对他屈指可数的计划之一有所批评，他就辞职（当莱昂斯<sup>①</sup>和休斯<sup>②</sup>是党的领袖时，孟席斯自己对他们并不忠诚）。在私人交往中，孟席斯能显得相当可爱，有种难以捉摸的诙谐风趣，比他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所能显示的要强得多。在公开场合，他通常表现拙劣。他向不同的人显露他的不同的方面，看上去只有在家人之间才能放松。在与同事相处时，他总

---

① 约瑟夫·莱昂斯（1879—1939），1930—1931年任工党政府财政部长，1931年脱离工党，与国家党联合，任新成立的澳大利亚统一党领袖，1931—1939年任总理。——译者

② 威廉姆斯·休斯（1862—1952），1915—1916年任工党领袖，总理。1916年被工党开除，与自由党联合组成国家党，任国家党领袖，1917—1923年再任总理。——译者

是保持一种超然离群、有点神秘兮兮的气氛。他会在这里放宽一点、那里让步一点，从而蒙骗了澳大利亚各地几十个不然总是疑神疑鬼、精明清醒的人，这些人会为得到孟席斯的一份恩赐而兴高采烈。

孟席斯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能以模仿和扮小丑逗人发笑。但他没兴趣跟在智力上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作伴。在工作之余他似乎乐于置身于一群仍使他在才智上显得鹤立鸡群的人之中。他懒于读书，尽管他为自己塑造了知识广博、教养良好的形象，其实并没有读太多的书。跟他的同胞们一样，他对精神上的事几乎毫无兴趣。至于他确实具有的文化和艺术上的兴趣，则极其陈腐乡气。他勇敢无畏，基本上是个傲慢自负的人，看不起大多数人（也许看不起所有的人）。他漫无目标地运用他的权力。

约翰·普林格尔<sup>①</sup>在《澳大利亚之音》一书里对孟席斯的描写切中要害：与其说他是个管理人才，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他以政治斗争为乐；爱发表演讲，只是经常把演讲跟政策的落实混淆起来；他的统治既懒散又沾沾自喜，偏爱驾轻就熟而不愿作困难的决定；他是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家，冷酷、机敏、狡诈，他的绝招是永远以国务活动家的姿态出现于众”。但所有这些并没能使澳大利亚人上当受骗。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那段时间里，孟席斯好像真相信他在做的事情；在那个阶段，他为“自由主义”辩护时，也许说的是心里话。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普通澳大利亚人都看不起他。他们对他被授予西斯尔骑士头衔大加奚落。人们普遍认为他太老派，从来都不诚恳。孟席斯比他的对手亚瑟·卡尔韦尔占上风的地方是，卡尔韦尔在个人形象上更显

---

① 普林格尔（1912—），英国作家，1958 年移居澳大利亚。——译者

得老朽。人们一次又一次听到澳大利亚年轻人说起，他们不敬重孟席斯，但是卡尔韦尔和他的工党的老调子更陈旧，那简直是先民的遗物。

人民对孟席斯的不信任好像受到了报应。他从不开诚布公，在对澳大利亚人民讲话时，他不把他们看成是值得信任的人。他担任总理的第一个任期是个彻底失败的任期，差点输了 1940 年的那次战时大选。他似乎对人民不很尊重，因此不向人民强调战争的意义，用提出要求来抓住人民的想象力。就好像他想包揽一切而不愿费心争取别人的信任。他甚至无法得到本党<sup>①</sup>的信任。在持续了几个月的公开争吵之后，他的党在 1941 年把他“干掉了”，迫使他辞职下台。在 1961 年，他犯了同样的错误。那时正在经济衰退之中，他却大肆夸耀自己的记录，从而得罪了人民。他能赢得那年的大选全靠了桑塔马里亚。虽然宣布 1963 年的大选是他自己的决定，但只是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党魁们对他施加了很多压力之后，为了争取选票，他才屈尊为人民许诺好处以显示对人民有足够的兴趣。孟席斯的真相是，他是一个在党内搞政治斗争的精明行家，他“斩尽杀绝”，毫不留情，但是作为竞争国家领导权的公众人物，他更多地得益于好运气而不是良好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人！）孟席斯在 1949 年和 1951 年相当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反对工党战后紧缩开支、节制消费政策的情绪。工党在 1954 年运气欠佳，在那以后，则是因为愚蠢而为他奉送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选胜利。

孟席斯对于利用工党奉送给他的大权而做事却毫无兴趣。这原本倒无关紧要，只要他能像一些跟他性情相仿的政治家一

---

① 即澳大利亚统一党。现在的自由党是孟席斯在 1944 年创建的。——译者

样，不仅追求勾心斗角的兴奋和大权在握的喜悦，也会利用能人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得以利用成功的行政管理的成果。可是，孟席斯喜欢做的，好像是让聪明人灰心丧气，同时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由平庸之辈组成的防护圈。在这点上，他是他那代人的典型。他本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他在世界上闯荡，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指引。在他那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才华出类拔萃。他当州政府的部长时还不到 30 岁<sup>①</sup>，1939 年当上总理时才 44 岁。（在 39 岁时他第一次出国旅行。）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人，这一代的人，除了自己，是很难得尊重别人的。寻找同类是这种人最后才会做的事情。他们不会信任同类。对孟席斯来说，1941 年在自己党的手里蒙受羞辱的那种苦涩（尽管多半是他自己的过错）显然使他断定，保住自己的地位要比政绩出色更重要。

在评价国务活动家时，人们可以采取一种通情达理的观点，即根据可能性、根据他与可能性相关的程度，以及他引导可能性的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看他是否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革，能否澄清观念和形象，强化行政管理系统，并抓住时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这种要求不高的治国才能标准来衡量他，人们可以说，在整整 16 年里，孟席斯极少看到时代的发展潜势。他的反应通常是种老派人的反应，指导他的是正在消逝之中的、从前的、更具农业社会特征的标准。有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体现的甚至不是他自己那代人的标准，而是比他还早的那代人的标准。这可能是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时，他最钦佩的是那些珍视与英国的联系的澳大利亚政治家，而那些人是真正的外省人：即自以为是以遥远的大都市的标准为标准的墨尔本

---

① 原文恐有误。孟席斯在当上维多利亚州铁道部长时已经是 37 岁了。——译者

绅士。孟席斯在他一生漫长的事业中总是强调“忠诚”，不过，他指的似乎不是对澳大利亚的忠诚，而是对与英国的联系的忠诚，对英王的忠诚。他好像总是把自己跟“忠诚”连在一起，而把工党跟“不忠诚”连在一起。甚至在柯廷政府在保卫澳大利亚不受日本人侵时，孟席斯的一些演讲似乎还在怀疑政府的“忠诚”。他倒不是怀疑政府在捍卫祖国的战争中的表现，而是怀疑它对联合王国的态度。如果以上阐述是正确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澳大利亚迫切需要调整方位，以便面向亚洲、面向科技的整个时期里，统治着它的是个深受本世纪初墨尔本盛行的外省标准影响的人。

## 孟席斯时代

孟席斯的辩护者们习惯于把 1949 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所有让他们喜欢的事都归功于他，哪怕有时他们无法证明孟席斯跟某件事有什么相干，哪怕是孟席斯自己都不据为己功的事，哪怕有时是孟席斯祈愿没有发生的事。同时这些辩护者们又并不遵守游戏的规则：他们不准备把 1949 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所有让他们不喜欢的事也都归罪于他。这些事他们往往怪罪于“人民”。

按照孟席斯的支持者的观点，澳大利亚的“工业革命”和经济飞速增长都是孟席斯的功劳（如下面要提到的，这甚至成了他在重整军备方面的失败的借口）。在分析这种为孟席斯辩护的言论时，人们根本不必考虑他的政策跟实际事件的联系，因为压根就没这些事。声称 50 年代初开始了一场“工业革命”是荒唐可笑的，声称从那时以来澳大利亚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是错误的。

澳大利亚的“工业革命”开始于 19 世纪，比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早。澳大利亚在建国后不久就在经济上实现了“起飞”。如果要用更具体的标准之一来衡量的话，那么澳大利亚的重工业基础早在 20 世纪之初就建立起来了。在那以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大萧条，制造业产量增长了 70%。在 30 年代，尽管经历着大萧条，制造业产量翻了一番以上。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澳大利亚人临阵磨枪，飞快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军火工业，为前线供应武器和军车，干得非常漂亮。战争结束后，在又一次惊人地出色的随机应变中，澳大利亚人以及外国人拥有的公司在奇夫利工党政府的鼓励下，把战时积累的技术、机器、工厂转变成了私营制造业。到孟席斯上台时，增加消费品的国产比例的过程早就已经开始了。连“工业革命”论的关键证据，即外国制造商在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人建立汽车生产厂之事，最早受到的鼓励也是来自奇夫利政府。而孟席斯的无动于衷则扼杀了哈特尼特<sup>①</sup>的创建由澳大利亚人拥有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尝试。

尽管有着所有那些“澳大利亚，潜力无穷”的豪言壮语，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自 1949 年以来实际上相对很慢。它的相对富裕，即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的繁荣，一直在衰退之中。所以，更确切地说，孟席斯担任总理期间的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

在社会全面改革方面，孟席斯亦乏善可陈。除了保健服务计划，1949 年以来他在社会福利上没有任何新的设想。不过，

---

① 劳伦斯·哈特尼特（1898—1986），1934—1948 年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澳大利亚霍尔登分公司总经理，因与总公司发生分歧而于 1948 年辞职，转而试图生产名为“哈特尼特”的国产汽车，未能成功。——译者

奇怪的是，孟席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对他国防力量几乎不通情理的忽视。他从来不假装是个社会改革者、福利国家主义者或者经济规划者，但他确实自称是在外交政策执行上的现实主义者和爱国者。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澳大利亚只有零打碎敲而没有协调统一的国防力量。澳大利亚一次同时只能把 6000 名士兵投入战斗，但没有强击舰把他们送到战场；没有足以运送一个营的兵力的运输机；没有能给地面部队以有力支持的空中打击力量；没有有效的海军航空部队；事实上连一支有效的海军也没有，海军变成了主要用于反潜艇的力量；大陆上没有充分的雷达和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60 年代初期的国防开支低至国民生产总值的 2.7%，比新西兰以外的任何发达国家都低。只是在同僚以及美国人的压力之下，孟席斯最后才匆匆忙忙扩建国防，把这个比例提高到了 5% 左右。

但这个数字还是没有说明问题的最重要的部分。例如，瑞典的国防开支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5%，而它却拥有一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或第五的最佳空军。瑞典人在处理国防问题时用他们的脑子，他们精简上层机构，采纳符合自己需要的政策，自行设计大部分的设备。孟席斯管着 5 个与国防有关的部，而瑞典只有 1 个。他似乎缺乏全面统一地考虑国防的智力。对本该主持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的人来说，孟席斯的统治是破坏他们士气的严重危险，因为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首创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宏愿，全被磨蚀殆尽了；他们成了堪培拉官员的侍臣。在孟席斯当政期间，几任国防部长都特别软弱无力。孟席斯的内阁会多次胡乱设法调整军方首脑跟内阁的关系，但总不见效。军队仍然主要由文职官员管理着，而这种管理又是凌乱分散的。孟席斯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他不是个与军队有缘的人。他会避免与军方领导人直接接触，除

非这些人退役成了平民。在他执政的多半时间里，财政部的会计人员规定了很低的开支限额，告诉与军队有关的各部门，这是它们可以花的所有的钱。从来没有根据情况需要而制定的协调的规划，有的只是逐年的临时应付。不过现在变化正在发生之中。

国防力量的衰弱使澳大利亚的外交根本无以达到其目的。外交本身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除非有宣传和恐吓的能力，但在堪培拉是肯定找不到这种能力的。即使到了这一步，按理说多少还是得显示点实力以使盟友相信自己至少在努力。正如贝迪教授所说的：“在表面上，我们在国防上作着重大的努力，以确保我们在盟国中的影响并施加我们的影响；而事实上，我们是在依赖盟国以放松我们的防卫努力。”人们应该记住，哪怕光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而不考虑人口平均水平，澳大利亚至今为止也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要是它的领导人有发展像瑞典那样质量的防卫力量的头脑，它就会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国防实力。从战略角度讲，它就会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强国，从而为它提供更强有力的外交活动的基础。

用不加掩饰的大白话讲，孟席斯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在面对亚洲新的实力态势时的政策是这样的：孟席斯作出若干承诺，然后不去设法履行它们。他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人，而那些意识到他在虚张声势的人则希望一旦有人不吃他那一套，逼他摊牌时，美国会往他手里塞几张好牌。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应该做的事情之一，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应用到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去，然后想办法使人民对他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孟席斯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过时的、与现实不相干的，他的世界观不能使他对当代和澳大利亚的问题产生真正的感觉。他无法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构想出计

划，因而他没有为任何问题构想出计划；或者他构想出的计划是错误的。例如，在他把一个营的澳大利亚士兵送到南越去时，他不想激起人民的想象力，让他们思考为什么有这必要。他随随便便就把这些士兵派了出去，好像他们是什么高贵的王子秘密地派出去为他干肮脏勾当的刺客。在这行动以后，他终于为之想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多半只是本科生在大学辩论比赛上的强词夺理，完全是针对批评他的人的。有证据证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这件事上是支持他的<sup>①</sup>，但他在对支持者说话时，也没有采取坦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亚洲从来没有真正引起过孟席斯的注意，而他对亚洲采取的态度使他成了自然趋势的巨大障碍。他在碍事。他最早的3个外交部长，斯彭德<sup>②</sup>、凯西<sup>③</sup>和巴威克，都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应该根据他们的岛屿跟亚洲紧邻的事实而重新调整思路，他们试图让澳大利亚人对之产生兴趣，但孟席斯使他们的努力一再受挫。孟席斯看到的只有伦敦。

孟席斯对当代问题缺乏感觉，对强调当代问题缺乏兴趣的毛病，不仅限于亚洲。很可能他看不起商务活动就像看不起亚洲一样。而在这个领域里，跟在外交政策上一样，一个政治领袖能够通过发表演讲、强调问题、显示风度而使人们改变态度，而这种改变也许比借助立法企图实现的改变更彻底。没有人能用立法使澳大利亚的企业家采取现代的态度，但要说服他们则是完全可能的。孟席斯应该告诉澳大利亚人民的，是他们想听的东西，即要求在不同领域里管理着这个国家的事务的精英们变

---

① 支持越战的舆论在1969年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反战抗议示威运动。澳大利亚在1970年开始从越南撤军，1972年基本撤完。——译者

② 珀西·斯彭德（1897—1985），1945—1951年任外交部长。——译者

③ 理查德·凯西（1890—1976），1951—1960年任外交部长。——译者

得聪明起来。但实际情况是，孟席斯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压制热情，阻碍解决问题，逃之夭夭。

在发表在《象限》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初版的评论文章里，欧文·克里斯托尔说：“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如果有优秀的民主化的领导，人民能够创造出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好的东西，并能真正地赞赏这种极其大众化的创造。要是没有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肯尼迪，美国的民主，根据其自己的定义，不仅会比目前贫乏得多，而且会无忧无虑地意识不到这种贫乏。有了他们，以及和他们同样的人，人们才能看到前途和潜力，而这种前途和潜力（我们希望）正在成为美国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种关于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职责的观点跟孟席斯所主张的一切彻底背道而驰。

## 孟席斯之后

没有比退出政治舞台更适宜于孟席斯了。变化中的世界使他困惑，他根本不愿费心为世界上出现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提供答案，于是不事声张地溜下了台<sup>①</sup>。他为英国授予他的五港总监<sup>②</sup>的头衔而心满意足，就像职员领班退休时捧着公司为表示尊敬而送给他作为礼物的镀金手表一样。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笔糊涂账，但没有给他的继承人留下如何处理这笔糊涂账的建议。

① 1966年1月22日，在结束一次内阁会议的时候，孟席斯轻描淡写地说道：“先生们，这是我给你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开会了。”他从此便辞职退休了。——译者

② 孟席斯是第一个被授予这个荣誉头衔的非英国人。五港指英国东南海岸上的多佛尔、黑斯廷斯等5个海港。——译者

哈罗德·霍尔特<sup>①</sup>取代孟席斯担任总理后，几乎立即就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对澳大利亚是重要的。霍尔特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移民政策中一些细微的改变。这些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它们的内容，而在于作出改变时的雷厉风行。不过通过重新阐释，这些改变至少赋予了行政管理上更大的决定权。霍尔特去了越南以及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国家，现身说法强调现在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他宣布，就越南而言，澳大利亚要“跟 L.B.J.<sup>②</sup>走到底”。在约翰逊总统对澳大利亚的惊人成功的访问<sup>③</sup>之后，霍尔特安排了南越总理阮高其的来访。后来他访问了柬埔寨（当时是中立国），透露了澳大利亚政策中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奥妙之一，即澳大利亚对所有不鹦鹉学舌的国家都保持友好。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语言里，他在社会稳定的观念以外加上了社会革命的观念。澳大利亚不再仅仅从共产主义威胁的角度看待亚洲，它也开始从那里的人民在自由和物质进步方面——即澳大利亚人自己享受着的自由和物质进步——实现突破的必要性的角度来看待亚洲了。

霍尔特某些决定的大胆泼辣使他的追随者惊讶不已。他在一场以越南问题为中心的激烈竞选中显示出来的勇气甚至得到他的一些批评者的承认。但是，在荡涤孟席斯主义方面，他似乎动手很慢，他的成功本来允许他大刀阔斧的。他的政府继续显露出前几届政府的许多特点。他的自相矛盾削弱了他对澳大利亚人的想象力的影响效果。在议会里，他依然表现出一个夸夸

---

① 霍尔特(1908—1967)，1966—1967 年任总理，1967 年 12 月的一天在维多利亚海滨寓所附近的海里游泳时失踪，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译者

② 即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1908—1973)。——译者

③ 约翰逊访澳所到之处，都遇到大规模的反越战抗议示威，人们高呼口号：“约翰逊，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几个年轻人？”

其谈的议会老手的委琐，只有那一点点怨恨才使他的冗长、杂乱、单调无味的演说有点生气。在另一方面，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理想主义，或者机会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使他紧紧抓住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作为政府政策的中心方针之一。不像孟席斯，霍尔特的政治敏感性是现代的。他探究当前至关重要的事；他喜欢这些事因为它们至关重要；他为政治目的而利用这些事。不幸的是，在表达重要事情的意义时，他用的是一个市长在宣布新的儿童照料中心开放时用的语言，脸上带着一个年老的踢踏舞女永不磨灭的微笑。

不过，霍尔特的机会主义，加上他流露出来的不以身为澳大利亚人而感到羞耻的信念，以及他期望澳大利亚的邻居或许在某一天也能享受澳大利亚的某些特权的善意，表明他是有希望的。人们有种印象，即不像在每况愈下阶段的孟席斯，霍尔特至少对他的工作还感兴趣。

## 观念的形成

### 新闻文化审查

本世纪以来，在其他民主国家新闻文化审查搞得糟糕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更为恶劣。澳大利亚总是不合潮流。在对与性有关的问题的审查制度实行宽松政策方面，澳大利亚至今落后于其他民主国家。世界上其他地方突如其来的自由化在澳大利亚只得到部分的反映。1965年，被禁止进口的《查特莱夫人的审判》<sup>①</sup>的一个版本在澳大利亚重新排版，独立印刷。联邦政府对这一挑战作了让步，取消了禁令。在那以后不久，政府又取消了对《洛莉塔》<sup>②</sup>、《少年教养院的孩子》<sup>③</sup>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禁令，可能是害怕有人依样画葫芦，也去印这些书的澳大利亚版。这种新的反抗方式使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在嘲笑国家的审查制度的澳大利亚知识分子信心大增，他们千方百计钻新的空子以愚弄法律。

这类禁令从来没有严重地妨碍过人们的阅读。任何人只要对书本有丁点儿的兴趣，都会在从海外回国时把禁书走私进来，并互相借阅，这是家常便饭。让人愤慨的是，政治家居然以能参

与禁书为乐。这种经常出现的提醒人们极端保守主义的过去的事,对那些认为政治家只是对什么是人类的价值缺乏正确判断的人来说,是种公开的侮辱。

电影审查在性的方面已经不那么严格了,它现在更注重的是暴力。在对旧片作重新审查以便在电视上放映时,所有以前剪掉的跟性有关的语句和片断现在都复原了,但其他跟暴力有关的语句和片断则被剪掉了。对新影片的审查宽松多了,不过在删剪时还是比大多数民主国家苛刻。

在 50 年代中期,由于教会,主要是天主教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引进了若干新的针对大众读物的审查法。一些州建立了出版许可证制度,另一些州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不过在那以后就没有多大的动静,只有昆士兰的文学审查委员会,因为匆匆忙忙、大手大脚地干蠢事而丢了一回丑。这个委员会号称是在捍卫“西方文明”、保护年轻人不受“道德败坏之徒灼热的暗箭”的伤害,开始时显得好像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可以任意禁止而不给理由。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抑制了它的活动。有意思的是,尽管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对他们自己想看的书本实行审查,他们差不多从不谴责对普通大众读物的审查制度,有时甚至还支持这种制度。

## 学 校

阻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不光是缺乏研究和领导的胆略,

---

① 英国作家塞西尔·罗尔夫(1901—)在 1965 年发表的小说。——译者

②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在 1953 年发表的小说。——译者

③ 爱尔兰作家布伦丹·贝汉(1923—1964)在 1960 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译者

还因为中层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技术员，在中下层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统计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虽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它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非常低。它的深入教育计划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因而它在培养技术专家的竞赛中也落后于人。澳大利亚没有培养训练新人才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组成部分的规划，它有的是大量围绕着越积越多的危机的为时已晚的仓促应付。在一些中学里，只有一半的教师受过大学教育。比较数字表明澳大利亚人才浪费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技术员的短缺比大学毕业生的短缺更严重，以至于有时工程师只能把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花在专业上，其余时间都花在技术员能干的活上了。大学里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太高。攻读高学位的学生的比例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则太低。

由于资方和工会目光短浅，加上政府没有魄力，澳大利亚的学徒制度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那一套。年轻人与公司签订学徒契约，在5年期满结束时，却通常没有技术考试。学徒训练没有国家标准，那是“各州的事”，虽然联邦政府的劳工和国家服务部在试图通过联邦手段改进学徒训练。学徒们往往得不到在技术飞速发展又飞速淘汰的时代必需的那种广泛而通用的背景知识，也得不到在适应性方面的训练。要改进这一切的话，还需要延长中学教育的期限。

各州教育部门的整个结构是专制主义的。由于澳大利亚疆域辽阔、人口稀疏以及地方政府软弱无力，各州的教育系统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首府城市的周围。在每个州里，得以同样的方式教孩子们同样的东西。男女校长们几乎没有任何自行决定的权利，他们作决定时根据的是教育局的行政命令而不是地方上的决议。探索创新性质的实验几乎没有可能。学校教师就像斯大

林时代的俄国官员那样被不可捉摸地调来调去。教育局的全部基调就是控制和纪律，它们的管理有时甚至达到了冷酷残暴的地步。教育工会里讨论的基调是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小学教师们定下的，而那基调跟专业化几乎彻底风马牛不相及。大学毕业的教师必须为教育局工作一段时间；而这些人在大学里有时受到他们的导师的羞辱。

学校在教育局的遥控之下，经常跟它们所在的社区互相隔绝。因为教职员的频繁调动，教师往往是地方上的陌生人，至多是友好的临时工。社会参与的学校活动局限于捐款和提供设施。在维多利亚州，当伊格尔波因特地区的妈妈们开始用学校免费给的牛奶做可可茶时，教育局对她们说，免费发放的牛奶只能作纯牛奶喝而不能变成其他形式。在遭到公众反对以后，教育局长修改了政策，允许小的学校用免费牛奶做可可茶，条件是它们事先应申请并得到批准。但是当维多利亚州母亲俱乐部联盟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学校也能用免费牛奶做热汤时，她们立即就受到纠正：“教育局没有考虑过这个意见，以后也不会考虑。”在澳大利亚如此可怕的制度下，众多的教育机构居然还能生存下来，这真是一曲人类精神忍受力的颂歌。

如果少数人的观点得不到保护，不仅民主会变得徒有其名，而且会有害于教育和人类的尊严。澳大利亚教育所需要的最大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能够实行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权力下放，即允许教师成为他们在其中执教的社区的一员；允许学校校长有更多的主动权；在教师中培养对专业的责任感；允许差异和实验；以及允许更多的社区参与。这一改革甚至可以跟寻求保证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控制、制定各种标准的大纲、建立能够胜任的规划部门的宪法改革同时进行。

## 生 活 的 写 照

在澳大利亚学校的教室里向孩子们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除了在天主教学校里，几乎没有对宗教人生观的介绍。在大多数学校里，没有对尚武精神的颂扬。绝对没有对国家的崇拜。主要是在收费的非天主教学校里，还有一些从前英国人的那种为国效劳的思想残余，但已陈腐不堪了，与社区和家庭生活毫不相干。有时学校也宣扬爱国，但往往主要是文学课和历史课上的事，对已经变得惯于怀疑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本世纪初那种信心十足的民间爱国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大英帝国作为一种信条已自然地消逝了，不过还有一些对君主制的谄媚和想从“英联邦国家”的概念中提取意义的企图。学校里很少有好奇心和疑惑感。最容易激起好奇心和疑惑感的领域可能是自然科学（以其唯物主义以及新的甚至包含着对科学本身的疑惑的怀疑主义，自然科学教育应该能对年轻的澳大利亚人造成自然的影响），问题是学校里最薄弱的就是自然科学教师。那些往往对自己捍卫或攻击的东西不甚了了的人文学科教师，给高年级的教学埋下了许多反自然科学的偏见。人文学科教师中有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怨恨，因为它的文明价值不需要鼓动“人性的发展”之类的玩意儿。

学校里也肯定没有对吃苦耐劳、自力更生以及“自由经营”的意识形态的崇拜。之所以会这样，除了这些意识形态基本上跟澳大利亚的情况没有关系以外，还因为学校教师往往对实际事务有某种敌意。他们的士气如此低落，以致他们的主要情感就是对雇用他们的教育局的憎恨。就他们对实际世界的态度而言，他们感觉到只有疏远和对立。他们觉得实际世界有害于文

化价值(这些教师自己其实也经常有害于文化价值,但他们在公开场合总是为这些价值辩护)。他们对别人在“外面”挣大钱羡慕不已。实际事务与文质彬彬、乏味无聊、循环反复的学校生活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因此一定是不对的。(其实任何观察家都知道,实际事务也有文质彬彬、乏味无聊的循环反复。)

在另一方面,学校关心孩子们应该“有出息”,通常是指有一份好的白领工作。这种“有出息”不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干劲十足,而是指在轻松的工作中不声不响地赢得尊敬。这种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却能为享受家庭生活和参加体育活动提供足够的闲暇和金钱。问题不在于工作效率高,而在于如何得到有优越退休条件的工作,同时不招惹是非。在理论上,天主教学校应该是与这种风气唱反调的,但实际上它们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点上,人们不仅为孩子担心,还得为鼓励孩子“有出息”的教会的名声担心。

过着既不适应他们自己的现存的职业标准、也不适应社会标准的生活,许多教师似乎觉得与人性中的弱点更为接近。在潜意识里,这样的教师可能更喜欢明理懂事、规规矩矩、彬彬有礼、智力中等的孩子。当前教育思想中流行的慈善精神可能就与这种对人性弱点的认同有关。弱者引导弱者。在这种情况下,“为民主而教育”变成了对民主的低劣的嘲弄;信仰多数人说了算变成了信仰平庸;平等主义和博爱主义变成了雷同;自由变成了拯救;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哪怕另外一些人要吃亏。“满意的生活”变成了人人相同的生活。不需要新的想法。不再有新的实验。我们一如既往,反正总有人会照顾我们。

幸运的是,对上述现象有一种抗衡的力量,否则澳大利亚人现在早成了一个傻瓜的民族。有些教师喜欢出类拔萃的学生,

并乐于培养这样的学生。有些孩子为了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拼搏。学生们,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对教师颇不信任。不过,总的来说,教育澳大利亚孩子们的是那些经常处在淡淡的绝望之中、为自己的物质和社会地位耿耿于怀、远离实际事物、远离他们在传播的文化的真正价值的教师,这个事实太重要了。只有认识到教师和学生是如何疏离于他们被迫面对的文化价值,人们才能深入到澳大利亚人的问题的核心。

## “学者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的大学可以说具有那种外省大学的高水平<sup>①</sup>。它们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一些次要大学的相当忠实但索然无味的翻版。甚至在那时就有人激烈地抨击它们除了“学位铺子”以外几乎一无所长。不算几个辉煌灿烂的例外,大学教师们就总体而言没能创造出能够对中小学的毕业生进行改造的大学。通常没有什么特点能把一个大学毕业生跟社会上其他比较成功的人区分开来。然后是有一阵子,来自人数越来越多的比较年轻的人的日益增加的要求,以及更多的技能教育的要求,好像让那些负责与大学有关的事作决定的人大吃一惊、灰心丧气。有些大学领导的水平低下。有些大学里的新派“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上好像是外行。再以后则开始有了进步。

大学生活总的气氛,尤其在研究“人文学科”的学者中间,不是生气勃勃的(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记录表明,在将近 7000 名大

<sup>①</sup> 在英国,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外的大学蔑称为“地方的”,“外省的”。——译者

学全职和兼职教研人员中，最能引起持续而认真的群体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是钱。这跟别人个个都在赚大钱的令人羡慕的神话有关。我听到有的“学者”抱怨说，他们碰到的“劳工阶级的人”都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挣这么少的钱。而实际上，所谓的“这么少的钱”是社会上平均周薪的好几倍。年薪 14000 元的教授觉得商人挣得比他们多得多，但除了顶尖的以外，事实并不如此。这种自卑自怜感和疏远感甚至影响到他们对待学生的态度：他们看着学生在教室里进进出出，对学生的数量和要求怨气冲天，同时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在不搞自然科学的人中，对自然科学的兴旺还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忐忑不安，或许是妒忌。

对相对收入作比较的有意义的一个领域是自然科学。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当具体地分析工资行情。在人文学科里，除了个别例外，一般是没法这么做的。真要贸然一试的话，大概至少有些搞人文学科的人在外面挣不了这么多（这不是批评他们）。问题是，除了一些例外，自然科学学科是无法开出有竞争性的条件或者提高工资以吸引新的人才的，就像教育局不能给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师支付比别人高的工资一样。大学里当家的通常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人，而招募新人的工资是根据拉丁语教授的工资确定的。

非自然科学的“学者”在澳大利亚一般都不甚突出。中层尚能胜任，但高层就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了。就是偶尔才华横溢的人，也会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而无法保持优秀。澳大利亚的缺乏竞争、缺乏对杰出成就的兴趣，加上墨守陈规之徒一定程度的妒忌或者纯粹的误解，使人才黯然失色。文森特·巴克利<sup>①</sup>在《澳大利亚文明》一书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为澳大利亚的非自然科学学者描绘了一幅令人信服的图画：“他们都被体制同化了；他

---

① 巴克利(1927—1988)，诗人、评论家。——译者

们对自己的职务很在意，习惯于城郊生活，……跟任何产业工会会员一样，他们对工资和提职看得很重。……他们不讲那种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为了思考以及促使别人思考的废话；与之正好相反，他们存在是为了‘干’份‘工作’。……如有一个在文学方面什么题目都能讲的讲师所说的：‘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看成一份9点上班、5点下班的活’。凡是有理想的中小学讲师都知道，一旦一个人以加薪、工作待遇以及类似的东西作为令人腻烦的自我辩护的借口，听任自己一生的事业被贬抑到一份‘工仆’的地位，他很快就会对一直那么热中地从事的工作冷讽热嘲起来。……在‘干活’时，每个人只管自己的那份‘工作’。工余时间是用于高雅的生活的。史密斯夫妇过段时间就会去看望琼斯夫妇，喝点从大肚酒瓶里倒出来的红葡萄酒，吃点装在木盘里的法国色拉，同时聊聊汽车、孩子以及假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学者们的基本信念是保守的。其中有些人是跟企图控制首府城市的笨拙的阴谋集团有联系的反动分子。如今依然还有些这样的保守主义，风格上自然有所变化。但是就整体而言，今天的澳大利亚学者持的是正统的自由派观点。他们抨击新闻审查制度、出版许可法令、绞刑、警察；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不信任自由党，痛恨民主工党，同时为工党担心；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他们厌恶反犹主义，但又常常对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疑虑重重；他们害怕麦卡锡主义，不过往往错误地把关于在工会里的共产党影响的热烈的讨论说成是麦卡锡主义。若干年纪更大的、通过西班牙内战和对希特勒的仇视而学到政治的人，还在用30年代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们的忧虑恐惧和所作所为中，有时有种歇斯底里的味道；他们语言中的陈词滥调有时使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有些学者与企业界人士结伙，有些与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搭档；不过，大多数人对实际事务的态度则说明了在澳大利亚由于社会分裂而造成的失望是多么严重。学者们在论述公众事务时，往往并不比别人更有根据。有时，如经济学家的学术讨论，确实比较了解情况，却因为考虑得不够透彻而不能让受过教育的听众听明白。

在搞学问的人中间有一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感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多数学者都会赞成悉尼一个讲师的意见，他说学者“比人类的大部分都更公正、敏感，不自私”。这些人对任何不是由学者进行的脑力活动都不信任，似乎大学以外的人不可能有时也为某个“课题”作出贡献，或者似乎大学里的研究“课题”包含了知识交流的全部领域。这种怀疑态度经常表现在对文学和艺术的冷淡上。文学艺术在他们眼里不是专业课题，而是非学术性的。在澳大利亚学术界人士中，没有很多人的谈论表明他们意识到了时代面临的主要的文化上的困境（没有人以此作为专题研究项目）。他们中一些人好像采取了普通澳大利亚人的观点，即时代面临的主要文化困境跟我们毫不相干。另一方面，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他们往往更热衷于朝自己脸上贴金。在大学工作的身份在一些国家通常要远比在澳大利亚更为社会所尊重，而那里的大学学者却不像澳大利亚的同行那样沽名钓誉。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特点，即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常常把文化生活与学术生活看作一回事。

澳大利亚学术界的普遍气氛与其说是学术上的责任心，不如说是与世隔绝、自卑自怜；与其说是积极主动，不如说是消极被动，连在大学事务的管理上也是如此。大学在满足时代的要求方面十分勉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给学生开课，给考卷打分，仅此而已。

## 新闻界

没有人能够实现彻底的独立。不过即使以不太理想主义的独立的定义来衡量,可以说在澳大利亚经常公开而有深度地讨论公众事务的人中间,没有多少人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整个从事新闻职业的阶层已经变得或多或少受商业意识的控制。社会上再也没有一个修养良好的有闲阶级了。除了个别例外,大学中的学术界人士沉默寡言。只有极少几个有独立见解的记者兼出版人能写内容丰富、有创见、有风格的文章。澳大利亚没有伦敦、纽约或西欧那种标准的“高质量”的日报或星期日报,也没有英国和西欧那种独立、在社会上地位稳固、员工素质良好、撰稿人多而精的“高质量”的记事表意的期刊。报刊杂志上极少出现反映事物发展的新概念,就连一般的背景知识和说明材料也不容易见到。就新问题进行持久严密的辩论的可能性极小。极少有记者能花时间深入一个领域;直至能够对该领域作出详实的说明;或者跟踪一个故事,直至抓住其关键。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头脑中澳大利亚生活的形象往往是那些千篇一律、粗糙简陋的老一套。各级决策人和知识分子都太习惯于阅读过分简单化地描写澳大利亚的文章了,加上他们的孤陋寡闻,使他们在谈论澳大利亚时变得粗暴无理。他们对复杂的事物因为无知而动辄发怒、缺乏耐心。他们不明白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分析各种可能的抉择。

在更为先进的国家里会被揭露曝光的一些事情,在澳大利亚则能通行无阻。我们的一些政治家要在其他的国家,会被媒体讽刺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想生存下去的话,非得改善自己的公开形象不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在澳大利亚现在变成了非

常一本正经的事情，这些讨论对社会上那些主要人物的价值深信不疑，同时美化他们的虚夸浮华。放肆莽撞和怀疑一切的传统几乎完全消失了。老百姓知道政治家常常是小丑，而有权有势的人常常是玩弄权势的骗子，但著书撰文的人不再告诉他们这些，虽然从前澳大利亚有些出版物宣扬的简直是布莱希特<sup>①</sup>的世界观。老百姓不相信新闻界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新闻界常常虚假地声称它几乎总是反映澳大利亚的芸芸众生，好像芸芸众生会得到认真对待似的。对普通澳大利亚人来说，公众事务现在显得既虚伪又遥远；而舆论制造者们早已精疲力竭了，他们只会用些陈词滥调进行思考，根本无法捕捉住人民中的怀疑情绪。这简直就是精神衰竭在搞鬼。

澳大利亚一般知识分子或决策者往往把以上那些一股脑儿地归罪于各种日报，好像知识界所有的专业知识和复杂性都是报纸提供的。通俗报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每天总共卖出 350 万份<sup>②</sup>，以便达到足够大的发行量，从而吸引足够的广告，然后从广告收入中赚钱。他们的读者是普通老百姓。不能指望它们提供智慧生活的营养，像吃药片似的，每天在早餐前吃一颗。精神生活需要许多经常和定期的表达方式。澳大利亚在公众事务的讨论上之所以毫无成效、外行幼稚，与其说是因为日报的不足，不如说是因为精神生活的表达方式的薄弱或缺乏。

一种评估澳大利亚报纸的公正的办法是把它们跟美国的地方报纸作比较。总的来说，在本地新闻的报道和阐述方面，澳大利亚报纸相比之下不很出色；在海外新闻的报道和阐述方面，它们略胜一筹。澳大利亚对国际事务的报道通常是零零碎碎不成

---

①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译者

②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

系统的，没有背景材料，没有深度，但往往比美国的报道领先。澳大利亚报纸关于国际新闻的篇幅已经比单从赚钱动机出发所允许的多得多了，所以不大可能再增加这方面的比例。要是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或决策者想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必须以海外出版物作为补充。在当地新闻方面，澳大利亚报纸缺乏美国报纸的勃勃生气、冷讽热嘲以及细致具体。它们难得出去发现故事。许多故事本来可能有助于报纸的销售，但是对什么才是“故事”的刻板的态度意味着澳大利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还没有被考察过。人们从报纸上得到的澳大利亚生活的印象是狭隘和古里古怪的，例如，那里没有对移民的详尽报道，甚至连对工会运动的详尽报道也没有（艾伦·里德<sup>①</sup>是个例外）。

澳大利亚新闻界中已经在社会上站住脚跟的那部分人士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约翰·普林格尔在伦敦住了6年后回到澳大利亚，他说：“我在回到悉尼以后的第一个印象是……自从我6年前离开以来新闻界的变化是多么微小。字体和版面是老样子，故事本身多半看上去也是老一套。……我找不到哪怕一个新的特征或一个新的作者——当然，有些作家改向别的报社投稿了。……我找不到一个新的专栏作家、一个新的漫画家，甚至一种新的连环漫画。噢，是的，有一种从英格兰买来的新的连环漫画。”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好作者能得到的报酬相对很低。有抱负的新闻工作者往往摆脱写作而转入行政管理，或者干脆彻底离开新闻界。

一些记者只是随叫随到替人捉刀代笔的打杂人。新闻界几乎完全没有培养行业性的共同参与意识的努力。记者工会不给会员灌输进取心。新闻业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作为谋生手段的吸

---

① 里德(1914—1987)，名记者。——译者

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澳大利亚报纸的经理人员还没有让他们的报纸堕落成伦敦的那种除了新闻以外什么都登的低级小报。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编造追求轰动效应的荒唐故事。他们通常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骄傲。他们在关心盈利的同时还关心报纸的声誉。不过，他们对别人的攻击过于敏感。批评别人时干劲十足的人在别人抨击他们时会变得非常暴躁易怒。几乎任何批评都会被他们看成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事实是，澳大利亚并没有足够多的批评；而现有的批评往往是毫无根据，或者出于私心的。报人们有时把自己看得太重，他们想把所有与书面文字有关的荣誉都揽为已有。跟其他许多澳大利亚上层人士一样，他们显然希望得到远比份内的更多的赞扬。他们以为自己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而历史令人忧心忡忡。要是这些人能以更坦率的态度面对世界，少一点假装的满不在乎，多一点澳大利亚式幽默的自我诽谤，他们也许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不讨人喜欢。

不过，在澳大利亚出版界有些新的发展，开始时是在期刊方面，现在体现在一份“全国性报纸”上。这多半可以归功于 4 大主要大众媒体集团中的 3 个。由澳大利亚联合出版社出资的反映知识界观点的双周评论刊物《观察家》在 1958 年初问世，在同年稍后跟着出现了由一个私人团体发行的《民族》。这两份杂志达到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那些看不起澳大利亚的潜力的人认为可能达到的数量，它们为澳大利亚公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从前回避的实质性内容。由《悉尼先驱晨报》发行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同时开始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它对经营管理和经济事务的报道为消息灵通的讨论增加了更多的材料。澳大利亚联合出版社对《公报》杂志的接管以及由与《观察家》有关的人员对《公报》的改造使这场出版界的小革命颇具戏剧性。《公报》本是

在 50 年前就开始消亡的那个老的澳大利亚的象征，在 1961 年那几个对变化的受害者来说非常可怕的月份里，这个代表着过时观念的残余物被撕成碎片，而被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报刊取代了。新闻有限公司集团在 1964 年 7 月开始发行的《澳大利亚人报》为出版业的格局增加了一个新因素。《澳大利亚人报》是澳大利亚第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它同时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印刷，代表着在澳大利亚发行“高质量”报纸的第一次尝试（它也夹杂有一些更能招徕读者的内容）。在同一个月里，由《悉尼先驱晨报》买下并全面更新的《堪培拉时报》也变成了一份以质量见长的报纸。

澳大利亚出版界发生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主要报纸固步自封，原地踏步的同时，进行各种探索性实验的园地转移到了新的出版物上去了，后者是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发行，并由新型的人组成工作人员班子。还有很多变化在进行之中，那是光凭对报摊的随意一瞥不容易觉察到的。但是，这些变化对那些主要报纸没有直接的影响，尽管出版所有这些新读物（《民族》除外）的集团同时也控制着那些主要报纸，只有极小的一群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出版商一起，在实行这一变化。

## 知 识 分 子

迄今为止，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没有给予它任何明确的含义。这样大概比较安全，因为不管给它什么意义，在澳大利亚，那种有实力、对公众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这使澳大利亚成了世界上最古怪的国家之一。凡是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现在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澳大利亚是例外。不过看起来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也

维持不了多久了。事实上,情况正在改变。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一个由知识界和趣味高尚的人组成的发展中的中产阶级,尽管它依然缺乏领袖、自信,以及成熟的与大众交流从而向大众施加影响的渠道。

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我指的不光是那种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思想家。富于创造性想象力的思想家不是系统地就是通过深刻的洞察力表现出对他们的环境的好奇心;他们设想世界的模式,或者既考察存在的某些神秘之处,同时也假设它们的模式。其他知识分子只是这种人的中介体。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可以是把新的观念传递给公众以改变公众立场的力量,也可以是保守型的压抑创造性智慧的绝缘体,甚至使创造性智慧显得傻里傻气或者任性固执。创造性智慧和大学之间并不一定有所联系。相反,在多数大学学者隐士般地保存和传播知识或详尽阐述(即研究)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保守主义,往往窒息了创造性智慧。所有这些过程在澳大利亚都有发生:这里有富于创造性智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新观念被传递给了公众,影响了公众的看法;他们也在这个其基本结构不允许独创性概念的社会里屡屡碰壁。有的澳大利亚人进入了世界知识界,如约翰·埃克尔斯<sup>①</sup>爵士和麦克法兰·伯内特<sup>②</sup>爵士因为拓展了在某个领域的探索范围而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的放射物理学家也在拓展他们专业的探索范围。澳大利亚的作家、画家和哲学家

---

① 埃克尔斯(1903—),神经物理学家,因“确立了神经细胞抑制与细胞膜的极化恢复之间的联系”而在1963年与英国科学家安德鲁·赫克斯利和艾伦·霍奇金一起获诺贝尔医学奖。——译者

② 伯内特(1899—1985),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因提出“接种疫苗可预防病毒感染”的假设而在1960年与英国免疫学家彼得·梅达沃一起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译者

的观点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引起了关注。

澳大利亚在“终极智慧”方面的薄弱体现在缺乏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这种缺乏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或者体现在迟迟不对澳大利亚的现状进行思考。澳大利亚知识分子倾向于回避 20 世纪的重大挑战和主要观念。在澳大利亚通常不可能进行那种在欧洲或纽约的知识分子中立即就能接受的对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知识阶层”显得较为薄弱。澳大利亚没有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广泛的阶层,这些人熟悉人类思想史(至少是其梗概),并能意识到人类思想史与自己的联系;他们熟悉分析、归纳、推断的方法;他们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工作,而这些领域唯一的共同点是“较高程度的抽象或者对某些共同经验的较高程度的利用”;他们能把知识和好奇心运用于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上去;尽管职业不同,他们能就日常事务进行平等的、有实质内容的、缜密的交际。正是缺乏这样一个阶层,可能给澳大利亚的未来造成危险。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指的主要也就是这种人。

一个“新”的国家也许需要有(区别于郊区生活的)城市生活以培育这种人,以及发展远比澳大利亚现存的更多的不同职业团体之间的交流。它也需要定期阅读材料,便于从中了解信息、了解有关什么思想在主导着世界的知识。拒绝相信知识分子一度曾经是澳大利亚的方式。有时候,知识分子唯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场合是某个教授在电视上讨论时插科打诨,显示出自己的低俗平庸。这种对才智的压抑意味着许多澳大利亚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毛病,即他们的知识在荒废,或者他们以一种早已过时的姿态冻结起来了。顾影自怜式的孤独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把自己承包了出去。

澳大利亚有一种日渐兴旺的咖啡文化。各种咖啡馆是受移

民欢迎的约会见面的场所，在白天则是一些职业人士如律师、广告商、帽子推销员以及年轻人爱光顾的地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也许在咖啡馆或酒吧里一起度过好几年的知识分子小群体的生活，然后就会逐渐减少直至停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隐退了，回到了郊区。在年轻人和其他人，比如说，40来岁的人之间，没有推心置腹的交谈或共同的意见。要是一个40来岁的人在年轻人出没的咖啡馆周围转悠，那些年轻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在找妓女什么的。

最活跃的小团体常常是那种文学或艺术性质的，不管其成员是老一辈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还是新的“垮掉的一代”。在这样的小团体里，一无所有是美德，而疏离社会是大原则。澳大利亚也有那种不写作的“作家”和不真正绘画的“画家”。对这些人来说，当个“作家”或“画家”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这类团体往往是反知识分子的。即使是在那些写得好或画得好的人中间，一般的风气也是反知识分子的。正如彼得·科尔曼所说，他们是一些“跟着感觉走”的人，而不是“跟着思想走”的人。要做“跟着思想走”的人，就是做学者。

澳大利亚问题的核心是，它从欧洲继承下来的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是与澳大利亚生活的现实相冲突的。菲利普斯<sup>①</sup>在《澳大利亚文明》一书中指出，幸福唾手可得是澳大利亚人的基本信念，然而它还没有像波利尼西亚人欢天喜地的性格那样深深地积淀在人民的气质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影响还反映着欧洲文化中的那种不满意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在欧洲很强烈，但它并不是澳大利亚社会的准确写照，因为澳大利亚人得到的比他们应得的多。欧洲小说家对等级制度的着迷本身在

---

<sup>①</sup> 菲利普斯(1900—1985)，文学评论家。——译者

澳大利亚就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不过其有趣的程度以及跟澳大利亚相关的程度就跟研究蚂蚁群体差不多。

澳大利亚是一个从欧洲派生出来、然而已经发展了许多非欧洲特点的社会，人们却指望它完全用欧洲文化的标准判断、观察自己，并且还不是采用当代欧洲文化的标准，而是以往欧洲文化的标准，正是这样一种处境，可能是许多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极端反知识分子态度的根子。他们碰到的事情跟别人告诉他们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看上去毫不相干，这使他们困惑不解。别人告诉他们的有些显然是不真实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教导他们的人并不彻底熟悉自己在传播的价值观念。这些人搞的是一揽子销售，他们传播了那么多跟现代生活明显无关的东西，使得那些与现代生活有关的也变得不怎么可靠了。人文学科的教师们知道这里有问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并不遵循他们背得烂熟的规定。他们于是变得对社会怒气冲冲。在他们眼里，社会变得无关紧要、怪异畸形，而不是充满了挑战，他们得努力才能理解。人们发现，甚至连左翼人士也在为富裕而悲叹，他们断言随着在经济上挣扎的需要的减少，民族的道德素质在下降。实际上他们说的其实只是某种准则的改变。

在澳大利亚人中欠缺的是一种对人类历史的真正的感受、对某个在充满惊讶地探究环境之谜时臻于辉煌的永存的知识界的归属感。澳大利亚知识界至今关注得更多的是重要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而不是国家的性质，但其目前的成员应该能够胜任从人类知识史的角度来看待澳大利亚的性质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人“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学习”文化，似乎这种文化记载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态度，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这一过程也使他们“学”到的文化的相关性显得虚假。这种虚假感甚至对那些非常彻底地“学习”了文化的人也有影响：

他们不能区别他们自己的社会跟他们所“学”的文化代表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因而他们“学”到的文化中的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如对恐怖、失败、谬误的领悟，也会显得不真实。澳大利亚人不能理解生活中的悲剧（或者喜剧），这可能使他们在幸福总的来说依然得之不易的世界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有教养”的澳大利亚人似乎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关于幸福的概念，理由是这种概念不包括在他所“学习”的文化之内，与此同时，他又可以将他“学”到的文化中所包括的恐怖和悲剧的现实置之脑后，而照样当个“幸福”的澳大利亚人。他是落泊之人，他无法与其他澳大利亚人谈论他们“学”到的文化，因为他们无论是对这种文化、还是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都没有真正的感受。对神志清楚、讲求实惠、快乐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看上去不是发疯，就是在寻找也许并不存在的理性。“有教养”的澳大利亚人无法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即外国人的行为方式中也会表现出思想意识上的非理性。“学”来的文化的问题不局限于澳大利亚，但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几个国家，这些问题最为严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一些新的、多半还不为人理解、未得到描述的生活的特征正在浮现。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已经有一种新人生活在新的社会里了。澳大利亚的魅力之一，是它有可能成为最早出现的这样的新社会中的一个。

知识分子与自己同胞的生活方式的疏离，以及与“学”来的文化的疏离，可能是澳大利亚知识界生活中某些弱点的根源。“智慧”变成了一种珍品，它可以学习，可以传播，但除了某些微小细节，它不是动态的。你不使用它。它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在第一章里说“澳大利亚真的那么排斥思想见解吗？还是呈现在它面前的思想见解本身有什么不妥？”时，心里存在的就是这个问题。

无论是因为对实际生活和对“学”来的文化的疏离，还是因为对快乐的癖好，反正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往往缺乏耐力。在多年的惊讶好奇之后，一些人销声匿迹了；其他人尽管仍在从事着脑力劳动，但他们通常似乎并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千方百计地尝试，他们似乎缺乏追求尽善尽美的冲动。关于公众事务的讨论常常变成了大喊大叫的比赛，谁也不掌握太多的细节。他们不是想得太大太高，就是想得太小太低。他们或者一知半解却大喊大叫，或者在细节的重压下萎靡不振。那些明白对各种替代方案进行严格审查的必要性的人往往在审查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以至于无所抉择。而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不总是理解替代方案的所有可能性；或者不懂决策是一个现实的、讲求效果的过程，即必须对各种方案及其可能的后果进行审查，然后作出决定，哪怕心里还有疑惑。

一些知识分子偏爱晦涩的风格，这是到处都能见到的特点。不过在澳大利亚，这特别令人感兴趣。在那些“学”到文化的人中间，似乎有一种对清晰明快风格的不信任。有关公众事务的封闭的信念系统也很普遍。没有人重视争论中的微妙之处（专业方面的内容除外）。知识分子就文章的“形象”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反应，而不屑于对细节作任何调查。发现一个论点，他们就会想当然地臆断其他的论点。他们似乎拒绝接受一种可能性，即除了专业出版物登载的文章，其他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奥妙或人所意料不及的新思想；或者除了专家以外，其他人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在另一方面，专家写的文章在他们眼里似乎就因为是出于“行内”而神圣不可侵犯。

不过，如今在澳大利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有更大的发展或有更多的有组织的知识界活动。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中有了另一种认识，即知识分子可以是变革的记录者以及对实际事务至

关重要的新问题、新态度的传播者。虽然不像肯尼迪的内阁，澳大利亚政府内阁的一半人是不读《冲突》<sup>①</sup>杂志的，但一些比较好的部长阅读能到手的东西；一些年纪较轻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现在也在读书。

在先前提到的新型出版物的涌现的同时，一些新格调的、社会文化性而不是老式的文学性的“小杂志”也在发展起来。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小册子。在书籍出版方面，现在有了能吸引知识分子兴趣的图书。曾经有过一个对历史进行松散的重新审查的阶段，这就有了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仔细研究的开端。研讨会和讲座越来越多了。不过，在作出澳大利亚正在经历一场“复兴运动”的判断以前，人们必须注意到，像澳大利亚人口这样稀少的国家需要有比大国在比例上更多的文化活动，而事实上澳大利亚连相同的比例都还没有达到；在澳大利亚至今还是不容易得到充分的解释性的信息；还不能说有任何真正的有竞争性的对思想的砥砺；在新的杂志上目前还不可能进行高水平的严密而持久的讨论。

现在时行把知识界的新的活动看成两大派。一种是墨尔本派，它强调社会进步和澳大利亚主义，相信人类可以臻于完美，有高度的道德感；另一种是悉尼派，它强调高度的文化和世界主义，接受生活中的缺陷以及对政治的冷漠，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同时又乐天知命。前者需要读帕特内辩论<sup>②</sup>集，后者需要读柏拉图对苏格拉底<sup>③</sup>受审的记载。在墨尔本大学，人们觉得英国

---

① 1953—1990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政治杂志。——译者

② 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平均派士兵和低级军官与将军们在帕特内就建立共和国的《人民公约》进行的辩论。——译者

③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其《申辩》一书记载苏格拉底被审判时的自辩以及服毒自杀前的议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以蔑视传统、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反对民主等罪名被雅典奴隶主政权判处死刑。——译者

清教革命<sup>①</sup>(不是在宗教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还在继续进行；他们不懈地关注维护道德、确保动机的真诚；他们对永恒正义的实现充满信心。在悉尼大学，人们回避“幻想”和“困惑”；他们对世界万物的分析都是消极的；他们自认是上帝的宠儿并以之作为慰藉。前者的代表是马克斯·克劳福德<sup>②</sup>教授，后者的代表是约翰·安德森<sup>③</sup>教授。

不过，以上这些对比已经有点陈旧了。随着人们不断突破原来的局限，知识分子的生活比从前要更加多样化了。

---

① 即标志着世界近代史开端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要求废除英格兰国教的旧制度和繁琐礼仪、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的清教徒，故名。——译者

② 克劳福德(1905—1991)，历史学家，1937—1971年任墨尔本大学历史系主任。——译者

③ 安德森(1893—1962)，哲学家，悉尼大学教授，悉尼自由思想传统的代表。——译者

## 幸 运 之 邦

### 靠运气生存

澳大利亚是一个主要由二流水平的人物治理的幸运之邦，这些人沾了国家好运的光。澳大利亚的生存依赖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尽管它的普通老百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它在所有领域里的大多数领袖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太缺乏好奇心了，以至于经常会措手不及。这个国家对生活方式的重视远甚于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然而它建成了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富裕社会。它是在一种基本上不利于创造性和对卓越的渴望（体育例外）的社会环境中取得这一成就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少地听到对勤勉劳动的颂扬。按道理说，澳大利亚是不配有这样的好运的。

但这道理也许不对。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在将来的科技社会里，对艰苦劳动的崇尚可能会成为享受幸福的障碍之一；到那时将有办法让大多数人少干活而不会在经济上相对窘困。澳大利亚是率先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假期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人或许比世界所想象的要激进得多，但也正是在

这方面,澳大利亚人自觉惭愧。还有,不管多么难以想象,持续繁荣并不非得有对创造性和优秀事物的感受能力不可。一些人会说,如果澳大利亚人真有本事在缺乏创造力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经济繁荣,那该向他们祝贺。说到底,在商业主义充斥的社会里,许多创造力和对优秀事物的感受能力都消耗在像电视机上的新式旋钮、削豆子的新办法之类绝对微不足道的小玩意上了。

本书排除了其他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日本人似乎有可能占领澳大利亚的1942年初,万斯·帕尔默<sup>①</sup>在《Meanjin》杂志<sup>②</sup>上写道:“往后几个月不仅可能会决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生存下去,而且会决定我们有没有资格生存下去。我们至今的成就没有一桩在外人的眼里证明我们有这个资格。……我们也许会从地球上消失,为后人留下极少的痕迹,表明在若干代的时间里,曾经有个民族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建设过一个家园。……没有什么东西能显示这里存在过一个具有共同的目标或丰富的生活情趣的民族。”

帕尔莫对他的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澳大利亚除了表面能看到的那些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特点了,那么,它就应该像白种人为了商业利益而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一样,被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摧毁掉,那是些外表堂皇富丽实则不堪一击的泥墙。但是事实上有一个潜伏着的、不太容易捉摸的、精神上的澳大利亚,它跟那些旧世界的帝国主义泡沫相当不同。……它爱冷讽热嘲,又富于理想主义,也许有点不善言辞,那是真正属于这里的人们的澳大利亚。……它能为世界作出一定的贡献。

---

① 帕尔默(1885—1959),诗人、作家。——译者

② 1940年在墨尔本大学创刊的文学季刊。Meanjin是个土著词,意为“小块土地”。——译者

当然现在在艺术上还谈不上,但在行动方面,在创造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方面,它能有所贡献。人人平等的民主必将是未来所有文明社会的基础。需要我们拯救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

即使在战时人们在担心澳大利亚是否会被敌人毁灭时,这些议论也是极不寻常的。(那时住在悉尼一些濒临海湾的郊区的爱冷调热嘲的理想主义者担心日本人的轰炸而廉价出售了他们的住宅。)然而,战争的灾难表明——总的来说——不爱拖泥带水的澳大利亚人在应付意外时是如何地泰然从容。澳大利亚人的怀疑主义及对临阵磨枪的偏爱意味着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勉强混过来了。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有一种赌棍的好运。但哪怕是使用“赌棍的好运”这个词组都会造成误解,因为这个词组暗含对风险和不安全感的认识,而澳大利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考虑风险。澳大利亚的救命绝招是有本事在最后关头急剧改变方向、找到快捷方便的出路。这是有点赌棍的沉着冷静的风度的。这种改变可以几乎不经任何讨论,可以轻描淡写而没有戏剧色彩。澳大利亚人的神经特别坚强。他们憎恨讨论和“理论”,但他们能在大事不妙前就溜之大吉。

## 幸运能否持久?

不过,有两个领域光靠好运和临时随机应变是行不通的。一是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二是对技术要求的反应。就前者而言,在亚洲发生的事件不冲击澳大利亚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极小极小;而如果抱这种侥幸希望,那是愚不可及的。至于后者,侥幸过关的可能性似乎根本不存在。不彻底根本改变其生活方式的话,澳大利亚在新的科技时代将无法保持其繁荣。正是因为不可能避免这两大挑战,我在前面提出澳大利亚已经完成了

其历史的第一章。事物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澳大利亚将以某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否则，如果事物原封不动，处于目前状态的澳大利亚同样也会完蛋。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不管做什么，澳大利亚都可能受亚洲可能发生的灾难的牵连而狼狈不堪。除了百分之百的胜利，各种各样的灾难都会使世界变得不利于澳大利亚。在东南亚还有若干危机，虽然不是直接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会给澳大利亚添麻烦；不说别的，这些危机首先就会吓跑移民和海外投资。澳大利亚永远也不会具有影响世界全局性大搏斗结果的实力，不过它可以参与，并在一些局部的小搏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经济越发展，人口越增长，它的角色就越重要。当目前掌权的那代人退出历史舞台后，澳大利亚公众生活中的那种僵硬不化和落伍陈旧能迅速改变，从而使澳大利亚接受它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吗？增加人口，加快经济发展，充实军事实力，改变对亚洲的态度，这些说说是不难的；对于澳大利亚的生存来说，这些也许都是必要的（但还嫌不够）；对于澳大利亚要在亚洲承担的重要角色（更确切地说，它为自己规定的角色）来说，就更不用说了。问题是，这些会发生吗？

澳大利亚有能力抓住使它在置身其中的世界里起更大的作用，有时起先导作用的极好的机会吗？它会抛弃那种它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国家、它不会出任何毛病、历史的不幸跟它无关的信念吗？或许澳大利亚人能干的要比他们肯尝试的要多得多，但他们太谦逊了，他们相信他们与重大事件无缘，因为他们的国家还太年轻，还不够重要。他们无法理解悲剧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太看重快乐了。他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常常是自己的错觉幻象。

技术发展的挑战不会像亚洲的挑战那样紧张刺激、富有戏

剧性，但对经济和社会则极其重要。澳大利亚赌的是大注，因为它要维持的是一种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为繁荣的总体水平。也正因为如此，衡量那些管理澳大利亚经济事务的人的标准必须很高，把他们跟一些在苦苦挣扎的小国里管经济的人相比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高踞顶峰，我们必须采取最高的标准。我们能保持繁荣和目前的生活方式吗？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这种熙熙攘攘能持久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来是“不”。就是说，如果一如既往，澳大利亚的人均国民收入将逐渐减少。（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本书的初版里写下这些文字以后，在一年的时间里，据某种估计，澳大利亚在世界最富裕国家中的排名从第五位跌到了第十位。）

澳大利亚至今在物质上的成就是因为它的人民大众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和适应能力，能以现代方式干活；因为他们渴望购买消费品从而使经济得以不停运转；因为他们的领袖们，尽管通常不是杰出人才，不过借助于政府保护，还是有本事领悟从海外接收到的指示。现在这些不够了。在新的时代里，物质进步不大可能以最高的速度持续，除非社会投身于改革，进行更高水平的训练，增加科学家、工艺师和技术员的比例，更强调行政管理能力，在思维方式中引进技术管理的角度和态度。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只是极少有像澳大利亚这样迟缓的，而在极有限的像澳大利亚一样反应迟缓的国家里，这种反应代表了社会模式的转换。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才智和技能是国家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哪怕在这些国家的文化精神中还有相反的因素。但在澳大利亚，才智和技能是没份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企业直接由海外的公司经营管理，但总得有足够的澳大利亚人能够理解并执行新的指示才行。要招募足够的移民为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不大可能的。按现在的远不能满

足需要的培训规划,等到这一危机变得显而易见时,恐怕得花10年时间才能解决了。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想到经济增长时,都觉得人们应该更努力地工作。这种从清教徒信仰习俗遗传下来的观念与真理也许正相反。我们或许该追求让“工作者”少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多得多的思考、训练、组织和聪明才智。我们现在从教育制度得到的职业上的收益只是应该得到的一半左右,而且情况可能变得更糟。单是说说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基本建设,即投入教育、研究和开发,应该寻找人才并授予人才以大权和威望是容易的,确实也应该这样。问题是人们必须认识到,这样做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而那将使澳大利亚文明的许多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物质繁荣程度继续是检验政府政策的标准的话,这样的社会革命在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生活态度的革命性变化对进一步物质繁荣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发生。要是一个政治家、政府官员、工会领袖或公司董事不想改变赋予他生活意义的那些观念和习惯,他是不会改变它们的;他的固有的观念习惯对他来说远比国家的进一步物质繁荣更重要。一般说来,人们宁可保持原有生活方式而不要物质进步,这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仍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原因之一。我在这里鼓吹的,是要彻底推翻和摧毁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领袖所普遍信奉的观念。如果我的鼓吹无效,那么澳大利亚很可能会发生全民沮丧,国家会变得一蹶不振、落伍陈旧、不知所措、怨声载道。

不管多么声嘶力竭地大肆鼓吹,没有人民付诸行动,社会革命的概念还是一文不值。澳大利亚老百姓看来是有适应能力的,关键是高层掌权的人。从不同代的人之间观察到的差别可以使人们对变化的可能性(无论变好变坏)增加一点信心。在上

面的是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奉行的是基于不再灵验的古训的那一套。只要看看电视上的领袖——他们低垂的双眼、他们的不能直视摄像机、他们对当今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冷冰冰的态度、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的不厌其烦——人们就能感觉到、总结出失落的一代人的症状。白哲特<sup>①</sup>对几代政治家的评论完全适用于整个几代人：“一般说来，一代人……几乎是无声无臭地继承上一代；在任何时候，有相当影响的都是 30 到 70 岁之间的人；每年都会除去许多老人，许多人会老了一点，每年又会引进许多新人。但有时会产生突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事务倾向于发生大的变化，变好或变糟。有时国家因之被毁，有时则从此欣欣向荣；无论如何，极少能原封不动的。”

澳大利亚人并不很容易接受一代人取代另一代人的概念。他们对这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更没有在多数发达国家里常见的新闻媒体对各代人的归类。作家们对这个过程缺乏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们执著于用 19 世纪 90 年代的迅速发展来描写澳大利亚特点，而不是把这种特点看成一种动态的过程；或者是因为一种相反的愿望（对前一种执著的叛逆），即根本不想发现任何澳大利亚的特点。社会上有一种“澳大利亚人”应该意味着什么的传统标准，人们希望保持这个标准而不去追究“澳大利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承认一代人会不同于另一代人，就等于承认出自 19 世纪 90 年代的著作的关于“澳大利亚人”的静止的概念是错误的。）旧观念和老年人的持续的主导地位在后辈中引起很多模仿或外表上的模仿。杰弗里·达顿<sup>②</sup>在《民族》杂志上说，澳大利亚的 30 岁以上的人大概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一

---

① 白哲特(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译者

② 达顿(1922—)，诗人、作家、编辑和出版家。——译者

些年轻人念念不忘的是“成熟”。如达顿所说：“贬低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万无一失的办法是说他怎么老长不大。”

尽管如此，在貌似相同的底下，人们可以观察到差异。人们可以作某些猜测，同时基于个人通常属于他们特定的时代的认识而对这一概括进行修正。总的来说，孟席斯—卡尔韦尔那一代遗老的特点是逆时代潮流、以死水为养料、有强烈的外省人心态。他们是联邦制度建立后的一代，澳大利亚各州组成联邦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从英国势力范围的角度发展他们关于世界的理论；他们会比英国的同辈人更落伍，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去 50 年里全球急剧动荡的冲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崭露头角的那代人把自己看成是具有钢铁意志的改革者，他们独断专行，以才气横溢的随机应变改变了澳大利亚的面貌。他们造成的变化往往代表了 30 年代的梦想而不是 60 年代的需要；他们依然自视极高而毫不信任底下的人（他们在交接班上的困难多半是他们的自作自受）；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有时这种直觉纯粹是巧合）、意志力以及玩弄权术。战时和战后初期的那代人更能理解时代的要求，比他们正开始取而代之的那些人更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他们更明白高度技能和合作的重要性。他们是以复杂得多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的“新一代”。他们中有的效仿那些“强人”，有的已经显得疲倦了。他们中一些佼佼者也许已经被那些“强人”的业余水平弄得沮丧不堪而失去了锋芒。无论如何，这批人是澳大利亚目前的希望。比这代人更年轻的那代人显得更有朝气，不过还像难解的谜，不好捉摸。有人指责这代人享乐至上、愚昧无知，然而他们表面上的愚昧无知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对强加给他们的虚假的生活观点的装聋作哑；他们的某些享乐至上主义可能正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强烈特征的表现（清教徒主义对这种特征的干扰现在小多了）。

这一代人也许是真正叛逆的一代，他们正在发展自己的风格，他们也许将是改变澳大利亚的一代。

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再也没有使命感、没有那种重大事件(灾难除外)还会发生的感觉呢？小国通常依赖历史的支撑或未来的启迪，可澳大利亚看来既失去了对历史的感觉，也失去了对未来的感觉。人们在呼吁请求，但没有呼吁请求的对象；人们想使政策“合理化”，但不知道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人们需要有某种能让其所作所为与之联系的目标感，就像个人需要一种身份感，一种明了自己的历史，明了自己达到了历史上特定的一点，明了自己面临着某种未来的感觉。澳大利亚之所以没有使命感和历史感，或许是因为它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个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不产生新思想，只会向海外寻求支持和认可，它只需在很小的范围里作决定因而不采纳别人的重大政策。对于那些功成名就、但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的老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处世方式。而在更活跃、更年轻的人中间，则有另一种感觉，即澳大利亚可以重振其历史雄风；不过在不同的方面。他们对亚洲感兴趣。这种兴趣，加上对教育和聪明才智更多的重视，可以证明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创造性的、自由解放的因素——如果该有这样的因素的话。

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人也许能恢复自信和自尊。跟失败居多、有时低三下四地试图保持与欧洲人的家族联系的努力相比，不同的澳大利亚人在亚洲的不同地方能以不同的方式感到更自在、更重要。举几个例子：虽然日本是工业大国而澳大利亚不是，但在亚洲只有这两个国家实现了经济飞跃；它们在工业化世界里都如鱼得水；它们都是贸易大国；它们可以把自己与亚洲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它们是做生意的搭档。1963年，有一伙日本人在周游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后到了

澳大利亚，这些人说澳大利亚使他们更感到亲切舒服。日本人很看重澳大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比澳大利亚人还看重澳大利亚。他们把澳大利亚看成大洋洲的“大国”，因而显示出比澳大利亚人更多的洞察力。另一个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亚洲知识分子”所沉湎的话题与某些澳大利亚知识分子醉心的话题差不多，他们都特别爱用“亚洲”这个词，尽管对亚洲一知半解；他们都在虚构各自的“民族主义”；他们都从最微不足道的艺术作品里看出艺术突破的迹象；他们谈论的都是反殖民主义、欠发达和外国剥削。第三个例子：一个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假如他想避免在言论上刺激马尼拉，同时希望在某个小的方面至少做点实际的事情，那么他会喜欢那种不善于纸上谈兵的澳大利亚专家。讲求实效、不肯轻信的澳大利亚人可以对亚洲的高谈阔论充耳不闻，就像盲人在枪林弹雨中一样。他们在那，在亚洲，指导着虫害控制、信贷政策、灌溉和语言教学之类的小事，正是这样无数的小事帮助文明得以生存而不至于被美言浮词所湮没。这些澳大利亚人对通则概论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做点具体小事。他们那种不搞抽象概括、一心一意干活的本事对那些注重实际的亚洲人该是有吸引力的。

由于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它跟英国的联系、它的繁荣富裕以及它的渊源于欧洲这一不辩自明的事实，亚洲对澳大利亚心存怀疑；但是，人们应该记住，在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之间就有那么多的差异和疑惧，澳大利亚通常并不是大多数人仇恨的主要对象。而对某些传统政策的修正还能增进友好关系。当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 1963 年作出修改，把澳大利亚划为亚洲国家时，许多亚洲人感到很高兴，他们觉得沾了光。他们希望澳大利亚能屈尊下驾，与大家平等相待，并对自己的作风表示自信。他们再也不甘心蒙受侮辱了。而所有这些——不鹤立鸡群，接

受自己的环境，脚踏实地地干事，与邻居友好相处——正是澳大利亚的显著特点，澳大利亚的天生才能的一部分。如果澳大利亚人能够以“本色”出现，那么，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得以缓和（基于实力冲突的紧张关系则另当别论）。

在澳大利亚向亚洲炫耀自己的物质繁荣时，亚洲人也许会感到嫉妒，但同时他们也会表示敬意，他们知道这种富裕不是来自对其他人民的剥削。许多人把这一成就看成是奇迹。（也有人会问：你们怎么会变得这么富裕的？为什么你们比我们成功得多？）许多亚洲人尊重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他们把它看成一种意味着不能将澳大利亚等闲视之的“特殊关系”。（显得软弱未必能赢得信赖和尊敬。）老的英联邦纽带在亚洲依然有意义，由于这种关系，澳大利亚人有时能与巴基斯坦、印度和马来西亚人相处得很好。贸易联系到处都能增进互相尊重，而在日本则更为明显。至于对不为人注意的大洋洲的那些民族来说，澳大利亚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伟大而强有力的朋友。

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跟那些在印度、马来西亚、香港或马尼拉的大学里读过书的人有着同样的问题，即他们得到的都是二手货。更专注于亚洲也许能使澳大利亚的精神生活摆脱狭隘和沮丧。澳大利亚的精神生活有种其特有的潜在的“风格”，可是它往往缺乏表现自己的自信而沦为模仿。对亚洲许多新的已经建立的领域的专注，以及可望通过小心翼翼不冒犯别人的文化交流而激发的新的想象力，能使澳大利亚成为亚洲重要的智能活动中心，从而成为世界的一个智能活动的中心。

接受技术的发展变化、与亚洲的交往、宣布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的震撼（在那一天到来之时），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件将会使澳大利亚重新振作起来。同时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在上层根据普通澳大利亚人的某些价值观进行调整。在比较年轻、受清

教主义影响较浅、不老是忧心忡忡地与欧洲人对比的澳大利亚人中间,许多变化也许正在发生,如对愉悦更热情的赞许,承认人在世界上能看到的只是他和他的周围环境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中的极端随便的忧虑,以及没有根深蒂固的信仰而照样行动、照样尝试的能力。澳大利亚人早清楚他们的行动失误颇多,与此同时他们就是喜欢行动。他们知道怎样当没有目标的英雄,怎样讥诮地承受苦难,怎样接受他们始终也不相信的准则。肯·英格利斯在为 1964 年澳新科学发展协会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说,在澳新军团纪念堂里纪念阵亡者时,吸引人们的不是基督教教义,而是前人在面临悲壮英勇的严酷考验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人生观。例如在经济计划中,这种态度就能帮助澳大利亚一路过关斩将。计划将特定的心态和模式强加于人,它导致行动;一些行动不遵循计划,于是人们随机应变、修改教条;怀着同样的不信任,人们继续行动。人们既是冷嘲热讽的旁观者,又是兴高采烈的参与者。最后总是一无所成,但人们照样勇往直前,似乎卓有成效一般。这就是生活。

不论在澳大利亚的什么地方,只要身处敏感而明智的中年人之间,一旦交谈达到一定的深度,人们就会体会到一种紧迫感: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人们则能体会到一种对生活表面形象与实际世界之间的荒唐怪诞的脱节的震惊。那些热爱祖国的人,或者用更含蓄的澳大利亚的说法,那些担心子女的前途,或者整天猜测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人,谁也无法想象出将来。那通常被看成是个政治问题,因为以孟席斯和卡尔韦尔为代表的过时的形象矗立在那里,看上去不可动摇,尽管实际上不可能,领导权的交接被视为换汤不换药。在那些对这种永久性的静止不变状态感到害怕(这是一种突破了对政党的忠诚的情绪)的人中间,有一种不信任自己国家的感觉,一

种对找不到负责的、聪睿的人的担忧，没有新人作出突破的担忧，一切因循守旧、没人能胜任工作的担忧。这种绝望的感觉有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准确的预测。澳大利亚精英们的循规蹈矩也许太强大而会压垮那些能看到新的可能性的人；保存某些信念和现行生活方式的愿望也许会粉碎所有对新的需求作出反应或重新界定现实的企图。贤人多的是，只是权力所在的那些体制的惯例跟他们作对，令他们窒息，或把他们排斥在外。一个原本对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充满独特的希望的国家正在变得保守反动起来，死抱着陈规不放——或者它的领袖们是这样。

无论如何，总有些事情会发生。时代的需要早晚会摧毁现时的惯例。正如白哲特讨论到的几代人之间的突变，事物不会原封不动，变化的结果也许是凶，也许是吉，也许如愿以偿，也许一败涂地。澳大利亚当今不是考虑小修小补的时候，而是要着眼于广泛全面的改革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基于对现实的某种认识，但不能基于只考虑到眼前可能性的实惠主义。在眼前根本没什么可能性。但是总有一天，现在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广泛改革的观念会显得有道理、切中要害。改革家必须置眼下大权在握的人于脑后，那是些不可救药的人。现在是无关紧要的，他必须朝前看，最好能产生一些在以后能激发行动的想法。在澳大利亚目前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讲求实际的方法大概是不讲求实际。

人们可以希望事态的发展将会释放出潜藏在澳大利亚人中间的好的进步的素质，而不会保留、美化那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希望生活越来越轻松安逸，社会日益繁荣昌盛；可以希望那种博爱的理想会逐渐发扬光大而把亚洲各族都包括进来（年轻人中显然已经在这样做了）。这样，澳大利亚的人口问题可以最终得以解决，即通过也许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大规模的亚洲移民。

不过这大概是很多年以后的事。那时，只要科学的巨大进展能使目前无法开发的地方开发出来，澳大利亚或许能真正成为这片大陆的主人。在一片大陆上建立一个其价值观与普通人的愿望有某种关联的新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但将比美国更成功。

在目前，任何事情看上去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澳大利亚人的某些特点是可以被解放出来的。几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化也许能满足技术方面的某些要求。在知识界，尤其是艺术上，已经出现了突破的萌芽。经验主义的智慧才华也许能在防止空谈的同时，为经济计划增加一种新的从实施要求出发的角度。面对着外部的世界，澳大利亚人需要发挥出他们固有的干练和勇敢。澳大利亚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有很多年没有表现出来过了，但看起来那依然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大特点，就像那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特点一样。澳大利亚人的优秀品质应该得到描述、赞扬以及充分发挥。他们的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宽容、他们对欢愉的认识、对公平竞赛的见解、对物质享受的兴趣、他们的家庭观、他们对自然的认同和对自然资源的感知、他们在方向明确时的适应能力、他们的博爱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随机应变的本事、他们的勇气和不屈不挠，所有这些都是能够构成创造一个伟大国家的优秀品质。应该激励这个国家在现实的意义上发挥出其才能。许多问题威胁着澳大利亚的未来，但我们或许会有好运。绝对值得为之一试。

Donald Horne  
**THE LUCKY COUNTRY**  
Penguin Books, fifth edition, 1998  
Copyright © Donald Hor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GUIN AUSTRALI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9-094号

**澳大利亚人**  
——幸运之邦的国民  
〔澳大利亚〕唐纳德·霍恩 著  
徐维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頁数2 字数184,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2345-3/D·057  
定价：12.80元